

沫若
自傳

草
之
春
秋

郭沫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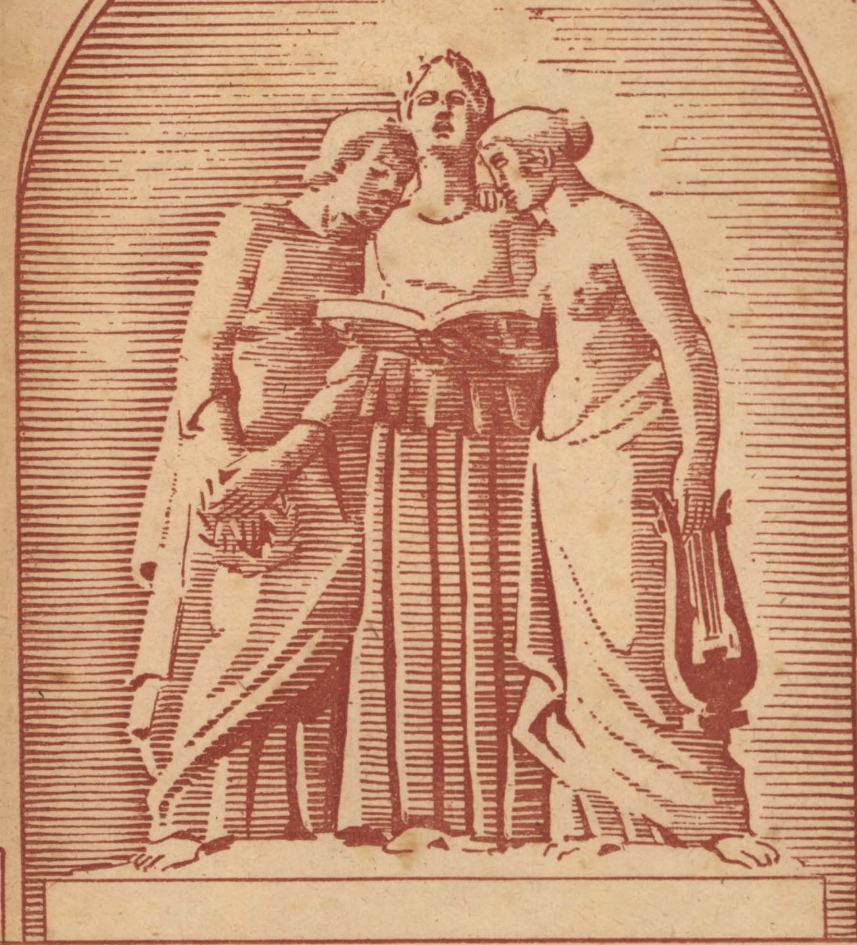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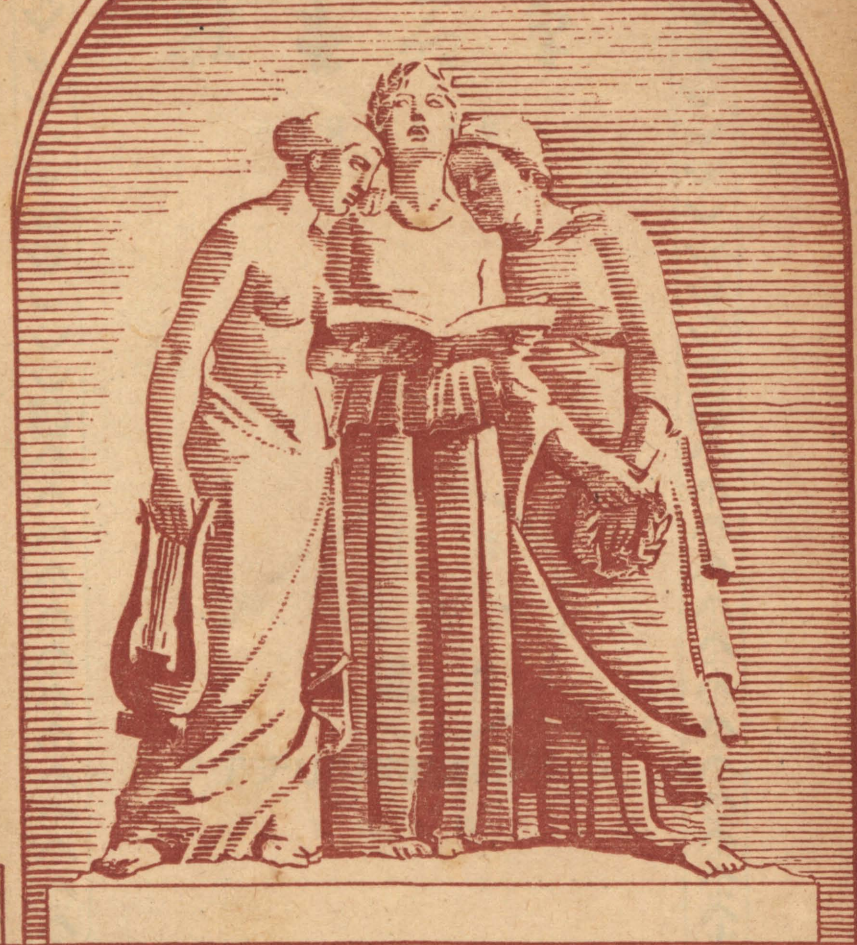


區十三第
枚第幾國州都
行陸東第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57598



SAM



秋 春 名 草

卷二第·傳自若沫



行刊店書燕海

1 9 4 9



曲江河畔

北伐時代的照片，我手裏所存着的只有零星的幾張，都是我的內子替我保存下來的。那時她被留在後方的廣州，我偶爾寄了些照片和信回去，她都替我保存了下來。這兒所插入的一張也就是其中之一。

這照片的前列，左側是俄顧問鐵羅尼，中間是鄧擇生，右側的便是我。後列立在我背後只露出一頂帽子的，不記得是誰。中間拿着一把芭蕉扇的是我的勤務兵薛紹三，另一個是擇生的護兵楊昇。可惜紀德甫沒有被收在這裏面，他的照片，我手裏一張也沒有。

原片背後寫有兩行說明，是：『廣州出發後，搭乘火車至韶關，此乃翌朝在韶關曲江河畔待舟時。七月廿五日。』大約是北伐第二年的一九二七年在武昌寫的。那時紀德甫早已陣亡，鄧擇生也跟着鐵羅尼跑向俄國去了。

由廣州出發時是在七月尾間，日期記不清爽了。照片是藝術股的股員攝的。

一九二九年一月十二日所寫的我的童年的「後說」裏面有着這樣的語句：自己的計劃本來還想繼續的寫下去，寫出自「前」後在成都的一身生活，「次」我前後在滬外的一身生活，「最後」寫到最近在上海土庫裏的一部革命春秋。

自「前」後是寫出了。→「次」我前後在滬外的一身生活也是在日本留學的時候。那可以分為「大」學以前和「大」學以後。大「學」以後的生活有一部分是保留在「創造」十年裡面的，只有「大」學以前的那一頁，特別是「歐戰」我期中的一頁，是脫了「軌」的。我在這兒想把她自由學生生活一文拿來補缺，使它成為自「前」後「創造」十年之間的橋樑。

北伐這次也只是北伐期中的一個片斷，其意其後都不曾完整地寫出，這也是一件憾事。時代相隔過久，記憶已經模糊，自己是沒有編寫的興趣了。好在在革命代和自己的精神活動上，少伐這次和創造十年倒是有藕斷絲連地銜接着的。因此就之要地把它與聯合併起來，而各之以革命時代。這和原來所打草草的寫一節草率而不成，並不一致，但主要的內容也不外是這里所敘述的一回事了。

創造十年及其後編前沒有把創造社的歷史寫定，其缺由就是北伐以後從期創造社的由那一部分。那與其讓那裏字筆寫是讓仿其初集了起來字更更寫寫一點。

創造社生活也是革命嗎？是的，至於由生活上說這社。

一九四七年五月一日

郭沫若

目次

序

學生時代……………一

創造十年……………一五

創造十年續篇……………一七

北伐途次……………二六

學生時代

此
页
空
白

自呱呱墜地時起，便要從母親學習言語和一切智識，人生的開始應該就是學生時代的開始。我母親事實上是真正的蒙師，她在我未發蒙以前就教我背誦了好些唐宋人的詩詞了。但我的發蒙是在四歲半的時候。家裏有一座家塾，面對着峨嵋山的第二峯，先生命名之爲『綏山山館』。先生姓沈，字煥章，是犍爲縣的一位廩生，在我未出世前六年便到我們家裏來教書了。家塾裏除掉偶爾收納一兩位親戚家的子弟外，都是自己家裏的人，人數在十人上下。但這點小人數的家塾，拿程度來說，卻是大中小學乃至幼稚園都有。

發蒙時讀的書是三字經、司空圖的詩品、唐詩千家詩。把這些讀了之後便讀詩經、書經、易經、周禮、春秋和古文觀止。庚子過後，家塾裏的教育方法也漸漸起了革命，接着便讀過東萊博議、史鑑節要、地球韻言和上海當時編印的一些新式教科書。先生又得到一部教會學堂用的算數備旨，根據着這書來教我們的算術。當時我們還寫不來阿刺伯數字的草書，因爲那刊本上都是用的楷書，而且算數不立程式，祇是算草，但那樣，在我十二歲的時候，已經把開方學完了。

科舉制改革的初期是廢八股，改策論，重經義，因此有一個時期乾嘉學派的樸學，就在嘉定也流行過一時。沈先生是不長於這項學問的，有族上的一位長輩郭敬武先生，在成都尊經書院讀過書，是王任秋先生的高足，他在流華溪開館。我的大哥橙塢先生曾經往那兒去就過學，因此又從那兒把樸學的空氣輸入了家塾來，教我們抄說文部首，讀段玉裁的羣經音韻譜，但這些東西在當時一點也不感覺興趣，只覺得是痛苦。

做對子是六歲開始的，做試帖詩是七歲開始的，後來就改做經義論說，算還沒有學做過八股。數學演算是每天都要做的，算數備旨裏面的每一道問題都不曾忽略過。點讀御批通鑑也是日課之一，而且還要抄御批，這項也是一樁刑罰，一長串的人名字點不斷時，最感覺頭痛。

是甲辰年吧，科舉廢了，各地興設學校。我們那偏僻的鄉鎮也有了蒙學堂的設立。省裏有武備學堂和東文學堂出現，我的大哥進了東文，二哥進了武備。但我們的家塾並沒有廢，我們的學課內容比蒙學堂的還要充實一些。我們只跟着蒙學堂的先生學過體操，同時在家塾的園子裏也備了一些運動器械。接着嘉定城裏有高等小學堂的設立，我考進了那個學堂，於是我的家塾生活便告終了。這大約是甲辰年年底的事。

嘉定的高等小學堂設在北門外的草堂寺內，學生的年齡程度極不整齊，有三四十歲久考不第的老

童生，也有十二三歲純潔無染的新少年。課程也極其零亂，凡是新式的課目與數學格致之類，教師都不能勝任。對於我自己在家塾裏已經學習過的人尤其不能滿足。我是鄉下人，年紀輕，因而常受城裏的老學生們欺負。第一學期的成績最優，老學生們嫉妬，發生撕榜風潮，並以不堪入耳的侮辱相加。先生們不能制止，反而屈服，因我端午節曾請假數日回家，便扣了我六分的總平均分數壓到第三名，重新改榜，算把風潮平熄下去了。這件事對於我一生是第一個轉捩點，我開始接觸了人性的惡濁面。我恨之深深，我內心的叛逆性便被培植了。

在小學堂裏新的東西沒有受到什麼教益，但舊的東西如國文講話地方掌故之類，卻引起了我很大的興趣。帥平均先生的今文尙書講義是我最喜歡的一門功課。帥先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廖先生也是尊經書院出身的王任秋的門下，帥先生的講義和我在家塾裏所受到的段玉裁的小學得到印證，因此特別感覺興奮。這種覺感在別的同學們的心裏似乎並沒有。

嘉定是適宜於讀書的地方，環境很好，山水十分秀麗。星期日在平坦如路的府河上划船。向青衣北岸的凌雲山和烏尤山去遊覽，遠望磅礴連綿的峨嵋山，近接波濤洶湧的大渡河，在那澄清的空氣中令人有追步蘇東坡之感。在凌雲山上有蘇東坡的讀書樓，有他的塑像刻像和題字，也還有好些遺跡，如洗硯池，載酒時遊處之類。凌雲山的岩壁上，正當着舊大渡河口，與峨嵋山正對着，鑿了一尊大佛，這是很有名的，是唐

— 8 —

代海通和尙所鑿。在那大佛脚下河水匯爲一個深潭，地方上的人說：『是和海相通的，』雖然是荒謬的俗傳，適足以表現其處之深。在那深處產一種魚名叫『墨魚』，全身黑色，這是因爲太深罕與太陽光接近而致的吧，但俗傳是吃了東坡先生的墨水。這些都覺得富有詩意。而墨魚也確是可口。

在這高小時代，我得讀西廂花月痕、西湖佳話之類的作品，加上是青春期，因而便頗以風流自命，大做其詩，在學的後半期成爲了最愛鬧事的一個代表。第二年在端午節前後，我曾經被斥退過一次，但不久又把我的學籍恢復了，原因是學校的處置遭了學界上一部份人的反對。

嘉定中學開設了，高小學生中成績好和年齡大的便升入中學，我的高小學程於是一年半便告結束。新開設的中學，更是一場糊塗，笑話百出。講地理的人說朝鮮在中國的南方，講博物的人把烏賊的嘴當成肛門，甚至連講國文的人，不懂得『望諸君』是樂毅的封號，而講爲『盼望你們諸君。』一位英文教師把日本正則學校的課本來教我們，幾個拼音就教了我們半年。在這兒不是讀書，簡直是養老。我在這時候只想離開故鄉，近則想跑成都，遠則想跑北京上海，更遠則想跑日本或美國，但我們家裏不肯讓我們跑遠，自己也找不到那樣遠走高飛的機會。因而有一個時期便很自暴自棄，吃酒的習慣是在這時養成的。

在中學裏面感覺興趣的仍然是經學，黃經華先生講的春秋，是維繫着我的興趣的唯一的功課。黃先生也是廖季平先生的高足，他也很喜歡我，在課外還借了好些書給我看。有一次我吃醉了酒，罵了一位從

日本回來的監學，這人並沒有多麼大的本領，只是愛弄詭辯，異常的專制，我特別的恨他。我醉了，罵了他，他一定要斥退我，還是黃先生力爭，又把我保全了下來。後來這位監學就在那年暑假，患白喉症死了。但我在下學期又因為別的事情依然遭了學校的斥退。

在嘉定遭了斥退之後，第二期的春初晉省，插入當時成都高等學堂的分設中學丙班。這是庚戌年的事。學校的課程雖然好得一點，但也好得有限。關於新學一方面的，如數學、物理、化學之類，因為教者本身都還不十分精通，怎麼也引不起興趣——不僅引不起，反而養成了我不喜歡這些課程的傾向。

在成都的一段學生生活中根本沒有學習到什麼。張陞楛先生的歷史講義比較感覺興趣，但他不善講授，詳時詳到無以復加，略時略到只舉帝王的年號，他究竟是不會征服歷史，而為歷史所征服了的人。

沒有東西可學，只是讀些課外的東西。林紓譯的小說，梁任公的論說文字，接觸得比較多。章太炎的學術著作當時也看看，但不十分看得懂。我自己是喜歡讀莊子的人，曾經看過章太炎著的齊物論釋，他用佛學來解莊子，覺得比莊子的原文還要莫名其妙。

遊山玩水，吃酒賦詩的名士習氣愈來愈深，東門外的望江樓、薛濤井，南門外的武侯祠、浣花溪、工部草堂，是常游之地。連學校在停課試驗期中，都把課本丟在一邊，和一些興趣相投的人在自修室內撞詩鐘，和

韻，聯句，講小說。

因是省會的關係，學生的政治運動便比較活躍。我本是分中的插班生，但不知怎的，總每每被選為學生的代表。頭一年的年底便參加了立憲請願的風潮，當時是趙爾巽做四川總督，學生請求他代奏，要清廷提早立憲，鬧到全省罷課要求的地步。起初學校當局大抵都是縱容的，但到後來趙爾巽下出嚴烈的命令，要學生復課，不然就要嚴辦，分中的校長自然也就奉命唯謹。但要學生上課，卻誰也不肯上課。他卻想到了一個妙法，要各班的代表先行上課以為表率，我沒有遵從他的命令，就在當天便離開了學校。學校說是要斥退我，但因種種原因，依然沒有斥退。到第二年還讓我補受了學年試驗。

第二年便是辛亥年了，參加了有名的反對鐵道國有的風潮，這是開始於保路同志會，繼而成爲保路同志軍，結果和辛亥革命的大運動合流，而推翻了滿清二百六十八年的專制。這在當時的學生界中也惹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革，有好些學生便借這個機會離開了正規學校，而轉入了軍界或政界。特別是法政學校的設立風行一時，在成都一個省城裏，竟有了三四十座私立法政學校出現。大家都想做官，幾個月速成畢業之後便有考法官的資格，於是祖孫父子同學的佳話四處都是。因此也惹起了一種反抗，稍爲嚴肅一點的學生，大家都討厭學法政，我自己也就是這裏面的一個。

但就留在正規的學校裏吧，依然是沒有可學的東西。而且在那鼎革的時候，學校多是奉行故事，有好

些稍諸人意的教員也都轉入了政界，剩給學生的便是焦燥、無聊、空虛。在當時有機會的人，便朝省外國外跑，不能跑的呢便只好陪着熬資格了。我自己在當時真是苦悶到了絕頂，要考省外的學校或留學吧，起碼要中學畢業資格，然而中學還沒有畢業。因此便錯過了很多的機會。在這樣苦悶狀態中，被逼着愈朝吃酒賦詩，遊山玩水的道路上走。幸好這時期還不算很久，民元分中和成都府中學合併，再熬了一年，算把中學畢了業。第二年又進了高等學校，熬了一學期，便考上天津軍醫學校，我便得到了離開四川，也離開了那種煩悶生活的機會。

天津的軍醫學校是國立的官費學校，民二的夏間在全國各省招生，四川省被攤派六名，我被錄取了。暑間離開成都首途，但到了重慶，便遇着二次革命爆發，又折回成都。等那次的革命平熄之後，又由成都首途向天津出發，大抵是十月的下旬了吧，記得經過黃河大橋的時候，已經在飛着雪了。

自己當時，事實上並不是存心學醫，應考軍醫只是想藉一個機會來離開四川，離開當時的苦悶。到了天津之後，雖然經過覆試，仍被錄取，但卻沒有心腸入校，我便獨自跑到北京去了。當時我的長兄澄塢先生在做川邊駐京代表，雖然到日本朝鮮去遊歷去了，但早遲是要回來的，我有這樣靠背，所以便決心跑去找他。這兒又是我一生的第二個轉捩點，我到後來多少有點成就，完全是我長兄賜予我的。

我到了北京，在一個同鄉京官家裏住着，等到年底，長兄才從國外回來了。起初對於我的求學也很感

棘手，後來決定把我送往日本。我是三十號離開北京的，由火車經過山海關、遼東半島、朝鮮半島，在朝鮮的釜山迎接了一九一四年的新年。

在釜山領事館裏面住了一個星期的光景，因為那時的領事柯榮階先生是長兄的同學，便又渡過日本，直達東京。在這兒開始了我一生之中最勤勉的一段時期，長兄送我離國的時候只給了我一條重六兩多的金條，叫我到東京去變換成日幣，作為學費。他希望我能够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考上官費學校，不然將來的學費恐怕難以接濟。當時中國和日本有五校官費的契約，東京的第一高等學校、高等師範學校、高等工業學校、千葉的醫學專門學校、山口的高等商業學校，這五個學校都招納中國學生，凡是考入了這五個學校的留學生也就由中國政府發給官費。這五個都是日本的國立學校，考上了又有官費，因此為留學生所競爭的目標，也就最難考，有的考了八九年都還沒有考進去。我是初去想要以半年或一年的工夫去考，那簡直是沒有把握的事體。而且幾個學校招生在那時多在暑期，我是正月到的東京，要在當年的暑期應考，事實上還不足半年，但假使不考，那又非延到明年的暑假不可，學費便要成問題了。因此我在當時實在是拚了命，拚命的學日文，拚命的補習科學，結果我終竟以半年的工夫，考上第一高等學校，這在當年聽說是沒有比我更快的了。

日本的高等學校約略等於我們的高中，是大學的預備門。在當時是分爲三部，第一部是學文哲法政

經濟等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醫科。在應考時便得分科，因此便發生自己的選業問題。當時的青少年，凡是稍有志向的人，都是想怎樣來拯救中國的。因為我對於法政經濟已起了一種厭惡的心理，不屑學；文哲覺得無補於實際，不願學；理工科是最切實的了，然而因為數學成了畏途，又不敢學；於是乎便選擇了醫科，應考第三部。這時的應考醫科，却在國內投考軍醫學校的心理是完全兩樣了。我在初，認真是想學一點醫，來作為對於國家社會的切實貢獻，然而終究沒有學成，這確是一件遺憾的事。

考入高等之後，有一年的預科是和中國學生同受補習的。預科修滿之後再入正科，便和日本學生受同等教育。三部中所學的以德文的時間為最多，因為日本醫學是以德國為祖，一個禮拜有二十四五個鐘頭的德文，此外拉丁文英文也須得學習。科學方面是高等數學，如解析幾何，高等代數，微分，積分，以及物理化學動植物學的講習和實驗，都須得在三年之內把它學完，功課是相個繁重。日本人的教育不重啓發而重灌注，又加以我們是外國人，要學兩種的語言，去接受西方的學問，實在是一件苦事體。不過中國人頭腦比日本人聰明，凡是肯用功的人在學業上是不亞於日本人的。

我在高等學校三年畢業之後，升入九州帝國大學的醫科。當時日本的大學其他各科都是三年畢業，只是醫科是四年半。開始兩年是基礎學問，如解剖學、組織學、生理學、醫化學、病理學、藥物學、細菌學、精神病學等，後兩年便是臨床學問，即內外兒婦、皮膚花柳、耳鼻喉、眼科齒科，乃至衛生學、法醫學，所有一切的

部門都要通盤學習。這四年也確是嚴重的四年。學問是嚴整的一套，你不能够跟等，也不能够中斷。日本人的醫學相當可觀，在他們是很盡了心力來的。

但我把醫學終竟沒有學成功，雖然大學是畢了業，我也得了醫學士的學位，但我不會行過醫，我也沒有意思行醫。在醫科開始兩年很感覺興趣，那時所學的可說是純粹的自然科學，人體的祕密在眼前和手底開發了。我自己解剖過八個屍體，也觀察過無數片的顯微鏡片，細菌的實習，醫化學和生理的實習，都是引人入勝的東西。這差不多等於在變戲法，實在是一些很好玩的事體。然而到後兩年的臨牀功課上來，我感覺着無上的痛苦了。原因是我自己的聽覺不靈，我不能夠辨別打診和聽診等微妙的基本醫術。

我在十七歲的時候，那時還在嘉定中學讀書，在中秋前後患過一次極嚴重的熱症，後來回想起來，很明顯的是重症傷寒。病了一個多月，接着耳朵便受了波及，脊柱也受了波及，兩耳因中耳加達爾而重聽，脊柱因腰椎加列司而彎曲不靈，這兩項缺陷便苦了我很久，一直到現在都沒有可能恢復。我的一生便受了這一次重症的極大的影響，我的學醫終竟沒有學成的原故，便是因爲有了這生理上的限制。

兩耳重聽，沒有可能把醫學，特別是臨牀醫學學好，因此在大學中途的時候，又來了一次極端的苦悶，又把我逼着走上了文學的路途。自己在國內所涉獵的，主要的就是文學，到了日本雖然把文學拋撇了，然

而日本人教外國語，無論是英語、德語，都喜歡用文學作品來做讀本，因此在高等學校的期間，便不期然而然地與歐美文學發生了關係。我接近了太戈爾、雪萊、莎士比亞、海涅、歌德、席勒，更間接地和北歐文學、法國文學、俄國文學，都有了接近的機會。這些便在我的文學基底上種下了根，因而不知不覺的便發出了枝幹來，終竟把無法長成的醫學嫩芽掩蓋了。

我在大學的中途曾經輟學一次，回到上海組織創造社，實際從事文學活動。這是五四運動後不久的事體，一般的朋友大概都約略知道這一段歷史，我不必縷述。但我回上海不足半年工夫，我又跑到日本去了，我把醫學的課程是學完畢了的，是民國十三年三月畢的業，從此便和學生生活告了別。雖然我並沒有行醫，但我覺得我的醫學知識比文學知識更有根底，我是衷心尊重醫學的一個人。唯其尊重它，所以我不敢行醫，我也恨死一般不負責任的西醫，尤其是把不負責任的中醫看成一種罪惡。

形式上的學生生活雖然終結了，但我感覺着我一輩子都還是學生，天地間值得我們學的事體太多，不到我的生命和世界告別時，我的真正的學生生活是不會終結的，也不應該終結的。不過這篇文章，是應該在這兒終結的時候了。

三十一年四月十九日。

此
页
空
白

創造十年

(一九一八—一九二三年)

此
页
空
白

發 端

創造社自一九二九年二月七日遭了封鎖以來，已經滿了三年了。早就有些朋友要我把它自立以來的經過追記出來，我也有那樣的心事，但總牽延着，一直牽延了三年。我現在終於決了心，要費點工夫來記錄出我所知道的創造社，或者更適切地是以創造社為中心的我自己的十年間的生活。牽延了三年，使我終於起了決心的，說也奇怪，卻要感謝我們中國的大小說家魯迅先生。

是本年的正月三號，一位日本朋友K君到我寓裏來，談到了中國的文藝，談到了魯迅先生。他問我「魯迅是怎樣的立場？」

我說，「魯迅是一位用寫實手法的作家，在前頗帶着一種虛無主義的傾向，近年聽說是轉換到左翼來了。」

——「是的，」那朋友說，「我們的右翼之雄的佐藤春夫是稱魯迅為左翼之雄的。」

K的說話顯然是含蓄有一種鋒芒，但我們也沒有作怎樣的深談，因為我對於魯迅先生的舊作

既少研究，他的轉換方向以後的新作我也還未曾看見。

在臨走的時候，那位朋友取出了一本黃油紙封面的雜誌來，遞給我，我看時有似篆非篆的古東多的四個紅字。旁邊還有一行鉛印標識：

「佐藤春夫編輯 古東多萬 第二號

昭和六年十一月五日發行。」

這「昭和六年」是民國二十年，西曆一九三一年，更簡切的說一句，便是去年。照那標識看來，自然是雜誌了。

K₁把目錄揭開，指示着上海文藝之一瞥下署着魯迅的給我，他說，「這篇文章很有趣，請你留着讀一讀。」

我多謝了他，問他，「古東多萬是甚麼意思？」

他說，「這書的封面背後便有解釋。」

翻開封面背後來看，是從日本的一部字典言泉上引用來的一段解說，原來「古東多萬」的發音是 kotodama，寫成漢字是「言靈」，照那解說直譯出來是：

「我國之言語之自由地變化，具有一種靈妙的作用之謂。國語之妙用。」

再翻到書後的「編輯餘談」來看了一下，才知道這「古東多萬」用的是「萬葉假名」——日本的一部歌集用漢字寫的日本字母——竟連日本人都不懂，屢屢質問，問得編輯先生「不耐煩而且冒火」，所以在封面背後才引用了那一段字典。

我看了着實暗地感嘆了一下，我對K說，「要懂一種外國文字，像在這些地方真很困難呢。老實說，我起初看見封面時，我以為你是送了我一本骨董店的廣告。」

——「哈哈，我初看見的時候是把它當成了法西斯諦的機關報的。」

——「怎的呢？」

——「有個H字啦，德國的法西斯諦希屈拉派打的是這個商標。」

彼此笑了一會。K才告辭着走了，我便把我們魯迅先生的文章繙了出來，原來是魯迅的講述，由一位日本人所譯記的。據那譯記者「九月十七號在上海」寫的短序上說：

「上海文藝之一瞥是最近在當地某處魯迅祕密的講演，那講演的大要在當地的週刊文藝新聞上連載了。然而文藝新聞在其立場上，顧慮到官邊，不能不多少加了一些刪削。但是魯迅又根據那連載於新聞的筆記，更把敘述弄得懇切周到，更適切地把辛辣的罵倒直言出來，改寫了這篇上海文藝之一瞥。本稿即由改寫了的原稿向僕講說了的譯錄。」

我看到了有「祕密」有「顧慮到官邊」的字樣，已經就虔敬了起來，我預想到我們的戰士一定是展開了一篇左翼理論，對於上海的御用文學民族主義派一定加了「辛辣的罵倒」。我如飢似渴地把那二十幾頁的長文，一口氣讀下去，看他的確是罵了好些人，罵了鴛鴦蝴蝶派，罵了創造社，甚且對於左翼運動也沒有忘記他的「辛辣的」清算，一直讀到尾上才看見了這樣的幾句：

「以上所說之外還有所謂民族主義文學和許久以前便盛行着的武俠小說之類，應該詳細解剖，可奈已經沒有時間，等到將來有機會時再講。」

就好像讀舊式的章回小說，讀到起勁處，卻被「欲知後事如何，且待下回分解」的一段手法欺騙了的一樣，我的一口氣軟了下來。我鼓着勁要跳過一條三尺寬的溝，鼓得一臉通紅，仍然跳不過去，立在溝的邊上。像這樣的講演我不知道有甚麼「祕密」的必要，更不知道有甚麼地方要「顧慮到官邊」。在文藝新聞上所發表過的內容，我不會看見。我們魯迅先生所「改寫」成的中文原稿，似乎也還沒有發表出來。我現在暫以一個准魯迅崇拜者的資格，把日譯文中罵到創造社的地方要忠實地——我特別在這「忠實地」旁加着注意點——重譯成中文。前後的文脈自然要稍稍顧慮着，但我不好便把全部都整譯出來：因為我們魯迅先生的改寫稿一定有發表的機會，即使沒有，將來也一定有魯迅先生忠實的——又來加上注意點——崇拜者來重譯全文，我是不好把這一筆稿費替人

奪掉的。

講演の開頭是說到新式的才子佳人鴛鴦蝴蝶派。這鴛鴦蝴蝶派「因新青年的流行才漸受打擊。」「那時有易卜生的脚本之介紹，有胡適之先生的終身大事那樣取着俊俏的形式之婚姻問題劇出現。」以下便論到創造社來了。

「此後有新才子派的創造社出現。創造社尊重天才，是藝術至上派。尊重自我，崇創作，恨翻譯，尤憎恨重譯，與同時在上海的文學研究會相對立。其出陣最初之廣告上，言有壟斷文壇者，即指文學研究會也。」

在創造社的頭上加上了一頂瓜皮小帽，輕輕地便把創造社的一羣窮小子化成了鴛鴦蝴蝶。我們魯迅先生的確不媿是紹興人，他的一枝筆實在有點刀的風味。是的，「新才子派」又等於「藝術至上派」，魯迅先生似乎很是學貫中西，大約王爾德波陀勒一類的人物，又是歐洲的鴛鴦蝴蝶派罷？是的，「創造社尊重天才，尊重自我，崇創作，」這倒不是什麼罪過。無論在怎樣的社會裏天才是否否認的，不同的只是天才的解釋罷了。馬克思昂格爾斯列寧不是絕大的天才嗎？就是我們魯迅先生不也是一位文學上的天才嗎？特別在「辛辣的罵倒」上其才是尤天的啦！就是「重自我，崇創作」的一點上，創造社的那些窮小子似乎還沒有我們的大天才魯迅先生的那麼「專，」不信你請去嘗

試一下罷。只要有胆量敢把『先生』兩個字誤排成『老生』，或者對於吶喊沒有搖旗吶喊一下，你看他先生會是怎樣地慷慨，他至少是會恭維你是『才子』的。『恨翻譯？』『尤憎恨重譯？』我自己似乎也是創造社裏面的一個人，我自己便『翻譯』過不少的東西，並也『重譯』過不少的東西。啦！是的，那些東西怕沒有值得我們魯迅先生的大眼之『一瞥』。不過不負責任的翻譯和重譯，似乎是在可『恨』可『憎恨』之例，創造社也幹過些指摘的事情，魯迅先生大約就是根據的這些罷？這好像是在說『你恨酸敗了的麵包的人，便是恨麵包。』吾無以名之，名之曰『阿Q式的羅輯。』至於廣告的一件，那是要請達夫先生負責的，說詳本文。

『文學研究會與創造社反對，主張爲人生之藝術，一面創作，一面重視重翻譯，並注意介紹了被壓迫民族的文學，因爲彼等小國誰也不知道他們的文字，所以差不多全部都不得不靠着重譯。而且文學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遂爲新敵與舊敵所夾，受了三方面的攻擊。一方面是創造社，他們既尊重天才的藝術，以主張人生流之藝術的文學研究會爲沒頭於閑事，爲『俗』（此字原譯文有引用符，不知魯迅先生引用的是那一位創造社員的話，且爲無能，所以一發見了一個誤譯，有時便要大賣氣力地寫一篇很長很長的專論。』

第二方面說的是吳宓所代表的論衡一派，第三方面是所謂鴛鴦蝴蝶派，在這兒魯迅先生又不

費力地(?)把創造社來和論衡派鴛鴦蝴蝶派歸爲了一類，而使文學研究會，承繼着新青年和終身大事的正統。似乎創造社之成爲文學研究會的新敵，是因爲該研究會聲援了新青年。是的，魯迅先生到底不媿是文學研究會的發起員之一人，在這些地方卻很能替本店發賣膏藥。「貨真價實，只此一家。」——只有文學研究會是文學的正統，是最革命的團體。我們在這兒來高呼幾聲口號：

革命的文學研究會萬歲！

擁護文學的正統！

打倒一切反動的文學團體！

擁護我們的文壇總司令魯迅先生！

反對文學研究會的就是反革命！

反對魯迅先生的就是反革命！

是的，還有一個「被壓迫民族的文學」也是該得高呼幾聲萬歲的。我們貴大民國的貴老百姓，要算是不折不扣的「被壓迫民族」了。我們貴被壓迫民族的貴民族主義的文學呢？在這兒我很抱

款，可惜我們魯迅先生沾染了點子章回體的小說派頭，要等到「下同分解」於是乎讓我們的「萬歲」也就不好明目張胆地叫出來，我們須得學學我們的先生「顧慮到官邊」啦。打個折扣，叫他媽個半聲罷。好的，我們再來呼叫起來：

『被壓迫民族的民族主義文學』

在這兒要加一個注解，這個屁股上的卅字，就和古東多萬屁股上的那個字一樣，是當作「萬」字在使用。「萬歲」的一半自然就是卅，但有聰明的讀者定要把它連想到法西斯，那也是他的自由。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這個罪狀不自今日起，據魯迅先生的「一瞥」看來，從與文學研究會反對以來便已經是反動了的——是的，創造社那一批「反動派」真是罪該萬死！公然反對「聲援新青年」，「介紹被壓迫民族文學」的文學研究會，要指摘他們的誤譯，真是罪該萬死！哼，你們不知道像「雅典主義」和「手式戲」一類的翻譯，不正是中華民國的國寶嗎？你們不知道那些名譯，縱不「百世」也會「萬年」的嗎？我「魯迅先生」正告你們：文學研究會者人生之人生也，藝術之藝術也，如此之如此也，這般之這般也；「俗」云何有？豈是「無能」？「無能」者天下之大能也，「俗」者不俗也。「錯誤」之僅僅「一個」便足使汝輩之「專論」做出「一篇」

誰能誰不能哉？——好了，我摹倣我們先生的筆調似乎有點不類，然而不類者類也，好像通，又好像不通，然而不通正是大通。此亦一「阿Q式的羅輯。」

『創造社』的這番起事，在表面上看來是勝利了。多數的作品既投合於當時的自稱才子輩的心情，加之以出版者之幫助，勢子遂盛，勢子一盛，大商店，例如商務印書館，也就把創造社的譯著來出版了——這是說的郭沫若、張資平兩先生之原稿也。自此以來，據我所記得的，創造社便再沒把商務印書館的出版物之誤譯來審查，來寫專論了。在這樣的地方，不好說得，豈不就是才子加珂羅茨基乎？（日本文的珂羅茨基 Gorotuki 譯成中文是『流氓痞棍』）

這一段文章做得真是煞費苦心，直言之，便是『郭沫若輩乃下等之流氓痞棍也；』但要看我們魯迅先生的文字是怎樣的『曲。』先生全靠他那空靈的推想和記憶，便把一羣人的罪狀在『一瞥』之中宣佈了出來，這是何等折獄如神的名手呀！但先生在這兒也隱隱洩漏了一點天機，他在上面罵創造社攻擊文學研究會的誤譯，在這兒把文學研究會的五個字寫成了商務印書館。哦，原來文學研究會就是等於商務印書館！文學研究會的一些『大人君子』（這是魯迅先生的言外之意，因為是和『才子痞棍』相對，）特別是屬於文學研究會的我們的魯迅先生，是很清而且高，高而且清，沒有受過『大書店』的賄賂的！（至於說到我和商務印書館發生買賣關係的詳情呢，那是私人的事情，

與創造社無涉，我要在本書中提供些事實出來，在這兒暫不贅述。）

『卻說，因為新上海到底不是舊上海之故，創造社員在凱歌聲裏終自覺得自己替自己的出版書店寫商品，雖是種種的努力，然從老板一方面看來，就和眼鏡舖的 Show - window (E) (面玻璃窗) 中裝飾着紙紮人物之活活活活的眼睛一樣，不外是以廣招徠的廣告而已。』

這一段把創造社員敘得又如此有自覺：因為就到現在也還有不少的人在替書店老板寫商品，在 Show - window 中做着廣告人物，而自己卻在揚揚得意的！

『於是乎才希圖獨立出版，書店老板便把他們向裁判所告發了。』

這一句話卻要算是天外的奇文！這兒所說的『書店老板』自然就是泰東書局的趙南公。幸好趙南公還沒有死，創造社的幾個人也都還活着的，創造社設出版部時，原來趙南公是提起過訴訟的嗎？老實說，我對於我們魯迅先生這位大『大人君子』的腦筋不免有點懷疑。魯迅先生或者不會是有意的捏造，因為受書店老板告發，倒不是甚麼大不名譽的事；我想怕是腦筋中的記憶有點絞線，在這兒把新青年社和創造社扯在一道了。新青年社由羣益書局獨立時，書局的老板提起過訴訟，這是人衆皆知的事體。

『後來終竟獨立了，一切的書籍大加改訂，改印刷，新開起店子來，然而舊老板方面也永遠

地用着舊板，一味的印刷，販賣，年年鬧着甚麼「紀念大廉賣。」

這幾行倒很近於事實，甚麼「紀念大廉賣」——這是九州萬國凡百商行所慣用的騙錢調門，自然不限於上海，不限於上海的書業，不限於泰東；然而這種極普遍極陳套的現象，落到我們魯迅先生的手裏是怎樣地「着手成春」了！因為這個現象一局限到這兒來，便是說創造社的作品屁錢不值！

「在作爲商品上雖是怎麼也忍耐不過，然而獨立了也沒有如意地賺出錢來，創造社的人們之走頭自然是朝比較有希望的，革命的策源地，廣東跑去了。於是乎便有「革命文學」這個東西出現。然而怎樣的作品也沒有。在上海呢，連那樣「革命文學」的名字都還沒有出來。」

這段的首兩句，我是很忠實地翻譯出來的，然而意思是摸不準確，不知道魯迅先生的原文是怎樣。不過這全段的意思是很明白的，便是創造社的幾個「流氓痞棍」想賺錢沒賺成，又才跑去革命。所謂「革命文學」也就是那幾個「流氓」所想出的騙錢的幌子。我們這位「左翼之雄」的魯迅先生的唯物的解釋真可要算是超馬克思主義的。但可惜那幾個「流氓」所鬧出的事實和先生的推論全不相符。創造社出版部的獨立是在一九二六年的四月一日，流氓的一員成仿吾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六月到的廣東，當的是廣州大學的理科教授。還有幾位流氓便是郭沫若、達夫和一位新入

流後又拆了伙的王獨清，是以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八日從上海出發往廣東的。這「三一八」是一個紀念日，在這兒自然是用不着我來做「宣傳大綱」的，幾個流痞剛好在這個紀念日上動身，所以這個日期也就留在了我的腦裏。我記得那天在下雨，在黃浦灘碼頭上送我們上船的有一位樓建南。走的不只我一個人，又還有送行的人做見證，可恨這個日期不好自由創作。就這樣我們在這兒還是應該痛罵那幾位創造社的痞棍，他們爲甚麼那樣早的便跑向廣東去了，沒有停一下造些事實出來和我們魯迅先生的「一瞥」相符，使得我們的「大人君子」又來形同捏造的自由創作了一下。

「到了前年（譯文中說的是「一昨年」大約是指一九二七年，）「革命文學」這個名稱才旺盛了起來，主張它的人是由「革命的策源地」回來了幾個的創造社的元老和若干新分子。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不消說是有它社會的背景，是因爲一般的民衆和青年們中有了那樣的要求。從廣東開始北伐的時候，一般積極的青年都奔走於實際運動，在那時還沒有甚麼顯著的革命文學，然而到政治環境突然改變，革命遭了挫折，階級的分化非常地鮮明了起來。國民黨以「清黨」之名大大地屠殺共產黨和革命羣衆，活剩下的青年們又入了被壓迫的境遇。在這兒，革命文學才在上海成了強烈的活動。所以這革命文學之旺盛了起來，從表面上看來是和別國不同，不是由於革命之高揚而盛，而是由於革命之挫折。（這兒的革命兩個字有點校線）

其中雖也有幾位舊文人投了指揮刀又來幹筆墨的舊業，有若干的青年由實際活動趕了出來，不得不借此以謀生路，然而實際上具有社會的基礎，新分子中極堅實而正確的人多所存在。然而這時候的革命文學運動，據我（一）的意見看來，是還沒有經過十分適切的計畫，錯了的地方怎麼也很多。（沫若案：最大的錯處就是罵了魯迅先生）例如，第一，他們對於中國的社會並沒有加以細密的分析，在蘇維埃政權下才能够運用的方法，便想機械地拿來運用。（這大約是責備那時的運動過激了的意思，在這兒正表示着魯迅的認識之極不正確。蘇維埃政權成立後的文藝政策多少可以自由，在成立前的左翼文藝是只有純粹的戰鬥。）第二，他們，特別是成仿吾先生把革命使一般人看成很可怕的東西，以一種極左的兇惡的面貌，簡直好像是只要革命一到來，一切的非革命者立即便要鑲殺乾淨，使人對於革命只是只是懷着恐怖。（這一節不知道是根據成仿吾的那一篇文章，恕區區淺學，指不出出處來。）其實革命決不是殺人的東西（阿彌陀佛，）而是活人的東西（再來一個阿彌陀佛。）像這種教人以「革命之可恐怖，」（這句話原有引用符，未詳出處）而自行痛快的態度，這也不好怎麼說得，只好說是中了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毒。」

這一段文章說得倒還風涼，不過先生的苦心我們是不好看過的。便是一九二七年連到一九二

八年的革命文學運動，有好些新分子是很堅實而正確，只是創造社的幾位舊人都是投機的傢伙，而且帶着「極左的兇惡的面貌」，反使革命生了障礙。就這樣，我們魯迅先生自始至終，是要把創造社的幾位流痞打進阿鼻地獄裏去的。在未革命以前他們是流氓痞棍，在既革命以後他們還是流氓痞棍！在以前的文學運動中沒有他們的份子。在以後的革命文學運動中也沒有他們的份子。我們魯迅先生真是有一手遮天一手遮地的大本領呀，而且文中的神髓更不好忽略地看過，那是在這樣說的：

「中國的新文學中無論革命的與反革命的，都只有我魯迅一個人的！」

是的，我們的魯迅先生的確是天上地下最偉大的一個創作家，他的小說是創作，他的批評是創作，他的演講也是創作，他在「一瞥」之間便替創作社創作出了一部「才子加流氓痞棍」的歷史。（須要注意：「才子」者輕薄之謂也。）

魯迅的一瞥，是很長的一瞥，他以下還把近年來的左翼文學運動「瞥」了一下，在這次的運動上最可慶幸的是我們魯迅先生在榜上有名，所以他也說得像煞有介事。不過他敘述創作社的地方就停止在這兒，以下的我不便再多事徵引了。創造社遭了封鎖的一節，魯迅先生是絕口沒提的，當然這在「大人君子」看來是那痞棍集社的惡貫滿盈了。日本有一位「左翼作家」和暴力團的團長一樣的前田河廣一郎從前到過一次上海，因為創作社的人沒有歡迎他，待他回國之後聽說創作社

遭了封鎖，他便大大地稱快，在他的機關報文藝戰線上做了一篇痛罵創造社的文章，說是中國的 Ultra 派（即魯迅先生所說的極左派）被中國社會清算了。我看這位日本的『左翼之雄』實在趕不上我們中國的『左翼之雄』，因為像那樣鼓睛爆眼地表示出自己的立場來，何如閉着眼睛連不加以『一瞥』的高妙呢？

總之，我是應該感謝魯迅先生的，我讀了他那篇『瞥』，才決心要來做這部十年。但我在這兒還要附帶着聲明一筆，我這十年並不是小說——記得國內另一位大小說家宣言過我是沒有做小說家的資格的：因為我的筆太直，不曲，沒有像魯迅先生的那樣曲。是的，這層我自己是很承認的，假使要曲才配做小說，那我實在是不配做小說家。據說小說是『寒帶』，那嗎只適宜於 Esquimo 那樣的小人去住，我也就敬謝不敏。

還有，我這十年也不好就是歷史，因為自來的歷史其實就只是小說，是由階級的立場或個人的私怨所寫出的小說。像魯迅先生的那篇『瞥』，那才是真正的歷史，是上海最近二三十年的文藝史——至少可說是史料，後代的文藝史家一定要在那兒取材的。所以我這部十年也不敢僭分地說它是歷史。

究竟是個甚麼東西呢？——說本色些，就說它是一個阿羅茨基的自敘傳之一部分罷。

此
页
空
白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我由日本的第六高等學校畢了業，昇進了九州帝國大學，由岡山轉到了福岡。福岡是日本西南端九州島的中心都市，在島的北端，沿着博多灣的海岸。市街是由兩個舊市併合而成，西段是福岡，東段是博多。大學的醫學部在博多市外，背面是臨着博多海灣的。這博多灣在歷史上是很有名的地點，它是六百五十年前元世祖的大將范文虎征伐日本時，遇着大風全軍覆沒了的地方。（日本史家稱爲『弘安之役』，當西歷一二八一年。）當時的遺跡在那沿海一帶很是不少，有所謂『元寇防壘』、『元寇斷首台』、『元寇紀念館』。紀念館中蒐存着元軍所遺留下的兵器及服用器具之類。

市面盡頭處有一帶大松林，沿着海灣就和圍牆一樣，怕有五六里以上。日本人稱爲『千代松原』。在古書上又稱爲『十里松原』。這『十里』怕是中國人替它取的名字，因爲日本的里數一里是要當中國七里的。松原中離大學後門不遠處有一座大神社，叫箱崎神社，供的是日本人的守護神八幡大明神。那種神社在日本國內隨處都有，從前侵略中國海邊的倭寇，中國的古書上記載着他們在船上打着『八幡大明神』的旗幟。今年的上海事件，把關北化成了一片焦土的日本兵也打着『八幡大明神』的旗子，日本

的報上還拍了一些照片下來，這是他們自己意識着就是倭寇，同時也就可以見得日本人信仰八幡神的程度了。

日本的神社是有等級的，就像官有官階，學有學級。那箱崎神社是所謂『官幣大社』，用學制來譬比，就是所謂『國立大學』。神社面着海，但由社門走向海岸，相隔還有五六百步路的光景，一直成爲一條甬道，兩邊是松林，道旁夾立着無數對的石燈。

我到了福岡之後是住在離大學後門不遠的一家性質與『當舖』相當，但規模較小的『質屋』裏面。時候是八月下旬，學校還沒有開課。有一天中午時分，我很早地吃了午飯，爲逃避午後所易起的慵倦和睡意，我跑出寓所去。想在松林裏面去散步。正走到箱崎神社前的甬道上，我無心之間遇着由海岸上走來的張資平。

——『哦，你怎的到這裏來了？』

——『哦，你也怎的到這兒來了？』

差不多是同時叫出的兩人的聲音。

張資平本是一高預科時的同學。那時候的日本的高等學校是分成三部的，第一部是文科，第二部是理工科，第三部是醫科。一高裏面爲中國留學生特設的預科也就準依着分爲三部，但是學醫的人少，又加

以和文科的性質相近，一三兩部是合班教授。如像物理化學博物一類的功課，因為講堂大，便是一、二、三、三部合班教授的。資平學的是理科，我學的是醫科，因為不同班的關係，彼此雖沒有甚麼往來，但也同了一年的學，差不多天天都在見面的。一年的預科畢業了之後，我被分派到岡山的六高，他也分派到別的地方去了，彼此便足足分別了三年。

——「我是來進這兒的醫科的，你是進這兒的工科嗎？」

——「那裏！我們還沒有畢業呢。」老張的梅縣的廣東官話說得分外激越。

——「怎的還沒畢業呢？」

——「我們五高的校長很頑固，他說我們是因為排日回國的，他不准我們補攷。我們說別的高等學校都補了攷，為甚麼我們又不可以補攷呢？他說：「你們又要愛國，又要誑憑照啦，二者是不可得兼的。」」

他這樣說我才記起了他是被派到熊本五高的，熊本也是九州島上的一個都市，離福岡只有半天功夫的火車路程。他因為學校還沒有開課，便一個人到福岡來洗海水澡來了。

原來在那一九一八年的五月，日本留學界為反對「中日軍事協約」的事體，曾經起過一次很劇烈的全體罷學的風潮。在那次風潮上還有一個副產的運動，便是有一部分極熱心愛國的人組織了一個誅漢奸會，凡是有日本老婆的人都認為漢奸，先給他們一個警告，要叫他們立地離婚，不然便要用武力對待。

這個運動在當時是異常猛烈的，住在東京的有日本老婆的人因此而離了婚的也很不少。不幸我那時候和安那已經同居了一年有半，我們的第一個兒子和夫產後已經五個月了。更不幸我生來本沒有做英雄的資格，沒有吳起那樣殺妻求將的本領，我不消說也就被歸在「漢奸」之列了。但好在我是住在鄉間，「武力」的滋味我倒還沒有領略過。

全體罷學的抗爭支持了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所反對的協約沒有因而取消，更連發表也沒有發表，於是乎便又生出了全體回國的決議。這一決議下來，凡是有錢在手裏的人回了國的也就不少，不幸像我這樣的「漢奸」每月所領的三十二圓的官費是要養三個人口的，平時所過的早就是捉襟見肘的生活，更那有甚麼餘錢來做歸國的路費呢？沒有錢便失掉了「愛國」的資格，「漢奸」的徽號頂在頭上，就好像鐵鑄成的秦檜一樣。我這人的淚腺似乎很發達，自來是多眼淚的人，當年我受着這樣的懊惱，自己在無人的地方真不知道流過了多少的眼淚。但說到回國上來我自己也是很有經驗的人。我初來日本的第二年，日本提出了二十一條逼着要中國承認的時候，我在那五月七日的一天和着幾位同學也曾回過上海一次，那時候我也是熱心愛過國來的人，我在回國的時候還做過這樣的一首律詩：

「哀的美頓書已西，衝冠有怒與天齊。

問誰牧馬侵長塞，我欲屠蛟上大堤。

此日九天成醉夢，當頭一棒破癡迷。

男兒投筆尋常事，歸作沙場一片泥。」

在那時慨當以慷地回了國的男兒在上海的客棧裏呆了三天，連客棧附近的街道都還沒辨別清楚，又只得恩恩忙忙地跑回日本。誰個料到隔不一兩年我又變成了「漢奸」呢？

——「回國後到底得到了甚麼結果沒有呢？」

——「那有甚麼結果呢？跑北京的代表們聽說是段祺瑞親自接見過他們一次，嘉獎了他們要他們回到日本安心求學，說政府是決不做有損國體的事體的。這一部分的代表有的早回來了，有的留在北京在運動做官，又有一部分南下到了上海，和派到上海的代表們合在一道，現在在辦着救國日報，空空洞洞地只是一些感情文章。我看他們通是一些政客啦！」

——「真正愛國的人怕也很不少的罷？」

——「受犧牲的是很不少，特別是一些年紀較小的朋友，他們很熱心，四處去賣報，去宣傳。但那樣的生活能够支持好久呢？能有多大的影響呢？要救國總怕還是要有實際的學問才行罷。」

老張很雄辯，大約也是因為落了一年第，所以特別地憤激。我自己是有過一番經驗的人，自己的愛國心覺得也並不比誰落後。「假使中國的政府真正能够同那一國開戰，跑回去當兵倒還有些意思。不然只

是空跑啦。」我對他這樣說。

兩人在那甬道旁邊的一座石燈下談了好一會，老張問我吃了午飯沒有，他說他要回寓去用飯。我也就跟着他到了他的寓所，原來就在鄰近的村落裏的一家新修的下宿屋裏面。他是住在樓上的。進了他的住房，六鋪的草席上連矮桌也沒有，只是有一個藤手篋，在手篋旁邊散亂着幾本書。我順手拿了一本來看時，是當時以淫書馳名的留東外史。

——「你怎麼在看這樣的書呢？」

——「怎麼，不好嗎？我覺得那寫實手腕很不壞啦。」

我沒有再說甚麼，看了一下書的內容是舊式的章回體；我又把書給他放還原處去了。
等資平吃了中飯之後，兩個人又走到海邊上去。

就在箱崎神社的正面，社前的甬道通向海濱的地方，展開了一片銀白的沙原。臨海處西側有水族館和築港事務所，東側有一座城堡般的西式建築的大旅館名叫抱洋閣。自歐戰開始以來，西歐的資本家因受戰事的影響一時遭了挫折，日本的資本主義便乘着這個機會勃發了起來。那時的日本政府正是在財政上採取積極政策的政友會的原敬內閣，對於產業熱也特別加以煽揚，於是乎有好些通常的家屋都改成了各種各樣的小規模的工廠，它們的最大的銷路不消說就是我們偉大的貴中華民國。中國便替日本

人造出了很多的『成金』(Zarikin)——暴發戶來。那些暴發戶一有了錢，痛頭的便是怎樣來把錢消費的方策。依着經濟上的鐵則，他們自然要向着規模較大的再生產的方面去灌注，同時是向着享樂一方面去揮霍。物價便如受着魔術的呼遣一樣，暴漲了起來。所以在這日本的『成金風』吹煽着的時候，日本的企業家自然是遇着了名實相符的黃金時代，一切的無產階級和中小商人倒也還沒有夢想到失業和破產的危險。在這時候最受着打擊的是沒有營業本領的中產人家和沒有筋力出賣的智識階級，日本的官公吏和教職員等增加了薪水的是在這個時候，中國的官費留學生，高等學校級的每月由三十二圓增加成四十三圓，大學級的由四十八圓增加成七十二圓的，也正在這個時候。抱洋關和築港事務所對峙着的箱崎海岸，就是那時候的『成金風』的標識了。

博多灣中那時正有築港工事在進行着，是商辦的有限公司所經營，打算把博多灣浚深起來成爲海港，好推進福岡附近的石炭產業，以奪掉長崎港的位置。博多灣的外貌很是像一個湖水的，在東北角上有一個細長的土股名叫海中道，一直伸向海中，就像縮小了的意大利半島一樣，把外海的玄界灘和內部的博多灣隔斷了。博多灣真是風平浪靜的，比太湖的湖水還要平坦。

——『令人有點不相信啦，元軍的幾百艘戰艦，說是在一夜之間同沈沒在這裏了。』

——『那時是遇着二百十日的大風啦，遇着大風的時候，浪子是異常猛烈的，這個時期不久要到了。』

你是可以經驗的啦。「二百十日」你曉得麼？是從春分起算的第二百零十天，正是夏秋之交，北半球的空氣寒冷了起來，和南太平洋上在夏天晒得灼熱的空氣生出猛烈的對流，便起那股大風。」

資平到底不媿是學理科而且打算學地質學的人，他這樣啓蒙地對我說。

抱洋閣前面停着好幾部汽車，有好些，一看便可以知其爲「成金」的人，帶着「藝伎」在那兒進出。有時也挾着些帶四角帽的大學生在裏面。聽說那裏面有海水浴池可以男女共浴，又還有好些娛樂的設備，如像台球之類，時而從樓上的窗口中於男女的笑聲之外也雜着些撞球的聲音。

兩人在濱海的一座石造的燈台旁邊把衣服脫了，便向海裏走去，海水是滿潮的時候。但是那博多灣真是「遠淺」，在水中走了很遠很遠，依然還是可以踏着海底的。那隻淺海機在將近灣心的地方刮刮拉拉地運轉着機械。運轉機械的發動力似乎用的是煤油，待我們在海裏擱了一會之後，想是風頭轉換了，本來是很清潔的海水，一海面都浮起了煤油，在陽光中反映着種種的虹彩，更還挾着一些煤煙。糟糕！糟糕！兩人恩恩忙忙地又趕快朝岸上逃跑。望着抱洋閣上臨海的大樓，一些尋樂的男女，坐在樓頭暢飲着啤酒。

上了岸，把衣服穿好了，向着右手的松原角上停放着的兩尊大礮的地方走去。礮是日俄戰爭時的擄獲品，是塗着紅油漆的。這種廢物，日本國內無論神祠佛寺學校官衙，大抵都是有陳列的，一方面以誇耀他們的武功，同時並喚起國民的軍國主義的觀感。

在兩尊大礮附近的松樹腳根上坐着，納了一會涼，又談了一些東西南北的事體。但在這時有一番話使我永遠留在記憶裏的是，資平談到了國內的文化狀態來。

我是三年沒有回國的人。又住在鄉下，國內的新聞雜誌少有機會看見，而且也可以說是不屑於看的。我那時候最感不平的是商務印書館所出版的東方雜誌和小說月報，那是中國有數的兩大雜誌，但那裏面所收的文章，不是政談，便是連篇累牘的翻譯，而且是不值一讀的翻譯，小說也是一樣，就偶爾有些創作，也不外是舊式的所謂才子佳人派的章回體。報章的亂七八糟，就是現今也還是沒有脫出舊態，那是可以不用說的了。隔了三年的國內的文化情形，聽資平談起來也還是不斷的嘆氣。

——『中國真沒有一部可讀的雜誌。』

——『新青年怎樣呢？』

——『還差強人意，但都是一些啓蒙的普通的文章，一篇文字的密圈胖點和字數比較起來還要多。』

——『丙辰學社（註）出的學藝雜誌名譽還好嗎？』

（註）中華學藝社的舊名，是丙辰年（一九一六年）一部分留學日本的學生所發起的。陳啓修鄭貞文周昌壽許崇清等爲其初期的主要分子。

——「那和新青年比較起來又太專門太複雜了。陳啓修的政治論文被蔡元培看中了，聘去做了北大的教授，他便不再做文章了。許崇清的哲學論文和蔡元培大打其官司，老陳從北京寫信到上海，叫社裏的人不要再做反對蔡老頭子的文章，大家都很不滿意他。我看中國現在所缺乏的是一種淺近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學雜誌啦。中國人的雜誌是不分性質，烏涅白糟地甚麼都渣在一起，要想找日本所有的純粹的科學雜誌和純粹的文藝雜誌是找不出的。」

——「社會上已經有了那樣的要求嗎？」

——「光景是有的。像我們住在國外的人是不滿意的一樣，住在國內的學生也很不滿意。你看新青年那樣淺薄的雜誌，不已經是很受歡迎的嗎？」

——「其實我早就在這樣想，我們找幾個人來出一種純粹的文學雜誌，採取同人雜誌的形式，專門收集文學上的作品。不用文言，用白話。科學雜誌我是主張愈專門愈好的，科學雜誌應該專門發表新的研究論文，像淺近的科學，我想各級學校有各級的教科書和參攷書，不已經够了嗎？似乎是用不着辦雜誌的。像學藝裏面所收的科學論文專門翻譯講義的鈔本，我最不贊成。」

——「出文學雜誌很好，但你那裏去找同人呢？」

——「據我所曉得的我們預科同班的有一位郁達夫……」

「哦，不錯，不錯，老郁是會做詩的，聽說他常常做舊詩到神州日報上去發表；聽說他也在做小說呢。」

「對的，我想他是可以來一個。我還曉得一位我們在岡山同過學的成仿吾，他去年進了東大的造兵科，恐怕他今年也回了國，他也是很有文學趣味的，他的英文很好。他似乎也可以來一個。你可還認得些甚麼文學上的朋友嗎？」

「我可沒有的。比我們早的同學如像文範村吳君毅都在學藝發表小說的翻譯，但他們恐怕不肯和我們一道。比我們後的同學我可不知道了，到熊本的人是一個也沒有的。」

「在大高同學（註）的系統以外怕還有些人材罷？」

「有或許有，但我們可不知道。」

數來數去可以作為文學上的同人的還是只有四個人，便是郁達夫張資平成仿吾和郭沫若。

「我想就只有四個人，同人雜誌也是可出的。我們每個人從每月的官費裏面抽出四五塊錢來，不是便可以做印費嗎？」

（註）指日本帝國大學及高等學校之出身者而言，該出身者們自稱為「大高同學」有大高同學俱樂部。

資平很贊成我這個辦法，他約定就以我那兒爲中心，待學校開課了以後，訪確了仿吾和達夫的消息再策進行。

這一段在箱崎海岸上的談話，在我自己留下了很深刻的印痕，實際上我和資平發生交誼的是從那兒起頭，我知道他有文學上的趣味的也是從那兒起頭。所以我一想到創造社來，在我自己總覺得應該以這一番談話爲它的受胎期；我這部創造十年要從這兒敍起的，也就是這個原故。

在海岸上談遊了一會，日脚漸漸偏西了，我約資平到我寓所去吃晚飯，他也就樂於同行。從那陳列大廠的地方穿進松林裏走向我寓居着的「質屋」，是只消兩分鐘光景的。

——「我們在研究自然科學，」我一面走着，一面這樣說，「只是在教我們觀察外界的自然；我是想由我們的內部發生些甚麼出來，創作些甚麼出來。」

——「要創作，不也還是先要觀察嗎？」

資平這樣地回答了我，我當時覺得他似乎沒有懂得我的話，但到現在想來，這兩句話正是兩人當時的態度不同的地方。資平是傾向自然主義的，所以他說要創作先要觀察，我是傾向浪漫主義的，所以要全憑直覺來自行創作。我現在覺得他的話是比我更有道理了。無論是怎麼深淵的精神活動，沒有外界的素材是不行的。

進了我的寓所，我替資平把安那介紹了。資平到這時候才知道我是娶有日本老婆的，他回頭便用中國話來對我這樣說：

——「你把材料提供給我罷，老郭，我好寫一部留東外史的續篇。」

我聽了他這話時，覺得是受了一番小小的侮辱。我的心裏在這樣想：「這傢伙太不客氣。這傢伙的趣味真是下乘！」我心裏雖是這樣想着，但沒有說出口來。待我看他倒本沒有侮辱我的意思，反覺得他這人的自信力很強，他直覺到我是不會做小說的人，要叫我把材料提供給他。

*

*

*

在這次會面後，不兩天，資平便回了他的熊本，大學也就開起課來了。

在大學開課不久的九月下旬，有一天午後，我從學校裏回來，安那背着和兒在樓下燒茶，她對我說：「樓上有幾位稀客來了。」

我急忙地跑上樓去，看見了三位來客，一位是成仿吾，一位是陳君哲，還有一位是我不認識的大學的同學。君哲把那位不認識的同學向我介紹了，是六高出身的大學的四年生徐誦明。君哲也是六高出身的人，和仿吾是同年級，比我早一年進的大學。

原來仿吾也是因為風潮回了國，這回是同着一位同鄉的老先生，盲了目十年的人，到福岡來就醫的。他到君哲那兒去，聽說我也在福岡，他便跟着他們到我住處來了。

我和仿吾相識是在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我初進六高的時候。仿吾要比我年青得三歲，但他的學級卻早我們一年。他學的工科，在高等學校裏是屬於二部。我們在岡山算同了兩年的學，也同住了將近兩年。他很有語學上的天才，他對於外國語的記憶力實在有點驚人。他最初是和他的大哥成劭吾一道到日本的。他的大哥進了名古屋的第八高等的時候，和幾位朋友同譯過一部英文字典，仿吾在旁邊也幫助過膽錄

和校對的工作。他自從有過那樣一番根底之後，他在高等學校的三年間是沒有置備字典的。做一位高等學校的學生沒有外國語字典，這在中國的學生看來或者不甚稀奇，但在對於日本的高等學校有些經驗的人，他至少是會驚異的。日本的高等學校的功課，有一半乃至以上便是學外國語，有第一外國語，第二外國語，甚至像我們學醫的人在第一的德語，第二的英語之外，還有第三種的拉丁語。一個禮拜的外國語時間在二十二三個鐘點以上。加之日本人教授外國語的方法又是很特別的，他們是特別注重讀。教外國語的先生大概都是帝大出身的文學士，本來並不是語學專家，又於學生們所志願的科學是沒有涉歷的，他們總愛選一些文學上的名著來做讀本。上課時的情形也特別不同，不是先生講書，是學生講書。先生只是指名某某個學生起來把原書讀一節，接着用日本話來翻譯。譯錯了時，或者讓別的學生改正，或者由先生自己來改正。接着又指名第二個人讀下去，譯下去。指名的方法，有的先生是挨着座次，那倒還可以偷懶，不輪到自己名下時可以不必準備。但有的先生全是任意，沒有一定的。因此學生的自修時間差不多就是翻字典的時間。日本人還好，他們是用本國話來譯外國文，又加以朋友多，可以併伙，很可以省些氣力。中國學生便是用外國話來翻譯另一種外國文的，一班之中大抵只有自己一個中國人，或者至多有兩個人的光景，因此是吃力到萬分。你看在這樣的學生生活中能够不用字典的人，是不是一種驚異？

但是仿吾是很木訥的人，他很少說的中國話是一口湖南的新化腔，初和他會面的人，真不容易聽懂。

他到日本的時候年紀很小，但他對於中國的舊文獻也很有些涉歷，我們在岡山同住的時候，時常聽見他暗誦出不少的詩詞，這也是使我出乎意外的事體。大抵仿吾的過人處是在他的記憶力強，在我們幾個人中他要算是頭腦最明晰的一個。

他因為風潮回上海去了，在他的意思是很不想再轉來的，直到九月的尾上，各學校已經早已開課了，才在上海遇着他的同鄉那盲了目十年的陳老先生。我們要記得蔡松坡也是湖南新化人，是死在福州病院裏的。大約就是因為這樣的關係，那陳老先生知道了福州的醫科大學裏有一位日本的有數的眼科博士。他已經是上了六十以上的年紀了，帶着一個兒子和一位管事，遠遠地從他的家鄉出來到了上海，更打算到福州去就那位名醫，想仗他的力量使自己盲了十年的雙目，於萬一的希望之中或可以重見天日。他們到了上海遇着仿吾，便拉他一同渡日，要他替他們做翻譯。

我所住的房間就是那『質屋』的質庫的樓上，面積只有一丈見方的光景，人立起來便可以抵着望板。只有東北兩面各有一堵鐵格窗，看來很像鳥籠，也很像監獄。但就是那樣的樓房，每月也還要我們六塊錢的房金。仿吾大約是看見了我們住的地方逼隘了，他說到陳老先生們住在旅館裏面，每天的耗費太大，一個人每天要七塊錢，四七便是二十八塊，起居飲食都不方便，他們打算在外面找一間房子來自行闢火。在這時候，他便向我提議，好不好讓我們夫婦和他們同住，就由我的夫人替他們管理家政。

正在這樣商議，安那燒好了茶，措着孩子送上了樓來。我便把仿吾的意思向她說，不消說她是立地便承應了的。因為那時候日本的一斗米要管七塊錢，兩個人一個月至少也要吃十塊錢的米。我還有一件至今想起都還令人憤恨的事，是在六高畢了業的時候，曾經到過一次東京，向經理員預支了兩個月的官費：因為轉入大學之後第一學期要繳四十圓的學費，又要買參攷書，醫科所用的參攷書多是德文書，爲了歐戰的關係，書籍不能輸入，就買舊書都要比原價貴到五倍以上。所以在初入大學時，預支學費便成了一般的通例。預支時原約的是按月攤還，但最可恨的是那時的四川經理員，綽號叫張麻子的，他從八月份起便和我整扣起來。好在我預支時在七月，是照的舊額四十八圓，從八月起便增了費額，所以我在八月底算就僅僅得到二十四圓的增額。寫信去質問並求通融，他欺負你是住在鄉下的人，給你一個不置答覆。於是便弄得來把買好了的參攷書又拿去進當舖，——好在當舖就在樓下——在九月將近一個月中連吃飯都是在節省着的。但誰個料到在這樣意外的地方才遇着救星呢？所以當仿吾一提議，我在心裏早就喜出望外的，一向安那說了之後，她也歡喜得幾乎流出了眼淚來，她只說，怕的是那老先生不高興，她是沒有不贊成的。

仿吾得到了我們的同意，便辭去了。隔不一會他又一個人轉來邀我們出去找尋房屋，原來那陳老先生聽說我們願意和他們同居，也是異常的高興。所以在瞬息之間事情便定奪下來了。我們便到箱崎神社

前去找到了一家房子，是有樓的，樓上有四間居室，樓下也有兩間。仿吾和陳氏一門定住在樓上，我們一家三口便住在樓下。把租約議定了，第二天我們就遷徙了去，於是乎我的老婆便成爲了陳氏一門的家政婦，我便成爲了聽差。但我當時是怎樣感激的呀！漂母的一飯原值得韓信的千金，況我和我的老婆是在出賣氣力，我們是並沒有甚麼羞恥的。

和仿吾同居在一處，我把月前和張資平兩人的擬議不消說是向他提說過，他也很贊成，但他覺得是人手不夠。據他的意見，東京的留學生能把中文寫通順的都沒有好幾個人，更說不上甚麼文學。他主張慢慢地蒐集同志，不必着急。

仿吾和我們同住了有兩個禮拜的光景，我白天是要進學堂去上課的，自然不能夠陪他；他和那陳先生父子特別是那位管家似乎也不很說得上來，他的生活便很有些無聊。我們勸他回東大去繼續學業，他起初很遲疑，覺得已經決意丟棄了的東大，自己又低首下心地繼續起來是很可恥的一樣。但他也經不住我們人多口衆的勸解，終於決心再往東京。他動身的時候是在一天晚上乘的夜車，天氣已經漸漸寒冷了下來。我記得他是披着我的一件披風去的，到了東京之後又郵寄了轉來。

陳老先生所打算就的眼科醫生是學校的大西教授。那是很有怪癖的人，由醫學上的表現來說，是有點癩癩性的人物。他在德國留過十二年的學，在日本的眼科中是數一數二的國手，在日本醫界中也怕是數一數二的怪人。

他的逸話很多。

有一次聽說是有一位日本的陸軍大將或是中將找他療治眼疾，走進了他的診察室裏，向他舉手行禮。

他叫着，『把帽子脫了！』

那將軍遭了他的叱咤很出意外，但也很倔強地回答了一句：『皇國的軍人是不脫帽的。』

大西聽了便跳起來，連忙把那將軍推出了門去，不讓他說出第二句話來。

——『豈有此理！豈有此理！進我的診察室的人不脫帽。』

像這樣的逸話在學生中很多傳說着，是真是假雖不得而知，但大家都很怕他，特別是他名下的助手，怕得他就和老虎一樣。因此他那一個教室裏，助手是寥寥無幾的，也怕是因為眼科不甚當道的原故。

陳老先生來找他，學校裏的老同學們爲他介紹，但大家都很戰戰兢兢地深怕觸犯了那怪教授的逆鱗。中國人的舊禮節也是不脫帽的，因此陳老先生頭上的那頂瓜皮小帽，又成爲了大家的憂慮的焦點。那

叱咤將軍脫帽的一段故事，也有人在他面前提說過，意思是要那老先生注意，和大西見面時把瓜皮小帽脫了。那老先生倒還很通方圓，據他說：『入鄉隨鄉，』脫帽是不成問題的。不過據我在旁邊所親眼看見過的說來，老先生住在病院裏的時候，大西教授每天是要來診察一次的，老先生有好幾次便沒有脫帽，怪教授也沒有發過一次脾氣。我想，大約他是看見陳老是上了年紀的盲人，又不遠千里地走到海外來就他，也是在感着義氣的罷？

陳老先生的眼疾據診察的結果是白內障（Cataract），假使舉行外科手術時，或許有復明的希望。老先生的熱心真可佩服，就是要略略見血的外科手術，他也甘願去受。在行手術之前的準備是很慎重的，血液的檢查，小便的檢查，各種內科疾患的有無的檢查，便費了幾天。食餌的調節更特別嚴格，這一層似乎很把那老人苦了不少。湖南人愛吃辛辣的食物，就是上了六十歲的陳老先生每餐沒有薑，沒有辣椒，也都是食不甘味的，但怕的會激起了老人的腎臟病，這辛辣的食物卻是在最嚴禁之列。不過那老先生也很能忍耐，因有復明的希望在後頭，醫生說甚麼他也就唯唯聽命。他時常愛這樣說，他的眼睛將來復明時，能够看見我們，他是很高興的。

起初受種種診察的時候是住在寓所裏，遇必要時再到學校裏去，後來決定了行手術，便移進病院裏去了，我和陳老的兒子和管家三人便輪流地在病院中陪他過夜。行手術的時候因為有課，可惜我不會看

見，據說大西教授很得意，說他的手術進行得很順暢，復明的希望或許是有的。

天氣一寒冷起來，學校裏的人體解剖實習便開始了，一個禮拜有三次都是在下半年。八個人解剖一架屍體，屍體是分成八部，頭部，胸部連上肢，腹部連大腿，脛連腳，左右各一人，餘下的背部是歸頭部的人解剖的。第一學期是解剖肌肉系統，第二學期是解剖神經系統，在約略四個月的期間要把這全身的兩項系統解剖完，因為左右是對稱的，所以一個人便須得輪解着八個屍體。屍體是用防腐劑福爾馬林（Formalin）注射過的，全身纏着紗布儲在解剖教室的屍庫裏。八個人去抬出一個屍體來，陳在鋅板製的長條桌上，就像圍着吃西餐的一樣，拿着刀子和鉗子來便坐着吟味；起初一兩次倒還是一個屍屍，後來便分割成七零八碎了；最後是像幾頭人熊，各人抱着一節骨頭。福爾馬林的臭味倒還不甚惡劣，但到時間過久了，纏帶的保障已經不嚴密，屍體上要發起微來，天氣一熱時更要腐化，甚至鑽出些蛆蛹來。這樣敘述着好像很惡心，但在解剖着的人看來實在好像在抱着自己的愛人一樣。特別是在頭蓋骨中找出了一根纖細的神經出來的時候，那時的快樂真是難以形容的。

屍體的來源是刑務所，因此所解剖的屍體便都是犯人，有的是絞死了的，在頸項上還留着絞索的痕跡，但大概是病死的多，得肺病死的很不少。日本人是有文身的習俗的，有些屍體上全身都施着朱色和藍

色相間的人物畫，畫得異常工整。

在這樣奇怪的骨絡特斯基的 (Grotesque) 雰圍氣中，我最初的創作慾活動了起來。

我幻想着我所解剖着的一個屍體上，在胸部有一個拙劣的裸體女人像的文身，旁邊也歪斜地寫着『濱田愛子』四個字。同我解剖着的一個日本學生便嘩噪了起來，『哦，這是齋藤寅吉的屍首啦！』接着便談起了一段盜屍的故事。

那濱田愛子是離福岡不遠的昔年日本的遣唐使所出入的唐津地方一家名門的女兒，在三年前的夏天在唐津海灣中洗海水澡時淹死了。黃昏時分屍體打上了海岸，因為要到明天警官才能來檢驗，在當晚便停寄在海岸上的一個棚廠裏。但到第二天來，那屍首突然不見了。

這個消息一傳出來在社會上生了很大的掀動，警察方面不消說是加緊的偵察，費了將近一禮拜的工夫都沒有着落。後來是有一位漁師的行跡可疑，那漁師自那屍首不見以來，白天沒人看見過他，只有在晚上偶爾出面，購買多數的冰塊。他的漁船每天都不見，要說他每天出去打魚去了，但又不見他打捕過甚麼魚回來。這漁師就是那齋藤寅吉了，他在三年前死掉了妻子，一直到現在都還是獨身的。警察方面得到了這個線索，對於這人的行踪也就特別注意起來了。結果是在一天夜裏，那漁師又回到了他自己的家裏。有兩個偵探早就埋伏在那附近在等候着他的，看見他挑着一擔空魚籃來放在門外，走進門去了；停不一

會又由屋子裏走出，挑着空魚籃，走上市去。兩個偵探便尾隨着他，看他到冰店去買了好些冰塊來盛在魚籃裏，但這回他沒挑回家，卻是向海岸上走去。兩個偵探又跟着他到海岸，在星光中發現了他的漁船是停在岸邊上，有一種異樣的奇臭。只聽見那漁師上了船對着空洞洞的漁船在說：

——「小姐，我回來了！濱田家的小姐……」

偵探聽見了，便急忙地掩上前去，跳上了他的漁船。那漁師看見有人來襲他，便順手提着一把切魚的長尖刀向爲首的一位偵探當心地刺去，把那位偵探刺中了，他同時也被第二個偵探捕獲着了。

那位漁師的確就是那盜屍的犯人，那濱田愛子的屍首赤裸裸地藏在那艙板下面，雖然浸雜着好些冰塊，但已經是半腐的程度了。屍體經檢查的結果，很狼藉地在死後受了凌辱，受了重傷的一位偵探不久也就死了。就這樣，那漁師便犯了幾重的大罪：盜屍，屍姦，拒捕，殺人。後來經了判決是受了絞刑的。——

這就是我所幻想出的漁師齋藤寅吉的故事。但我的幻想還沒有結束。

故事的全體我是採用了歐洲舊式的小說體裁，全由一個日本學生口中談出的。煞尾是我聽了那番故事之後，我把那齋藤寅吉畫有裸體女像的——那自然是在監獄中思慕着濱田愛子所自行刺墨的了——胸上的一幅皮膚割了下來，盛在酒精瓶子裏面，在課畢之後攜回了寓所。自己覺得很疲倦，便倒在草席上休息。突然之間有人在我的耳畔叫：

「喂！還我的愛人來！」

我睜睛一看，才看見一架骷髏立在我的房門口。我不禁大吃一驚。但是這一驚不消說只是一個夢。

這就是我的最初的一篇創作的梗概，題名就叫骷髏。我自己苦心慘淡地推敲了又推敲地把它寫在了紙上，草稿也更易過兩三次，我自己不用說是很得意的。那陳老先生聽說我做了這樣的一篇小說，叫我把原稿唸給他聽，他很稱讚我，說是落尾的一個夢收得最好。我在當時真是不揣冒昧，公然把那篇最初的創作投寄到東方雜誌社去過，不消說是沒有登錄，隔不了許久骷髏仍然寄還到了我自己的手裏來，是我把它火葬了的。

陳老先生的眼睛受了手術之後，經過是很良好，所擔心着會併發的疾病甚麼也沒有，但是失了的明總是恢復不起來。大西教授每天上午要來診察一次，要拿着手指在他眼前搖動，問他看見甚麼沒有。要把他的頭掉向有窗戶的一面，問有沒有甚麼白色的影子可以看見。但那老先生的空洞洞的一雙眼睛總是甚麼也沒有看見。我在下課時去看他，或者在病室裏留宿的時候，也時常看見他愛自行伸一個指頭在眼睛前面搖動，或者把頭掉向有窗子的一邊去望望，但總是搖搖頭。教授的意思是假使有絲毫的模糊白影可以看見，那嗎網膜上的視神經末梢還沒有退化，第一次的手術沒有完全，還可再行手術使效果增強起來。但是終竟連絲毫的影響也沒現出，結論是怕是末梢神經已經退化了。那盲老一聽見這樣的話是很失

望的，再受手術的勇氣也就消滅了。在病院裏住了四個禮拜的光景，依然在黑暗的世界中又回到我們的共同寓所來。在十一月的中旬，他們便整頓起行裝回國去了。我總忘記不了的是那老先生對我們說過的這一句話：

——『我能够睜開眼睛看見你們一眼，我是怎樣的高興呀！』

這一句話他說過不僅一次，在未行手術以前說過，在手術無效以後也說過。我是把他們送到門司上船的，在臨別的時候他也把這話來反復了一兩遍。

起初在箱崎神社前租定那間大房子的時候是先下了三個月的定錢的。陳氏父子在十一月的中旬走了之後，我們還在那兒住到了年底，在當年的除夜我們才搬到了附近臨海的一家小屋子裏面去。搬家是在夜裏，因為地方近，行李又不多，便同老婆兩人自己手提背負地搬運了一兩次，也就搬空了。那時我的感傷率性大動了一下，做過好幾首絕詩，有幾首我還記得，把它們寫在這兒：

十里松原負稚行，耳畔松聲並海聲。

昂頭我見天星笑，天星笑我步難成。

除夕都門去國年，五年來事等輕煙。

壺中未有神仙藥，贏得妻兒作掛牽。

回首中原嘆路窮，寄身天地太朦朧。

入世無才出未可，暗中誰見我眶紅？

一篇秋水一杯茶，到處隨緣是我家。
朔風欲打玻璃破，吹得爐燃亦可嘉。

這些最足以表示我當時的心境——矛盾的心境。自己好像很超脫，但在事實上卻很矜持；自己覺得是很熱心的愛國志士，但又被人認爲了『漢奸』；在無可如何之中便只好得過且過，算好倒還沒有落到自暴自棄的程度。這沒有關到自暴自棄的程度的，或者也怕是沒有錢的關係，有一些人要表示出自己的風塵潦倒，便要寫出滿紙的醇酒美人，一些不假思索的青年也就爲之灑雪出無限的同情的眼淚，其實那所謂醇酒美人是要以錢爲前提的。

轉瞬便是一九一九年了，綿亘了五年的世界大戰已經告了終結，從正月起，在巴黎正開着分贓的平和會議，同時『山東問題』也鬧得甚囂且塵上來了。我的第二篇的創作牧羊哀話便在這時候產生了出來。做那篇小說時是在二三月間，學校裏正在實習着顯微鏡解剖學的時候，我一面看着顯微鏡下的肌肉纖維，一面構成了那篇小說。那在結構上和火葬了的骷髏完全是同母的姊妹。我只利用了我在一九一四年的除夕由北京乘京奉鐵路渡日本時，途中經過朝鮮的一段經驗，便借朝鮮爲舞台，把排日的感情移到了朝鮮人的心裏。那全部的情節只是我幻想出來的，那幾首牧羊歌和一首怨日行都是我自己的大作。我

在縱貫朝鮮的鐵路上雖是跑過一天一夜，但那有名的金剛山我並不會去過，我的關於金剛山的智識，只是看過一些照片和日本文士大町桂月的金剛山遊記，所以那小說裏面所寫的背境完全是出於想像。

那篇小說寫成了之後，因為體嘗受過一次絕望，我不敢再作投稿的冒險了；但我想發表它的心事也並沒有拋棄。那時候我的一位長兄還住在北京，在司法部裏做事情，我便把那小說寄給了他，請他改削，萬一有可以發表的地方，便請他在報上替我發表。我的長兄寫信來責備了我一番，說我正在求學的時候，不應該沾染文墨上的事情，應該好好的學些本事，將來可為國效力。我的小說，他一字不易地又給我寄回來了，問我那首怨日行是從那位朝鮮人的詩集裏抄下來的？

不久之間『五四運動』的風潮便澎湃了起來。那在形式上是表示為民族主義的自衛運動，但在實質上是中國自受資本主義的影響以來所培養成的資本主義的文化對於舊有的封建社會之決死的抗爭。自從那次的運動以來，中國的文化便呈出了一個劃時期的外觀。

在那年的六月，在福岡的同學有幾位集合了起來組織過一個小團體，名叫夏社。這夏社是我所提議的名字，因為我們都是中國的人，結社是在夏天，第一次的集會是在一位姓夏的同學家裏。我們的目的是抗日，要專門把日本各種報章雜誌的侵略中國的言論和資料蒐集起來，譯成中文向國內各學校各報館投寄。由幾個人的自由的捐助，買了一架油印機來做為我們的宣傳的武器。但是這個團體結成以後，同學

的人都不會做文章，只讓我和陳君哲兩個人去擔任。君哲只做了一篇東西，在暑假期中他又回浙江去了，因此便只剩下我一個人做了油印機的保管者和使用者。我在暑假中也發過好幾次稿，都是自己做，自己寫臘紙，自己油印，自己加封投寄的。

因為在做這種義務的通信社的工作，國內的報紙便至少不能不訂閱一份。我們訂的是上海時事新報。那個報紙在五卅運動以後很有革新的氣象，文藝附刊的學燈特別是風行一時。訂報是從九月起頭，第一次寄來的報紙上我才第一次看見中國的白話詩，是康白情的一首送甚麼人往歐洲。詩裏面有『我們叫得出來，我們便做得出去』（大意如此，文字當稍有出入）的一類話。我看了不覺暗暗地驚異，『這就是中國的新詩嗎？那嗎我從前做過的一些詩也未嘗不可發表了。』我便把我一九一八年在岡山時做的幾首詩，死的誘惑、新月與白雲、離別，和幾首新做的詩投寄了去。這次的投機算投成了功，寄去不久便在學燈上登了出來；看見自己的著作第一次成了鉛字，真是有種說不出來的陶醉。這便給與了我一個很大的刺戟，在一九一九的下半年和一九二〇的上半年便得到了一個詩的創作爆發期。

我自己在小時本來就是喜歡唸詩的人，因為我們的母親愛從口頭教我們暗誦唐宋詩人的五絕七絕。在國內的中學校肄業的幾年間，科學方面的教員們通是些青黃不接的資料，不能夠喚起科學上的興趣，我自己也就只得在古詩古學裏面消磨。這不幸的幾年間構成了我日後的一個怎麼也難克服的文學

的傾向。

我初到日本來的時候，是決心把這個傾向克服的。在那二三十年前的青少年差不多每一個人都可以說是國家主義者，那時的口號是所謂『富國強兵』。凡是稍有志趣的人，誰都是想學些實際的學問來把國家強盛起來，因而對於文學有一種普遍的厭棄。我自己是在這種潮流之下逼着出了鄉關，出了國門的人，雖是有傾向於文藝的素質，然而存心地要克服它。這就是我所以要學醫的原因，因為受着時代潮流的影響既厭棄文學，同時又厭棄法政經濟之類的學科，而自己的科學上的基本智識卻沒有堅實的根底，對於數學尤其有點畏難，所以避開了理工科，而檢取這條折衷的醫學的路徑。但不料我在一高預科時無心之間和印度詩人太戈兒的作品接近了。那時同住的一位本科生，有一次他從學校裏拿了幾章英文的油印錄回來，是從太戈兒的新月集中選出來的幾首詩，是岸上、睡眠的、偷兒、嬰兒的世界等篇。我把來展讀時，分外感受着清新而恬淡的風味，和向來所讀過的英詩不同，和中國的舊詩之崇尚格律雕琢的也大有區別。從此我便成爲了太戈兒的崇拜者，凡是他早期的詩集和戲劇我差不多都是讀過的。我在岡山的時候便也學過他，用英文來做過些無韻律的詩。辛夷集開首的題辭便本是一九一六年的聖誕節我用英文寫來獻給安那的散文詩，後來我把它改成了中文的。

我們準備學醫學的人，第一外國語是德語，日本人教語學的先生又多是一些文學士，用的書大多是

外國的文學的名著，例如我們在高等學校第三年級上所讀的德文便是歌德的自敘傳創作與本事“Die-entung und Wahrheit”，梅里克（Morike）的小說卜拉格旅行途上的穆查特“Mozart auf Reise nach Prag”。這些語學功課的副作用又把我用力克服的文學傾向助長了起來。我得以和德國文學特別是歌德和海涅等的詩歌接近了的，便是在這個時期。

因為喜歡太戈兒，又因為喜歡歌德，便和哲學上的汎神論（Pantheism）的思想接近了起來——或者可以說我本是有些汎神論的傾向，所以才特別喜歡有那些傾向的詩人的。我由太戈兒的詩認識了印度古詩人伽畢爾（Kalbir），接近了印度古代的烏邦尼塞德“Upanisad”的思想。我由歌德又認識了斯賓諾莎（Spinoza），關於斯賓諾莎的著書如像他的倫理學，論神學與政治，理智之世界改造等，我直接間接地讀了不少。因為和國外的汎神論的思想一接近，便又把年少時所喜歡的莊子發現了。我在中學堂的時候便喜歡讀莊子，但只喜歡文章的汪洋恣肆，那裏面所包含的思想，是很茫昧的。待到一和國外的思想參證起來，便真是到了『一旦豁然而貫通』的程度。我在高等學校第三年上曾經起過一個野心，想做一部莊周評論，把想論述的詳細的目的，寫給北京的長兄去過，但是同樣地遭了他的斥責。

在大學的二年上，正當我在開始向學燈投稿的時候，我無心地買了一本有島武郎的叛逆者。那兒所論的是三個藝術家，便是法國的雕刻家羅丹（Rodin），畫家米勒（Millet），美國的詩人惠特曼（Whit-

man) 因此又使我和惠特曼的草葉集接近了起來，他那豪放的詩調使我開了閘的作詩慾又受了一陣暴風的煽動。我的鳳凰涅槃、晨安、地球、我的母親、匪徒、頌等詩，便是在他的影響之下所做成的。

但使我的創作慾爆發了的，我應該感謝一位朋友，編輯學燈的宗白華。我同白華最初並不相識，就由投稿的關係才通起了信來。白華是研究哲學的人，他似乎也有嗜好汎神論的傾向，這或者就是使他和我不接近了的原因。那時候，但凡我做的詩，寄去了他無有不登，竟至學燈的半面也有整登着我的詩的時候。說來也很奇怪，我自己就好像一座作詩的工廠一樣，詩一有銷路，詩的生產便愈加旺盛起來。在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交的幾個月間我幾乎每天都在詩的陶醉裏，每每有詩的發作襲來就好像生了熱病一樣，使我作寒冷，使我提起筆來戰顫着有時候寫不成字。我曾經說過，『詩是寫出來的，不是做出來的，』便是道的當時的實感。但到一九二〇年的四五月間白華到德國去了，學燈的編輯換了人，我的詩潮也就從此消滅了。

我得以認識田壽昌的是因白華介紹。田壽昌和宗白華都是當時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是五四運動後所產生出的新人。壽昌也在日本留學，那時還在東京高等師範讀書。他那時已在介紹着俄羅斯文學，又在議論着詩人和勞動問題。據我所知道的他是受了日本文壇的影響，同時不消說也就是間接地受的俄羅斯革命的影響。一九一七年俄羅斯的十月革命一成功，在各國的勞工運動上和文化運動上有一個劃

時期的促進。日本思想界之一角顯著地呈出了左傾色彩的，便是從那時候起頭。在當時比較進步的雜誌改造和解放，繼續發刊了。

壽昌由白華的介紹和我開始通信，後來在一九二〇年的三月尾上，他利用着春假竟由東京到福岡來訪問過我。他來的時候正逢着我第二個兒子博孫誕生後才滿三天，我因為沒錢請用人，一切家中的雜務是自己動手，他看見了我那個情形似乎很感着了莫大的失望。他那時候還年青，還是昂頭天外的一位詩人，不知道人生爲何物。就是我自己也是一樣。當他來了的第三天上我公然陪着他到福岡附近的名勝地太宰府去玩了一天，第二天也陪着他遊玩了福岡市中的名勝，把產後僅僅五六天應該保持絕對安靜的安那連帶着兩個孩子丟在了家裏，後來弄得奶子斷了，生出了種種的病痛。

孩子因爲奶斷了的關係便不得不用人工營養；營養又不很得法，因此又發生出食餌中毒的症候，只得抱進大學病院裏就醫。先生說，孩子恐怕是不能够保的，只有用最後的手段飢餓療法來調治，要等到中毒現象的熱度退了，才有希望。一家人搬進病院的一間小小的病室裏，守着一個發着高熱的因飢餓與痛苦而啼哭着的半死的嬰孩。時候是秋天，窗外的庭園中有寂寞的雞冠花映着寡白的秋陽。白天守了一天，到晚來又眼睜睜地守了一夜，我那首索羅普的夜歌便是在那惺忪的夜裏做出的。那在痛苦的人生負擔之下所榨出來的一種幻想。由葡萄中榨出來的葡萄酒，有的人會謳歌它是忘憂之劑，有的人又會

詛咒它是腐性之媒，但只有葡萄自己才曉得那是它自己的慘淡的血汁。孩子在第二天的清早熱度退了，算是好了起來。那首副產物的夜歌，後來因為壽昌翻譯了王爾德的沙樂美，要我做篇序，我便寫寄了給他。

壽昌來訪的結果是產生了一部三葉集，所蒐集的便是白華、壽昌和我的通信。但他對我是很大的失望。他回東京時，路過京都，和鄭伯奇見面時，伯奇問他見了我的感想如何，他說了一句「聞名深望見面，見面不如不見。」這是後來伯奇對我言及的，但我相信絕對不是假話：因為壽昌對我也露過這樣的口氣。當他初來的時候，我正在燒水，好等產婆來替嬰兒洗澡，不一會產婆也就來了。我因為他的遠道來訪，很是高興，一面做着雜務，一面和他談笑，我偶爾說了一句「談笑有鴻儒，」他接着回答我的便是「往來有產婆。」他說這話時，或者是出於無心，但在我聽話的人卻感受着不小的侮蔑。後來在三葉集出版之後，他寫信給我，也說他的舅父梅園先生說我很有詩人的天分，但可惜煙火氣太濃重了。當時的壽昌大約是嫌我太不清高，太不自重，往來的是產婆下女，關心的是柴米油鹽，這樣是會把詩藝之女神駭到天外去的。但他卻沒有想到我假如有錢，誰去幹那樣的事體……三葉集出版之後頗受了一時的歡迎，壽昌便又食指欲動起來，又會約我和他的另一位朋友作三角的通信，好出一部新三葉集，這個提議是由我拒絕了。

在學燈上投寄詩稿的時候，我也投寄過一兩篇小說，有一篇題叫鼠災，寫的是我的唯一的一件哩噫。學生裝放在破了角的一隻藤篋裏面被耗子咬壞了，我和安那勃谿了一場的故事。那全篇用的是心理描

寫得頗暗淡，比較我那牧羊哀話和火葬了的骷髏，要算是進了一境的創作。可惜我自己沒有存稿，別的人也沒替我保存着的。（註）

那篇牧羊哀話，我起初是在學燈附刊上看見了有一種新中國雜誌在北京刊行，看那廣告上也登載着托爾斯泰的短篇小說的翻譯，我也就大着膽子投寄了去。這回也搭響了。那雜誌的編輯先生登時回了一封信，稱讚我的小說『筆酣墨飽，情節動人，決於本誌第七期登載。』但自從接到那封信以後便沒有得到消息，後來隔了許久，由我的詰問才得到了兩本雜誌的報酬。那新中國究竟是那一系的刊物，那位編輯先生究竟是誰，我到現在也還不知道。

（註）假使有人有一九一九年九月以後及一九二〇年四月以前的學燈的人，這篇文章一定可以找出。

四

自己本是傾向文學的人，受着時潮影響，反乎本性地到日本來學習醫科。日本人的教育方針採取的是灌注主義，生拉活扯地把一些學識灌進學生的腦裏，這在我又是一番苦痛。在高等學校的時候倒還沒感覺着怎麼，因為那兒的功課一半以上是語學，也可以說就是文學。進了大學情形便迥然不同了。天天鬧的是『姆士苦魯士』(Musculus 肌肉)，『奈爾烏士』(Nervus 神經)，『欺爾苦拉穹』(Circulation 循環)，『勒斯拉拉穹』(Respiration 呼吸)並沒有多麼道理，只是烏士魯士拉穹沙穹的死記些外國名辭。一個腦筋成爲一個世界漫遊者的皮篋，縱橫狼籍地貼滿了各個口岸各種文字的旅館招帖。

在我自己還有一種身體上的缺陷，是我在十七八歲的時候，得過一次重症傷寒，兩隻耳朵是得了中耳加達兒的。這種疾患的症候是耳鳴重聽，原因是由高熱的關係使鼓膜窪陷了，在傳播聲音的機構上生出了障礙。在高等學校時，因為那兒班上的人數少，每班至多只四五十個人，教室不大，這種症候倒還沒感覺着怎樣的困難。進了大學，特別是醫科大學，每班的人數在一百人以上，所有的講義都是口授筆記，因此自己的不健全的聽力便感受着莫大的痛苦。

就這樣在身心兩方都感受着痛苦，在進大學後沒一年工夫，我深深感覺着我自己的學醫是走錯了路。一九一九年的暑假中，我早就有想改入文科的心事，但反對最激烈的便是我自己的老婆。在她的想法又不同，她是和我同受着生活上的壓迫的，她認定醫學可以作為將來的生活的保障。而我自己所受的身心的痛苦，她是沒有身受的。像那種眼睛所看不見的痛苦，你就訴說出來，別人也只好把你當成神經過敏。因為有了她的反對，於是乎我的牽怒便是恨她，甚且唾棄着一切的科學。歌德的浮士德投了我的嗜好的，便是在這個時候。

我在一九一九年的夏天，便零碎地在開始作浮士德的翻譯，特別是那第一部開首浮士德咒罵學問的一段獨白，就好像出自我自己的心境一樣。我翻譯它時，也就好像我自己在做文章。那場獨白的翻譯最初是在那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發表過的。第二年春間經宗白華的勸誘，我又曾把那天上序曲和第二部的開首一場風光明媚的地方翻譯了出來，後者也是在學燈上發表過的。

就在宗白華往德國留學的時候，我自己卻是想跑回中國。「五四」以後的中國，在我的心目中就像一位很葱俊的有進取氣象的姑娘，她簡直就和我的愛人一樣，我的那篇鳳凰涅槃便是象徵着中國的再生。眷念祖國的情緒和爐中煤，便是我對於她的戀歌。晨安和匪徒頌都是對於她的頌詞。特別是匪徒頌，那是憤慨於日本新開界的捏誣，那時候的日本人稱「五四」運動以後的中國學生為「學匪」，我感覺着

無限的憤恨。爲抗議「學匪」的誣蔑，便寫出了那首頌歌。但在「五四」以後的國內的青年，大家感覺着智識慾的驅迫，都爭先恐後地跑向外國去的時候，我處在國外的人卻苦於智識的桎梏，想自由解脫，跑回中國去投進我愛人的懷裏。我那時候想回中國去也並沒有多麼大的野心，就像太戈兒的園丁集裏的那個只想替女王拉上鞋跟的園丁一樣，我是只想跑回中國去，在那兒的中小學校裏當一個國文教員便心滿意足了。

一九二〇年的七月十日，我率性放下了決心，別離了安那和兩個孩子，跑到門司去想乘船回到上海。那時候有一位朋友在門司養病（就是殘春中的賀君）我去看他時，他的病也快要脫體了，打算在月底退院回國，約我等一下和他同道。我自己想到在上海並沒有熟人，地方也不熟習，在一九一五年的五七雖然回到那兒去過一次，但只在旅館裏呆了三天，甚麼地方都沒有去過，對於那未知的上海也不免隱隱地含着一种恐怖。樂得有伴，我也就承應了，又由門司折回福岡。折回福岡時是七月十九日，就在那天，我意外地接到了一封張東蓀的來信。

張東蓀是當時的時事新報的主筆。信裏說他們有幾位同志，在上海組織了一個共學社，打算翻譯海外的名著。浮士德正是名著之一，因我零碎地翻譯過一些，他便勸誘我從事全譯，不則另外擔任一兩種譯述。條件是在時事新報上登着廣告的，並且登了許久，售稿或版稅都聽隨自便。

我得到這封信時異常高興，安那不用說也是喜出望外的，我便立地寫了一封回信，接受了前者的提議，著手浮士德的全譯，把回國的計畫暫時中止了。

西洋的詩劇，據我看來，恐怕要算是最無理的一種文學的形式，最當散行的對話都用韻文表現，結果實不外是一種文學上的遊戲。浮士德這部詩劇，單就第一部而言，僅可稱爲文字的遊戲之處要在對成以上，像那歐北和酒吧、魔女之廚、瓦普幾司之夜及夜夢，要算是最沒有詩意的地方。那些滲雜在詩劇裏面而濫竽詩名，僅是在有韻調的鏗鏘而已。在這些地方譯得最吃力，最不討好，假如要用散文譯出時，會成爲全無意味的一些骸骨，用韻文譯出來，也不外是下乘的遊戲文字而已。在這些地方我覺得元代的雜劇，和以後的中國戲曲，唱與白分開，唱用韻文以抒情，白用散文以敘事，比之純用韻文的西洋詩劇是要較近情理的。

譯浮士德的第一部費了有四個禮拜的工夫，我的初稿是用毛筆在日本的『改良半紙』上寫出的，因爲塗抹得厲害，我又工整地謄寫過一遍，結果是將近一個暑假的時間都爲此消費了。第二部更長，更難譯，難譯的原故是因爲那兒的遊戲文字比第一部更多，全劇的構成過於支離，而那裏面所包含的帝王思想，反對革命（這個革命的意義與現代的不同的思想，是使我最難忍耐的。因此我便改變了初志，只譯出第一部來印行，第二部不譯。這個辦法並不是由我創始，浮士德的英譯有三十種以上，僅譯第一部的在

二十種以上，把第二部全譯了的不上十種。演浮士德的人，也僅僅是演第一部的。因此我便寫信給共學社，提說僅譯第一部的意思。不知道是那封信失掉了，還是共學社的人看見我不想譯完，便以為無可出版的價值，信去後，我一直沒有得到回信。不久學校開課了，我只好把譯稿收拾起來，放在一個日式的「茶籠」下小小的壁櫥裏，等有機會時再來譯第二部。回國的念頭也同時寄放着了。

不幸在這兒我又遇着了一次「鼠災」。學校開課之後大約有四五個禮拜的光景，我在一天禮拜日想把譯稿取出來整理一下，同時也想借着禮拜和每日夜間的餘暇來試作第二部的翻譯，好使工作告一個結束。待把小小的壁櫥打開，放在壁櫥角上的原稿，有三分之一以上的分量不見了。那壁櫥原來有一個窟窿和旁邊的一個櫥子的地板相通，有高客先生把我的譯稿拉去做窠去了。紙是改良半紙，異常柔軟，但那高客先生們還嫌不如意，把紙頭咬得來真是和粉一樣碎。這個災難使我失望不小，因為那是我費了將近一個暑假的勞力譯出來的東西，每天清早四五點鐘便起床，連吃飯的時間都疼惜着譯了出來，才成了這樣的一個下落。被咬壞了的部分就是那街坊以前的各場，那在第一部中要算是最難譯的部分。假使我的底稿還存着，都還可以安慰一下，但那些底稿在第二次的清寫稿錄出時，已經先先後後消費到毛房裏去了。就這樣，第一次受了黃金幹先生的批判，第二次受了高客先生的批判，使我那部譯稿便成爲一架殘骸。而在第三次還受了老婆的批判，我的日本老婆對我說：「這是說你不應該做文學家，所以你第一次出

馬便受着這樣的打擊。』

翻譯了浮士德對我卻還留下了一個很不好的影響。我的短短的做詩的經過，本有三四段的變化。第一段是太戈兒式，這段時期在五四以前，做的詩是崇尚清淡、簡短，所留下的成績極少。第二段是惠特曼式，這段時期正在五四的高潮中，做的詩是崇尚豪放、粗暴，要算是我最可紀念的一段時期。第三段便是歌德式了，不知怎的把第二期的情熱失掉了，而成爲韻文的遊戲者。我開始做詩劇便是受了歌德的影響。在翻譯了浮士德第一部之後，不久我便做了一部棠棣之花。在那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上僅僅發表了一幕，就是後來收在女神裏面的那一幕，其餘的通成了廢稿。女神之再生和湘累以及後來的孤竹君之二子，都是在那個影響之下寫成的。助成這個影響的不消說也還有當時流行着的新羅曼派（Neo-romanism）和德國新起的所謂表現派（Expressionism）。特別是表現派的那種支離滅裂的表現，在我的支離滅裂的頭腦裏，的確是得到了它的最適宜的培養基（Nährboden），安勒爾的轉變，凱惹爾的加勒市民，是我景仰的作品。那一派的人有多少是崇拜歌德的，特別把歌德的『由內而外』（“Von Innen nach Aussen”）的一句話做爲了標語，在把浮士德第一部譯過了之後的我，更感覺着了骨肉般的親熱。但這個影響卻把我限制着了，我在後來要擺脫它，卻費了不小的努力。

記得是北京的劉半農博士，他在語絲上嘲罵過我，說我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稱歌德。』我在前雖

然沒有自稱過我是歌德，但我和博士先生一樣委實是崇拜過歌德來的人。博士先生的說我『自稱歌德』是罵我不配，但我現在可又進了一步，我敢於這樣說，像歌德那樣的人是值不得我們崇拜的——在博士們看來，或者又會說我是在『自稱歌德』以上，』那倒可以說是近乎事實。歌德可以令人佩服的地方，是在他的努力，但他的成績也實在有限。他和他同國同時而稍稍後出的馬克思比較起來是怎麼樣？那簡直可以說是太陽光中的一個螢火蟲！他在德國是由封建社會轉變到資產社會的那個階段中的詩人，他在初期是吹奏着資產階級革命的一個號手，但從他做了隈馬公國的宰相以後，他老實退回到封建陣營裏去了，他那貴族趣味和帝王思想實在有點薰鼻。詩人海涅罵過他，說他只曉得和女人親吻——用紅樓夢上的話來表現時，便是只曉得『吃姑娘嘴上的胭脂』。他老先生的確是可以稱爲德意志的賈寶玉。

我雖然不會自比過歌德，但我委實自比過屈原。就在那一年所做的湘累，實際上就是『夫子自道。』那裏面的屈原所說的話，完全是自己的實感。『從早晨起來，我的腦袋便成了一個灶頭，我的眼耳口鼻就好像一些烟囪的出口，都在冒着烟霧，飛着火星，我的耳孔裏還烘烘地只聽着火在嘯，灶下掛着的一個土瓶——我的心臟——裏面的血水沸騰好像要乾涸了的一般，只迸得我的土瓶不住地跳跳跳。』在當時我自己的生理狀況就是這樣的。我在目前也多少還是這樣，但我沒再有那時那樣的狂妄，要叫着『破滅！破滅！我歡迎你！我歡迎你！』的話了。我知道這樣的一點點身體上的苦痛，比較起在鐵鎖之下呻吟着的朋

友們，在火線上再接再厲的朋友們，所受的苦痛，算得甚麼！但我當時實在是有些燥性狂的徵候，領着官費，養着老婆兒子，實際上不外是一條寄生蟲的我，而偏要自比屈原，就好像自己是遭了放流的一樣，就好像天高地闊都沒有自己可以容身的地點一樣。

我從前做過的一些古事劇或小說，多是借着古人的皮毛來說自己的話，這層也就是西洋賈寶玉所給與我的惡影響了。我們知道浮士德中的浮士德，就是歌德自己的化身，威廉邁斯達中的威廉，也不外是渾爾夫剛他自己。

女神之再生是在象徵着當時中國的南北戰爭，共工是象徵南方，顛項是象徵北方，想在這兩者之外建設一個第三的中國——美的中國。但我自己的力量究竟也太薄弱了，所表現出來的成果僅僅是一副空架子。這篇詩劇的初稿我寄給鄭伯奇看過，又由伯奇轉寄了給達夫。達夫用德文做過一首詩給我，我把來寄到民鐸雜誌去一同發表過。可惜我手裏沒有民鐸，達夫的詩我也不能記憶了，我僅記得是兩節詩，每節四行；那八行詩的價值是在我那副空架子的詩劇之上的。

五

南國月刊的二卷一期（一九三〇年三月二十日出版）多蒙田壽昌爲我保存了一封舊信：

「壽昌：

你近來做了些甚麼稱心事還好麼？你我已久不寫信了呢！你做的“Violin and Rose”，我很想看，可惜少年中國雜誌已經停寄了，所以我至今還未入目。你其餘的一些計畫，已經完成了麼？我在年假中也做了兩篇短短的戲曲。一篇是湘累，是把屈原姊弟優孟化了的，不久在學藝雜誌上當得披露。一篇是女神之再生，現在還在伯奇那兒，將來擬寄往李石岑君在民鐸上披露。

成仿吾君你近來會過沒有？他去年有信來，說有幾位朋友（都是我信任的）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要約你和我加入。他曾經和你商榷過沒有？他的來信上說：「新文化運動已經鬧了這麼久，現在國內雜誌界底文藝，幾乎把鼓吹的力都消盡了。我們若不急挽狂瀾，將不僅那些老頑固和那些觀望形勢的人要囂張起來，就是一班新進亦將自己懷疑起來了。」他這個意見，我很具同感，所以創刊底建議，我也非常贊成，不消說我們創刊雜誌另外還有多大的目的和使命了。京都方面底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我在二月間擬往京都——我昨天寫到此處便住了筆，今天往校內去

取信，成仿吾君竟有一封信來，我纔知道他已經和你商量過來。其後的進行怎麼樣了？我等你來信，再商量以後的辦法。

沫若，十八日。

這『十八日』是一九二一年的正月十八日。那時正是我的煩悶達到絕頂的時候，我說『二月間擬往京都』便是想改進那兒的文科大學。這次的計畫也沒有成爲事實，是遭了仿吾的反對。仿吾的意思是，研究文學沒有進文科的必要；我們也在談文學，但我們和別人不同的地方是在有科學上的基礎知識。他這些話卻把我想轉學的心事克服了。

仿吾自從同着那位盲目的陳老先生來過一次福岡之後，他和我常常通信的。當我一九一九年與一九二〇年之交正猛烈地爲作詩慾所襲迫着的時候，我凡是成就一首詩，是用複寫紙謄錄出來，一份寄給宗白華，一份便寄給仿吾。仿吾最喜歡我那首『讀 *Carlyle*: "the hero as poet" 的時候』的雪朝，但他不高興那第二節，說是『在兩個宏濤大浪之中那來那樣的蚊子般的音調。』但那首詩是應着實感做的。那是落着雪又括着大風的一個早晨，風聲和博多灣的海濤聲，十里松原的松濤聲，一陣一陣地起來，把銀白的雪吹得彌天的亂舞。但在一陣與一陣之間卻因爲對照 (*Contrast*) 的關係，有一個差不多和死一樣的沉寂的間隔，在那間隔期中便連蒼蠅的滴落都可以聽見。那正是一起一伏的呂律，我是感應到那種

呂律而做成了那三節的雪朝。我覺得要那樣才能形成節奏，所以我對於仿吾的意見沒有採納。仿吾尤喜歡的是『我全身心好像要化爲了光明流去』的那一句，他在一九二一年的年頭所做的處女作流浪人的新年，開首的幾行中便引用了那一句。

仿吾開始作新詩，據我所知道的是從一九二〇年起頭。當宗白華還未去德國時，他有兩首詩我替他寄到學燈去發表過，一首是澎湃的黃海，他宣言着我們達到了我們的“Sturm und Drang”（狂飈突貫）的時代。他在那年的暑假在房州洗海水澡，便做了不少的詩寄給我，我替他集成海上吟，在創造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的便是那時候的作品。仿吾初期的詩和他的散文是形成着一個奇異的對照的，他的散文是勁峭，有時不免過於生硬；他的詩卻是異常的幽婉，包含着一種不可捉摸的悲哀。你讀他的詩，絕對聯想不到他在學造兵科，是和大礮戰車打交道的人。但他和我一樣是在煩悶着的。他爲甚麼要學造兵科，我不會聽他自己說出過他的理由，但我們是很容易推想得到的，那也不外是富國強兵的時代潮流之影響。他後來爲甚又終於把造兵的本職拋棄了，這我也不會聽他自己說出他的理由；但我想他的文學趣味的抬頭縱不是全部的原因，總要算是重要的一個。

一九二〇年的下半年他在研究托爾斯泰。達夫寫信來對我說過，說他的研究最澈底，他打算把托爾斯泰的全部的著作都拿來讀它一遍。但這項研究在後來似乎中輟了，因爲隨後我也不會看見他提到托

爾斯泰來過。他和達夫同在東大。張資平那時候也在東大的地質科。我說的能够信任的幾位朋友，便是指的他們。田壽昌和他們的交際要算是出於我的介紹。那個『想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的計畫，便是博多灣上的舊議的復活了。據仿吾先後寫來的信，說他們在東京在達夫的寄宿處開過兩三次會，第二次壽昌出了席，討論的結果是壽昌自行擔任在國內找出版處，並要邀約些國內的朋友來參加。第三次開會時壽昌沒有出席，出版處的消息也沒有下文。

「京都方面底朋友也可有三四人加入，」便是說的鄭伯奇穆木天張鳳舉徐祖正諸人。伯奇那時還在京都三高，我和他的交際，又是由壽昌介紹的。自壽昌來訪之後，他便在和我通信了。

我聽了仿吾的勸告打消了轉學向京大的念頭，但我的煩悶並沒有因而打消。我在二三兩月間竟至狂到了連學堂都不願意進了。一天到晚據在樓上只是讀文學和哲學一類的書籍。我讀了佛羅貝爾的波娃麗夫人。左拉的制作，莫泊桑的波南密，水上，哈姆森的飢餓，波奕爾的大饑，還有好些易卜生的戲劇，霍普特曼的戲劇，高斯華綏的戲劇。愈和這些書接近，便愈見厭棄醫學，回國的心事又抬起了頭來。

當在這樣煩悶而動搖着的時候，仿吾也和我一樣在煩悶而動搖。他是學造兵科的人而要澈底的研究托爾斯泰，單是這一點已經就可以知道他的矛盾。他在東京是和他的一位同鄉李鳳亭住在一道的。那是在一處私立大學學法政的人，在一九二一年的二月畢了業，先回上海去了。泰東圖書局在那時打算改

組編輯部，要分成法學文學哲學的三科。李鳳亭任法學主任，李石岑任哲學主任，是已經約定了的。李鳳亭便推薦仿吾爲文學主任。於是仿吾就決定了回國的計畫，並把臨到頭的畢業試驗拋棄了。他決定在三月尾上由神戶乘船動身，船在四月一號可以抵門司。我得到這個消息，便急轉直下地也決定了在四月一號到門司去和仿吾同船回國。

我是在晚上動身的，那時候我家裏還稍稍出了一點悲劇：便是我們在海上住了兩年多的房子，在我決定了走的三月三十一號的那一天，屋主來領了房金，同時說他的房子要改造了，限我們在一個禮拜之內搬出。這到後來才知道只是一個口實，實際上是他另外找到了一家願多出一倍房金的摯客。那房子是一樓一底，樓上有兩間房屋可住，底下是日本的漁家式的建築，一邊是牆壁，一邊是敞放着的，雖也是兩間的間隔，但並不成爲房間。我們起初租賃下來的時候，是每月六元的房金，把我們趕走之後，所新招的一家聽說是每月十二元。在我已經決定了走時，而我留在後邊的家族卻要被人驅逐，這使我的決心不免又動搖了起來。在這兒我是應該感謝我的安那的。她平常雖是阻當我，不要我改學，不要我回國，但她看到我就像成爲了狂人的一樣，呆在家裏幾月不進學校，她也就決心讓我把醫學拋掉，回國去另外尋一種出路。她的性格比我強，只要一起了決心，便沒有甚麼遊移，在我動搖着的時候，反是她來鼓勵着我執行了既定的計畫。

由福岡到門司只有兩個鐘頭的火車，我動身時是在夜裏，因為在白天時兩個孩子看見我走，是會要啼哭的。安那在夜間煮了些紅豆飯，燒了一匹鱒魚來替我餞行。這是日本民間的很有古風的習慣，凡是表示喜慶或祝賀的時候便要用這些東西，和中國的民俗很是相近。紅豆飯不消說是取其紅色。鱒魚在上海市上稱為銅盆魚，也是一種紅色的海魚。

走的時候天在下雨，安那說要送我到箱崎車站上去，我阻止了她，怕的是兩個孩子在夜間醒了來沒人照顧。

丟着一妻二子在後邊，雖說是回國實際是等於出外漂泊的我，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和那晚的夜雨一樣，是淋漓地洒雪過的。我最放不下心的，便是我走之後，剩下家裏的人在一禮拜之內不能不另尋巢穴。

安那安慰我，她說，『在村上很有些熟人，在你回國之後暫時還有官費可領，我們的事情你不用擔心。只希望你回國去努力，有了職業時，我們便回來跟着你。』

就這樣同安那住了四年另三個月，纔第一次要作長久的分離。我在夜雨中從十里松原穿過，到箱崎車站去搭夜車，我心中的感覺就好像古代的武士出去上陣一樣——不是說自己很勇敢，有視死如歸的精神，是自己的漂泊的前途吉凶莫卜。

在門司的船上遇着了仿吾，天色也晴起來了。海灣中的海水呈着濃藍的顏色，有好些白鷗在海上翻

飛。在晴明的自然中，與久別的舊友重逢，夜來的憂鬱已被清冷的海風吹送到太平洋以外去了。我那時候委實感受着了「新生」的感覺，眼前的一切物象都好像在演奏着生命的頌歌。仿吾搭的是三等艙，他在自己的鋪位旁邊另外替我空下了一個鋪位。同時他還替他的友人護送着家眷，那是搭着二等艙的。

在門司時的天色異常清明，但不料船一出海時便起了風雨。我是愛暈船的人，睡在那黑黢黢的三等艙中一動也不敢動。仿吾很強，他時而要跑到二等艙去照拂友人的孩子們，時而又跑到三等艙來和我談話。仿吾隨身帶了不少的德文，雷克朗牟（Reclam）版的屠格涅夫的小說。他的托爾斯泰的研究又已經轉換成屠格涅夫的研究了。我睡在船上算得到機會把屠格涅夫的父與子、新時代等讀了一遍。

船到上海的那一天是四月三號，天色又晴起來了，但是風浪還沒有止息。我醉心着想在船頭上去看海中出日的光景，忍着眩暈地跑上船板上去，好容易把那光景目驗了一下，但幾乎把自己的肝臟都吐了出來。我那歸國吟中的海舟中觀望日出的一首便是寫的是這個時候的情景。

船進黃浦江口以後，那兩岸的風光的確是很愛人的，時節是春天，又是風雨之後晴朗的清晨，黃浦江中的淡黃色的水，像海鷗一樣的遊船，漾着青翠的柳波的一望無際的大陸，真是一幅活的荷蘭畫家的風景畫。幾年來所渴望着的故鄉，所焦想着的愛人，畢竟是可以使人的靈魂得到慰安的處所。靠在船圍上呈着一種恍惚的狀態，很想跳進那愛人的懷裏——黃浦江的江心裏去。但這個幻覺不一刻便要像滿盛着

葡萄酒的玻璃杯碰在一個岩石上來了。

船愈朝前進，水愈見混濁，天空愈見昏朦起來。楊樹浦一帶的工廠中的作業聲，煤烟，汽笛，起重機，香煙廣告，接客先生……中世紀的風景畫，一轉瞬間便改變成爲未來派。假使那些工廠是中國人主宰，那面未來派的畫幅是中國人畫出來的，又或者我自己不是生在中國的人，或許也未嘗不可以陶醉一下摩登的風物。然而不幸的是我自己和那岸上活動着的和乞丐相差不遠的苦力兄弟們是同屬於所謂黃帝的子孫，神明之遺裔！那時候我還沒有階級意識，我只有民族意識，看見自己的同胞在異族的皮鞭之下呻吟着的，除非是那些異族的走狗，誰也不能够再閉着眼睛做夢。美好的風景畫被異族塗炭了！

到了上海了。這兒我雖然是再度的劉郎，但勝於是初到了外國的一樣。那時候的上海女人正流行着短袖子的衣裳，袖口快要到肘拐以上，流行着長大的毛線披肩，披在肩膀上可像反穿着一件燕尾服，男子的衣裳卻又有極長的袖口，長得快要驢過膝頭。那些長袖男，短袖女，一個個帶着一個營養不良，栖栖遑遑的面孔，在街頭竄來竄去。在古語的『走肉行屍』中令人感受着一種新鮮的感覺。街上跑着的汽車、電車、黃包車、貨車，怎麼也好像是一些靈柩一樣。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時候率性又以不同的意義流瀉了出來。

我隨着仿吾和他所送的友人家眷坐在馬車上先到了一家公館。那公館是誰的，是在甚麼地方，我不

知道，後來我也沒有問過仿吾。在那公館裏面吃了一會茶，不記得又是取的怎樣的路徑，同仿吾兩人到了馬霍路的泰東書局的編輯所。到了編輯所，昏昏濛濛地會過一些人，談過一些話，那時的詳情我已不能記憶了，只是記得自己感覺着沒有着落。我們從一些人的談話中，知道了改組編輯部的事情原來才是一場空話。擔任法學主任的李鳳亭已經任了安慶政法學校的教職，擔任哲學主任的李石岑還是在編輯着學燈和民鐸，聽說不久有入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的消息。仿吾所當擔任的文學主任卻本來有一位姓王的人擔任着的，那姓王的人也十分高興地歡迎我們，說是他得了很好的兩個助手。這樣一來，在我倒是出於自動，沒有甚麼，在仿吾要算是等於落進了一個騙局。

到了編輯所已經四五天，仿吾的任務依然沒有決定，我自己也沒有找着出路。仿吾是領了歸國費的，他那時還有餘錢，便在四月八號約着我去遊西湖。

遊西湖時的心境和經過，我有西湖遊紀的幾首詩留存了下來；仿吾的一首長詩，由長沙寄沫若也敘述到了這件事情的追憶。

去時我們乘的是晚車，到南站時，天上有赤色的晚霞，有大而明朗的長庚星出在西邊，由車頭上冒出的蒸氣在那紅色晚景中映成紫色。我那時候在思念着我離別了八年的母親，同時又在擔心着留在日本的妻兒。火車是由南而北的奔跑，我的心思是在東西的緯線上梭織。我們坐的是二等車，車上有幾個中國

人，好像是上海的政客，帶着了兩名妓女，在一隻角上大事吃嗑。在中國的火車上沒有特設的食堂，就在客車中便可以叫番菜，嗑酒。那幾位先生一面和妓女開着玩笑，一面牛飲着啤酒，男的女的都在吸香菸，吸得一個車箱都是昏天黑地的。把酒菜吃嗑了之後，他們又打起撲克牌來，又鬧又笑，特別是那兩位妓女鬧得厲害。同在車上的有好幾個西洋人，都沉默着在拿着一些文件校閱，在他們心目中似乎除掉自己之外，沒有身外的世界。又有幾位日本人在高談闊論，時而帶着極輕蔑的眼光望着那一羣吃喝賭博着的中國人取笑。因為我和仿吾都穿的是日本帝大的制服，他們大約是把我們當成日本人去了，有的遠遠用眼睛來向我們示意。我的不值錢的眼淚，在這裏又洶湧了起來。我憤恨的自然是我們中國的貴同胞太不爭氣，同時是連想到中國的政局，中國全體的局面，以及在國際上的形勢都是那個樣子：車中的情景便是時局的一幅縮寫圖，凡是自己不能夠抱一個妓女在懷裏的中國人，想來是誰都會痛哭流涕的。

到杭州時是半夜，我們投宿在清泰旅館裏——這座旅館我不妨在這兒給它登一個廣告，但我恐怕現在已經是沒有的了。進了旅館使我第一件感着驚異的是杭州的清靜，連那穿長衫戴京帽的茶房都很斯文，就好像那兒的小學教員一樣。

第二天清早起來，吃了早飯之後，便去遊湖。我們在杭州那時是沒有熟人的，只買了一份地圖來做嚮導，決定沿着湖的西南岸走去先遊雷峯塔。這個路向便是一個頂外行的路向，在圖上看來不很長的一段

湖岸，走起來卻是費了半天的工夫，而那一段湖岸在西湖是最沒趣味的一段。並且我們的沒有經驗還鬧了一個小小的笑話，我們不知道在西湖裏面只要有錢隨處都是可以吃嗑的，我們照着日本的「遠足」式的辦法，備辦了一些乾糧。我們所備辦的乾糧又有些特別，我們因為「素心饅頭」的名目別致，又聽茶房說有甚麼「素鷄」、「素火腿」。以為那冠在頭上的素字是清潔的意思，便拿了兩塊大洋叫茶房替我們置辦，於是一個人一塊錢的乾糧便是荷葉兩大包。挾着兩個大荷葉包子走了半天的路，真真是再別致也沒有的西湖遊，但有火腿和雞肉在手中可以犒勞，倒也不覺得有怎樣的厭煩。走到雷峯塔，正是所謂「日午當空塔影圓」的時候，兩個人都感覺着口渴，而同時肚子也有點餓了。於是在塔下的草地上坐下，把荷葉包子解開，把那「三素」來賞心。誰知所謂「素心饅頭」才是甚麼心子也沒有的麵包，所謂「素鷄」「素火腿」才是一些豆腐皮。「三素」嚼在口裏，倒也沒有怎樣的難吃，只是愈嚼愈見口乾，嚼不上半個饅頭，怎麼也難吞下喉去，只得又把荷葉來包好了。

在雷峯塔下停着有一隻湖船，船中的矮桌上放着一個茶壺，那誘引我們把沿湖走路的計畫拋棄了。我們坐上了船，把船家的那壺冷茶傾向肚子裏，比吃了兩大杯冰淇淋蘇打水的還要快意。船家把我們搖到北岸，在湖濱公園近處的一家小館裏吃了中飯，我們把我們的「三素」送給船家去了。

在西湖北岸遊了一回，參拜了一些英雄英雄的墳墓，沒有感着多大趣味便折回了旅館去。

第三天逛了一回孤山，遇着了一番微雨，雨中的西湖很給與人一種寂靜的感覺。回頭又到湖濱公園去過，遇着了幾位畫畫的女子，想來怕是杭州女子師範的學生。

“un danei” 我這樣用日本話對仿吾說。

“un dai” 仿吾也回應了我一聲。

我在這兒對不住我們那天看見過的幾位女同胞，要把這個隱語解說一下。這是日本學生間所慣用的隱語，un 字是由德文的 unschoen 省略下來的，意思便是不美。反過來遇着好看的女人時便說一個 schoen 字。但這德文的 schoen 字正確的發音當如中國的「薰」字，日本人沒有這個音，他們所發出的聲音都像中國的「香」字。

杭州在一下過雨之後，街上的道路就和黃海一樣。兩位初到西湖的外國回來的學生，在西湖裏費了兩天工夫，到第四天上來便遇着那黃海樣的杭州，把所有的迷戀都打斷了，便怱怱忙忙地又折回上海去。就那樣我們也說是去遊過西湖的人，也做了些遊西湖的詩，西湖的好處連邊際都沒有摸到。

六

仿吾在東京接到的信上是說聘請他當文學主任，月薪一百元。但他到了編輯所已經半個月，沒有給他聘書，也沒有說上月薪的話。那書店的老板趙南公——其實趙南公並不是泰東書局的老板，那書局是政學系的人辦的，趙南公只是經理，後來政學系的幾個分子成了『大人物』，沒有再管書局的事，那書局於是乎便成爲了宋朝的江山——看見了我的商品價值還不壞，他便把我一同留下，但我也始終沒有接過他的聘書，始終沒有正式地受過他的薪水。仿吾在上海住了兩三個禮拜，看見那書局情形沒有容納下我們兩人的地位，他便決心回長沙，把上海的事情留給我辦。仿吾說，長沙有一座兵工廠，廠長是東大的同學，他到那兒是有事可做的。

在仿吾去後的我，住在德福里中，更好像飄流到孤島上的魯濱孫一樣了。那位姓王的大編輯聽說是天津的什麼學堂的出身，身上穿的是西裝，手中拿的是一根打狗棍，腳上穿的是一雙響鞋。他的脚步好像羚羊一樣，走得很快，與其說走寧可說是在跳的那樣程度。他每天起床得很遲，一起床便在樓上高叫茶房打水。吃飯，差不多沒有一次不聽他吵菜不好的。每天上半天要到某女塾去教英文，去上課時總愛塗一臉

的雪花膏，打一身的香水。他那一雙響鞋由樓上響出大門，出了大門還可以聽見好一段的聲音。當他回來的時候也是一樣，在大門外好遠便聽見他的響鞋聲，大門如是關着的時候，總要用他的打狗棍來在門環上打得滿響。一進門之後又是『茶房啊，水呀！』的叫起來了。他那枝打狗棍，和樓梯的欄杆是很有仇恨的，無論他是上樓或下樓，那棍子總要在欄杆頭上出氣。先生的專長是英文，一部歸化了日本的一位外國人原名爲 Laficadio Iearn，日本名爲小泉八雲 (Koizumi Yakumo) 的文學概論，便是他的寶典。他——高興時，便捧着朗誦。誦讀倦了又進房間去按按一架 Baby-organ (囡囡風琴) 再不然便拉長腳在床上宰子起來。編輯所裏的人對於這位先生都有點不高興，特別是那位每天要被他叫打好幾次水的以廚房而兼茶房的司務尤其恨他，當面叫他是王先生，背面便叫他是『亡八蛋』爲要更具體地表現他的憤恨時，他愛把右拳來加在左膊上歪着嘴做出一種哭聲。據說那王先生初來上海時便中了梅毒，被一位不高明的醫生打六零六號把手膊打腫了，睡了一個禮拜。

我是和八蛋先生同住在一間房子裏的，因此我也很感覺着不便。我們在日本讀過書的人，有一種不好的習慣，便是在嘈雜的地方不能用功，那八蛋先生的英文朗誦和囡囡風琴的獨奏，尤其是使我痛頭的資料。但因爲他是主任，我是食客，我也不好干犯他的自由，每當他在編輯所裏的時候，我使用毛巾把頭包着，把兩隻耳朵遮蓋起來，別人問我是否頭痛，我也就答應是頭痛。

在編輯所裏面有一位四川人鄧均吾，這要算是我在馬霍路遇着的一粒砂金。他很年青，在當時怕只有二十三四歲光景，但他的態度極其冷靜，就像是一個冷靜的結晶體一樣。他沒有喜怒哀樂表現出來，但一眼看來便可知他不是呆子，也決不是胸有成府的人。他本是由吳芳吉的推薦，出來任上海某女學的英文教員的，在他未到上海之前暫時由八蛋先生替他代理着。但等他到了上海，那代庖的先生才霸佔了別人的位置不肯退還，他樂得也就像我一樣，呆在編輯所裏當了幾個月的食客了。這件事情也是使我憎恨八蛋先生的重要原因。

八蛋先生當時在編輯着一種雜誌叫着新的小說，是白話文流行時的一種應時的刊物。在初似乎也還銷了一些，但到後來西洋鏡折穿了，已經遭了一般讀者的唾棄。書局方面聽說我們要出純文藝的刊物，便有意思要我主編，我已經替它改了一個名字叫着新曉。但那八蛋先生卻仍然把持着不肯放手，我也就讓他去主持，我自己做起我自己的事情來了。

我開始是編纂了我的詩集女神，其次是改譯了那本茵夢湖。茵夢湖的共譯者是我的同學，那小說的初稿是他譯成的。他對於五四以後的中國的新體文沒有經驗，他的初譯是採用舊時的平話小說體的筆調，譯成了一種解說的體裁，失掉了原作的風格。因此我便全盤給他改譯了，我用的是直譯體，有些地方因為牽就初譯的原故，有時也流為意譯，但那全書的格調我覺得是沒有損壞的。我能够把那篇小說改譯出

來，要多謝我遊過西湖的那番經驗，我是靠着我自己在西湖所感受的情趣，把那茵夢湖的情趣再現了出來的。

那時候上海灘上正是舊書新式標點流行着的時候，亞東標點了紅樓夢、水滸等書很風行一時，泰東看了眼紅也想照辦，我便勸他們標點元曲。這個提議立地也就見諸實行起來，但把那位八蛋先生卻苦着了，他把那詞曲中的文句標點不斷。我自己爲填塞提議的責任起見，照着西洋歌劇的形式改竄了一部西廂。這項工作在當時已經很不滿意，現在想起來尤其無聊，並且可惜了那部缺了一冊的明刊本，那和金聖嘆批本的內容大有不同，卻被我把它塗毀了。

*

*

*

在這兒我應該追遡到我們和文學研究會發生糾葛的起源。

就在我同仿吾回上海的時候，文學研究會的鄭振鐸也由北京到了上海。那時也就是文學研究會由醞釀期向實行期突進的時候。

我的西湖紀遊的那幾首詩，是在學燈上發表過的。因此便有好些已知未知的朋友知道我回了國，振鐸也就是其中的一人了。振鐸的名字我是在時事新報上時時見到的，共學社的出版預告裏面有他的名字，學燈裏也常見他的名字。我記得一九二〇年的學燈的雙十節增刊中，文藝欄的四個人是周作人、魯迅、

郭沫若、鄭振鐸的順序。魯迅的是髮的故事，我的是棠棣之花，周鄭二位的是翻譯，內容我不記得了。在我們由西湖回滬之後的不幾天，接着振鐸寫來的一封信，約我在一天禮拜日在半淞園會面。

仿吾在這時候才告訴了我一件事情。

原來振鐸他們在要發起文學研究會的時候，有一封信寄到東京田壽昌處，約他和我加入。這封信壽昌沒有轉寄給我，同時也沒有答覆，就在這兒種下了一個與文學研究會未曾合作的因子。那封信仿吾是在壽昌處看見的，他那時說過壽昌很多不是，那樣的消息都沒通知我一聲。

半淞園的方向，在我初到上海的人，自然還不知道，是趙南公的兒子送我到西門，由西門改換中國電車坐到了那兒的園門口。在那兒遇着了振鐸，沈雁冰，和編輯着時事新報的青光欄的柯一岑。一岑和李石岑到馬霍路來看過我，他是認得我的，我和振鐸雁冰算是初次見面了。

見了面彼此都很慇懃，特別是振鐸，他和我談話的機會最多。我記得他穿的是一件舊了的雞血紅的華絲葛的馬褂，下面是愛國布的長衫。他的面貌很有些希臘人的風味，但那時好像沒有洗臉的一樣，帶着一層暗暮的色彩。他伸出來和我握手的手指，就和小學生的手一樣，有很多的墨跡。那時候我覺得他很真率，當得德國人說的 *unschuldig*，日本人說的『無邪氣』。

雁冰所給我的第一印象卻不很好，他穿的是青布馬褂，竺布長衫，那時似乎在守制的光景。他的人矮

小，面孔也纖細而蒼白，帶着一副很深的近視眼鏡，背是微微弓着的，頭是微微埋着的。和人談話的時候，總愛把眼睛白泛起來，把視線越過眼鏡框的上緣來看你。聲音也帶着些尖銳的調子。因此我總覺得他好像一隻耗子——我在這兒要特別加上一番注腳，我這只是寫的實感，並沒有包含罵人的意思在裏面。

柯一岑的印象沒有甚麼特別可說的，我只記得他的面孔平板，嘴唇微微往上翹，有點朝鮮人的風味，只是沒有朝鮮人所共有的那種可憐的茫沒情況。他穿的是青哩嘰的學生裝，我聽雁冰稱之爲「勞動服」。三個人將近玩了一天，中飯是在園子裏面用的，是振鐸付的錢。吃飯的地方是在一個臨池的亭子上，因爲是禮拜，在園子裏還有些人在用中餐。飯後我同振鐸坐在那臨池的欄杆上，望着池裏的敗荷梗。

——「我們不久要在時事新報上出一種文學週刊，」振鐸對我說，「希望你能够合作。」

——「我已經看見過你們登出廣告，」我回答他，「我自然是要盡力的幫助。」

——「你率性加入我們的組織不好嗎？」

——「沒有甚麼不好的，只是我聽說你們最初發起文學研究會的時候，寫過信給田壽昌，並邀我同加入發起人之列……」

——「是的，有那麼一封信，那時沒有得到你們的回信。」

——「那信我並沒有看見，壽昌沒有把信給我看。他沒有答覆你們，想來他怕是沒有合作的意思。現

在我又來加入，覺得對不住朋友，好像賣了壽昌的一樣。所以我看最好是在會外來幫助你們了。」

——「好的，總之請你幫忙好了。」

當天談的話自然很多，在園子裏遊玩了好些辰光，還在園外的田野中逍遙過好一會，一面走着，一面暢談，但那臨欄的一節話要算是那天的談話的核心，那一節話我也記得最爲明晰。在田野裏盤遊到了天色行將就暮的時候，一岑要到報館裏去，雁冰也好像有別的事情，我們便同坐電車到西門，在那兒握手告別。一岑在臨走的時候說過這一句話，「你今天會很有一些詩產生出來啦，」但不幸那天的遊興我卻沒有紀在詩裏。

振鐸看我不熟悉上海的路徑，怕我走錯路，他從西門還陪我坐了好一節的電車，坐到一處很繁華的十字街口，他陪我下了車，指示着和乘來的電車道成正交的路線對我說，「你乘那一路的電車往西首走，走不好遠便是新世界，新世界前面左手邊上有一個大跑馬場，在那跑馬場門口的電車站上下車，便是馬霍路口了。」

他送我下車的地方是先施公司前面，浙江路和大馬路成正交的那個十字路口，這自然是後來才知道的。那時我很感謝他的慇懃，但我不知道他那時是不是已經住在閘北，如是已經住在閘北，那他乘浙江路的電車也正是必由之路，他和我同了一節路也不必就是專於爲我了。不過他的確是陪我下過車，他那時

候的厚情，我始終是懷着謝意的。

嗣後振鐸也還到馬霍路來過幾次。有一次是同着葉聖陶來的，是在晚上。振鐸把聖陶介紹了，聖陶握着我的手，十分懇切地說了好些話，但可惜振鐸向我介紹時，我沒有聽清楚，聖陶的蘇州腔，我連百分之十也沒有聽懂。我待他們走了之後，才問編輯所裏的人，那位王主任吃驚不小地向我說：

「那便是鼎鼎大名的葉聖陶，你不認識嗎？」

我聽見是聖陶，也很後悔，覺得自己太木訥，沒有盡量地多多談些傾心的話。聖陶的小說，我最初是在青光欄內讀過他的，他與她，覺得他的筆致是很清新的，雖然並不深刻。

我自從那次以後便沒有和聖陶見過面，他留在我腦裏的第一印象，是矮小而樸實的和藹可親的一位青年。

又有一次，振鐸是同着朱謙之來的，那時似乎還有李石岑同路，是到編輯所來商量謙之的革命哲學的出版。那時我同趙南公正坐在天井裏面喝茶。他們來了，起初是只和趙南公談話，我沉默着坐在一邊，謙之也是沉默着。我看他怕只有二十歲的光景，穿一件毛藍布大衫，一雙圓頭的布鞋，頭髮最異樣，那周圍的

毛邊是剃光了的，就像在頭上頂着一頂圓形的氈帽。振鐸代他說，他的革命哲學在商務不好出版，問過別家書店，也都不敢承印，要望泰東替他印行。

南公沒說二句話便答應了下來，回過頭請他們和我商議。到這時候，謙之才知道我是郭沫若，他從椅子上一跳而起，跳到我的面前，一雙手把我的手抓着。

『沫若，啊，你是沫若！』

他那一雙有些可怕的眼睛就像要迸出火來的一樣。

在五四以後，凡是從事於新文化的人，便都是自己陣營裏的人，都是同胞骨肉一樣，這樣相親愛相敬慕的程度，不是個中人是絕難想像得到的。

謙之聽說我是住在泰東，他也就決定把行李搬來同住，等到他的革命哲學的出版。

就在謙之住在泰東的時候（是七八月之交），振鐸也到馬霍路來過好幾次。他那時在編輯學燈，在女神出版時，那首序詩他曾替我發表過，同時也發表過那集子中所未曾發表的一兩首。我有一次還做過一首兒歌，也蒙他拿去發表過的。（這首詩我沒有保存下來，意思是孩子要到海邊去，孩子的媽媽不讓他去，孩子望他海外的爹爹趕快回來，帶他到海上去玩耍。不消說是我思念自己的兒子，託爲兒童的情緒所做出來的。）又有一次，我把王維的竹裏館那首絕詩寫在紙上：

「獨坐幽篁裏，彈琴復長嘯。」

深林人不知，明月來相照。」

這是我從前最喜歡的一首詩，喜歡它全不矜持，全不費力地寫出了一種極幽邃的世界，我從前很喜歡把這首詩來暗誦。振鐸看見了這首詩，他以為是我做的，他這樣地問過我：

——「你還在做舊詩嗎？」

*

*

*

在初回上海的時候，少年中國學會的左舜生也到馬霍路來過。那時少年中國學會另外出了一種雜誌，叫着少年世界，要出一期日本研究號，向我徵文，我早做了一篇日本之煤鐵問題寄去。因為那篇文章不是很滿意，我便寫了一封信去，請把原稿退還。左舜生便親自到了馬霍路來。來時是在晚上，他告訴我少年世界雜誌已經印好了，不日便可出版，那篇文章不好再抽了。

同時又談到了些別的事情。

——「聽說你們要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啦？」他這樣問，使我很感驚異，因為這個我們還不會對國內的人說過的消息，怎麼他會知道了。他又說，「壽昌在二月間有信來，託我找出版處，我也奔走了幾家，中華書局不肯印，亞東也不肯印；大約商務也怕是不肯印的。」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仿吾們在東京開第三次會議時，爲甚麼壽昌沒有出席，以及找出版處的事件之所以沒有下文的原故。

* * *

自己留在上海的使命是要出一種純文藝的雜誌，這是始終在腦子裏盤旋着的一件事情。新曉既由那位主任先生把持着了，我的意思便是在新曉之外另出一種刊物，這層是得到了趙南公的同意的。當時我也暗暗地感謝趙南公，因爲我聽了左舜生的那一番話，像那時還未成形的創造社，要想出雜誌，在上海上是不可能的。在不可能之中有泰東來承印，這當然是可以感謝的事情。但我一個人留在上海，周圍同住的沒有一個可以幫助我的人，雖有一位鄧均吾，但他的能力也是很薄弱的。仿吾回長沙後連信都少有寄來，在日本東西二京的一些朋友，通一次信來回至少要兩個禮拜。起初要主編新曉，寫信給各地的朋友，得到同意時，局面又已經變了。就這樣我呆在上海由四月初間達到六月中旬，雜誌的事情沒有弄出一個眉目。我便想到無論如何有再往日本一次的必要，須得去巡訪各地的朋友們，定出一些具體的辦法，雜誌用甚麼名字，是定期還是不定期，定期時期限的長短，每人可擔負的稿件的分量，這些都是應該商量的問題。於是我在七月初旬便決定再往日本。

這次我往日本的來往路費，是趙南公送我的，他送了我一百塊錢，還送了我的老婆一隻金鐲，是買成

四十三塊袁頭。這一百四十三塊錢就算是我在編輯所裏住了三個月，編譯了三四本書的報酬了。但當時的『流氓痞棍』性似乎還不足，領了那點錢我覺得似乎還多領了的一樣。

七

離別了三個月，首先是回到福岡。我留在福岡的妻兒是被家主驅逐出了從前的舊居的，新遷的地方離舊居不遠，但我是不知道那個所在的。我走到舊居近處問以前相識的鄰里，問明了地址，又才按照着去探尋。原來新遷的住居是在箱崎町的街道上，背着海岸，和海岸相隔還有兩三家漁家。後面有一方空地，有新的木板牆圍着。我先隔着那木板牆看見大的一個兒子和夫，一個人孤另另地坐在那空地當中掘土。頭上的頭髮很長，好像是自從我走後不曾剪過髮的光景。就單只這樣的一個情景已經就使我的眼淚流了出來。我又轉到街頭的前門去，前門才是鎖着的。我也並沒有甚麼驚異：因為我想到安那一定是背着第二個兒子出外去買東西去了。我在門口佇立着不一忽，安那果然背着孩子買了些小菜回來。她看見了我，自然是喜出望外，因為我走得很倉卒，臨行時我是沒有通知她的。

新居是平屋，結構和舊居的樓下相同，可說就是舊居削去了樓層的一樣。我們本來是沒有什麼家具的，我的一些書籍又已經運回了上海，看起來真真是家徒四壁，這些不消說又是催人眼淚的資料了。

我那淚浪的一首詩，被已故的『詩哲』罵我是『假人』，罵我的眼淚『就和女人的眼淚一樣不值

錢」的那首詩，便是在這一天領着大的一個兒子出去理髮時做的。我們繞道在以前的舊居處纏綿了一會。那裏還沒人住，僅僅有兩三個木匠司務在那兒修繕。我也就走進去，在那樓上眺望了一回，那時候的眼淚真是賤，種種的往事一齊襲來，便又逼得『淚浪滔滔』了。

我回福岡僅僅住了一天，第二天便動身往京都。在車上過了一夜，到京都時已經是第三天的上午了。我先到三高去訪問伯奇。他那時正在考試，我在會客室裏坐了好一會才等到他出來。他和我雖通過很久的信，但是初次見面，他信上寫的字跡異常纖細，就像姑娘們的筆跡一樣，那知一看見他才是一個矩形的面孔，身裁比我還高，我覺得他可以稱爲東方的興登堡。伯奇對我也一樣地感覺着一種意外，他領着我去找一位舊同學李閃亭時，他這樣對我說：『從信上得來的想像和實際的印象又不同，文學的要素是不免有誇張的啦。』因爲我做過死的誘惑那一類的詩，我寫給他的信上也每多悲哀的話頭，因此在他的想像中以爲我一定是一位病弱的人，肺結核沒到三期，怕至少是到了二期的。

伯奇在考試。我便不好攪擾他，便在李閃亭的寓裏住下。這李閃亭是岡山六高的舊同學，進的是京大的經濟科，要算是河上肇的弟子。在岡山時我們同住過兩年。因爲他是第一部，我們常常叫他是『曼大林』（Mandarin 中國官僚）他很不高興。進了京大，京都的同學們又稱他爲『中國馬克思』了。但這位『中國馬克思』到底還是成了『曼大林』。他後來是孤軍派的中國青年黨的一員健將，做過長沙法政學校

的校長，一九二七年客死在上海的。

我暫時寄寓在『中馬國克思』的寓裏，不幸我得了急性腸加達兒，那天整個的下午不能行動。那時我對於馬克思學說還是門外漢，夜間我同『中國馬克思』並枕睡着的時候，我扣問過他，馬克思學說的精髓究竟是怎樣？他對我說了些『唯物史觀的公式』說了些『資本主義的必然的崩潰』又說了些『無產階級專政』他說得似乎並不怎樣地把握着精髓，我聽得也就千萬萬確地沒有摸捉着頭腦。他勸我讀河上肇的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我在當時並沒有感覺着怎樣的必要，他這個勸誘，我也沒有立地接受。

第二天病算好了一些，我應着張鳳舉的邀約，到他寓所裏去茶話。我同閃亭去時，鳳舉又到近處去把當時在京大研究着的沈尹默先生請了來。沈先生那時恐怕將近五十歲了，他帶着一付藥片眼鏡，眼睛好像很不好。臉色很蒼白。那蒼白的臉色配着藥片的眼鏡，怎麼也好像是日本的一位按摩。

鳳舉替我介紹了，說起我們要在上海辦一種純文藝雜誌的意思。

沈先生的第一聲是『上海灘上是談不上甚麼文藝的。』

我聽見了這一聲，微微地感覺着一種驚異，我不知道爲甚麼在上海灘上便不可以談文藝。文藝究竟是該在甚麼地方談？揣想沈先生的意思自然是舍北京而外沒有甚麼地方說得上的，這一層也就引起了

我的一種反抗心。北京我從前也是到過的，我覺得像那樣暮氣沉沉的地方倒未見得配談文藝。我這些話自然沒有說出口來，我覺得說是多事——其實照現在看來，就是那樣的作想也已經是多事了。沈先生所說的文藝是大學教授的文藝，講研究要唐鈔宋刻，講做作要古月荒城，這自然是以北京為宜，上海灘上是說不上的。這兒有一個階段不同的階級意識，就如貴族們之鄙視資產家一樣，北京城的文士每鄙視『上海灘上的詩人』。這種思想，明白地說，就是封建思想。北京城是中國的封建社會的結穴，蟠居在這座古城裏的大人君子或準大人君子，要想超克這種思想是很不容易的。

話一不投機，結果是把雜誌的說話丟在一邊去了。談了些京大所藏的中國古書，談上了元曲。我發表了我的中國劇曲在文學構成上優於西洋歌劇的意見，鳳舉說他沒有研究，沒有加以贊否。沈先生也是沉默着的。鳳舉又說到廚川白村（京大的文學教授）稱讚過我那首死的誘惑——因為大阪的一家日報翻譯過——說是中國的詩已經表現出了那種近代的情調，很是難得。我聽了這話，其實並不知道他是在稱讚，還是在蔑視。

談不好一會，便同閃亭從鳳舉那兒退出。那時京大附近的飯堂很多，都是以學生為對象的。用中飯時，在飯堂裏遇着了伯奇，那天的下半年伯奇陪着我，去訪問過一次穆木天。木天那時是三高的二年生，他是在專門研究童話的，一屋子裏都堆的是童話的書。我覺得他自己就好像是童話中的人物。他人矮，而微微

有點胖，圓都都的一個臉有點像黃色的番茄 (tomato)。他見人便是笑謎謎的，把眼睛眯成一線，因此把他那豐滿的前額和突出的兩個臉墩便畫成了兩部分，他特別像番茄的地方也就在那兒。他是吉林人，愛用捲舌音的他的北方話的聲音也特別是幫助了他的天真爛漫。我覺得他的姓穆而名叫木天，真是名也名得好，姓也姓得好。那時聽說他是參加了周作人先生的「新村」的，我也覺得像他這樣童話式的人也恰好和「新村」相配的一樣。

伯奇那天很有意思把我引去訪問廚川白村，我卻是謝絕了。我這人，用我們四川話來說，怎麼也是有點「不帶貴」。不知怎的，我總有點怕見上人。凡是所謂大人名士，我總是有點怕。外國的大人名士不用說，就連吾們貴國的我也是只好退避三舍的。在這些地方或者也就是不能受人抬舉，十年如一日地只當着「流氓痞棍」的原因的罷。

到了第三天，我覺得在京都想會面的人，都已會了面，雖然所想討論的事情並沒有說上，但已覺得無可再逗留的一樣。我便決意再往東京。閃亭已故的「中國馬克思」勸我到晚上乘夜車去，他說那樣要方便一些，到東京時是清早，省得許多麻煩。我聽從了他的話，他便陪我去遊過一天琵琶湖，京都近旁的一個大湖。那湖的規模比西湖大，水也比西湖深，有小的蒸汽船在裏面通行。湖畔也有好些古剎。有所謂「近江八景」是仿照着「西湖八景」所擬定的，到過西湖的日本人有的說是比西湖還好，但這個比喻似乎有

點不偷。因為西湖的好處是在它的小巧玲瓏，就像規模放大的庭園；琵琶湖那樣宏闊的大湖，是沒有這種風味的。

在琵琶湖遊了一天，晚間在大津市乘車東上。坐在夜車裏，自己不免又把雜誌上的事情來縈想着。怕是只有出季刊的可能的，能够寄稿的人至多不上十人，又多是有學校纏着，而且散處在四方。一年要出四期，怕已經很費事的。季刊用甚麼名目呢？誇張一點的便是創造，謙遜一點的可以命名爲辛夷，名目太誇大了，要求實質相副，是很費力的。書局方面拿不出稿費來，這是一件很大的困難……這些都是在縈想中的問題，但想來想去總沒有着落，最大的希望是到東京後，要靠幾位有力的友人來決定。

到了東京，先走到達夫的下宿處去看時，他得了病，進病院去了。我又跑到病院裏去看他，是駿河台的杏雲病院。

我和達夫已經五年不見了，在未見面之前只疑他的病很沉重，我在想像中描畫着我那位本來是很瘦削的友人怕已經是骨瘦如柴的了；他那蒼白而又帶着一層暗灰色的面孔，怕已經是面如土色的了。但一進病室時，他是坐在病床上的，帶着紅紅的臉色。

他見了我，想立起身來和我握手，我急忙勸他安靜着沒動。我問他是甚麼病，他說是胃病，但我同時懷疑起來，爲甚麼得了胃病就要進病院呢？我疑心他是肺病，他不肯說出實話。

我那天談了一天，並陪他去登臨過一次在病院附近的舊俄羅斯教會的尼哥拉斯圓堂——這是東京的名勝，在大地震時已經毀滅了。他住的病室似乎是頭等，在一間前室中擺着一尊鋼絲床，一隻角上有洗面池等的設備。隣接着的後室是三鋪席面的日本式的小房間，是看護婦或患者家族們的寢處。我那晚便是在那兒的草席上睡的，同時還有兩個看護婦睡在我的左右兩邊——這樣一寫出來，好像是很風流的一種境遇，達夫在第二天清早也說過些風流的話頭，但其實我就和睡在豬圈裏的一樣。那兩位看護婦，有一位可真像是一條白肥豬，她那一雙肥白的手各個手指節都呈着眼窠；又有一位好像是腎臟有甚麼病患的光景，面孔上帶着倥偬的暗灰色，並且有點浮腫。達夫有一篇小說叫友情和胃病的，便是寫的那時的事情，那位密斯（？）白肥豬被我們達夫先生是描寫成了楊貴妃一樣。

達夫很熱心，他所講的主要的話，是他明天或後天便要退院，退院之後他便要創作了。他已經做成了三篇東西，便是沉淪、南遷、銀灰色的死，他打算要拿來出一個集子，退院之後便要寄給我。並說他的銀灰色的死寄往學燈已經四五個月還沒發表出來，叫我回上海之後給他要回雜誌的名目他贊成用創造，月刊季刊都不論，每次他可以擔任一兩萬字的文章。

我看見他這種熱情，覺得到東京的目的是已經達到了一樣。他能否在一兩天之內退院還是未知數，資平他們都還有考試，不好多費他們的辰光，在東京方面的事情我便要他做個中心，退院之後把大家

召集起來商議一下；最好督促着大家在暑假之內努力做些文章，好使雜誌在年內或來年的正月出版。他和田壽昌那時還不十分熟習，我在東京該做的事情便只有去訪問壽昌了。

第二天適逢禮拜，清早在病院中和達夫離別了，便往東京郊外去訪問壽昌。壽昌住的地方，就是仿吾從前住過的月印精舍。那個地方，我起初以為是僧寮或者道院，原來只是幾個留學生共同組織的「貸家」。壽昌和他的漱瑜是特別住在一間小房間裏的。他們那時的戀愛已經是在所謂「純潔的」以上了。他們同住的人在精舍裏面養了一些鷄，我到了，在吃中飯時便蒙他們殺了一隻鷄來款待我。午後壽昌約我去會佐藤春夫，我謝絕了。又約我去會秋田雨雀，我也謝絕了。不拜訪名人的我的「不帶貴」的脾氣在壽昌面前又來發揮了一下，其實我所拜訪的壽昌，在那時候已經是名人了的。他那時雖然還是高等師範的學生，但那兒的學課他已經老早沒有去上了。只是他說晚間要引我到銀座去領略些咖啡店情調，這倒是對於我的一個很大的誘惑。

我在一九一四年初到東京去的時候，預備入學試驗的最初半年住在小石川的偏僻地方，我不會到過銀座一次。在一高預科的一年是青年矜持期的絕頂，不說銀座的咖啡店，便連淺草的電影館都沒去過。以後便分派到鄉下去了，在暑假期中雖然偶爾有到東京的時候，但像那銀座的咖啡店，實在是受了禁制的樂園。「咖啡店情調」這是多麼誘惑人的一個名詞喲！我聽說那兒有交響曲般的混成酒，有混成酒般

的交響曲，有年青侍女的紅脣，那紅脣上有眼不可見的吸盤在等待着你的交吻，在等待着用另一種醇酒來使你陶醉，那兒是色香聲聞味觸的混成世界，在那兒能够使你的耳視目聽，使你的脣舌掛在眉尖，使你的五蘊皆充，也使你的五蘊皆空。這樣的一種仙境能得深有研究的壽昌來嚮導，這真是我到東京的一種意外的收穫了。

咖啡店情調要到晚間才能領略，午後壽昌引着我在代代木松林盤桓，追憶到了一年以前的千里松原內的散步和大宰府的遨遊。他談到了漱瑜最近和他鬧過一次閒氣。他說他和「康月昭姐」——這位女士據說是廣東人，壽昌是這樣稱呼她的——太親密了，漱瑜有一次便對他說要和他分離，免得成爲了他和月昭姐兩人的交誼之障礙。他說漱瑜是在摹倣歐洲某一位作家的戲劇裏面的女主人公，可惜這位某作家的名字忘記了，我的貧弱的外國文學的智識，也沒有這個典故的儲藏。

好容易到了晚上，吃了晚飯後，漱瑜說要到某姐處，叫我們等她回來之後再往銀座。這個禮節自然是應該遵守的。不一會漱瑜回來了，壽昌先走去迎接她，他們好一會都沒有進來，我也走去看時，看見漱瑜坐在門道上帶着一個很不愉快的臉色。

——「怎的生了病嗎？」我問她。

——「是的，我肚痛。」

「最好是趕快休息的好了。」

這樣一來所謂咖啡店情調已經飛到別一個太陽系統裏去了。

第二天漱瑜的病算好了，她和其它同住的人都去上課去了之後，那時候有一種表現派的電影叫格里博士，在神田某戲館開演，是不可不看的，壽昌留着我定要把這場影戲看了再回福岡。他和我兩人便坐上電車進東京市去。起初是陪着他到上野，因為他要去會一位美術學校的朋友。那朋友是住在一家臨着背街的樓房上的，下面好像是汽車行，走到了那兒時，壽昌在樓下叫了一聲：

——「老王，在家嗎？」

——「是老田嗎？你上來。」從那樓上有湖南人的聲音回答出。

壽昌叫我在下面等着，他跑上樓去了。剛好上去又跑了下來，又叫我走。我們在上野公園裏逛了一下，快到吃中飯時候，他又拉我到本鄉去會他的一位「劇友。」

原來那位「劇友」就是屠模，本是我在岡山的同學，但不幸我們在岡山時，爲了一些小事是有點不和睦的。他是武進的人，有演劇的天才，壽昌和他的交際便是由演劇而來。他在帝大學植物學，但他那時正在熱心製造香水，進了他的房間，一房都是香氣，隨處都是香水瓶。中飯是在他那裏用的。用了中飯之後他要去上課，我們又才分了手。

壽昌又拉着我走，在大學前面的街道上，就像兩個夢遊患者一樣走來走去，進過好幾家舊書店，在幾家書店店頭也立讀過一些雜誌，不知幾時已經走到了萬世橋。是電影快開演的時候了，我主張坐電車去。兩人上了電車，我拿出一張五圓的老頭票來買電車票，車長找不起。我的零錢，卻又不够，坐了一站路，車長又把我們放下車來，意思是讓我們把錢換了再坐電車。我到這時候才知道我們的壽昌是囊空如洗，他是連坐電車的零錢都沒有的。我這個太不聰明的腦筋，也才悟到了在早上他爲甚麼要到上野去會那位「老王」，爲甚麼到中飯時又去找屠模，爲甚麼幾次不坐電車。說不定昨天晚上漱瑜說是去會某姐，也怕去借錢，因爲錢沒借到，所以才肚痛了起來，讓我們的咖啡店情調也就成爲了畫餅。腦筋太遲鈍的人，就是在享樂上都是沒有資格的，我假如早悟到了他們是沒錢，我自己雖然也窮，但還有從書店老板那兒領來的路費，一小時的咖啡店情調或者可以領略的，可惜我就在那一次把機會失掉了，自有生以來一直到現在終還不曾把我們的『咖啡店情調』領略過一次。——我這樣寫來倒不是要誇示我是一位道學先生，也並不是想否認我之爲『流氓痞棍』，不過我這個『流氓痞棍』委實是一位膽小的傢伙，凡是沒有經驗的地方，我是沒有膽量一個人去走的。自然在這兒也有一種東西在說話，那種東西多的便是膽量十足的人，那種東西一缺乏不怕就是想要以『咖啡店情調』來款待我的壽昌，反因我而得到一番夢遊患者的經驗。

那場格里格里博士的影戲，所描寫的是一種狂人的心理。開首是瘋人病院的場面，是現實的情景。接着是那院裏的兩個患者在談話的光景，以下便是夢幻境了。

德國的某一個都市有一對青年同愛着一位姑娘，有一次節日，他們三人同往市中觀看種種的遊樂。有一位格里格里博士利用着一位夢遊患者在市上營利，說是能夠判斷人的吉凶禍福。那兩位男子和他們的共同的愛人也就進了那位博士的齋館。館裏是一座小小的戲場佈置，正面一段高壇上立着一個細長的木匣。壇下圍着座席，觀光的人已經坐滿了。停不一會那格里格里博士走了出來，字幕上表現出了他的說話，就是說他要向着看官們開示他的能知人吉凶禍福的夢遊患者。他把木匣揭開，裏面立着一個人，就和乾稿了的屍首一樣，眼睛閉着的。博士向看官們發問，有沒有人要扣問自己的吉凶。那對男子中的一個便要立起身來，幾次都被他的友人和愛人拉着了，但他終於是立起了身來。他問的是知不知他幾時會死。在這時候那博士讓那夢遊患者把眼睛睜開來，那眼睛徐徐地睜開，睜得璧圓，放出一種可怕的兇光，直射着那問者的面孔。患者的口奇怪地動了幾下，字幕上表現的是：『你呀，你今晚就要死！』說了又把眼睛閉了。

三位愛人大笑了起來，便各自退了席。那料得那質問者的一位，在那天晚上就了寢之後，就由那格里博士的夢遊患者潛去暗殺了。另一個男子揣想到是那位遊方博士作怪，便要替他報仇。經了幾多轉

折，得到了一些實證，便率領着人去逮捕博士和夢遊患者。兩人逃跑了起來，人們緊緊地追趕着，一直追進了最先現出來的那座瘋人病院裏。銀幕上又是現實的景象了。一些狂人仍在那病院的中庭遊散，有一個像死屍一樣的人閉着眼睛立在一邊，便是那位夢遊患者；又有一個女的患者像垂着眼簾的白蠟觀音一樣，是那兩位男子所共愛的一個愛人；格里格里博士是那兒的院長；不用說談出這番幻想出來的人也是患者中的一個。

走出影戲館時滿街都已經上着電燈了。壽昌問我再到咖啡店去不，我卻也早已經回到了現實界來，只是買了一些西洋點心，促着他趕快回去安慰他的漱瑜去了。

*

*

*

跑到東京，混混沌沌地便過了三天，到第四天清早又和壽昌告了別，我是決定轉回福岡去了。因為想買幾本書，便又打算跑到東大前面的書店裏去漁獵。坐在電車裏自己覺得真是無聊，跑到東京來了一趟，也就和在京都混了幾天的一樣，真是空洞。自己也會了一些朋友，但好像所當解決的問題，一個都沒有得到解決。朋友們自然大家都在答應要做文章，但那不是和幾個月以前還未回國時的情形一樣嗎？未知數依然還是未知數，X依然還是X，問題是沒有進展得一步的。想到達夫說要退院，覺得最可靠的還是只有他，他的寓所本就在東大附近，我便決心再往他那兒去探望一次。

他果然是在我會見了他之後的第三天退院的，我再在他的寓所見面時，他已經在做他的友情和胃病了。

這一次的重逢才會見了好些朋友。會見了資平和何畏，是別的東大同學們在學校裏把他們找了來的。無心之間也會見了徐祖正，他在我到京都的時候，已到了東京，那時好像是和達夫同住一個館子裏。就在那天下午，在達夫的房間裏聚談了一次，大家的意思也都贊成用創造的名目，暫出季刊，將來能力充足時再用別的形式，出版的時期愈早愈好，創刊號的材料，就在暑假期中準備起來。這個會議或者可以說是創造社的正式成立，時候是一九二一年七月初旬，日期是那一天我不記得了。

到日本去往返了一次，費了三個禮拜的光景，在七月中旬又跑回了上海。

回到上海之後很不愉快的是新曉的預告中登出了我的名字。那位主任先生乘着我不在的時候，把我鎖好了的書案的抽箱打開了來——因為他和我的書案是相同的形式，鑰匙也是相同，把我的兩篇舊稿取出了。一篇是我早已譯就的葛雷的墓畔哀吟，另一篇是名叫“Love Lane”的隨筆。Love Lane是靜安寺路上的一個小巷，離馬霍路不遠，華名用的是那幾個字，我不記得了。那個名字在那時候我覺得很有詩意，地方也很幽邃，直譯出來便是「情人弄」或「愛情弄」。我住在馬霍路時，在晚間每愛到那兒去散步；每次總要遇着好幾對逍遙着的西洋人的男女，大約都是些「情人」。我自己的「情人」呢？時常是我自己的影子。那篇隨筆便寫的那種情趣，那原稿後來是失掉了。

主任先生不得到我的許可，便任意開開我的抽箱，攫取我的文字，把我來做他所編的新曉的幌子，這是使我大不愉快的。編輯所裏的人都勸我登報聲明，於是在學燈的一角上，在我回滬的第二天便有我的啓事。啓事也並沒揭穿，只是說有人假借我的名義在外面招搖而已。這樣含糊的文字自然有爲它注釋的

活着的脚，上海雖大，大家也就曉得我爲的是那新曉的事情了。到這時候那太聰明了的書店老板才知道我和那主任先生是不能合作的。他見了啓事便跑到書店裏來，談了些和衷共濟的話。有人向他談到了私揭抽箱的一件事，他拿着也就沒有辦法了。新曉停辦的話似乎就是在這個時候說出來的，他說以後便不出新曉，專出創造。

從那時以後書店老板便把對於他的態度完全改變了。他遇着人便在罵他，罵他編纂了三個月連一本小雜誌都編纂不出；罵他太不負責任，做出了些對不住人的事情。這樣一來弄得那主任先生的響鞋，響得愈見焦燥，但是臉上的雪花膏卻少塗了，香水也少打了。有一天清早，他還睡在床上的時候，有一位娘姨跑到編輯所裏來叫醒了。

——『王先生，太太叫把這架風琴拿回去。』那個囡囡便被她抱下了樓，坐着黃包車走了。

原來那架風琴是P公館的東西。P是組織泰東書局的一個人，家眷住在上海。有一位成了人的女公子在學英文，編輯主任由書店老板的介紹在擔任着那兒的家庭教師。風琴是從那兒借來的。P家對待西賓似乎很有禮節，往常每有雞肉和清蒸鱸魚之類的食品送到編輯所裏來。大家都稱王先生爲未來的駙馬，王先生亦隱隱以此自命。囡囡風琴一被搬走之後，於是乎駙馬公的希望也就隨着朵奶嬭向空中消逝了。用所謂春秋的筆法來說，或許這一段姻緣是由我拆散了的，但是當年的那位密司P，假如看見了我

這篇文章，她就和我們的創造沒有被新曉污辱的一樣，我倒要請她感謝我的。

這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人又來提起過加入的事情。在七月中他們要在上海開一次大會，在開會之前的兩三天，李石岑寫了一封信給我，傳述振鐸他們的意思，要我加入文學研究會，並限我在一天之內答覆。（有人說過就像是哀的美頓書。）石岑那時已經進了商務編譯所，學燈是讓振鐸在編輯的，他不消說也是加入了研究會。但他的提議，我卻以同樣的理由拒絕了。

暑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和我同住編輯所裏。他蒐集來的資料是王獨清由法國寄來的一首長詩名叫支那，和一部新月集的翻譯。支那似乎是惠特曼派，但對不住我們的「情調詩人」，我在原稿中便替他毀棄了。新月卻替支那報仇，叫我流了好幾斗汗水。支那既不能採用，伯奇礙在他們的友誼上，始終要叫我賞玩新月；於是乎在那上海市上的100%以上的炎熱之下替他渲染起來。那部新月除掉一些單語單字外真可以說一鈎新月。

當年的上海市的確是炎熱得不堪，有時候熱到了一百度以上。坐在那馬霍路的樓上就使一事不做，也像麵包烤在洪爐裏，汗水不斷地迸出。但是在吃別人的飯自不能不努力地做點事情，倒是做着事情反可以把炎熱忘記。那時候我在開始翻譯少年維持之煩惱，伯奇在翻譯盧森堡之一夜。伯奇是從法文翻譯出的，那書在描寫性的一方面很有些露骨的地方，英譯本大概都替作者刪削了。伯奇爲此頗受礙難，我勸

他全譯，但顧慮着世評，或者也怕是顧慮着他們少年中國學會的同人的指摘，終於把原文刪節了好些。

號稱爲編輯所的地方，絲毫組織也是沒有的。本是一所二樓二底的弄堂房子，樓下做了堆棧，五六個人通雜住在樓上。做工、會客、睡覺，在那兒是三位一體。中國人的客，有事來商量的很少，無事來消遣的很多。客一來總是高談闊論，起碼總要坐上兩個鐘頭。編輯所裏有五六個人，平均每人一天作算有一個來客，你一天的工夫便要整個地替你費掉。在這種環境當中譯事是很不容易進行的，創作的機會更是沒有，本是有燥性狂的煩悶者在上海不免又煩悶起來了。因此我們便有拿着工作暫時到鄉下去做的計畫。就在七月的下旬，我們便到過一次鎮江。

我們先去遊了金山，登過那金山寺的塔。塔是木造的，塗着紅色。塔下的進門鎖着，要繳若干錢，和尚才來替你打開。登上塔去的眺望當然是一個壯觀，可惜我的記憶已經完全消逝了，我只記得塔壁上縱橫狼藉地有無數的題名，也有些西洋人的題名雜在裏面。

焦山是有定期的小蒸汽船往還的。坐船上了焦山，一山都是寺院，那些寺院的和尚就和四馬路上的野雞一樣，專門在做拉客的生意。我們是初到，自然是外行，在開始走進的一個寺院裏便投入了他的羅網。大和尚拿了些茶點來款待我們，又展示了那寺裏所藏的寺寶。他聽說我們是來避暑的，便愈見慇懃起來，我們要到山上去遊玩，他便遣了一個「小童」來跟着我們。他所稱的「小童」其實是和魯智深相差不

遠的巨漢，任隨我們走到那兒，那漢子都在我們後面跟隨着。各個寺院都是有所謂『寺寶』，看了便要你出錢。我們兩個寶貝看了的『寺寶』也很不少，但只有焦山寺的『無惠鼎』還留在我的記憶裏，連『瘞鶴銘』的所在我都是模糊影響了。

漢子又把我們引回了他的寺院，那兒已經替我們預備下了一桌很豐滿的素菜，和上海的素菜館子功德林的上等席面相差不遠。菜雖號素，用的通是葷名，而且還爲我們備下了一些『素酒』。我們見了，不是酒的事，只是愁的事了。我們不知道這一席的款待究竟是要我們付多少錢。我們一面用素餐充着飢腸，一面用日本話訴着愁腸，我很感覺着焦山這個名目到不媿是座焦山。把飯吃完了之後，結果是拿十塊硬洋來抵塞，故意用了硬洋的也是因爲十塊硬洋比一張十元鈔票來得更更有實感。但是那大和尚倒還客氣，他說我們施舍得太多了。這一句話真是天來的佛音，才把我們從焦愁解脫了。我就是到現在也還不知道，究竟那十塊錢是給得太多，還是給得太少。假使是少了，而能使那大和尚不說話的，怕或者是我們的日本話奏了功效，那禿頭大師怕一定把我們當成了帝國主義者了。

但是，十塊大洋！這在大和尚看來或者不會多，而在我窮小子卻不算少，我帶去想在鄉下住一個月的費用已經用了三分之一。焦山避暑，還是滾他媽到阿鼻地獄裏去罷！不用說我們就在那天也就退回了鎮江。

遊了一次焦山，花了十幾塊大洋，換來的是在這兒再寫幾行賣錢的文章。

焦山的北面，峙立在江岸上的是北固山，那山上有有名的甘露寺。我們遊了金焦二山之後北固山沒有再去了。但我想起了小時候讀過的一首唐詩，便是王灣的次北固山下。那開首兩句是：

『客路青山下，行舟綠水前。』

這青山綠水的幾個字隔了二十幾年才使我感受了驚異。我想在唐時的北固山上或許會有一些林木，而揚子江裏面的紅水斷不會是綠化了的。大約那位王灣先生也是一位大天才，大創作家，他在夜裏泊舟，並沒看見山，也沒看見水，只是按照着自己腦筋中的觀念做出了那篇傑作；不然他或者便是一位紅綠盲，不能辨別水色，也不能辨別山色，只沿用着通常的習慣語，言水必冠以綠，言山必冠以青。

由鎮江折轉到無錫。我們要到無錫去，是因爲住在那兒的朱謙之寫過一封信來，說那兒的惠泉山有希臘的風味，比西湖還好。我們聽了他的話便也到了那兒的惠泉山，那兒的確是有『希臘的風味』並且不是古典的希臘，而是現代的希臘。山是一座童山，山下叢集着一些頹廢的節孝祠，謙之和他的朋友們便是住在一座節孝祠裏面的，那兒倒還好，比西湖還好的好處，便是可以少花錢。我們到的時候，謙之已經到了南京，便由他的朋友們招待我們，我們也就在那家節孝祠的一間樓房裏住下了。

那間樓房擺設着有兩尊木板床和一張方桌，平常像是做泥人的匠人住的地方，隣接的空敞的樓房

裏沿着樓壁還陳列着好些未上彩色的泥人。匠人們是回去了的，爲甚回去了的原故，在當時我也聽人說出過一般理由，但我已經沒有記憶了。我想或者怕是各處的商場被西洋囹圄佔領了的原故。樓房頭上直接露着瓦頂，白天很是可以納暑，晚來蚊蟲的大軍逼着我們只好在帳子裏面過籠城生活。就這樣在那兒住了有一個禮拜的光景，工作絲毫也不能做，並連逼在近旁的太湖都不曾去過，又只好『桃之夭夭』了。

逃回上海之後，仍然還是住在馬霍路的樓上。但在我避暑去了的期間中，有一位尊客來訪問過我。那便是商務印書館的元老之一人高夢旦先生。夢旦先生來訪問我，這個異數的光降，就好像漢光武訪問嚴子陵，或者是像亞烈山得大王訪問皮匠，把編輯所裏的人都震驚了。特別受了驚惶的是書局的老板趙南公，在我回到編輯所時，南公老板來看我，他說夢旦一定是想找我進商務的編譯所的。他同時也向我提出了一個消息，是安慶法政學校的校長光明甫給他寫了一封信來，請他代聘一位英文教習，月薪是每月二百塊大洋。他的意思是要我去擔任，遙領着他的編輯。但我這個不識抬舉的天生成的『流氓痞棍』卻沒有膽量去拿那一筆大錢。我自己自然也是學過英文的人，但我的英文僅僅能夠看書，除掉參攷着日本文或者德文的譯本也勉強能夠翻譯翻譯之外，要講說幾句『不落肯的因革利徐』我連上海的茶房都還趕不上。錢自然又何嘗不想拿，但恐怕上了課堂立地便會被學生哄掉。我這位膽小的『痞棍』在那時候才推薦了達夫，因爲達夫的英文程度的確是比我高明，他那時還是東大的三年生，學的是法制經濟，學那

種功課的人平常是可以不必上課的，只要在試驗之前把別人抄的講義借來或買來——日本的苦學生多有抄講義來發賣的人——準備一下，試驗便可以無事的渡過去。達夫先生的頭腦很好，我相信他有這樣的本領，所以便推薦了他。我並且說，達夫來也可以遙領泰東的編輯所，比起我來是更要拿手的。

我在當時已經是在準備退路了。住在日本的時候，就像要發狂的一樣想跑回中國，就使有人聘去做中學校的國文教員也自誓可以心滿意足的我，跑回上海來前後住了三四個月，就好像猴子落在了沙漠裏的一樣，又在煩燥着想離開中國了。我深切地感覺着我自己沒有創作的天才，住在國內也不能創作——已經三四個月了，所謂純文藝的雜誌仍然沒有一點眉目弄出。像我這樣沒有本領的人，要想在上海靠着文筆吃飯養家似乎也太僭分了妄想。因此我又想到還是繼續我的學醫安全些，世間有很多不怕死的病人，吃飯想來大約是不會成爲問題的。

南公聽見我說達夫可以遙領編輯所的話，他很詫異。『怎麼樣？』他這樣問我，『你是打算進商務的嗎？』

——「笑話！你未免神經過敏！我是打算暑假過後折回日本的。」

——「爲甚麼呢？剛剛架好步勢，爲甚麼就走呢？」

——「不行，在上海不能創作。」

「到鄉下去怎樣呢？」

「鄉下也是一樣，這次跑到鎮江和無錫去，花掉了幾十塊錢，得到的便是這樣的一個教訓。」

「我在這樣想，想把編輯所移到西湖，讓你在西湖去做文章，跑印刷和管校對的人就留在上海。你看這個計畫怎麼樣？」

我在心裏笑了一下，趙南公在他的煙癮過足之後本來是很可以想些妙計的，但在我以為妙的，少看見過他實行，而他所實行着的我卻是很感不妙。我住在他的編輯所裏，差不多是在唱獨腳戲，跑印刷所，管校對，差不多都是我一個人在攪。「哼，他要把我移到西湖。」我在心裏這樣想着，但我對他說，「西湖還是一樣。西湖我同仿吾也去過一次，終竟是不能安定的。中國沒有可以使我們安定的地方，無論到甚麼地方都感覺着頹敗，感覺着壓迫。」

「怎麼樣呢？雜誌呢？」

「自然要辦，唯其要辦，所以我要折回日本。我在那兒多少還可以做些文章，同時有達夫先生回來兼顧，你是可以不必愁的。」

「把你的日本夫人和公子們接回來怎樣呢？」

周到的南公老板想到了這一層，他定然是以為我的性慾不能發洩，所以才想回日本去。用弗洛伊德

派的精神分析術講來，一切的煩燥都是由於性慾的不滿足，那我們的老板倒很可以算得是一位精神分析術的大家。但他卻沒有想到我一個大白吃着他的飯，好像是奴隸，又好像不是奴隸，已經是有點難耐了。

——「他們回來是愈見使我累贅的。總之，達夫很好，只要他肯回來，那便甚麼都不會成問題。」

談這些話的時候是在八月中旬的上午。我們就在那天決定了去請郁達夫回來，先由我寫了一封信徵求他的同意。高夢旦先生那兒我卻摹倣了一次孔二先生的辦法，便是「陽貨歸孔子蒸豚，孔子時其亡也而往拜之。」我聽說夢旦先生白天是在商務編譯所裏的，我便跑到他的公館裏去投了一張回拜的名片。但在這兒我要聲明一句，我並不是比夢旦先生爲陽貨，比我自己爲孔丘，只是我自己的怕見上人的怪癖使我取了這樣一個滑頭的辦法罷了。

商務印書館的編譯所裏面本來是有好些同學在那兒做工的，如像鄭心南（貞文）先生，周頌久（昌壽）先生，何公敢先生，在當時的薪水雖然沒有歐美留學生的多，但在實際上已經是不可缺少的中堅人物，他們每肯到馬霍路來看我，我也時而到閘北去訪問他們。有一次我不記得是因爲什麼事體，到商務編譯所裏去會我的那幾位同學。那時候夢旦先生正在鄰室裏會客，他聽見同學們在和我談話，便特別跑過來和我見了一次面。那老先生的態度異常誠懇，人很魁梧，聲音很宏朗，神彩於質樸之中帶着精幹的氣味，我一看見了他，便覺得和我父親的面貌很相彷彿。那天他說到他日前來訪我的意思，是他有一位姪

子得了肺結核症，想到福岡醫大去就醫，要想扣問我些那邊的情形。我是談到我不久要轉回福岡的話，夢旦先生便決定了讓我回福岡之後再送他的姪子渡日，好託我照料。

大約是帶着爲我餞行的意思罷，在九月初旬我快要回福岡的前幾天，夢旦先生下了一通請帖，在四馬路上的一家番菜館裏請吃晚餐。那帖子上的第一名是胡適博士，第二名便是區區，還有幾位不認識的人，商務編譯所的幾位同學是同座的，伯奇也是同座的。伯奇那天愁他沒有衣裳穿，他便穿了我在上海用兩塊半錢縫就的一套法蘭絨的西裝，我是穿的夏布長衫。這要算是我們自有生以來的最大光榮的一天，和我們貴國的最大的名士見面，但可惜我這個流氓，竟把那樣光榮的日期都忘記了。

那時胡適大博士受了商務印書館的聘，聽說就是夢旦先生親自到北京敦請來的，正在計畫着改組商務編譯所的大計畫。大博士進大書店，在當時的報紙上早就喧傳過一時。我聽說他的寓所就是我晚間愛去散步的那 Love Lane 的第一號，是商務印書館特別替他租下的房子，他每天是乘着高頭大馬車由公館裏跑向開北去辦事的。這樣煊赫的紅人，我們能够和他共席，是怎樣的光榮呀！這光榮實在太大，就好像連自己都要紅化了一樣。

博士到得很遲，因爲凡是名腳總是在最後登台的。——光榮到絕頂的是，他穿的也是夏布長衫。他那尖削的面孔，中等大的身裁，我們在那兒的像片上早是看見過的，只是他那滿面的春風好像使那滿樓的

電氣風扇都掉轉了一個方向。夢旦先生和我們介紹着，他慇懃地和我們握手。

夢旦先生說：『這是沫若先生，我們沫若先生很有遠大的志向，不久還要折回日本去繼續學業。』
我臉上的肉不免麻了一下。

——『很好的，』這是博士先生的第一聲，這三個字好像是他的習慣語，我以後便聽見過他說過無數次，『很好的，我們就等郭先生畢了業之後再作商量了。』

在『商量』之上冠了一個『再』字，自然是爲我的事情已經是商量過的。商務真的有想找我的意思嗎？老實說，在上海的書業界上做事情，除掉商務之外再沒有第二個更好的地方，這點智識我早是有的。假如在我和泰東發生關係之前，商務早有找我的意思，那我不費俄頃的遲疑，或許早就聽命是聽的；但我不幸的是一回國後，便和泰東發生了一種關係，發生了一種主奴的關係。我要想『朝高枝飛』嗎？這個行爲是 something like 『革命』的。

在博士和我握手的時候，何公敢這樣說：『你們兩位新詩人第一次見面。』

博士接着說道：『要我們郭先生才是真正的新，我的要算舊了，是不是啦？』

他這樣的一問，我沒有摩準確是怎樣的意思，但至少是感覺着受着了一種要求，便是要求我談出一句客氣的話，這話卻沒有立地構想得出，我只含糊地笑了一下。

就席的時候，夢旦先生並沒照着西洋的禮節，他是坐在那長餐桌上手一邊的正中，胡博士坐在他的左手，我是坐在他的右手。博士時時隔着夢旦先生和我打話，在席終用茶點的時候，夢旦先生率性把我讓在了他的左手去，和博士並坐了起來。談的話很零碎，我現在也只能零碎的記得一些。

博士說過，『我們的朋友陶孟和的夫人最近把海涅的詩選譯了，將來要作為世界叢書的一冊出版的，她把那首“Du bist ein[e]”譯得真好。』

我聽了他說出這一番話，才知道博士先生也懂得一些德文。但他的德文發音好像很有點『不落肯。』

他又告訴我：『某君（這位先生的名字恕我忘記了）譯了 Drink water 的林肯，不久便可以出版，那部戲劇寫得異常之好，把古事寫得和新事一樣。』

他回頭又問我：『你近來有甚麼新作沒有呢？』

那時候學藝雜誌上正在發表着我的一篇未完成的戲劇蘇武與李陵的序幕，我便問他看過沒有，正打算說出我要做那篇戲劇的大旨和細節時，他已經插斷了我說：『你在做舊東西，我是不好怎樣批評的。』

此外還談了些事情，我無庸縷述了。但我在這兒要敘述一件我們的大博士對於我的小小的奉仕。

我那時候也在吸香菸，在電氣風扇之下擦了幾根火柴都不能擦燃，博士把火柴匣接過去，順手又取了一個酒杯來打橫，把左手的拇指和無名指挾着酒杯邊，食指和中指挾着火柴匣，那樣酒杯便成了一個玻璃罩，火柴也就擦燃了。他向我笑了一下，我也着實地佩服着他：究竟不愧是我們的博士。

散席的時候，胡博士和另一位美國出身的博士去打台球去了。

九

安慶學堂的事情，達夫早有回信來願意擔任，便給他匯了些路費去，他是九月初頭上回來的。他回來之後有四五天的光景，我又轉回日本。這一次泰東送了我一張二等客艙的船票，另外又送了我六十大洋。我動身的一天，朋友們把我送到匯山碼頭上船。送行的有達夫、伯奇、均吾，還有一位新認識的朋友畢瑞生。上了船，在二等客艙的食堂裏開了幾瓶啤酒來飲御送行的朋友，但待我一要搜錢包來付賬的時候，我的錢包不知道幾時已經被扒手扒去了。真是要命，急得我這個背時倒兆的『流氓痞棍』幾乎流出了眼淚來。我那錢包裏面不消說泰東送我的六十塊錢是放在裏面的，另外還有上海的朋友託我到日本去買醫書的一百塊錢，足足的一百六十塊錢就那樣便無翼而飛了。船又臨着快要拔錨的時候，身上一個錢都沒有，到長崎上了岸便是問題。在這時候我才知道朋友是可感謝的，達夫連忙把他的錢包搜了出來，傾了五十塊錢給我；畢瑞生也儘他身上所有的搜了二十七塊錢出來。這些錢在後來雖是由泰東抽出來還了的，但在那咄嗟的時候，全不顧慮到自己，而能傾囊相助的友人，不是很可以感謝的嗎？

我離開上海的時候不用說把上海的事情移交了給達夫。伯奇因為有別的事情留在上海，他可比我

遲得兩個禮拜。他留在上海的期間，一切的事情自然也可以和達夫商量。但他們兩人的勇氣的確是比我十足。在我回到福岡之後，第一次送來的上海報上便登載着創造季刊的預告，計算起日期來，就在離開上海後的第三天。預告上說着季刊準於明年元旦出版，並且還有就在十幾年之後都還使我們的魯迅先生不能忘懷的『有人壟斷文壇』的話。那一方面使我佩服着我們達夫的勇氣，同時也使我感覺着分外的不安。我在上海呆了將近半年還不敢登出的預告，達夫接事僅僅三天，便把它登載出來了。旗鼓一聲張了，便不能不有實質來相副，我始終是感覺着我們同人們的力量實在並不充足。還有那『壟斷文壇』的話，我也覺得打草驚蛇，而且不免有些誇張；因為那時候的中國那裏有甚麼『文壇』？更那裏說得上甚麼『壟斷』？但把『壟斷文壇』的字樣一揭出來，於是文學研究會的朋友們便居然『壇』起來，而且也『斷』起來了。

回到了福岡，自然是繼續學業。醫科大學的課程，頭兩年是基礎科學，後兩年是臨床科學。基礎科學的畢業試驗本在第二年年末舉行，但我當時沒有受，便跑回上海去了；要繼續學業便不能不補受試驗，因而我的時間便不能不為試驗準備而花費。但我從上海回來時還帶了好幾件工作。第一件是替穆木天修改那部王爾德的童話集，第二件是譯完少年維特之煩惱，第三件便是準備創造季刊的文章。這些工作我是在試驗準備和學課的餘暇中完成了。還有那被扒手扒去了的那一百塊錢的買書費，算我自己是學醫

的人，我把我自己的醫書拿了好些來補充了。

創造季刊既已預告着在明年的正月一號出版，發稿至遲便當得在十二月以前。那第一期的稿件，除達夫的那篇茫茫夜之外，通是我集成的。我在十一月以前已經陸續把稿件集齊交給了達夫，只期待着到了正月一號便可以如期出版，但不料第一期便愆了期。愆期的原因就是等達夫的那篇茫茫夜。達夫是心雄萬夫的人，如在一種刊物中，他自己的文章不能壓卷，他是不肯苟且的。他到二三月間才把稿子發出，發了稿之後便回到日本受畢業試驗，那第一期自然沒有經過他的勘校和指點，一直遲到五月一號才出了版，產生出來的結果倒還馬馬虎虎的可以過去，單是茫茫夜的一篇已經是拍案驚奇的大文字了。但是那排版的拙劣，校對的荒疏，在新文化運動以來的刊物中怕要算是留着了一個紀錄。有一位熱心朋友替我們統計過，那創造季刊創刊號的錯字在二千以上，還有同時出版的少年維特之煩惱錯誤在五百以上。

因為校對荒疏的原故，同時還惹起了一件小小的悲喜劇，便是田壽昌的抗議了。壽昌在第一期中發表了那篇咖啡店之一夜，使我們在紙上領略了一番『咖啡店情調』。他的原稿先是寄給我，由我轉寄上海。他沒用原稿紙，只是在隨便的紙頭上乘着自己的興趣揮寫出的。筆下的龍蛇已經飛舞得有點駭人。他那時做文章還沿着舊時刊物的習慣，凡有得意的文句要在字旁加以密圈胖點，因而是愈加滿紙的雲煙。那是不折不扣的真正的草稿，塗抹添改不消說是很不少的，而他在紙上又是寫着兩面。我最初接到他

的原稿時已經就在擔心，怕一定弄不出好的結果。結果果然是不出所料，他的那篇文章錯處最多。壽昌在這兒便生了一個疑心，他疑達夫改竄了他的原稿，有意要陷害他，傷毀他在國內的名譽。他很嚴厲地叫我替他把原稿索回，要在別的刊物上再行發表，他說他可發表文章的地方很多。我是相信達夫決不做那樣卑劣的事體的，我把達夫不會經過勘校的情形告訴了他，又告訴了他泰東的校對素來是荒謬絕倫，勸他不要疑心朋友，即使真有怎樣的改竄時，待我在暑假期中回國去檢查原稿，查明之後再作理論。當時算好，壽昌聽信了我的話便沒有急切地和達夫絕裂。並且他還把應該在第二期發表的午飯之前寄給了我。

六月尾上學校放了暑假，泰東給我寄了一百塊錢的路費來，我在暑假期中便又回到上海，最先是在馬霍路的樓上把創造季刊第一期和少年維特之煩惱來校勘了一遍；壽昌的原稿自然是還保留着的，結果是證明了他的多疑。從那原稿上除掉爲保持雜誌的統一上把那密圈胖點刪除了之外，絲毫也沒有更易。原稿我寄還了壽昌，他的疑團也就冰釋了。

回到上海最感受着驚異的是鄧均吾的進步。去年在上海同住時，只覺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他的英文還好，對於舊式的詩詞也是有些教養的人，我走的時候曾經把我所有的一本英譯的海涅詩集送給他。隔了一年回來，看他把那海涅詩集已經讀得爛熟；他自己還寫了一冊新詩稿，他交給我時，他那詩品的清醇在我當時所曾接觸過的任誰那一位新詩人的新詩之上。在創造季刊二期和三期上所發表了

的白鷗吟以及其它，便是經過我替他挑選過的作品。

因爲馬霍路的狹隘的樓上又添了南公老板的兩位親眷，他在哈同路的民厚南里便頂下了一家一樓一底的房子來。我回上海，不一個禮拜的光景，便搬到那兒去了。那兒比馬霍路要清靜得一些，起初是一個人住着，也覺得很舒適，我不久便把創造季刊的第二期編出了。

就在我移到民厚南里之後沒兩天，高夢旦先生和鄭心南同學又來訪問過我一次，適逢其會我又不在寓裏。那時候商務的編譯所已經改組成四部，心南在擔任理化部的主任，何公敢在擔任庶務部的主任，凡是稿件上的交涉都是由公敢經手的。不久公敢也來談及，他說夢旦的意思是叫他和我訂下一個契約，凡是我的著譯可不經審查，售稿時著作千字五元，翻譯千字四元，據說這在商務印書館是最高的價格。公敢又說，這種優待是對於我的一種報酬；因爲去年夢旦託過我爲他的姪子調查過醫院的事情；但他的令姪在未能渡日之前是已在滬上病歿了的。我當時覺得自己並沒有怎樣盡力，沒有資格受這樣隆重的報酬；同時也覺得還沒有售稿的必要，所以把這項契約只在口頭聽了一番，並沒有寫在紙上。

達夫在春間把東大的畢業試驗通過了之後，早又回到了安慶服務，他利用着暑假也到上海來了，他便和我同住在民厚南里裏面。那時候肯到寓所裏來的有張聞天、吳明、汪馥泉諸人，他們當時似乎住在民厚北里，差不多每天都要來一次，來時談話的對象多是達夫，和我是少有交涉的。文學研究會的詩人朱自

清也來過一兩次，他完全像一位鄉先生，從他的手裏能寫出一些清新的詩，我覺得有些詫異。他那右側的顱頂部有一個很大的禿了髮的瘡痕，可更助長了他的鄉先生的風味。

在那時候文學研究會的人和我們已經是有些隔閡了。發起時的勸誘經了壽昌的不置答覆，去年夏間勸了我兩次參加，又經了我的謝絕，創造季刊出預告時又由達夫暗射了他們『壟斷文壇』的話，於是乎在不知不覺之間便結起了仇怨。文學旬刊上早就有好些文章在嘲罵我們，例如罵頽廢派的『肉慾描寫者』便是指郁達夫；罵『盲目的翻譯者』便是指我和壽昌。創造季刊出版之後更蒙沈雁冰以郎損的筆名加了一次酷評，所謂文學研究會是人生派，創造社是藝術派，頽廢派，便一時甚囂塵上起來。我們的刊物因為是季刊，又因為大家都不住在上海，因此對於別人的攻擊，只有忍受的一途，但我們終竟還年青，一回到上海來，便逼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就在那樣的情形之下有達夫的血與淚的那篇小說寫出，那是嘲弄雁冰和振鐸諸人在當時所空吹的『血淚文學』的；我也有論文學之研究與介紹和論國內評壇的兩篇文字，在正式地和他們交綏。那時又是柯一岑在編輯學燈，達夫和我的文章都是在學燈上發表的。我們當時的主張，在現在批評起來自然是錯誤，但在當時的雁冰和振鐸也不見得有正確的認識。文學研究會和創造社並沒有根本的不同，所謂人生派與藝術派都只是鬪爭上使用的幌子。雁冰在當時雖有些比較進步的思想，他的思想便不見得和振鐸相同。文學研究會的幾位作家，如像魯迅、冰心、落華生、葉聖陶、王統

照，似乎也不見得是一個葫蘆裏面的藥。雁冰在那時能夠同振鐸合作，倒是我們的一種驚異。所以在我們現在看來，那時候的無聊的對立只是封建社會下培養成的舊式的文人習氣之相輕，更具體的說，便是行幫意識的表現而已。

這種意識，一方面促進了我們對外的抗爭，另一方面也促進了我們的內心的哀感。我們感覺着寂寞，感覺着國內的文藝界就和沙漠一樣。有一天晚上似乎是在達夫把血與淚寫成之後，我們到四馬路泰東書局的門市部去。趙南公正在過癮，我們在他的房間裏坐了一下，問及創造季刊的銷路，他說「初版兩千部，還剩下有五百部的光景。」這樣的一句話在那時使我們感覺着特別的悲哀。創刊號由五月一號出版已經有兩三個月了，才僅僅銷掉千五百部——其實這在當時已經要算是很好的成績了——我們感覺着同情於我們的人真是少，在那電光輝煌的肩摩踵接的上海市上就好像只有他和我兩個孤另另的人一樣。

——「沫若，」達夫叫着，我，「我們去嗑酒去罷！」

——「好的，我們去嗑酒。」

兩個人挽着手走出店門，就在四馬路上一連吃了三家酒店。第一次是在一家麵館的樓上，我們嗑了兩壺酒，以後叫添酒菜，怎麼也叫不來，一座大樓上空空洞洞的也只有我們兩個人。把頭伸出樓外一望，那

酒店的招燈上的紅字是用白紙貼了的，原來才是有喪事的人家。我們急忙下樓去付了錢，又跑進別一家館子裏去。第二處也因為堂官送來的酒接濟不上，飲了幾壺又衝出去了。最後一家是在那青蓮閣旁邊的一座酒樓上，兩人坐在一張方桌上吃嗑，嗑到酒壺擺滿了一方桌，順次移到鄰接的空桌上，終於把鄰桌也擺滿了。兩個人怕足足吃了三十幾壺酒。我們平時是沒有那樣大的酒量的，我就到現在也還有點懷疑，我恐怕嗑到後來的一些壺數，堂官看見我們嗑醉了一定是作了假的。有一輪滿月從街頭照進樓來，照着我们桌上的酒壺的森林。我連說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我們是孤竹君之二子呀！結果是只有在首陽山上餓死的！』達夫紅着一雙眼睛就像要迸出火來的一樣，可他說過的一些話，我現在通不記憶了。我只記得我們決計請仿吾出來主持社務，便是在那天的席上。

兩人都嗑醉了，跟踉蹌蹌地彼此將扶着由四馬路走回民厚南里。走到了哈同花園的附近，那兒的靜安寺路上照例是有許多西洋人坐着汽車兜風的。因為街道僻靜，平坦，而又寬敞，那連續不斷的汽車們就像是賽跑的一樣。那個情景觸動了我們的民族性，同時也好像觸動了一些流痞性，我們便罵起了西洋人來，罵起了資本家來。達夫突然從側道上跑到街心去，對着從前面跑來的汽車，把手舉起來叫道：『我要用手槍對待！』我連忙去把他挽着，汽車從我們的身旁取了一個拋物線形跑過去了。

雖然和文學研究會的人有些意見，但也並不曾怎樣的決裂。記得在八月初頭上達夫發起過一次

『女神會』是紀念出版後滿了一週年的我的詩集女神，這種會合在日本是常有的，好事的達夫要把它輸入中國。在開會的頭一天晚上，達夫拉着我到開北去找振鐸，請他們參加。振鐸那時候是一個人住在一層樓房裏，書架上陳列着不少的古書。在深處的一角，一張長條的書桌後面，有圓頂的羅紋帳子罩着一尊小巧的床，那床想來定是單人用的鋼絲床了。振鐸快興地答應了參加，並答應了要多多邀約些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出席，想借這個機會來組織作家協會。

開會是在晚上，地點是在一品香，文學研究會的同人到的有振鐸、雁冰、謝六逸和盧隱女士諸人，日本 帝大出身的同學到了不少。那回雁冰先生在席上確是含着敵愾地演說過一次，可是組織協會的事情卻沒有提起。席終後在屋頂上還拍過照，但那次的照片我不會看見過，也不知道它的下落。

我對於政治問題發生了一些關心的，是在這個時候。那時商務編譯所裏有一批人，便是後來的「孤軍派」，集合了起來要出一種政治上的刊物。主腦是陳慎侯，此外大多是帝大出身的同學。他們的主張，起初是以『約法』爲中心，主張恢復『約法』以維繫中國的大局。他們說，這種主張是和當時主張『好人政府』的胡適派，主張勞農革命的共產黨成鼎足的。他們的雜誌本可以在商務出版，因爲不便說話，便託我介紹由泰東刊行，因此我也被視爲了準同人之例。在他們開會討論的時候，我也列過幾次席。我那時候的智識實在不足以參加他們的討論，我每次都是旁聽，並沒發言；不過我覺得他們的議論總是有點迂闊，他們主張護法，主張裁兵，在當時自然也誰都感着切要，但拿甚麼工具來實現呢？靠一本雜誌的宣傳，幾個人的主張，要使當時破壞約法的擁着私兵的督軍們覺悟嗎？我對於他們的主張，出馬便有點懷疑，但那裏的同人，大都是同學，而且多是專門研究政治經濟的人，特別是那位陳慎侯，我覺得他是一位有趣的人物，所以我對於他們取的是好意中立。

慎侯是福建人，在辛亥革命時是福建方面的首義的一個人，他以福建代表的資格參加過南京的參

議院。等到政權移到了北京，他自己卻跑到上海，當了一個商務印書館的編輯，專心在幹他的國語文法和國語整理的工作；他主張把中國通用的字數限定，限成九千字的光景，就和日本人限定漢字的一樣，那在教育普及的過程上是必經的階段。他的生活很樸素，思想帶着些社會主義的色彩，明確地給他一個估定時，大概是一個社會民主派的光景。他是尊重法的，他要以法來維持着國家的機構，在法的維繫之下再進行着社會的改革，以達到將來的『大同』。他是反對個人主義的，因而也就反對戀愛神聖說。因為我翻譯了少年維特，那裏便有些神聖戀愛的話頭，在有一次他們的討論會終結了之後便談到了這個問題來。

他說，「戀愛最是自私自利的一種衝動，結局是要把對方佔有。這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是根本矛盾的。你是「願意成爲共產主義者」的人，爲甚麼又主張戀愛神聖呢？」

他這句話實在是把我問窮了的。我自己雖不會主張過戀愛神聖，但既翻譯了歌德的東西，自己便不免要負一番責任，我便取了一種解釋的態度。我說，「凡是我們，在戀愛中是要陷到一種無我的態度，假如是文人，在這時候每每有平時想不出的思想可以湧出，平時做不出的文章可以做出，合乎詩人們的所謂神興，所以詩人們便神聖視之。這種感情雖然結局是在佔有，但因兩情相得，反可以增加替社會服務的精神，我覺得在理想的社會之下是不會矛盾的。」

他反對我這種說法，始終強調着那佔有排他的一面，並且說自古的帝王因爲戀愛，因爲女色而亡國

敗家的不計其數，無論怎樣不能認爲神聖的感情。特別是年青人，對於這種感情尤當盡力的控制。

他的話我不大信服，但我也不能駁他，只是說戀愛有好的一面，也有壞的一面，想這樣含糊了事；但他並不肯放鬆。他說：『你既認明戀愛有壞的一面，那就不能認爲神聖了。』

結果是他佔了勝利，我沒有再說甚麼。我現在想到這個問題，我覺得他的話是對的，他是怕戀愛神聖說一出會使得中國的青年都陶醉於戀愛，把正當的工作拋掉。這是他淑世精神的一端的表現。但我現在可以增加幾句：戀愛和吃飯睡覺是一樣，在人生是一種不能缺少的衝動，用不着神聖觀，也用不着罪惡觀。飯吃多了要生病，覺睡過了要惰業，戀愛失掉了節度自然也有他的害處。並且理想的戀愛，只有在理想的社會制度之下才能够完成，這也是可以斷言的一個公例。

慎侯就在那年的八月，在孤軍尚未出版之前便中了丹毒死了。我當時做過一篇月光的短劇來紀念他，那是收在星空裏面的。

孤軍把主宰失掉了，一時很有中止的形勢，後來在何公敢的領導之下，仍然繼續着出了版；他們在第一期上請我做過一首歌，便是那首前進曲，那後來雖是略略點竄過一下，但大體的意思是照着原樣的。

中國的積弱，在往年的一般人認爲是因爲沒有近代的國家形體，沒有近代的產業，所以在我們的幼年時代，才有變法維新富國強兵的口號。就在那種種口號之下鬧了幾十年，中國在形式上也算是成了新

式的共和國，然而產業仍然不能夠振興，國度仍然不能夠富強，而且愈趨愈下。在這兒大家的解釋又是趨向到唯心的方面，便是說中國民族的墮落，或者是自私自利的心太重，或者是法制的觀念、國家的觀念太薄弱。因而拯救的法門也就趨重在這一方面了。我自己的想法是傾向在革命的，覺得中國的現狀無論如何非打破不可，要打破現狀就要採取積極的流血手段。這種想法，在基調上也還是一種唯心的想法，因為是想把中國的惡人剷除乾淨，自然便會有好的局面出來，這和胡適所主張的好人政府，其實是並無二致。孤軍派主張護法，不贊成用流血手段，他們同時也在反對好人政府的主張，但其實護法的主張也不過替好人政府的主張提出了一個具體的辦法。約法一恢復了，人人能遵守約法，那不就是「好人」嗎？但要主張恢復約法，卻怎樣去恢復呢？沒有流血手段可以辦到嗎？

在政治上我雖然有些比較進步的想法，但在文學的活動上和這種想法並沒有怎樣有機地連絡起來。女神的序詩上，我說「我是一個無產者，」又說「我願意成爲一個共產主義者，」但那只是文字上的遊戲，實際上連無產階級和共產主義的概念都還沒有認識明白。在棠棣之花裏面我表示過一些流血的意思，那也不外是誅鋤惡人的思想，很濃重地是帶着一種無政府主義的色彩。

要主張流血，那先決的條件便是武力的問題。空洞地主張流血的人逢着這個實際上的問題，便沒有方法解決的。他要爲自己解嘲，那空想者便不能不抱着「獨善其身」的態度，而率性高蹈。暑假期中，我在

上海譯出了卷耳集，暑假過後回到日本又譯出了魯拜集，做了一篇孤竹君之二子的戲劇，完全就是那種態度的表現。孤竹君之二子那篇東西尤其是帶着虛無主義的色彩，記得是鄧中夏批評過，他希望我少做那一類的文章，多做棠棣之花一類的東西，其實兩篇都是一種傾向，只多少有些消極和積極的不同罷了。

日本的資本主義在歐戰期中得到了長足的進步，但在歐戰過後便遇着了恐慌的危機。重要的原因便是歐洲的資本主義又捲土重來，要在世界商場——很榮幸的事幾乎就是我們貴大中華民國的別名，繼續他們的經濟戰了。日本產業界中所必然發生的傾向便是資本的集中，表現在外面的現象便是小資本家的破產，零碎事業的中斷，猖獗的『成金風』之平息。這個現象從那博多灣的一角上也很鮮明地表現出來了。博多灣中的築港工事中止了，那座像王宮一樣的抱洋閣，漸漸蕭條了起來，終至不能經營，在一九二二年的春間，全部拍賣了。

把抱洋閣買了的是新起的博多灣沿海鐵道會社，買來打算改成公司的辦事所。但在未改造之前，空了有半年的光景。公司是命令了一位技師看守的，但那技師和福岡市上的一位伎女拚上了，兼顧不到抱洋閣來。他便托了一位在抱洋閣附近住着的工頭替他代理。工頭的家和我們的寓所相隔不遠，我們在那箱崎町上住了已經三年，自然是相認識的，逢年過節的時候也時而有些往還。那工頭的老板娘想到自己一家人住在那王宮一樣的抱洋閣裏，在掃除上要大感困難；同時她的經綸似乎也很不弱，她利用那技師

的弱點，便私自把抱洋閣的一部分向我們開放了出來，她請我的女人和他們同住。於是在那暑假前後的幾個月中，那臨海的幾層樓房便成爲了我們的居室。在三年前我在岸上羨慕着樓上的人如天上的人一樣的，在三年後的我自己卻成了被岸上的遊人所羨慕爲天上的人了。

臨海的第三層樓上是六十鋪席面的房間——這「六十鋪席面」假使日本人聽了立地便要大吃一驚：因爲日本式的房屋通用席面計算，席面的廣袤是有一定的，寬約三尺，長約六尺，普通的居室大抵是八鋪六鋪四鋪半的規定。那樣大的房間不知道在前是作爲什麼用的。臨海的東北兩面都有迴廊，廊外有欄杆，博多灣全面的景色毫不吝惜地裸露出來。大房間的西南角上又還有一間三鋪席面的小屋，這也不知道在前是作爲甚麼用的。

我在迴廊上擺了兩張由上海買去的藤製的睡椅，安了一張短桌在那大房間裏面，那兒便成爲了我臨時的書齋。有時海風太大時，我又把短桌移到後邊的小室裏去。

就在那樣的廣居之中，我譯出了魯拜集，做成了孤竹君之二子。那孤竹君之二子在初本是想寫達夫和我在四馬路上醉酒的那一晚上的事情，是想用寫實的手法寫成小說的。但我對於現實的逃避癖，卻又逼着我把伯夷叔齊寫成了那樣一篇不成名器的作品。我寫那篇作品的時候，本打算寫出伯夷叔齊在首陽山上挨餓時的心理。我爲求得實感起見，有一天我自己實行地餓過一次，早飯午飯通沒吃，睡在迴廊上

的長椅上，等待着飢餓心理的到來。早飯不吃，倒還沒有甚麼；到不吃午飯，那真是受了點煎熬。餓着肚子幻想着伯夷叔齊，同時是想借伯夷叔齊的史影來暗射當世，因此在孤竹君之二子，尚未構成之前，我卻得着了哀世古調九首的副產物。那幾首是用古詩格調寫出來的，那自然只是一些歪詩，但在可以暗示出當時中國的大勢和我自己的心理上，它對於我比孤竹君之二子是更有意義的。我現在把它揭在這兒，自己來加一番註腳。

阮嗣宗，哭途窮，

劉伶欲醉酒，揮袖兩清風，

嵇康對日撫鳴琴，腹中飢火正熊熊。

一東，二冬，人賤不如銅。

阮嗣宗，劉伶，自然是夫子自道。對日撫琴的嵇康是在二樓的一室裏彈着鋼琴的陶晶孫。晶孫先生本來要遲我一年，但因為我回上海去停了半年的學，我們便同在一班了。他花了六百塊錢買了一架鋼琴，一有空閑便在一東二冬地彈奏。我們遷進抱洋閣之後，他也一同搬了來，寄居在二樓的臨海的一室裏。他那一東二冬的琴聲正在伴奏着我的飢腸的跳舞。

一碗飯，五羊皮，

養活淮陰侯，買死百里奚。

伯夷叔齊首陽山，不合時宜該餓死。

四支，五微，秋高馬正肥。

這是那晚和達夫醉酒時的情緒。秦東老板對於我們採取的便是「一碗飯，五羊皮」的主義。他知道我們都窮，自然有一碗飯給我們吃，時而也把些零用錢給我們用；但這些飯和這些錢是主人的恩惠，我們受着他的買活便不能不盡我們的奴隸的勞力。我們不會受過他的聘，也不會正式地受過他的月薪；我們出的書不會受過稿費，也不會核算過版稅；他以類似友情的主奴關係來羈縻着我們。我們所受的恩惠雖是有限，而所盡的義務卻沒有可言滿足的一天，因為這兒的尺度是精神上的尺度。我們的自由無形中是受着束縛的，譬如商務印書館要聘請我們，我們便不好向高處飛去。受着這樣的束縛，善於自行解嘲的人，自然可以美其名曰「高潔」，曰「不合時宜」，自然也就可以自比爲伯夷叔齊了。這些正是我們那時候還受着封建思想的束縛的鐵證，並不是秦東能够束縛我們，是我們被舊社會陶鑄成了十足的奴性。我們出馬的時候假使是亞東，是羣益，它們都可以一樣地做我們的主子的。

羨殺人，黃金印，

順口說合縱，橫目說連衡。

富貴在天生有命，一朝尸被五牛奔。
酒醴三牲，準備哭蘇秦。

這指的是當時的一批政客，特別是那時的一位「小徐」。

唐藩鎮，勢絕倫。

當年熾手熱，今日何人存？

河朔淮西一宵盡，滿池鵝鴨可成兵。

虎口當心，驪龍有逆鱗。

這指的自然是當時的軍閥。

白居易，琵琶行。

徐娘已老大，猶自嫁商人，

懷抱琵琶隣舟去，贏得青衫淚滿襟。

五鼓三更，關公走麥城。

這兒所說的徐娘是指當時的徐世昌。那位老頭子賣名賣到晚年，不料他的權勢慾是很大的，苦心孤詣地運動着做了一次大總統，後來被段祺瑞趕跑了，跑向天津。

（第六首闕）

楚狂人，笑孔丘，

七十二大賢，三千小獼猴，

包辦中華教育界，老莊無分吃豬頭。

三跪，九叩，緣木把魚求。

中國的教育界有這樣包辦的一羣人，這是無須乎再來加註的。只是那一羣人在當時正叩頭百拜的
向北政府請發薪水。

博浪錐，何處有？

荆軻今已死，狗屠不可留。

陳涉吳廣起田間，農民之中今在否？

一筆全勾，醉死夢生儔！

這仍然是做棠棣之花時的情緒。

天風吹，海浪流，

滿懷悲憤事，聊以寄箜篌。

神州原來號赤縣，會看赤幟滄神州。

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耨！

這兒明白地露出了一個「赤」字，但奇怪的是這幾首詩裏面罵了政客、軍閥、官僚、黨人、教育家，卻沒有提到在這些傀儡之後牽着線子的人物；追慕了些 Lumpen-proletariat，一躍便想把中國赤化了。橫陳在藤睡椅上想赤化，這便是我當時的一個如實的寫照。

肚子實在餓得難以煎熬，在那六十鋪席面的三層樓上當着海風，熬出了這幾首哀時古調，把赤化問題，飢餓心理，孤竹君之二子，拋在一邊，自己跑下樓去把冷飯來填了一肚子。

在回福岡不久的時候，達夫從安慶寄了一封很悲哀的信來，同時寄來了一份胡適編的努力週報。胡適在罵人的一段雜記裏面，罵了達夫，同時不用說是連帶着我們。罵我們是『淺薄無聊而不自覺。』達夫挨了罵，他便異常的悲憤，寫來的信上說，他要跳黃浦江而死。我得了信，又看見了胡適的那段雜記，不用說也很悲憤，我尤其怕的是我的朋友會真個跳進黃浦江裏面去了。

先是達夫在創造季刊的創刊號上發表了一篇夕陽樓日記，指摘了少年中國學會的余家菊由英文重譯出的人生之意義與價值的錯誤。余譯的錯誤委實很厲害，但不幸達夫的指摘的開首的幾句中有“establish”的一個字應該是『證實』或『證明』一類的意，達夫又譯成了『建設』（恐怕是『建設』的誤排。）胡適大博士便抓定了這一個字，又把達夫所指摘的幾句重譯了一遍。但我們大博士的翻譯更錯得一塌糊塗，連“while”這個極普通的英文，都譯成『雖然』去了。

人生之意義與價值是德國哲學家威鏗的著書，因而要求本問題的最後的決定，自然是要看德文的原文。德文的原文我所有的是第四版，和英譯本的內容完全不同，達夫所指摘的那幾句是被刪除了的。英

譯本所據的是初版，在這兒卻出於不意之間得到了一個重譯之不可靠的實證。便是在著者本人已經是廢棄了的文字，由別一國的舊譯裏又珍重地把它介紹了過來，這個事實就讓我們的大小說家尊重重譯的魯迅先生，無論怎樣把他手中的一隻筆自由自在地曲得就像卓別麟手中的一根手杖，也是難於曲護的。但這當別論，我們要駁倒胡大博士的罵人，自然是又當去找尋威鏗的初版。這卻是難事，因為問題不是買書，而是買骨董了。

很可感謝的是仿吾的意思和我不期然地兩相契合了。他那時候已經到了上海，同時田壽昌應中華書局的聘也回到了上海，仿吾便在壽昌的藏書中找尋到了一本初版，他給我寄了來。結果是連初版的原文和英譯文都很有距離，原文只是半句話的文章，英譯者竟譯成了好幾句，胡大博士的重譯不用說和原文是更隔了十萬八千里了。胡大博士結果仍然是錯了的。（參看創造季刊第三期中反響的反響。）

全書譯得不成名器（即是本無譯書的能力，因投機而不負責任的亂翻）與偶爾有一二字的誤譯，這本來是不可同日而語的。達夫的誤是屬於後者的。然而胡大博士的身分卻拿得十足，他指摘了達夫的錯誤，罵了我們「淺薄無聊而不覺」，又還說了一句便是「彼此都是初出學堂門的人，相差也是有限。」（大意如此）他的意思就是說：你達夫和余家菊都是才畢業的學生子，有好深一點的水，落到我大博士手裏，你看，怎樣了，不空落得一個「淺薄無聊而不自覺」的罵名嗎？是的，可憐那大博士的罵語卻不折不扣

扣地落在了他自己的頭上！

我們這位博士只是一位有些常識的啓蒙家，而他的常識也不是怎樣的高級的。我這樣空空洞洞的說來，顯然也有些心存報復的在罵人，讓我在這兒把他的文章來舉個例罷。

我手裏有一本新月月刊二卷十號，那裏面有我們胡大博士的一篇高文，便是我們走那條路那篇大文章開端處引了一句淮南子上的話；他說「這正是我們中國人今日的狀態。」

『今夫盲者行於道，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遇君子則得其平易（今本作『則易道』）遇小人則蹈于溝壑（今本作『則陷溝壑』）（原註：淮南汜論訓，文字依『意林』引。）

我們的大博士引用了這一句古語，十足地表示他是一位學者；而且他的標註更表示出他是一位精細周到的攷據家（可惜『蹈于溝壑』四個字似乎是依據御覽，『于』是作『於』的，）不是尋常的學者；這樣一位大學者的高論你還不好信嗎？所以博士先生的引古是有意義的，便是標註也是有意義的。但可恨我們多生了一副腦筋。我們只要讓我們自己的腦筋來想一下，便會知道淮南子的話完全是睜眼子說的瞎話，世間上絕沒有那樣無聊的瞎眼子。我們知道瞎了眼睛的人，他的視官雖然失了，在視官以外的聽官觸官乃至所謂第六官是比睜眼子更銳敏得多多。他能够以聽官觸官來補足視官的缺陷，他能够因

絲微的氣流而辨別方向，他能够依杖梢的點觸而辨別高低，他的耳朵上有眼睛，竹杖上有眼睛，脚上有眼睛，全身的皮膚上都有眼睛。所以我們在極繁華的都市上，每每能够看見有獨自一個人能够上電車的瞎子。瞎子走路，絕不是『人謂之左則左，謂之右則右』的。淮南王劉安是兩千年前的人，那樣的話作爲兩千年前的常識倒還沒有甚麼；而我們胡大博士就好像從前的闍墨文章愛引『子曰』『詩云』的一樣，引用來做了自己的木鐸（motto），那是證明了胡大博士的常識至少是落後了兩千年的。

學學博士的筆調：『古人說得好：文章爭一起。』胡博士在一起上想以學者的資格來釣人，可惜我們在這一起上已經看穿了他的落後，他以後的文章，除非是好事家或者同是愛說瞎話的瞎眼子，是可以不必看的了。但我們爲忠厚起見，不妨再看一下他的下文。

博士說：

『我們要打倒五個大仇敵：

第一大敵是貧窮。

第二大敵是疾病。

第三大敵是愚昧。

第四大敵是貪污。

第五大敵是擾亂。

這五大仇敵之中，資本主義不在內，因為我們還沒有資格談資本主義。資產階級也不在內，因為我們至多有幾個小富人，那有資產階級？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帝國主義也不在內，因為帝國主義不能侵害那五鬼不入之國。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爲什麼偏愛光顧我們的國家？豈不是因爲我們受了這五大惡魔的毀壞，遂沒有抵抗的能力了嗎？（加圈照原樣）故卽爲抵抗帝國主義起見，也應該先剷除這五大敵人。」

胡大博士真可說是見了鬼。他像巫師一樣一里招來，二里招來的所招來的五個鬼，其實通是些病的徵候，並不是病的根源。要專門談病的徵候，那中國豈只五鬼，簡直是百鬼臨門。重要的是要看這些徵候，這些鬼，是從甚麼地方起來。

胡大博士在疾病的項下舉了一項瘧疾，他把瘧疾說成亡國滅種的大病，說「我們不得不承認瘧疾的可怕甚於肺結核，甚於花柳，甚於鴉片。」這位先生假如多少學過兩天近代的醫學，我想他斷不會這樣的誇張；同時凡是多少學過兩天近代醫學的人也立地會知道他張皇得真有點程度。我們暫且就把瘧疾來做譬比罷。這是由於病原蟲 *Plasmodium* 所喚起的疾病，有間日瘧，三日瘧，四日瘧等的種別，但假如這幾種瘧疾的病原蟲同時侵犯了一位病人時，由時間的組合上可以形成不規則的瘧形。這種病是有特效藥的，便是雞納霜（Chinine），用得得法時可以藥到病除。古時候沒有這樣明確的知識，故也苦於無法治

療，在中國更是當成鬼病在處治。說起那鬼狀來要舉出『五大仇敵』可以俯拾即是。第一大敵是寒熱間作，第二大敵是肝脾浮腫，第三大敵是譫嚅迷離，第四大敵是食慾不進，第五大敵是衰弱無力。假使不顧惜紙面，還可以舉出好些。在古時當鬼病治的時候，便是對於這些徵候『一點一滴』的想方法，所謂『頭痛醫頭，脚痛醫脚』。照着那樣辦去，或者也怕會弄到胡大博士所誇張的那樣，亡國滅種了。但到現在已經不是再見鬼的時候了！現在有特效藥來撲滅病源蟲。（古時瘧疾也每服藥而癒，是因藥中含有雞納成分。）有豫防的智識來撲滅那傳播病源蟲的媒介。（這是一種花脚蚊子，立在壁上後體斜翹與壁面形成一種角度，學名爲 *anopheles*，見了這種蚊子務請打倒，千切不要懷疑說這蚊子並不在瘧疾之內！）而且還有一項新奇的智識，便是利用瘧疾來醫治淋病梅毒，因為那些病源菌是不能耐高熱的，瘧疾有四十度至四十一度的高熱，可以撲滅那些病源菌；去了虎再來驅狼，這可以說是以毒攻毒，但是要有明確的醫學知識的人才行，倘是見鬼醫生，聽了都是會驚駭的。

說到了梅毒，再來談談梅毒罷。從前在上海的小報品報上看見過一篇文章，說胡適博士是害過梅毒，這事情的確否雖不得而知，但好在博士是把花柳病看來比瘧疾還輕的人，而在我們學過醫的人看來，梅毒患者和瘧疾患者是一視同仁的患者，倒沒有甚麼名譽不名譽。即使說胡適博士害過梅毒是訛傳，也就如說胡適博士是得過瘧疾一樣，倒也不會發生毀壞名譽的訴訟。而且我們還要知道，梅毒單由簡單的接

吻都是可以受傳染的好了，還是來談談梅毒。博士先生把梅毒看得來比瘡疾還輕的，我想這是因為知道了有『六〇六號』的特效藥的原故。但其實這病依然是可怕的。病由驅梅的療治即使斷了根，便是把病原菌的 *Spirochaeta Palida* 撲滅了，但那病菌的屍骸留在人體裏，在神經系統中，有時仍然要發出種種不愉快的腦症和脊髓癆，那究竟不是瘡疾可比的。但就有這樣稀罕的例症也，還是要用根本的驅梅療法，不能够委棄梅毒而不治，或者是在梅毒的徵候中舉出五大仇敵來打倒。拿第三期的梅毒來說罷：第一大敵是毛髮禿落，第二大敵是鼻頭腐爛，第三大敵是聲音變啞，第四大敵是骨髓疼痛，第五大敵是運動不靈。此外還多，還多，讓你去一點一滴地去打倒！

哼哼，我們的博士先生『淺薄』得真是有點可愛。他說『資本主義不在內……資產階級也不在內。』是的，內或者是不在。外呢？中國的金融、交通、礦山、紗廠等等是在貴何國度的貴何主義貴何階級的手裏呀？他說『封建勢力也不在內，因為封建制度早已在二千年前崩壞了，』這只是在名詞上玩把戲。他說的『封建制度』是秦以前的封功臣建同姓的說法，（但那種說法已經靠不住，周代的諸侯大多數是自然生長的國家，當時的社會還是奴隸制度。）現在所談的『封建勢力』是指在行幫制下的各種舊式產業，在地方上割據着的軍閥、官僚、地主的那個連鎖，以及因之而發生的各種痼弊的迷信與腐化（胡博士所說的五大仇敵都包含在這裏面，）這些是崩壞了的嗎？問題不是徒逞唯名的（nominalistic）詭辯，而是

要你看着事實！更可愛的是我們的博士問『帝國主義爲什麼不能侵害美國和日本』——這該不是多喝了兩杯洋酒的時候說的話罷？因爲這等於在問：『瘧疾的病源蟲爲什麼不侵害 Piasmodium，梅毒的病源菌爲什麼不侵害 Spirochaeta Palida？』先生是無智呢，那倒還可恕，因爲他究竟還年青，還可以再讀幾年書來再談。雖不能說『一言可以興邦，一言可以喪邦』（胡博士的原文很嚴正地引用了這兩句，其實世界上並沒有這樣大的牛屁，）至少是可以說『一言可以留芳，一言可以遺臭。』

其實中國積弱的病源，就像盲目者依然有方法找尋正確的道路一樣，中國人自雅片戰爭以來在暗中摸索了一百年，畢竟是早已摸着了的。只可恨有好些狂牛不跟循着民衆所找尋到了的正確的道路，只是像五牛奔屍一樣亂跑。弄到現在來還要讓我們的博士問『我們走那條路？』

博士先生，老實不客氣的向你說一句話：其實你老先生也就是那病源中的一個微菌，你是中國的封建勢力和外國的資本主義的私生子。中國沒有封建勢力，沒有外來的資本主義，不會有你那樣的一種博士存在。要舉實證嗎？好的，譬如擁戴你的一羣徒子徒孫，那便是你一門的封建勢力；替你捧場的英美政府，那便是我們所說的帝國主義者。你便是跨在這兩個肩膀上的人，沒有這兩個跨足地，像你那樣個學者，無論在新舊的那一方面，中國雖不興，實在是車載斗量的呀！

這一個例證舉得未免太長了，還是收回本題來，便是我們的博士始終是一位稍稍有點常識的啓

蒙家，在五·四運動的前後，他這個啓蒙家是有過相當的效用的，所以他當年罵起人來也很有使我們達夫先生想跳黃浦江的力量；但我想假如達夫現在肯來罵罵胡適，那或者怕會使我們的博士去跳瓦兒池罷。（註）

由達夫的夕陽樓惹起了胡適的罵人，由胡適的罵人惹起了仿吾和我的回敬，以後便愈扯愈遠了。張東蓀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着是惹出了仿吾的形而上學序論的指摘，張東蓀的『手式戲』喧傳了一時，成仿吾的『黑旋風』也就因而名滿天下。吳稚暉也來參加過這場官司，接着是惹出了陳西滢對於茵夢湖的指摘。還有是『詩哲』徐志摩在努力週報上罵了我的『淚浪滔滔』。這場事件的因果文字，如有人肯好事地把它收集起來，儘可以成爲一部夕陽樓外傳。但我們那聰明的夕陽樓主，他是最先把兵馬收了的。這是後話，在下邊自然要慢慢地談到。

仿吾由長沙再到上海是在我們離開了上海以後，他便住在我們住過的民厚南里裏面。在他到上海之後不久，田壽昌受了中華書局的聘，也由東京到了上海，壽昌是住在民厚北里。同在民厚里裏面，一南一北地住着我們的兩位同人，在局外人或者會想到創造社的進行是會要更加圓活的。但不料在這兒有小

（註）瓦兒池者德國的跳舞 Waltz 之音譯也。

小的一點意見，使壽昌和仿吾決裂了，並因而和我們斷絕了關係。

事情是創造季刊二期出版之後，仿吾由長沙寫了一封信給我，這是在季刊三號上發表了的，信中批評了第二期裏面的作品，批評了達夫、資平和我。中間有一筆帶說到了壽昌的薔薇之路。仿吾說他不知道壽昌爲甚麼要把那樣的文字來出版，他對於他的前途真是絕望了。這封信我留在上海，留給仿吾編入第三期，是用紅筆把那兩句勾了的。壽昌和仿吾起初自然是時相過從，不幸有一次壽昌在仿吾的抽屜中便看見了那封信，自然也就看見了那用紅筆勾了的兩句。那使壽昌感覺着很大的不快，中間雖也經過我的函件的調解，但是兩人終至於決裂了。但我早就在這樣想，壽昌的決裂雖以仿吾的信爲其近因，其實也是早有遠因埋伏在那兒的。壽昌是少年中國學會的人，那個學會起初本來就是帶着有很濃厚的國家主義的色彩的。壽昌在前雖不必便是怎樣鮮明的國家主義者，但他在那一方面的朋友特別多。一種團體無論怎樣自由的集合，多少總是有點立場的；一個人無論是怎樣超脫的性格，入了一種團體也自會帶着那個團體的意識，可以說就是行幫意識。壽昌以少年中國學會的會員而參加創造社，他在出馬的時候便不是怎樣的熱心，可說僅是出於對我個人的友誼。創造社在前在積極一方面本沒有甚麼主義，但在消極的一方面至少可以說是非國家主義的。這種意識和少年中國學會的宗旨隱隱成爲對蹠。使壽昌因些小的意見便和仿吾決裂了的，是這種對蹠的意識在作怪的！

一九二三年的三月，在福岡足足住了四年零七個月的我，算把大學弄畢業了。自己對於醫學，就象費了幾年的工夫把世界漫遊了的一樣，但終因自己的聽覺的不靈，做醫生的希望是不能不拋棄的。

張鳳舉那時候在擔任北大教授，他寫過一封信給我，勸我到北京，說是周作人先生也有這個意思。他說北大不久要開設東洋文學部，勸我去擔任些事情，位置想不至有所計較。他又說，知道我的周圍有一位陶晶孫，他希望我介紹給他做朋友。晶孫我自然是介紹了，但是北京我卻沒有意思去。我在日本雖然留了八九年的學，但學的並不是文學，所謂東洋文學尤其外行，我當然沒有去教人的資格。

北京沒有去，帶着家眷仍然回到了上海，動身的一天又恰好是四月初一。在我自己是回國，並回到已經走熟了的上海，倒也沒有甚麼；但是我的老婆，她是初次跟着我跑向未知的國土的，在她當然是別有一番的感慨。——我現在問了她，問她當時的感慨怎樣；她說，『好像感覺着幸福，因為你已經畢了業，以後的生活好像是只有朝好處走的一樣。』她當時如果是這樣作想，那她不久便要受欺騙了。

回到上海仍然住在民厚南里，仿吾移住亭子間，把前樓讓給了我們。均吾又搬回馬霍路去了。那時候

我已經有三個兒子，第三子的佛孫生後剛滿兩月。我畢了業了，家裏給我匯了三百塊錢來，要我回四川，那三百塊錢便是我唯一的財產。我最初的計算是，回國之後暫時到上海附近的鄉下去，把我的浮士德譯稿整理出來，以了結一重公案。譯好之後或回四川，或到什麼地方去，再定行止。

仿吾住在泰東編輯所裏，也和我向來是一樣；他沒有正式受過聘書，也沒有領過一次薪水。他人又厚道——雖然蒙我們的魯迅先生把他歸之於『流氓痞棍』之例，更斥之爲『極左的兇惡的』，但我在這兒是要爲他嚴重抗議的——自從去年十月到了泰東，住了半年，除吃飯而外，也沒有用過泰東一個錢，弄到連坐電車的錢都是沒有的。那時候他的大哥劭吾，在廣東擔任第二軍的軍需處長，託他們的軍長譚組庵先生爲仿吾寫了一封介紹書，介紹給商務印書館的張菊笙先生，求在商務的編輯所裏面謀個位置。菊笙先生是商務的元老，組庵先生是軍長，他們又是同年（是由信中稱『年兄』而知道的），那封信假如投寄了，我想仿吾至少是可以做個二等編輯，每月拿他一百五十塊錢，或者截到今年的日本兵的爆擊爲止，他都還安閑地吃着一碗安樂飯的罷？

回到上海之後，商務的同學們多肯來訪問我們。庶務主任的何公敢又來提起了著譯契約的事情，還是著則千字五元，譯則千字四元，不經審查的舊議。我當時談過一次笑話，我說，『著譯未免太勞苦了，能够每個月送我幾百塊錢，我倒一定要拜領的。』公敢說，『你的資格可惜還不够啦，你要想鬧到梁任公胡適』

之一流的資格，總怕還要等幾年。」自然我們彼此都是一笑，因為公敢並不是崇拜梁胡的人，他的話只是含着滑稽的意義。契約的事情依然保留着了，也沒有說訂，也沒有說不訂。

不久達夫帶着他的夫人和龍兒和一個丫頭由安慶回到上海來了，他是因為甚麼事情卸了職，我現在已經記不清楚了。所以那時的達夫要算是失了業的人，我們覺得他是很可同情的一樣。說也奇怪，我自有生以來不知道就過甚麼業，偏在同情達夫的『失業。』有一天我們三個人聚集在民厚南里，在談笑之間決定了一個路線，便是過『籠城的生活。』仿吾的那封介紹信不去投交，我的著譯契約也不用去締訂。可憐的那幾個封建餘孽，他們竟想把民厚南里當成首陽山；不過那時候已經不止是伯夷叔齊，而是加上了仲雍的。

決定了過籠城生活之後，第二步便決定出創造週報。這次商議的地點是在馬霍路的樓上，達夫那時是住在那兒的，寫出了他那篇不朽的葛蘿行。那個提議的首倡者是達夫，還是仿吾，我現在不記得了，至少不是我，我是可以斷言的。只是一決定了之後執行得卻很勇猛。達夫在四月下旬回到富陽去了，我們沒有等他，趕着在五月一號裏便把第一期的週報刊佈了出來。所以要趕着在五月一號出版的，與其說是為要紀念勞動節，寧可說是為要紀念創造社的滿了一個週年——創造季刊的創刊號千巧萬巧地是挨到了一九二二年的勞動節日才出了版的，卻成了創造社的意識以外的一個光榮的紀念，特別是仿吾，他把這

個日期看得是分外輝耀。仿吾異常的猛勇，在週報第一期上便投出了詩之防禦戰的那個爆擊彈，把當時築在閩北的中國的所謂詩壇，爆擊得比今年的閩北怕還要厲害。那篇文章除掉仿吾之外是誰也不會做的，因為凡是多少要顧慮一下飯碗問題的人，誰個敢於做出那樣的文章？至少連我自己就是不敢做的。一個人，在我們目前這個先生長先生短的黃金世界裏，少稱了一個『先生』都可以得罪人，那個敢有那樣天大的膽量再來言『戰』？仿吾因為那篇文章便得罪了胡適大博士，周作人大導師，以及文學研究會裏面的一些大賢小賢。然而仿吾的報應也覷面了。他在用爆擊彈，而在敵人方面卻用的是毒瓦斯。時事新報上的瀾天漫野的綠氣把他化成了一陣『黑旋風』，就在一九三一年的魯迅先生的『一瞥』中都還說他是帶着一個『極左的兇惡的面像』——仿吾，你知道了好夕麼？我看你是永遠不能超生的罷。

因為有了那場『防禦戰』，在敵人陣營裏並沒有損得分毫，把自己卻弄得一個焦頭爛額，在自己的本陣營裏也崩潰了一角。創造社的醞釀期中曾經參預過的張鳳舉和徐祖正的兩位先生，他們在創造季刊四期的『雪萊紀念號』上是做過文章的，鳳舉在那一期上還發表過一篇小說叫途；但在週報創刊以後，他們說仿吾改了他們的文章，因此便和創造社斷絕了關係，屢次請他們把那未完的稿子繼續下去，他們也謝絕了。彼此改改文章，在我想來，在朋友之間，斷不會便成爲『廣絕交』的資料，重要的原因怕還是那一『戰』罷？那一『戰』把我們北大教授周作人導師得罪了，倒是千真萬確的。

出了二期之後達夫由鄉裏出來，第三期上他便出馬上陣。他的勇猛也不亞於仿吾，最初在中國的文藝界提出了『階級鬭爭』這個名詞的怕就是我們達夫先生。不過達夫的那篇文藝上的階級鬭爭，結果只是說了些鬭爭，並不會說到階級，離題自然是很遠的。

正在那出週報的前後，日本大阪每日新聞的駐滬特派員M來找過我，說他們的新聞社要在英文版的每日新聞上出一期『中國專號』，要我代表着中國的文藝界做一篇文章。現在想起來真是有點僭妄，也真是有點滑稽，我便做了那篇我們的文藝新運動，由仿吾英譯了出來交了去。在日本布爾佐亞治的大新聞上發表那篇似是而非的普羅列塔利特的文藝論，新聞的編輯者怕定然是感着苦笑的罷？那篇文章是得過二十塊錢的稿費的，不過自從那篇文章發表過後，日本的新聞界也就沒有再找過我了。

一鼓的作氣的確是很勇猛，使敵人對於我們也隱隱的生了一種畏懼。週報發刊不久，季刊的四期又出版了，那裏面有我的卓文君，達夫的采石磯，不期地同時刻薄了攷據家，把胡博士罵我們『淺薄無聊』的話來發揮過一下。就在那時候胡大博士到了上海，他對於我們的反攻取出了一種求和的態度，他由亞東書局送了一封寫給我和達夫的信來。信中的文句塗抹得異常厲害，大部分是對於我的說話。他說攷據家有當罵的與不當罵的，像我譯魯拜集的時候如肯多攷據一下，有些地方便不會弄出錯誤來了。

我們得了他的信，同時也就回了他一封。我是勸他把提倡白話文那時的精神恢復起來提倡氣節。這

夫是怎樣寫的，我不記得了。我只記得達夫口頭說過這樣的話：『我的采石磯把他比成了戴東原，他一定是在暗暗得意的。』

我們的回信去後，胡大博士畢竟是非凡的人物，他公然到民厚南里來看望我們。一年不見的他，憔悴多了。他說他在生病，得了痔瘡；又說是肺尖也不好。我看他真有點像梁山泊的宋公明，不打不成相識，罵人的一筆官司就像是從來沒有的光景。他那時住在法租界杜美路的一家外國人的貨間裏，我們，仿吾、達夫和我，也去回拜過他一次。我們被引進了一間三樓的屋頂室，室中只擺着一架木床；看那情形，似乎不是我們博士先生的寢室。博士先生從另一間鄰室裏走來，比他來訪問時，更覺得有些病體支離的情景。那一次他送了我們一本新出版的北京大學的國學季刊的創刊號，可惜那一本雜誌丟在泰東的編輯所裏，我們連一個字都不曾看過。

週報在開始創辦的時候本很有趣，因為人扣手，又都還是些生力軍；但辦到十幾期上來的時候便覺得有點筋疲力盡了。每週要發一次稿，我們最爭的是頭一篇，所謂“Haupst”，三個人輪流起做都感覺着有點青黃不接的恐慌。又要由自己校對，自己跑印刷所。禮拜一發稿之後，禮拜三送初校，禮拜五送二校，禮拜六送三校，禮拜日出版，弄得整整一個禮拜全沒有空閑的時間，真真如坐在囚船上的奴隸一樣，動也不能動一步。我想到鄉下去整理浮士德譯稿的計畫，在無形之中是被拋棄了。還有最感痛苦的便是沒有錢

用。泰東依然沒有和我們議正式的薪水，在初我還有錢的時候是用着自己的錢；但我自己的錢因為初帶家眷回上海，不免要新置些東西，用不許久也就告罄了。到那時候自然也跑到泰東去，十塊五塊地要。說起要錢，雖然是自己應得的報酬，總覺得在討口的一樣，有些可恥。十塊五塊的錢，在上海的幾個人是用不上幾天的。達夫和仿吾的潔癖比我更還厲害，要錢時大概是叫我去破臉，我的脚自然也就有些羞澀，當去三次的至多只去得兩次。在這兒便誘導出了一個重大的龜裂。

是在九月初旬的時候，上海有一部分的老同學們在消閒別墅燕集，席上有中華新報的主筆張季鸞，他從前是住過一高的人，所以在我們要算是先後同學。他在席上對我說，要我們分點餘力來替中華新報每天編一項文學副刊，編輯費每月一百元，編輯的篇幅是半面報紙的二分之一，編輯的全權全盤委託給我們。我當場保留了考慮的餘地，只是答應回去同達夫仿吾商量好之後再作正式的答覆。

在民厚南里商議的時候是在晚上，除我們三個人之外，有陶晶孫和何畏，他們是在暑假中回國來，不久便要轉到日本去的。

我的意思是拒絕。理由是中華新報是政學系的機關報，政治上的色彩不好；中華新報的銷路當時在上海市面上只能銷得三兩百份，而我們創造社的週報初出版時每版三千，後增印至六千，還要屢次地再版，犯不着去替他們推廣銷路；還有是我們編週報和季刊已經疲於奔命，再添上日報，終是沒有力量顧及

的。

仿吾和達夫是贊成接受。他們的意思是文學研究會有時事新報上的學燈，在旁系上有北京的晨報副刊，上海民國日報的覺悟，我們總得有一種日刊來對抗。其次是季刊和週報的標準太高，外來的投稿百分之九十九以上不能採用，因而失掉不少的讀者，應該要有一種日報來做尾閘，以銷納外來的投稿。其三是編輯的全權在我們，他們的政治色彩自然把我們沾染不到，並且有一百元的編輯費也是些少的生活上的補助。

晶孫和何畏是要往日本的人，他們客氣着沒有發表甚麼積極的意見，但在語氣之間是贊成接受的。就這樣在五個同人的會議中就剩下我一個人，在反對，結果是我服從了多數，但同時的決議是日刊由達夫仿吾均吾負責，我的力量多用在週報方面。日刊又定名為創造日，這是我提議的名字，那標題畫的木版畫在黑暗之中閃出了一些電光的，也是我畫的。

就這樣在那九月中旬便有創造日的誕生。

在這兒又要加上一段光榮的插話。創造日誕生的預告是在中華新報上登了出來的。在那要出版的前一天，商務印書館的高夢旦先生又請我到他公館裏去晚餐。男客有楊端六、鄭心南、何公敢、周頌久諸先生，都是在商務任着職務的同學。端六先生誰都知道是英國留學生，在商務管着銀櫃子的人，但他在前是

在日本留過學的，而且是岡山六高的出身，照着西洋的話來說，我們是同一個「母校。」女客有端六夫人，還有兩位女士我不記得名姓。主人除夢旦先生之外有振鐸和振鐸的未婚妻，夢旦先生的第二女公子。我由夢旦先生的介紹才知道振鐸「招了駙馬，」或者那天的晚餐，就是婚約的披露宴罷？

夢旦先生把我和端六夫人坐在首席上，夫人坐在我的左邊，因為要和坐在她左邊的端六先生連席。我的右邊又坐着兩位未知的女士。夢旦先生大約是看見我是名詩集以女神，並做過卓文君一類的作品的人，以為定是一位女性崇拜者，所以才那樣安置我的罷？但我的位置一嫩起來——這個奇字是我新造的，暫且假定它為騮字的異體罷——委實是有點左右做人難的苦況。

席散之後，心南邀我到他的寓所裏去，他對我說，振鐸是他族上的一位族孫，人很聰明，也很用功，目前雖然幼稚得一些，將來是很有希望的。又說，這次的婚約是振鐸請他去說合的，夢旦也很喜歡振鐸，說他的女兒配不上他，只要振鐸喜歡，自然是情願。又說夢旦的幾位女公子中，長女公子最有學問，見識也很高，其它的便遠遠不如。心南以他那族祖而兼月老的資格向我委委婉婉的說，我雖然呆笨，但同時是感覺着高夢旦先生的一席晚餐，是對於我的一個箝口令。物質的通性有一項是：一個空間不能容兩個物。夢旦先生把那很可口的福建菜充滿了我的口腹，自然會把我口腹中的話從反對的孔穴裏逼進毛房裏去的。但無如夢旦先生對我的估計，是作了過高的評價。夢旦先生以為我是創造社的代表，創造社同人的主張我是

可以左右的。其實我並沒有那樣大的本領。拿學級來說，仿吾是早我一級的，日本人的習慣是稱爲『先輩』。達夫資平雖和我同級，但我因回上海鬧創造社的事情停了半年的學，畢業在他們之後，所以他們也要算是我的『先輩』。我以後來者而居上，是因爲我在國內的文藝界上比他們早出了一兩年的風頭，在創造社的醞釀期中，我比他們多跑了一些路子。因此外界的人通有一種錯覺，以爲我是創造社的『領袖』。其實像創造社的那一批『天才』，除掉以友情爲聯繫之外，絕沒有任何人能以『領袖』的資格來統率的。在我自己始終是只有犧牲我自己的主張去服從友誼，我決不會以我自己的意見來壓迫朋友，我們的朋友中任誰那一位也都是不甘願受壓迫的人。我從前說過些唯美派般的話頭，說『毒草有美麗的色彩，也可以娛目暢懷』（創造季刊三期上的一段漫衍言），那是達夫在受着京滬兩地的批評家責罵，我說來擁護他的；在我自己實在並沒有那樣的資格。又譬如仿吾，他是心直口直筆直手直的人，我假如要勸他稍稍妥協一下，那他一定會先把我罵倒。所以我雖然多謝了夢旦先生的極誠懇的兩次的晚餐，我自己的口雖然可以箝——我自己從不曾罵過振鐸，雖然也不曾恭維過他，——無如夢旦先生沒有同時請我的朋友。

創造日出版了，照着最初的決議是達夫、仿吾、均吾三人主持，一百元的編輯費也是由他們三人分用的，達夫用六十，仿吾和均吾各用二十。達夫有了那每月的六十塊錢，算好，使他產生了那還鄉記、還鄉後記，以及未完成的蘇州煙雨記的傑作。達夫那時候怕是創作慾最旺盛的時候，他的筆調很快，仿着日本式的新聞連載小說的辦法，文稿是每天寫一段，寫好便拿去付排。在他的蘇州煙雨記剛好寫了兩次（？）的時候，北京有電報來了。

北京大學的陳啓修先生——就是近年的陳豹隱——要到俄國去留學，在北大所任的有兩個鐘頭的統計學要請達夫先生去擔任。

達夫接着這個電報的時候我們又在馬霍路的樓上商議過一次。我的意思是勸他沒去，因為到北大去當講師，在那兒的分門別戶的幾種既成的勢力之下沒有發展他的才力的可能；又因為他是創造社的一根撐天柱，他一走了，季刊、週報、創造日便很難維持。但是仿吾是贊成他去，他說：『我們通集中在這兒也沒辦法，現在要用散兵線，散到各處去開拓。』

我說，「那嗎，幾種刊物怎麼辦呢？」

出乎意外的是達夫說了這樣的一句話：「最好是停辦！」

我聽了覺得有點傷心，就好像費了幾年的心血養成了幾個兒子，要一刀把他們斫成兩段的一樣。我又說，「到了北京不好再寄稿來嗎？」

達夫更決絕地說了一句，「不停辦我是不寄稿的！」說得有點聲色俱厲的程度。

我碰了一個大釘子，才感覺到我自己招了朋友的厭棄。仿吾沒有說話，我自己也就沒有再說了。

那時候我大的兩個兒子正在過麻關，第三個幼兒也得着痢症，我和我的老婆在民厚南里的前樓上守着三個病兒，有好幾晚上是沒有睡覺的。達夫在要動身的前夜，泰東書局替他餞行，晚間幾位朋友更在振華旅館裏開了房間爲他惜別，我守着病兒沒有出席。但到第二天要開船的時候，我是跑到船上去和達夫握了別的，他拿了幾個金山橙子給我，說「拿回去給孩子們吃，」我聽了幾乎流出了眼淚來。

達夫在要動身之前，還做過一篇小說叫離散之前，那是達夫最得意的文章，他自己說過是他平生的傑作。那篇小說是在東方雜誌上發表過的。也要算是在創造社同人中開了賣稿的風氣之先。那是預言着創造社之將離散而當成事實寫着的。預言在幾年後自然是中的了，但事實和小說卻是兩樣。那裏面的鄭海如，誰都知道就是郭沫若的漫畫化，把他描寫得十分忠厚——在民厚南里的樓下一張方桌上，把出

了幾期的季刊供奉起來，點了一對紅燭，鄭海如跪在地下，大呼「藝術之神」，磕了幾個響頭。原來我在朋友眼中看來才是那樣的一位忠厚長者——我想魯迅先生一定是要大反對的。不過在達夫走後，創造社還沒有即行分散，因而那篇離散之前在還沒有機會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之前，便已經離散到東方去了。

達夫一接了北大的聘，於是乎那篇蘇州煙雨記也就因「作者臥病」而中輟。以後的創造日是仿吾和均吾負責的，一百塊錢也就由他們兩人分用。創造日經達夫一走自然是減色不少，又因我沒有本事兼顧，惹得張季鸞說是「大將不出馬」，然而政學系的大將章秋桐卻到上海來出馬了。

那位紙老虎在十月尾上到了上海，在時報上做了些抨擊白話文的文章，又在研究甚麼「墨經」，把上海的文藝界弄得有點稍稍的墨而且黑。中華新報和泰東圖書局是政學系的兩個私生子，不消說也是章老虎的勢力範圍。在泰東方面受着他的意旨，便有出文言的中小學教科書的計畫——這個計畫似乎是因為沒錢的關係，沒有實現。中華新報出着白話文的創造日，在我的揣想中早遲是難免要停刊的了。

說起辦創造日，仿吾委實是費了不少的心血。中華新報的排字工友和校對員的程度太低，仿吾每天晚上都要親自去校對，遇着有外國文字的地方還要親自去檢字排字。仿吾的右膝關節是患着柳麻迭斯的人，他走起路來都不大自由，自從達夫走後，天氣漸漸寒冷了起來，看着他在晚上一個人去登報館，覺得

有幾分悲壯，同時也覺得有些難忍。我到後來，有時候也陪着他去，在我最初說出這樣的話時，他很淒切地笑着說，『你也去嗎？』——他那簡單的一句話使我覺悟到，我以前沒有陪伴他們同去，大約就是使朋友厭棄我的原因，我自己是失悔莫及的。

達夫去後，委實是言能顧行，他一直便沒有文稿寄來。他有工夫在晨報副刊上投稿，在太平洋雜誌上投稿，但是創造社的幾種刊物似乎已經被他忘在腦後了。三個人分擔着都感覺着吃力的工作，剩着兩個人來做，自然是愈見捉襟見肘的。每天要文稿的創造日，起初是視為銷納外來稿件的尾閘，其實才是一個愛吃甘旨的饕餮，外來稿件不加減一下鹽梅，它是不肯入口的。為我們驅除了這個饕餮的，怕應該還是要感謝我們的老虎。

十二月的中旬的一天清早，中華新報的總理殷柱夫先生到了民厚南里的我們的寓所裏來。他講到報館的經費支絀，能夠的時候希望我們把創造日結束起來。殷先生說這話時很客氣，怕的得罪了我們，其實他不曾知道他的話正是救命的符籙。我保留着攷慮的意思，在第二天清早回答，他回頭便告辭走了。在他走了之後我和仿吾商量起來，仿吾也贊成停刊。剛好創造日滿了百期，於是乎那個孩子便在一零一號上天折了。

創造日停刊後，可算鬆得一口氣，但說也奇怪，那一停刊卻也增加了創造社的蕭條的氣象——至少

在主觀上是這樣感覺着。創造週報已成了強弩之末，失掉了它從前的刺激性。季刊出到第五期以後便很難繼續。有些人勸我們改改口味。仿吾的大哥在那時候由廣東到過上海來一次，也勸我們把方向轉換到政治方面。這是當時社會上的一般的要求。在歐戰期中中國的資本主義雖蒙受着頻年的內亂，但也看到了它的暢茂的發芽，上海天津的紗廠有一個時期如像雨後的春筍一樣簇生了起來。但自歐戰結束了以後，歐洲資本主義的勢力，捲土重來，把那簇生起來的春筍幾乎全部都拔了起來進了油鍋。中國的覺悟了的人在這兒明白地看見了那無形的帝國主義的勢力，覺悟到中國如不抗拒帝國主義，就連民族資本主義都不能夠發展。便是一般近視眼的人們也看到中國的內亂妨害了中國的產業。因而政治問題便成爲一般社會人的意識的焦點。這在我們身上所生的影響，便是社會的要求不再容許我們籠在假充象牙的宮殿裏面談純文藝了。我們自己也感覺着這種必要，但我們卻沒有轉換的能力。

在這時候達夫從北京寄了一個消息來，便是太平洋社的人想和我們合作，打算把太平洋雜誌停刊，和我們同辦創造週報，前半政治，後半文藝，政治的一半由北京編好寄來，由我們在上海加上文藝的一半，付印出版。這個求婚的提議本是極投時好的，而且也特別看重了我們，我們如稍稍聰明一點，一定是無條件地接受了。但在這兒又是我和仿吾的潔癖誤了事，太平洋社的那些英國回來的學者，我們總覺得他們是太紳士了一點，說壞些便是官僚氣味太重，一時好像合作不來；又加以用文藝來做政論的附屬品，是

我們出馬時所最反對的辦法，雖然時勢變了，也覺得不好立地拋棄。在這兩種的顧慮之下，我們提出的辦法是，週報由兩社的人輪流編輯，一期政治，一期文藝。但這個提議卻失掉了合作的主要意義，——想借文藝做調劑以推廣政論，因而便沒有得北京方面的同意，事情也就擱置了。

合作不成，轉換方向又沒有能力，週報的出版只是在一種惰性的習慣之下維持着。在那樣的情形之下已經是意思索然的仿吾，因為他的大哥在廣東，早便存着了南下的心事。而在我自己更要加上一層家小的束縛。

我的日本老婆自從回到上海以後，她便很少開朗的日子。生活自然是和她所想像的『幸福』完全背馳，第三個幼兒的消化系統的疾患，實在是最大的累贅。住在日本時小兒一有病痛便抱進大學病院去。醫生是最可信任的先生，醫費是一文不取的（因為是學生的眷屬可以免費。）回到上海以後情形便完全不同了。中外的醫生沒有一個敢信任，醫費也貴得驚人。假使是有錢倒還沒有什麼，但在過着奴隸加討口子生活的人，連坐電車的車費都時常打着飢荒的。老婆因此便時常吵着要回日本，她要顧着幾個肉體上的兒子們，我同時也不能不兼顧着幾個精神上的兒子們。她帶着三個兒子們回日本，獨立地是不能生活的，除非實際地討口，所以那便是要逼着我把創造社的全部拋棄。這是一個重大的衝突，因此在家庭中便免不了時常在鬧着風波。

在我自己的思想上也正感受着一種進退維谷的苦悶。我自己在初便是有些左傾病的人，在出過報時又吼過些激越的腔調，說要『到民間去』，要『到兵間去』，然而吼了一陣還是在民厚南里的樓上。吼了出來，做不出去，這在自己的良心上感着無限的苛責。我從前的一些汎神論的思想，所謂個性的發展，所謂自由，所謂表現，無形無影間在我的腦筋中已經遭了清算。從前在意識邊際上的馬克思列寧不知道幾時把斯賓諾莎歌德擠掉了，佔據着了意識的中心。在一九二四年的初頭列寧死的時候，我着實地感着悲哀，就好像失掉了太陽的一樣。但是馬克思列寧主義我是並沒有明確的認識的，想要檢討那種思想的內容是我當時所感受着的一種憧憬。

年假期中伯奇回到了上海，他那時正在熱心着他所提倡的『國民文學』。那個概念是很模糊的，他自己也很模糊，但在仿吾和我已經是筋疲力盡的時候，便率性讓他編輯了幾期。那幾期，我現在可以明白地說，要算是創造週報的最消沉的時候。伯奇在二月底才回日本，我便起了一個決心請他把我的家小送回福岡去。我待週報辦滿了一年之後再往日本，也好讓仿吾決心南下。

在那時我自己的確是走到了人生的歧路。我把妻子送走了之後，寫了那歧路三部曲，盡性地把以往披在身上的矜持的甲冑通通剝脫了。人到決了死心，唯物地說時，人到不要了面孔，那的確是一種可怕的力量。讀了我那三部曲的人聽說有好些人爲我流了眼淚。就是我們的達夫也受了感動，他把我們的舊誼

又恢復了起來，他從北京寄來了他那篇北國的微音，那是他去上海以後在週報上所發表的唯一的作品。我們一決定要分離了，秦東自不免起過一下恐慌，南公老板也費了好些唇舌來挽留我們。他說以後要爲我們定薪水，我是有家眷的人自然要多用些，定一百五十；仿吾是單身，只定一百。以前的積欠作爲股票，我一千，達夫六百，仿吾四百。這樣的話他不只說過一次，但從不會見諸實行。像那一千，六百，四百的話待我去了日本之後，他在寫給我的一封長信上都明白地提起過的。——在這兒我算又替魯迅先生輩提供出了一項史料：便是郭沫若輩還是秦東書局的大股東呢？南公的那封信，我的老婆還很鄭重地替他保存着的，大約她是想借她的帝國主義的背景來收回那筆陳賤的罷？所以假如有人見了我這項史料還要懷疑，以爲我是在自由創作，我隨時都可以破點鈔，把那原信的照片提供出來的。

烽火台的諸侯畢竟只能戲弄得一次。更公平地說，我們之爲秦東服務，其實又何嘗不是想利用秦東。像孤軍社的人想出雜誌，不怕他們都是商務的編輯，並且還有些是佔着重要位置的人，卻不找商務而要秦東，他們的目的就是要多說幾句硬話。替商務辦雜誌的人，是連半句硬話都不敢說的，如有人肯高興去問雁冰先生，他便知道得最明白，他爲這件事情便是上過當來的人。我們在創造社的刊物上也算說了不少的硬話來，那些刊物假如是出在商務是怎麼也不能辦到的，所以這些地方也正該應該感謝秦東。創造社的人要表現自我，要本着內在的衝動以從事創作；創作了，表現了，不能不要發表的地方，所以在他

們的那種迷夢正酣的時候，泰東書局無論怎樣苛刻他們，對於他們是有效用的；夢一醒來，暫時不想那樣去表現，不想那樣去創作了，失掉了效用的泰東便只留下苛刻。

創造社的決計和泰東脫離，可以說是一種革命，是奴隸對於奴隸主的革命。在這場革命中達夫要算是最先覺，我是足足後了他半年，仿吾又是爲着我而後到了半年以上。本打算辦滿週年才走的我，但在路向一決定了之後，終耐不過再作勾留，便率性提前了一個月，在四月初頭上便離開了上海。

我走了，暫時沒有發喪，週報還由仿吾一個人支持了一個月。但是停刊的消息是早報告了達夫的。達夫在我離開了上海之後，他在四月尾上由北京趕到了上海，趕着在週報的最終號中挾了一張預告，是太平洋社和創造社的共同的預告。預告着兩社將合辦一種週刊，就是後來的現代評論，在最短期中將與讀者見面的話。這個預告當然是得到仿吾的同意的，事後我也得到達夫的一封信來向我提及。但我在福岡接着了最終號的週報並同時接着了那張預告的時候，我痛痛快快地把我從前的不值錢的眼淚清算了一場。在這兒我和達夫的感情自不能不取着對蹠的方向：在達夫方面或者會說，我們的密斯創造臨到彌留的時候，由他度了一口氣便復活了轉來，更嫁給了高門；而在我的一方面，始終是覺得那位可憐的姑娘夭折了還受了一次屍姦。

創造十年續編

(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年)

此
页
空
白

創造週報的停刊是一九二四年的五月中旬，但我在四月一號便離開了上海，後事是由仿吾一個人把它結束了的。

在離開上海之前還有一個很執拗的記憶留在我的腦裏，我現在藉着這個機會把它先清算在這兒。近代的精神分析學家們說，所謂『遏斯迭里』(Hysterie)的那種病症，是因為在前有種種不愉快的經歷，一時被意識界的生活把它抑制到潛意識界裏去了，它便在潛意識界裏鬱積着，使人的精神生出種種的障礙，充其極可以使人成爲瘋狂。治療的方法是要施行“Chimney-washing”，便是『煙囪掃除』。這是把人的精神比成煙囪，把那些鬱積着的不愉快的經歷比成煙煤，煙煤把煙囪閉塞了，爐灶便生出毛病，如把那煙煤掃清，毛病也就同時被掃除了。掃除這人體煙囪的方法是怎樣呢？是用種種誘導的方法，或甚至如催眠術之類，以喚醒病者的那些不愉快的記憶，讓他從自己的口中吐出來。那樣便使人的意識清明起來，漸漸地回復到健康狀態。

『遏斯迭里』這種病，在從前以爲是女子的專病，但在歐戰當時發生了所謂『戰壕病』，是對於戰

爭的恐怖使人的精神生出異狀的，才知道男子也有得這種病的可能。其實廣泛地說時，我看一個民族或社會都是可以得這種病的。民族遇着了種種的高壓，經歷過久，把種種的不愉快，主動地，被動地，壓到潛意識界裏去，漸漸地招來民族的萎靡，頹喪，互相猜忌，互相殘刻，結局是不為異族所吞併便釀成革命的爆發。革命的爆發也不外是一種自然療治性的「烟囪掃除」。但這掃除來得劇烈，其趨勢是要把煙囪乃至爐灶本身都爆破，這便應着俗語所說的「另起爐灶」。所以開明的行政者對於民意是因勢利導的，民意得到暢達，社會也就健全地發展了起來。古人說「上醫醫國」，我看的確是道破了一部分的真理。那種善於「醫國」的「上醫」就是能够對於民族的「遏斯迭里」症及早施行「烟囪掃除」的治療的。

文人，在我看來，多少是有些「遏斯迭里」性的患者。古人愛說「文人相輕」或「文人無行」或甚至說「一爲文人便無足觀」。這對於文人雖然不免作了過低的評價，但事實上多少也有些那樣的情形。尤其在整個的民族受着高壓的時候，文人的較爲銳敏的神經是要加倍感受着痛苦的。許多不愉快的事情遏在心裏說不出來，一個烟囪塞滿了烟煤，滿肚皮養化不良的殘火在那兒薰蒸，當然是要弄得彼此都不愉快的。在這兒我贊成一切的文人把自己的不愉快的記憶，儘可能的吐瀉出來，那是使自己健全的一種方術，同時也是使社會健全的一種方術。文人要把自己弄健全了，然後纔能够完成文藝底社會的使命。

一味地吐瀉着烟煤，對於旁人，或許會是一種患害。但那不過是比喻而已。事實上所清掃出的記憶不

必便是烟煤。即使是烟煤，但松烟可以做墨，冶銅廠的烟可以提取金銀。所謂竹頭木屑，皆為有用。即使是完全無用，總比烟囪閉塞着專吐炭酸瓦斯的毒氣的好些。

是那年的三月中旬了，中華學藝社要在杭州開年會。我自己在那時是一位掛名的幹事，社友們定要叫我出席，而且還要叫我講演。關於講演，我是一點自信也沒有的人，不僅沒有自信，而且還着實有點害怕。因為站在大衆的面前要作為一種號筒，而大施教訓，那如不是品行學識都是俯仰無愧的智者，便是完全或多少不知道慚愧的騙子。自己和智者相隔着的距離不用說是奚啻天淵，而要成為那樣的一種騙子，臉皮又像還薄了一點。因此我對於出席一層是答應了，而對講演一層則始終不敢應命。

由上海北站出發是在一天禮拜六的晚上，坐最後的一趟晚車。但不料住在民厚南里的我，稍微誤了一下鐘點，趕到北站時，火車已經開了。糟糕！朋友們不會說我故意失信嗎？於是在第二天的清晨一早又搭着最早的一趟早車趕去。記得在硤石停車的時候，我到月台上去舒散了一下，不勝光榮之至的是在那兒還遇着過般汝耕，他也是要去赴年會的。但他坐的是二等，我坐的是三等，互相招呼了一下，又各自分開了。到了杭州，在湖濱旅館會見了學會的幹部，知道一切開會的手續和工作的程序都已經決定了，而且登了報。大略是在當天禮拜日，假教育會的會場開總講演會，由物理學專家周頌久講演相對論，另一位新由德國回來的姓聶的朋友講演德國的現狀。在第二天，禮拜一，派人到各學校去分講，大體上都已經排定

了。還有兩處沒有把人派定，一處好像是工業學校，一處是蠶桑講習所。主事的人怪我去得太遲，說我是有意迴避，定要叫我分講一處。我沒有辦法，只好選擇着學生較少的蠶桑講習所去擔任分講。工業學校是由殷汝耕擔任的。

杭州是一九二一年四月回國的時候，同仿吾兩人去遊歷過的地方，但因人地兩疎，只在西湖邊上玩了一下便算了事。這次，在總講演之前，才跟着大家去遊覽了一次棲霞嶺，觀賞了飛來峯，隨喜了靈隱寺，但在自己心裏是橫互着一個憂鬱的。爲着文藝生活與現實生活之不能兩全已經和妻子分離了，而且在不久之間更要把年來的工作通同放棄，和最相契的朋友也不得不分離起來，遊山玩水的樂趣怎麼也克服不了自己的牢愁。

總講演是在午後二時開講，中午時分在教育會的樓上招待着杭州的名流一同用了午餐之後，大家的注意力自然便集中到講演會場上來。一切的佈置都是停當了的。會場很宏大，樓上樓下怕可以容納一千人以上。但出乎意外的是來聽講的人異常的冷落。一點鐘過了，只稀疏地有幾個人來，來的人看見沒有後繼者，坐不一會又絡繹地退出去了。就那樣等到了兩點過鐘，依然沒有人來，弄得主持的人異常不舒服。眼睛們見到我時往往是白多黑少，這使我也不勝其覷束起來。

『就是你不好了，你要迴避。』我的一位在日本高等學校的同班，范允臧，在樓上一間臨街的屋

子裏，這樣責備我，他也是學藝社的幹事，而且是負着責任的。

——「怎麼怪得我呢，」我反駁着說：「我本告訴過你們，我是不能講演的。而且沒人來聽講，我相信是因爲禮拜日大家回家的回家，玩耍的玩耍去了；你就叫我去出馬，也不見得會有人來。」

——「只要你肯出馬，一定會有人來。」允臧堅決地說。

旁邊有一位在杭州任教職的社友也這樣幫着他，據他說是講題不能引起學生的興會，假使由我去講演一點關於文學上的東西，一定可以「叫座。」

對於講演已經是沒有自信的我，對於文學上的演講是尤其沒有自信的。因爲我自己雖然在做做詩，寫寫小說之類的東西，然而對於所謂「文學」實在是個外行。我自己並不會把文章來當成學問研究過（我學的本是醫學，）拿什麼東西來對人講演呢？

但聽講者既沒有人來，講演是不能不延期的，問題畢竟是集中到我身上來了。

——「無論怎樣你非講不可！」

——「講演，一點也不困難，一上台便會有話出來的。」

——「只要你肯講文學，一定有人來聽講。目的是在號召聽衆，只要有人來聽講，你就講得不好，還有兩位也可以補償的。」

大家都把講演會的失敗來歸罪於我，我受不過朋友們的責難和勸誘，便也放下了決心，答應去做一次塞克斯的小丑。結局是把講演會改到了第二天下午，加上我一名講演文藝之社會的使命，重新在杭州各報登出消息，更由教育會の後援請求杭州各學校在第二天放半假，事情便這樣決定下去了。

允臧本是上虞人，杭州是他少年時代讀書的地方，他看見我答應了講演，當天下午便和另外一位姓鄭的社友，把我引到萬松嶺一帶去遊覽，由九溪十八澗折至錢塘江邊，登過那兒一座臨江的垂危的木塔。晚上走到閘口，觀光了那兒的有名的『江山船』很遲的坐着火車才回到了杭州。

第二天清早吃了早飯，允臧又約着鄭君和我坐汽車去遊覽花塢。我愁着下午的工作，很想一個人留在旅館裏作一番靜靜的思索，但允臧說，花塢很清靜，在講演之前倒寧是去舒散一下，增長自己的興會好些。

花塢在西湖背後，那兒的確是清靜。由馬路插入一段荒僻的背徑，便到了那個遊跡罕至的地方。地在兩山之間，中有一道溪流，兩岸是深深的竹林。裏面有許多庵堂，聽說在前都是尼庵，但尼姑通已經解放了。在那流水琤琮的溪邊上走着，允臧大約是感着了濃厚的詩意吧，他問到我的筆名的意義來。問我『沫若』(Mo Jo)兩個字，是不是取自佛經的『如夢幻泡影』那樣的意思。但我的名字其實本是『沫若』(Mei Jo)，是由我的故鄉的兩條河，沫水與若水合攏來的，司馬相如的喻巴蜀檄裏有『關沫若』的一句，便是那兩

條河並舉的開始了。

允臧又談到他往年夏天一人遊過花塢，遇着一位姑娘在自己前面走着，身裁很美好，但總不掉過頭來；一直走到花塢的盡頭，走進一家別墅裏去了。他這一席話，我倒感覺着頗有些水月鏡花的意味。

沿着溪邊朝上走去，快要到盡頭處，路邊上有一座小庵子，名叫白雲庵，我們走進了裏面去。佛堂前面擺着有兩盆素心，正在開着花，吐着令人沉靜的清香。但從裏面走出的卻是一位中年的和尚。他很慇懃地獻了我們各人一杯茶，又向我們講了一番蘭經。

從白雲庵走出，再往上走，走不好遠，在那盡頭處果然有一家別墅，有白色的高牆圍着。允臧說：這便是那位姑娘所走進去的地方了。別墅門是緊閉着的，門前有一個月台，立在那兒眺望，花塢的全景都呈在眼底。存了好奇心，大着膽子去敲門，但裏面沒有人應門的。繞到屋旁去，看見牆次有一道側門開着。門內是廚房，有好些人圍坐在那兒講話，看那情形知道是看守人的家屬和鄰近的農民。我們走進去，道了來意，說要拜望主人，瞻看別墅的內容。那兒的人回答着主人不在，屋內可以儘我們去看。我們便被引進了那兒的中堂。詳細的情形現在已經不能記憶了，只記得正中有兩排棹椅的陳設，而尤其印象深刻的，是在中堂的右翼放着一架和冰河時代的『莽孟斯』遺骨相彷彿的——風斗！

從花塢走出，又坐着乘來的汽車回到西湖，在湖裏的一家菜館裏面吃中飯，允臧特別叫了一樣西湖

所獨有的菜，叫着『醋魚帶柄』。那是用湖魚去骨去皮，切成片子，染以薑醋汁生吃，而別把皮骨之類烹來熟吃的。菜名和菜的本身都很奇拔，但吃起來並不怎麼可口，大約也是自己心裏在愁着別種事情的原故吧。講演的時間，刻刻地逼來了，然而腹稿仍然沒有打好，自己卻起了一種不好對人說的僥倖心，希望到了講演的時刻也和第一天一樣，沒有聽講的人來。

時刻終竟挨近了，允臧一直把我引到教育會去。這次又是出乎意外！昨天聽講的人寥寥無幾的，今天卻是川流不息地湧來，在未到時刻之前，那宏大的講堂裏，樓上樓下都被人坐滿了。允臧把我引上了樓，社友們都是喜氣洋洋的，有的連連在叫着『大成功！大成功！』很沉着的允臧，他也向我誇負着他的先見來，說我是把昨天的罪過補償了。然而我卻弄得愈見驚惶失措。怎麼辦呢？愈想愈着急，愈着急腹稿愈見理不出一個頭緒。講演的招標上，又把我寫在第一名。捱頭刀的便是我，這怎麼辦呢？時間終竟逼來了，只好請講相對論的周頌久去打頭陣。大家要我出場去，在講演台上坐着，我也推卻了，想在樓上多捱一點時間，調整一下自己的着急。

樓下的拍掌聲起來了，相對論已經開了頭。走到樓頭去窺伺了一下，只見頌久在講壇上步來步去，妙喻取譬地，講得頭頭是道。滿場的聽衆都肅靜無聲，聽得十分的專一。這一窺伺愈見使自己不能安定，自己是毫無經驗的，那能够作爲承繼頌久的下手？自己想要說的話，僅僅是由搜索枯腸而來的一些支離滅裂

的野狐禪，那能够和那嚴整的理論系統相對論相對？『文學』要死在我口裏了！失悔太不自量，要把補講的事情承應了下來。這一慷慨，真真是有點慷慨『文學』之慨。糟糕！怎麼辦呢……

頤久講了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允臧上樓來催我下去。

——「想說的話一點也沒有整理好，一定要失敗的，怎麼辦呢？」

——「不要緊，你若無其事地鎮靜着，當作像沒有人在你面前的一樣。」

允臧見我着急，便盡力鼓舞我。他並且說：你講的時候，我要雜在聽衆裏面去，講到好處，我便替你鼓掌。推諉是無從推諉的了，只好到下面去。在那比聽衆高一段的講台上坐着的時候，心頭只是囊囊地跳。相對論！你再講長些，再講長些，不要立刻便輪到我名下來。唯一的希望，隨着跳着的心搏在那兒跳。

頤久講演了一點鐘的光景，在熱烈的鼓掌中終竟結束了，我也就受着指揮，被立在了一千人的聽衆的面前，左右還有和陪審官一樣的名流們陣列着。

關於新興文學的理論，在當時是完全沒有接觸的，自己所說的究竟是些什麼現在已經不記得了，但總不外是從拉斯金的藝術經濟論，葛羅舍的藝術原始，居約的由社會學上所見到的藝術那類的書上所生吞活剝地記下來的一些理論和實例，更加上一些半生不熟的精神分析派的見解，一方面是想證明文藝的實利性，另一方面又捨不得藝術家的自我表現，就像先打了一碗泥水，再倒了些米粉、麵粉、豆粉乃至

石灰粉，所火迫地拌攪出來的糊漿一樣，把來向那滿堂的聽衆頭上淋洒了下去。那可不得了！聽衆在開始的十分鐘光景，都還能夠忍耐，但漸漸地便動搖起來了。自己所向人淋洒着的是那種不明其妙的糊漿，自己也是明白的，心裏在感覺着內咎，聲音怎麼也就提高不起來。聲音不能提高，聽的人也就愈見着急，最後的幾排裏面有擦腳的聲音起來了，接着是有幾個人退場，接着又是十幾個，幾十個，幾百個，沒有三十分鐘的光景，全場的人退了三分之一。人一稀疏了，雜在聽衆裏面坐在最後第二排的允臧，孤影悄然地也就印到了我的眼裏來。我看見他那爲我頹喪着的神情，幾乎流出了眼淚。不用說允臧的手是最初替我鼓了的，但是，是在我講了有四十分鐘的光景，把那昏水糊漿的淋洒停止了的時候。

講演失敗後還由鄭君陪伴着到蠶桑講習所去也講演了幾十分鐘，但那次又講演了些什麼，現在是連題都忘記了。只記得那講習所是在西湖裏，地方很僻靜。講時已經傍晚，在一座頗幽暗的講堂裏雖然坐滿了人，但人數似乎不足兩百的光景。號筒是『曾經滄海，』失敗是『除卻巫山，』像在教育會裏的那一幕倒沒有重演。

「仿吾：

我離開上海足足兩個禮拜了，幾次想寫信給你，但總不容易執筆；隨便寫幾句平安的報告，我覺得沒有寫的必要；待要寫長時，而我想寫的又太多。本打算在週報辦滿了一年之後纔走，但終竟提前了四五個禮拜跑到了海外來，把一切事情都推在你身上。這是使我心裏異常不安的。我每晚幾乎都要夢見你，夢見和你商量週報的後事，但我現在實在無能爲力了……

你到廣東去的時期定妥沒有？

此地的櫻花正在盛開，但是春天不是我的。我寓所裏小小的庭園中有一株粉紅的茶花，已經將近殘謝了，聽見一朵殘花墜地的聲音，使我化了石的心也時起動悸。

我半月以來只在譯讀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總怕還要三個禮拜纔能完工。

我現在有一個維繫着生命的遐想，我把研究生理學的志望拋棄了。

明天是拜倫的死期了，但是我的文章還沒有做。我一時想起他轟轟烈烈死在海外的精神也很激起了些追慕的心事，但我又想起他是貴族，他有錢，有幸福，他的世界終不是我的世界。

週報久不見寄來，大約是已經停刊了。想起在上海的一年真是一場迷夢……」

這是在週報將停刊時，由日本寫給成仿吾的第一封信的摘錄，信上署的日期是「四月十八。」全信在創造週報的終刊號上登載過，在泰東出版的沫若書信集裏也有收錄。

我自從四月一號離開了上海，仍然跑到住過了五年的福岡，是住在箱崎海岸上的一家面海的屋子裏面的。屋子相當寬敞，背後有一面寬敞的園子，種着有好多花木。

再度跑向福岡的意趣，起初是相當複雜的。我自己對於生物學本是很感覺趣味的人。福岡的九州帝大的生物學教授石原博士又是我所敬愛的一位學者，我聽過他的生理學總論、遺傳學、內分泌學等的講義，相當地引起了我對於那些學問的向往。我和博士的個人的接觸雖然不會有過，但他對於我的印象卻頗像一位深通禪理的高僧。矮小而瘦削的他，在演講時總是把眼睛閉着的，讓他那頗有溢味的聲音不急不徐地流出。生理學總論是醫科學生第一年所必修的科目，他在最後的一點鐘上曾經離開了講義說到他自己的私生活上來，作為對於我們的示範。他說：近時的學生好美衣美食，食事愛在「卡羅里」（熱量）的多少上關心，但他自己是一位菜食主義者，已經素食了多年，然而精神也不見減衰。關於菜食的生理學上的根據，博士沒有說出，但他那簡單的幾句話，對於我卻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我自己早就是有過研究生理學的志望的人，很想以石原博士為師，把自己的一生作為對於自然科學的奉仕。但自己對於社會科學的要求也早是覺醒了的，就當時耳濡目染地所得來的一些關於辯證的唯物論的學理，覺得有好些地

方和生物學有甚深的姻緣，例如社會形態的蛻變說似乎便是從生物學的現象蛻化出來的。因此便又想一方面研究生理學，而同時學習着社會科學。但是科學家那種枯淡的生活是要有物質的條件來做背景的，自己的乃至一家人的生活全無保障，結局只是一張畫餅而已。

河上肇博士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本來是由他的個人雜誌社會問題研究上所已發表過的論文所纂成的總集，那平明而剴切的筆調曾風靡過日本的讀書界。他克服了他的論敵福田德三博士的不正確的理論，要算是日本的初期馬克斯理論的最高峯。社會問題研究，在發刊的中途我也曾零星地購讀過，因為沒有得到系統的本質的認識，印象是很淡漠的。但一得到了作者所自行編纂的總集，加上我對於社會科學的憧憬，更加上一家的生活迫切地有待解決之必要，於是乎便開始了對於它的翻譯的工作。

翻譯時用的是由上海帶來的用中國紙印的原稿紙，非用墨寫不可。寓中沒有桌椅，也沒有置辦日本式的矮桌，把一口中國式的皮箱拿來作了代替。硯台是沒有的，隨便檢了塊甌頭磨平，便當成了硯台。就這樣坐在草席上由清早起來寫到夜深，寫了有五十天的光景，終竟把那部二十萬字以上的大著譯完了。

那書的譯文會部分地在學藝社的學藝雜誌上發表過，後來又由商務印書館把它印行了，但發行不久便由出版處自己停了版，我自己手裏現在是沒有存本的，連那用毛筆寫的譯稿也歸了商務，恐怕是已經成了『九一八』的礮灰了。商務既承印了那書而又把它停了版的原因，大約是怕那書中所說的理論

對於社會上發生影響吧。那種影響的有無，我現在無由論定，但對於我自己是生了莫大的影響。同在一年寫給成仿吾的第二封長信上，有着這樣的話：

「我最初來此的生活計畫，便是遙譯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一書。這書的遙譯本是你所不十分贊成的，我對於這書的內容雖然也並不能十分滿意，如他不贊成早期的政治革命之企圖，我覺得不是馬克思的本旨，但我譯完此書所得的教益殊覺不鮮呢！我從前只是茫然地對於個人資本主義懷着的憎恨，對於社會革命懷着的信心，如今更得着理性的背光，而不是一味的感情作用了。

這書的譯出在我一生形成一個轉換時期。把我從半眠狀態裏喚醒了的是它，把我從歧路的彷徨裏引出了的是它，把我從死的暗影裏救出了的是它……」

（書信集一五九頁）

這是一點也沒有誇張的話，因為譯了這部書不僅使我認識了資本主義之內在的矛盾和它必然的歷史的蟬變，而且使我知道我們的先知和其後繼者們是具有怎樣驚人的淵博的學識。世間上所誣譏爲過激的暴徒其實才是極其仁慈的救世主。但那書也大有缺陷，便是原作者只強調着社會變革底經濟一方面的物質條件，而把政治一方面的問題付諸等閑了。尤其是那裏有篇專論，引用着賈買依加島的奴隸解放的事實以證明早期的社會革命之終必歸於失敗，我覺得是只看見事實的一面。美洲在被白人經營之前的社會狀態是還沒有達到奴隸制的階段的。白人侵入了，一時會施行人爲的奴隸制以經營資本

制的生產，後由人道主義的立場把奴隸解放了，而那被解放了的奴隸又回到了原始的自然經濟狀態。因此有一部分學者便把這個事實作為社會革命之不能早期施行的實證。這從奴隸一方面着眼誠然是無可否認，但如從白人一方面來觀察，美洲豈不是由原始的自然經濟一躍而成爲了資本制的社會嗎？故爾社會的進展如加以人爲的促進，在我看來，的確是有飛躍的可能。隋唐時代的日本輸入了中國文化時，由氏族社會一躍而入於封建社會的，也是有史實可據的另一個明確的證據。那人爲的促進便是政治問題，如拋棄了這一方面的問題，那就等於只講基礎醫學而不談臨床學，不僅違背了醫學的精神，且於人類的實際是毫無用處的。這便是我對於該書的不能滿足的地方。後來原作者的河上博士曾經寫過信給我，說他自己也不能滿意，在初版刊佈後便囑出版處停止了印行。原作者的學者的良心是足以令人欽仰的。在這兒，中國的出版處之自動地中止了譯文的發賣，雖然用意不同，卻是獲得了與原作者所企圖的同樣的效果。

我譯了河上博士的書不僅使我增長了關於社會經濟的認識，堅定了我的對於正確的理論的信心，而同時所產生的一個副作用，是使我對於文藝懷抱了另外的一種見解。

前述的給成仿吾的第二封信上，我這樣說過：

「我現在對於文藝的見解也全盤變了，我覺得一切技術上的主義都不能成其爲問題，所可成爲問題的只是昨

日的文藝，今日的文藝，和明日的文藝。昨日的文藝是不自覺的得佔生活的優先權的貴族們的消閑聖品……今日的文藝是我們現在走到革命途上的文藝，是我們被壓迫者的呼號，是生命窮促的喊叫，是鬪志的咒文，是革命預期的歡喜……明日的文藝：要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纔能實現。在社會主義實現後的那時，文藝上的偉大的天才們得遂其自由完全的發展，那時的社會一切階級都沒有，一切生活的煩苦除去自然的生理的之外都沒有了，那時人纔能還其本來，文藝纔能以純真的人性爲其對象，這纔有真正的純文藝出現。在現在而談純文藝，是只有在年青人的春夢裏，有錢人的飽暖裏，嗎啡中毒者的 Euphorie（迷魂）裏，酒精中毒的酩酊裏，餓得快要斷氣者的 Hallucination（幻覺）裏呢……」

（書信集一七五頁）

這些覺悟便是使我生出了「一個維繫生命的夢想，」「把研究生理學的志望拋棄了」的。我是想一方面仍舊繼續着自己的學藝生活，而在另一方面從事於實際的活動。這是決定了我日後的動向的，但在當時對於兩者都還沒有充分的把握，故爾仍只能稱之爲「夢想，」沒有想到那「夢想」的實現竟是非常的迅速。

把社會組織和社會革命翻譯了之後，在箱崎海岸上還替泰東書局盡過一次義務，是替王陽明全集做過一篇長序。我有過一個時代是王陽明的崇拜者。那是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一七年我在岡山第六高等學校肄業的時期。那時候因爲沾染了汎神論（Pantheism）的思想，崇拜着斯賓諾莎（Spinoza）歌德（Goethe），耽讀泰戈兒（Tagore）的詩，在中國的古人中則崇拜着莊子和王陽明。

莊子的思想一般是認爲虛無主義，但我覺得他是和斯賓諾莎最相近的，他是把宇宙萬彙認爲是一個實在的本體底表現，人當體驗着這種本體底觀念，視萬彙爲一體，摒除個體底私慾私念，以此養生則能恬靜，以此爲政則無爭亂。他倒可以說是一位宇宙主義者，而他的文筆，據我看來，在中國的古文中是古今獨步的。王陽明的思想雖然是以禪理爲本質，而穿儒家的衣裳，其實和莊子的別無二致。他把莊子的本體所謂「道」命名爲「良知」，一面主張靜坐，以求「良知」底體驗，一面主張實踐，以求知行合一的生活。儘管那出發點是有問題，但他的「事上磨煉」的那個主張，我看是把一切玄學家的偏蔽拯救了的。而他自己的實際，古時候所謂「經綸」也正是他的學說的保證。我在當年學過靜坐，耽讀過他的傳習錄和他的詩，後來雖然拋棄了，但我對於他的景仰依然是維繫着的。我相信，他終不失爲我們的民族進展中的一個傑作。所以泰東要標點他的全集，要我做篇序，我也就樂於溫理了一番舊業，但不用說也還有一種迫切的要求——是想弄幾塊錢的稿費來維持生活；不幸這個要求卻沒有達到。泰東版陽明全集除掉我的序外，還有章太炎和釋太虛的兩篇，後來聽說泰東對於這兩位大師各各送了一百元的筆墨費，但我所用的筆和墨是名實相符的「金不換」，一個銅板也沒有換到。

一九二四年是文藝界相當多事的一年，那年是英國詩人拜倫的死後百年祭，也是德國的大哲學家康德的誕生二百年祭，這都是操觚者做紀念文章的資料。創造社當時是打算紀念拜倫的，已經收集了好

些文章，預定在創造季刊上出一個專號，但我一離開了上海之後，仿吾不久也去廣州，因此那個紀念專號也就流了產，當時所收集的一些文章是在後來的創造月刊上發表了的。拜倫本是歌德所極端推崇的人，歌德說過單是爲了要讀拜倫的詩都有學英文的必要。歌德自己也譯過拜倫的詩，據說浮士德第二部浮士德與海倫所生的那位歐福良，便是以拜倫爲典型的。但這位英雄詩人對於我的引力卻沒有他的友人雪萊來得強烈，關於他的紀念文章終竟沒有做出。記得是馬克思說過這樣的話：三十歲的拜倫的死不算夭折，因爲他的發展可以成爲我們的敵人；而二十八歲的雪萊的死卻是損失，因爲我們失掉了一個朋友。

關於紀念拜倫的文章雖然沒有做，但關於紀念康德的文章是做了的，便是 Loebenths 的塔，那是在學藝雜誌的紀念號上發表了的，曾爲北京的晨報副刊所轉錄。作那篇文章的用意，與其說爲要紀念康德，寧是想藉以諷諭哲學家。儘管哲學家或思想家是怎樣地冷靜，超然，過着如冰霜如機械的理智生活，但是人生的情趣終不免要來縈繞，而且在黑暗中還要給他以助力。惡魔說過：『灰色是一切的理論，只有人生的金樹長青。』這意思可惜沒有表現十足，曾蒙過一位作家譏評過我那篇文章，說是『文藝作品是人生的反映，不是古人的行狀。』是的，我本來是沒有意思替康德作行狀的。

在福岡住了有半年的光景，爲研究生理學的志望也曾到過一次東京，和當時的四川經理員接洽，希圖入大學院，繼續領取官費，但沒有成功，只領到一年前畢業回國時所應領的歸國費，結局是仍然不能不

作歸計。但在回國之前，在十月的一月間又在福岡與長崎間的佐賀縣的山中潛居過一個月。就在這六七個月間要算是我自己的最多產的一段時期。除開上述的一些譯著而外，我翻譯了屠格涅夫的新時代，寫了落葉，喀爾美羅姑娘，葉洛提之墓，萬引，陽春別，及橄欖中除掉歧路三部曲的全部。當時的生活紀錄大體是留在了橄欖裏面的。

在這兒是應該補說一下週報的下落了。週報在我離開上海時自然是決定停刊，但在將要停刊的時候，當時在北大任着教職的郁達夫由北京趕到了上海，在第五十二期的終刊號裏夾了一張通告，是預告着創造社和太平洋社將要合編一種週刊，就是後來的現代評論，改由北京編印的消息。我接着這終刊號和通告是在五月中旬，同時也接到達夫的來信，說到合夥的事情。那在兩三個月以前本來是早就由太平洋社方面的人提議過的，起初的提議是擴張創造週報，一半政論，一半文藝，政論由太平洋社的人擔任，由我們把文藝的一半附上去照舊由我們編製，在上海印行。我在當時卻不甚贊同這種以文藝爲政論的附庸的老辦法，曾經提出過一種折衷的意見，便是一期政論，一期文藝的輪流辦法。但這種意見沒有得到同意，原議也就中止了。待我離開了上海，週報也已決定停刊，障礙在無形之間是除去了的，因此合夥的一幕便順暢地進行了起來。

太平洋社和創造社的合夥在當時的情勢上是有充分的可能的。太平洋社本來有太平洋月刊在商

務出版，他們的構成分子大都是有相當學識的自由主義者，所發表的政論，公平地說來，也還算是開明的一派。那個月刊雖然從不會達到過左右中國文化界的地位，但在科學與玄學之戰鬧得風起雲湧的時候，吳稚暉在那兒發表一些奇拔突梯的論文，是曾經把讀書界哄動過的。我對他們雖然沒有什麼接觸，但其中的主要角色多是湖南人，與仿吾有同鄉之誼，而與仿吾的長兄劭吾又多是在日本留學時代的同學，仿吾隨着他的長兄留學日本時是和他們之中的一部人同居過的。其在達夫，則因為多是北大的同事，過從當然更加親密。有這種種的關係，加上我們自己本已有趨向政治的要求，兩社的合夥，除掉我自己的一點點潔癖和矜持之外，幾幾乎可以說是等於自然之數。這層是我一向對於那次的合夥一幕的理解，但直到十幾年後的今日卻出乎意外地得到了一個驚人的發現。

是日本出版的大魯迅全集的第三卷，蒙出版處改造社的贈閱，我得到了先觀的快樂。卷後有胡風的解題，署的日期是今年的一月二十二日，那兒有着這樣的一段話：

『此時代的魯迅之活動是活潑的。被作為敵人者是段祺瑞政權之教育部總長章士釗與其支援者的現代評論之一派。章士釗在當時自行主唱復古運動，編輯發行甲寅週刊，以孤桐的筆名寫着評論，因其週刊的封面上畫有老虎，故被呼為老虎總長。與此勾結的現代評論，雖然以太平洋學會和創造社之同人雜誌為招牌，但反動的政客俱樂部交通系及研究系為其背境的勢力。』

原來當時的現代評論社才有這樣偉大的政治背景，我這十幾年來，真是蒙在了鼓裏。不過我在這兒也並不想替別人來清理這番陳賬，我不是個中人，對於「支援」、「勾結」與「背境的勢力」的黑幕，似乎尚只好取一個「姑妄聽之」的態度。假使那場黑幕是千真萬確的事實，我卻敢於保證就連仿吾和達夫都是被蒙在鼓裏的。達夫早就在嘆息着被人利用了作爲「小丑」（見他在現代評論上所發表的一篇小說）仿吾呢，更是不識時務，他還做過一篇反對章士釗的文章，而且是發表在現代評論上。（號數不記得了，總得在十號以後。）

仿吾在現代評論上發表的文章似乎就只有一篇。達夫在開始多得一點，後來也沉寂下去了。我呢？前後後就只有兩篇，一篇是亭子間中，一篇是哀感。前篇是受不過達夫的敦促，勉強寄去的，同時還寫了一封怕比那篇文章更長的信給達夫，直率地敘述了自己對於他的感情。那信恐怕沒被達夫保存，但寫那信的心境直到現在都還能髣髴。達夫、仿吾和我，在撐持着初期創造社的時候，本如像一尊圓鼎的三隻腳。達夫中途離滬，去北大擔任講師，我是不甚贊成的，想維持創造社自然是種私心，而達夫的大才小用也覺得不值。但終竟去了，而且去得如像絕了交的一樣。文章儘可在別種刊物上發表，對於嗷嗷待哺的創造社的幾種刊物卻一字也不肯飛來。圓鼎子去了一隻腳，結局是只好倒台的。倒了台之後，達夫代表着創造社參加現代評論，然而一個人不免終嫌寂寞，因此在我回上海之後，便接接連連地寫信來要我的文稿。

我當時是住在環龍路四十四弄裏的一家一樓一底的屋子裏的，有一天一次接到達夫的三封很懇切的信使我感覺得流淚，覺得像自己這樣的人依然是被朋友在當着朋友看待的。這感激使自己的心境，失掉了平衡，爲要鎮定自己的衝動想坐下去寫封回信，在間小小的堂屋裏，就像被關在籠裏的煩燥着的老熊一樣，轉來轉去地不知道轉了好幾十個圈子。

哀感是一九二五年三月十二日，得到孫中山的死耗時所寫的一篇短文，那又是因爲陳西澐的幾次來信的敦促，才寄去發表了的。西澐和我發生交誼是從他在太平洋上指摘我和錢君胥所譯的茵夢湖開始，他後來到上海也曾訪問過我一次，但是在五卅以後了。西澐的信我到現在也還保存着的，不用說是不便發表。他那時勸我到北京去，說要把現代評論的編輯全權都交給我，甚至於又稱讚我是「天成的領袖」我不知道他是存心鼓勵我還是有意調皮我，也不免暗暗起過一番哀感，因此也就把追悼那真正的「天成的領袖」的哀感郵寄了去。

前前後後就只發表過這兩篇文章，這對於「背景的勢力」似乎也太「背」了一點。

要談文壇掌故，其實不是容易的事情，知者不便談，談者不必知，待年代既久，不便談的知者死完，便只剩下不必知的談者。懂得這個妙竅，便可以知道古來的歷史或英雄是怎樣地被創造了出來。在這兒我覺得私人的筆札和日記似乎可以多少表現着一個時代的真相，然而此正筆札文學和日記文學之所以當

筆誅墨伐矣。聰明的人可以用創作的態度來寫日記，而更聰明的人卻勸人連日記也不要寫。

三

由福岡回到上海是十一月中旬，在環龍路四十四號弄裏租了一間小房子，是一樓一底的。這「四十四號弄」就在四十四號的國民黨支部旁邊，因為號數相同，我住在那兒時接受過好些國民黨的所謂西山會議派的刊物。房子背後是一面空地，有幾座無主的大墳，聳立在那兒，多少還呈着些自然原野的風貌，但當我移住不久，大墳已經次第被人啓發，在目前恐怕老早是被建築塞滿了的。

和我的回上海只相差得五天，相別了半年的仿吾，出乎意外地扶着他的長兄的靈柩，也由廣州回來了。仿吾是六月去的廣州，在廣東大學充任理學院的教授，同時兼着黃浦軍官政治學校的教官。他的長兄劭吾，任着第二軍的軍需處長，得了心臟麻痺病突然死去了。仿吾扶着他的靈柩要轉回長沙，因此在上海又淒寂地聚首了兩天。我最忘記不了的，是仿吾提起他的家事便要伸出兩隻手來說：「這兩隻手！這兩隻手！」他的意思是，他的長兄留下了五個遺兒，還有他的生活能力薄弱的次兄也有五位子女，這一雙手都是須得他去扶持的。他的長兄雖然在做着軍需處長，但當年的廣東經濟是異常窘絀的，軍隊的給養時常鬧着問題。仿吾尚未去廣東時軍需處長會寫過信給他，叫他在上海設法弄點錢寄回長沙去養家，這是我

所知道的事體。一九二六年的八月，我跟着北伐軍路過長沙時曾去看望過劬吾的遺兒，我記得頂小的一個還在母懷中吃奶，頂大的也不過十三四歲的光景，家況是相當寂寞的。爾來十幾年了，那些孩子和仿吾也是離開了的，不知道他們的情形是怎樣。

回上海的當時，由於曹錕賄選所激起的盧齊之戰是剛好告了終結的。盧是浙江督軍盧永祥。齊是江蘇督軍齊燮元。齊是曹派，盧是反曹派。反曹派的盧和南方的革命勢力與東北的張作霖是聯結着的。九月初盧齊在江蘇境內以兵火相見，東部戰線是在上海附近，西部是在宜興。在戰爭的開始，盧是相當佔着優勢的，但到十月初曹派的閩督孫傳芳所乘，終竟遭了失敗。然而身受戰禍的江蘇人於齊燮元卻是懷恨入骨。有一部分江蘇紳士，據我所知道，是以陳陶遺為代表，打算調查戰地的慘狀，以反對齊燮元。同時對於曹錕吳佩孚輩加以筆誅。他們把這件事情委託給上海的孤軍社。孤軍社的人多是留東同學，見到我在賦閒，便勸誘我擔任調查宜興一路並作調查報告的總編輯。這事情，我覺得頗有意義，便承應了下來。

我開首是相當踴躍的，除掉自己所擔任的一路之外，還到瀏河黃渡等地去視察過，戰痕的確是有點慘淡。像瀏河鎮上有幾條街是完全成了一片瓦礫場。那兒的東岳廟就像成了神像的野戰病院一樣，一些成了殘廢的泥塑木雕，露天地狼藉着。

宜興的調查費了一禮拜的功夫，我到過蜀山、蘭右、湖沒、懸腳嶺，和浙江長興縣界上的尚儒村。我有一

篇未完成的到宜興去，便是那次調查的紀錄。那次的調查使我於戰禍之外卻深深地認識了江南地方上的農村凋弊的情形和地主們的對於農民的榨取之苛烈。紀錄可惜沒有寫完。其所以沒有寫完，是有一段隱情伏流着的。

孤軍社的人本來有一大部分是信奉着國家主義的，和當時的醒獅派有密切的聯絡。他們委託我擔任調查，並擔任調查報告的總編輯，然而他們都又去找醒獅派的首領曾琦，要他在調查報告上做一篇序。曾琦本也是我的一位舊友，但他那種近於病態的矜持和把真正愛國的人當成「國賊」的所謂「國家主義」，我是不能贊同的。而他又是長於做「之乎也者」的閩墨體的文章家。孤軍社的人要請他做序本也情有可原，因為他們既志同道合，又可以得些兼收並蓄之效。但在我，卻覺得有點類似薰蕕和冰炭。因此我也就取了一種消極的抵抗，故意把我的文章拖延起來，不把它完成，終於使孤軍社等待不過，把調查報告收回去自行編輯，而我的文章也就得以免掉了作為牛溲馬勃的資料。但我那篇文章一經拖延，也終於失掉了把它寫完的興趣，我至今都是引以為遺憾的。

同樣遺憾的事，是關於資本論的翻譯。這又是和學藝社所發生的關係。私立大學的開設，在當時的上海頗為流行，學藝社的人也打算辦一所學藝大學。我一回滬，便被指派為籌備委員之一人，並被預定為大學的未來教授。除我而外的籌備委員們大抵都是有職業的，尤其處在商務印書館的編輯所裏任事，離大

學的開辦還有相當的時期，閒着的我和我一家人的生活，便須設法維持，因此我便決心翻譯資本論，要求由商務出版，在翻譯的期間由商務每月供給我若干的生活費。這個意趣得到了學藝社的朋友們的贊成，尤其在商務編譯所任着庶務主任的何公敢，他從東方圖書館中把須得參考的英譯本都爲我借了出來，他們以爲這事情是不成問題的，只須在編審會上通過便可以定下契約。

我當時感覺着十二分的愉快，並且預定了一個五年譯完的計畫。譯完要五年，在讀者或許會詫異，以爲是過於迂緩，但資本論全部譯成中文會有四百萬字，日本的高島素之是費了十年工夫把它譯成了日文的。高島在譯成之後不久也就病死了。這日譯者之死是否爲譯資本論而勞死，雖不得而知，而在我自己卻覺得如果能爲譯資本論而勞死，要算是一種光榮的死法。然而那次的計畫，在商務的編審會上卻沒有得到通過。譯其它任何名作都可以，資本論卻有不便。

這樣一來，計畫也就只好終於是計畫了。這事情在現在想起來都不免是一樁遺憾。不過我也偶爾在這樣作想：假使當時我是得到了商務的概諾，那我的精力，即使不是全部，也會有一大部分，是被用在翻譯上的，我定然是被釘在了上海；一九二六年往廣東以及其後的事情便不會發生出來。一個人的生活路線，有時可以爲外來的偶然的契機所左右，確是不能否認的一個小小的真理。

資本論的翻譯計畫既歸失敗，結局是只好在上海灘上過着賣文的生活。這樣寫起來，在現在的作家

眼裏，或許會感覺着不快，因為「賣文」是作家應有的權利，沒有什麼榮辱可言，否，文章能夠賣錢，而且愈能够賣，賣的錢能夠愈多，倒要算是作家的榮耀。但在當時的我卻是視為萬事失敗了所剩下的一條絕路。我自己是充分地受過了封建式的教育的人，把文章來賣錢，在舊時是視為江湖派，是文人中的最下流。因此，凡是稍自矜持的人，總不肯走到這一步。由賣文為辱轉而為賣文為榮，這是一個社會革命，是由封建意識轉變而為資本主義的革命。我自己在那時是經過了這種的意識上的革命來的。開始向商務印書館賣稿就是在這個時候，我的喀爾美羅姑娘，行路難，落葉，便連續地在東方雜誌上出現了。在這些作品之外，也還陸續地賣了不少的譯文，屠格涅夫的新時代，河上肇的社會組織與社會革命，霍普特曼的異端，約翰遜孤的戲曲集，高士華綏的爭鬪，都是在這前後一二年間先先後後地化成了麵包的。

自己所視為不大冠冕的事情，在抱着同一封建意識的人看來，自然也是不大冠冕。例如已故博士劉半儂，他在語絲上便挖苦過我是「上海灘上的詩人，自比歌德」把我和閒話家陳西滢，已故詩哲徐志摩，歸諸一丘之貉。據說罵人也是要講點藝術的，幼稚的人劍拔弩張，陰險的人指桑罵槐，這樣的罵適足以表示自己的幼稚或陰險，事實上是成爲了向天而唾。像半儂博士的那種罵法，那是可以登諸大雅之堂的了，在「上海」下只消加得一個「灘」字，便深得了「春秋」的筆法。爲甚麼呢，因爲所謂「江湖派」者本來還是雅名，再通俗得一點，便叫「跑灘匠」。在上海「跑灘」的人而「自比歌德」——歌德者，德意

志的詩聖而會爲假馬國之宰相者也——不亦妄乎！

不過半儂博士的雅罵，其起因似乎也不專爲我在上海賣文（單只這層，博士倒是我們的先進，）而是賣文賣錯了地盤。那時的北京晨報本是研究系的機關紙是誰也知道。但那兒的副刊向來是孫伏園先生編輯的，在中國的新文化運動上留着有很大的功績。就在那一九二四年的下半年（？）伏園和晨報的主事者似乎發生了什麼意見，便退了職，一向在副刊上寄稿的主要的作家們也就退而組織語絲，與晨報社斷絕了關係。就在這時候，晨報的主事者曾寫過信給我，要我勸仿吾去主編副刊。仿吾不用說沒有去。那主事者同時又希望我投稿，允許我以千字四元的報酬，我覺得也是一種收入，便拿了些既成的隨筆寄去發表了。但這一發表，我是明確地知道的，便是半儂博士的那番挖苦話的觸媒。

人在落魄的時候，也就如有甚麼傷痛的神經一樣，感受性是倍加銳敏的。小小的譏刺可以慘於蜂螫，小小的慰藉可以暖於春陽。像半儂博士的那兩句話，其實是很平淡的，但我卻記得非常深刻。這原因自然有一多半是由於我的神經過敏了。由於這同樣的神經過敏，在同一時期，我也受過好些人的小小的慰藉，使我永遠也不能忘記的。

我住在環龍路上的時候，沒有雇用女僕，內事是由內子擔任，外事便歸我外子聽差。每日所吃的菜蔬，都是我自己一早跑到八仙橋的小菜場去採辦的。

我記得，在要赴宜興調查之前，因為要有好幾天不在家，非多備些食糧儲蓄着不可。我在一天清早便提了一個菜籃，又拿了一張大包單，跑到八仙橋去。我身上穿的是在日本穿了十二年的一件學生裝，外面披着一件破外套，頭上戴着一頂棕黃色的駱駝絨的烏打帽，是民國三年初到東京時買的。在小菜場附近買了些猪肉醃魚白糖白菜，把一個菜籃已經裝滿了。又跑到菜市上去向着我每常照顧的一位五十上下的老媽媽買了一大堆場姑菜，芹菜，油菜苔，豌豆苗，我叫她替我包在包單裏。那老媽媽向我說了幾句話，一直到現在都還是如聞其聲。

老媽媽一面在三和土面上替我打包袱，一面問着我：「大司務，你在哈地方燒飯呀？」

「在環龍路，」我回答她。

「你往後該買個大來些格籃，用包單會把菜攔壞個。」

就只這樣簡單的兩句，而在我，卻好像是有生以來所受過的最大的恩寵。我自己並不想自比為韓信，但韓信受了漂母的一飯之恩而以千金為報的心理，我覺得是能够了解的。

同樣是八仙橋。大凡在上海的小菜場上都是有麵攤賣粉和麵的。我自己是喜歡吃麵的人。每逢一早到小菜場去，便要吃兩碗麵來當早飯。那兒的一座麵攤，當爐的怕是一夫一婦，都只有二十四五歲的年紀。老板娘的一位，人頗矮小，在血色不甚好的臉上有些雀斑，一雙眼睛倒還靈活。我一去吃麵，她總特別要把

我面前的桌面抹潔淨一下，麵吃完後又要用一張比較潔白的葛巾用水絞來讓我淨面。起初的兩三次只以爲她是愛乾淨，善於奉侍客人。但去的次數多了，看她對於別人卻不那樣，才知道她是對於我一人的好意。這也是使我有些受寵若驚的。在那位年青的老板娘眼中，或者又看待我是在『大司務』以上了吧？我是不會和她打過話的，她的看法自然不得而知，但她的厚意繼續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二六年的三、一八，我離開上海去廣東爲止。真的，假如我有回上海的一天，很想到八仙橋去吃兩碗素麵。

達夫因爲創造週報事雖然和我稍稍有點捍格，但我們的交誼是沒有改變的。

一九二五年的初頭，太平洋學會的石瑛長武昌師範大學，達夫做他的輔佐，由北京南下，充任文科教授。他們要聘我去做文學系的主任，連聘書和路費都送來了，路費是二百元。

說起武昌師大的下聘，前後共有三回。第一回是一九二一年九月，那時還是高等師範，尙未昇成大學，聘我去做文科教授，聘書下到了四馬路的泰東，但我已經折回了日本，在繼續着我的醫科的學業了。

第二次是一九二四年的八月，是已經昇成了大學的時代了。校長姓張，寫了信來寄到福岡，也是聘我去做文科教授。這次我倒很想去，但因爲學校的手續沒有十分周到——未下正式聘書，未寄旅費來，而屢次催我去上課——弄得我不甚高興，我又謝卻了。

第三次有聘書和旅費寄來了，而且陞了官，是做主任。達夫既在那兒，又有張資平是那兒的理科教授，

頗有聲望，而且正領導着一批青年作家。有了這樣好的條件，論理，無論怎樣都是應該去的了。但我卻又陷在了不能去的苦境。

在前面說過，中華學藝社的人所打算組織的學藝大學，我是掛名的籌備委員之一人，而且被預約着充當將來的文學系的主任。委員雖僅是掛名，主任也僅是預約，然而，怎好見了實利便拋棄了朋友們的厚誼而向高枝飛去呢？因此我又不得不把武大的聘書和旅費一同退回去了。

這次的辭退覺得很對不住達夫和太平洋社的人。達夫寫了信來，說是我的辭退使得大家失望，要我再加考慮。北大的陳西滢也寫過信勸我，他照例是用着那種使我有點難堪的措辭，他把武昌比成假馬，叫我去當歌德。

武大出身的洪爲法，當時是常在我通信的，他的勸法尤其直率。他說，要在中國文化界樹立一勢力，有入教育界的必要。中國人是封建思想的結晶，只要正式地上過你一點鐘的課便結起了師生關係，他便要擁戴你，稱你爲導師，而自稱爲弟子。如僅是著書立說，不怕儘有人深切地受着了你的教益，他是諱莫如深的，一忽兒要和你道弟稱兄，一忽兒還要罵得你湮沒出世，這真是不合算的。他這番話，倒的確也道破了一部分的真實。然而你在文化界就算樹立了一個勢力，又怎麼樣呢？何況那樣的建樹，也談何容易。入教育界的人多，能够把自己樹立成爲一個中心勢力的，卻沒有幾個。

其實我的參加學藝大學的組織也要算是加入了教育界，而事實上是失敗了的。這，且留待後述。在學藝大學開辦之前，我也在大夏大學當過幾天講師，結果是那兒的辦事人把我當成「么二」，而且有一位國家主義派的學生更曾打過我的翻天雲。足見專靠封建意識便能蓋世稱雄的自然有那樣的人，而我卻沒有那種本領。

關於「么二」的待遇，我在這兒想插說幾句。

當我初回上海的時候，大夏便想找我去當講師，講文學概論。但因鐘點少，每禮拜只兩個鐘頭，而校址離我的寓所又遠，我便沒有承應。但終因那兒的學生有一部分希望我去，那兒的辦事人有一位是留東同學，他直接間接地總要拉我去幫忙，我在第二年的四月，新學期的開始，也就答應了每禮拜去講兩點鐘的文學概論。

我那時對於文學，已經起了一種野心，我想獨自樹立一個文藝論的基礎。我的方法是利用我的關於近代醫學，尤其生理學的智識，先從文藝的胎元形態，原始人或未開人及兒童底文藝上的表現，追求出文藝的細胞成分，就如生理學總論是細胞生理學一樣，文藝論的總論也當以「文藝細胞」底探討為對象。這種「細胞」的成分，在我看來，不外是由於「條件反射」所激起的情緒，與情緒所必需的波動，即節奏開始是簡單的，繼進是複合的，更進則由情緒的領域誇入觀照的領域，由條件之反射成為條件之再

現。這是我所了解的文藝的創作過程。

情緒的波動是有感染性的。作家把由內在或外在的條件所激起的情緒，反射出來，由其本身的節奏便可以使受者起着同樣的反射。但更進一境，把內在的或外在的條件如實地，或由作家的能動精神而加以剪裁煊染的地，再現出來，那不用說也可以得到同樣的或更進一步的效果。小兒見人哭則亦哭，大人則哭之所以然如不說明，或說明而不得到適可，他不會和你同聲落淚。這是我所了解的文藝的感應過程。

條件是進化着的，無論內在的或外在的，都隨着人類社會的進化而進化。由這條件所反射出的情緒，因而也是進化的。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條件，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感情，因而一個時代有一個時代的文藝。過去了的時代條件無由再現，故過去了的時代文藝有它的不可摹倣性。它是獨立具存，它是後無來者。這是我所了解的文藝的進化過程。

我是想根據這三種過程以構成文藝總論，再就詩歌，小說，戲劇等以作分論，以構成所懸想着的『文藝的科學』。

這個規劃是須要有多方面的參考書，纔可以實現的。我自己素來是沒有什麼藏書的人，而當時的大夏大學更連具體而微都還說不上。他們租了一間租界外的舊公館在那兒開散學，圖書館的存在不用說是沒有的。我的規劃，自然也就很難如意地去推進，但我當時也要算是費了我的至善的努力的。自己沒書，

而且沒錢買書，每每跑到北四川路的內山書店去借閱或者立讀，爲着一禮拜兩點鐘的講義，總要犧牲好幾天的工夫。

但我得的報酬是多少呢？他們每個月給我二十塊錢，勉強可以够來回的黃包車費。原是出於幫忙，錢多錢少，倒不在乎。因此，我在那兒也相安無事地教了兩個月。但不幸我到後來發現了一個不甚愉快的祕密。

原來大夏大學的講師是有等級的，有每小時三元與每小時二元半的兩種。這等級究竟是依什麼標準而分，我不得而知，但我自己是受的二元半的「么二」待遇，那是明而且白的。在這兒又有件出乎意外的事，是五卅事變成爲了我的救星。五卅事變一發生，滬上學校全體罷課，我也就得和那座偉大的大學堂於無形上斷絕了關係。那學校在暑假過後又下過聘書給我，起初是照舊的二元半，我把聘書退還了他們，自己覺得頗幽默地，說不願再當么二。他們接着又下了一道聘書來，每點鐘加了五毛錢，把我提昇成了「長三」。說也奇怪，知道了受着「么二」的待遇時倒也還沒有什麼；因爲原約本是幫忙，別人出此或許並不是有意的歧視。然而這次的「長三」提昇，卻是存心把錢來買賄了。受人買賄倒也沒有什麼，不過爲了五毛錢便要賣身，終嫌自己還矜持了一點。

四

五卅事變轉瞬便要隨着木星一週天了。全國各報紙照例是會有連篇累牘記述的。年年歲歲都在做着紀念文章，而那事變的全貌，替我們把它塑像下來了的作品，卻似乎至今都還沒有見到。

有的人在怪『時代』。『時代』姑娘喲，你似乎也太輕佻了一點，花樣變換得太多，使我們實在應接不暇。然而你照相匣子太簡陋，照相的本領有限，更加以不肯盡力，怕也是實際的情形吧。

別人暫且不忙責備，就是我自己也就胡塗得可以。五卅當時我是住在上海的，而且就在五卅那一天我也到過南京路，雖然去遲了一刻沒有得到微幸地做一名烈士的光榮。然而我對於那次的事變又有什麼文字紀錄下來了呢？

手中無書可查，只能全憑記憶，然而記憶真不甚可靠的東西，連那樣劃時期的事變，僅僅十二週年，那全體的經過，在我已經是很模糊了。我只記得事變的起源是由於小沙渡路的日本紗廠的工友為經濟的要求罷工，工廠的日本人取出無理的高壓，把工友之一人顧正洪，用手槍打死了。上海的學生界同情於工友，在五卅那一天，往南京路的工部局去要求懲辦兇手，不料又釀出了更慘的悲劇，被那兒的西捕開槍，把

學生打死了若干人，打傷了若干人。——記憶的殘存就只有這一點，死傷者的人數姓名，不用說都已忘記了。聽說目前是『民族復興』時期，我也由衷地在希望着，我們的民族真正能夠那樣，但不知對於那一批爲民族鬪爭而死了的烈士，在上海或中國的那一隅，有什麼紀念的建築沒有。

僅僅十二年，要蒐集當時的活鮮鮮的資料已經就不容易了。大家諛實地都差不多。其所以差不多者，豈不是僅僅受動地在時代的潮流裏被推蕩，而沒有能動地把各個時代的精神和面貌把握得着嗎？真正要想差不多，只有努力着把那容易消逝的東西抓緊，纔能夠奪得錦標。你不高興她而要背着她走，我也敢於保險，那一定也會是差得很多的。當猿人進化到人是差得多，由人退化到猿人也是差得多；要在人中求出超人，斷斷乎不是向着猿人走去的那條路。

月光光呵，美呀美！聽說『詩人』還在讚賞着。但是，從那凍結着的火山口裏有冰冷的笑聲了，朋友。約略是午後三點多鐘的光景。

我同一位C君，在浙江路上，朝北，向大馬路走去。照例是那樣亂雜而又悠長的街。走到要到交叉路口的近處，街旁步道的行人就像潮水一樣從前面簇湧來了。承頭的多是學生，都呈着一個蒼黃的面孔。

——「他們開了鎗了，不要往前進！危險！」一位學生氣喘着向我說。那是大夏大學聽過我的課的人，他也在蒼蒼茫茫地放着小跑，被我把他拉着了。

「誰開槍？」

「工部局門前打死了好些人！打傷了好些人！交通斷絕了。」

人潮愈湧愈來得洶，我放了學生的手，同C君商量着仍往前去看看實際的情形。

在人潮中推蕩着，容易逆颺到了大馬路。電車，汽車，黃包車，舉凡交通機關都是停止着的。寬大的馬路就像是崖礁突兀的淺海，形成着一片猛烈的人的漩渦。

天是陰曇的，有濃重的灰色的雲在低空處由東向西地流蕩，永安公司和先施公司的兩座高塔就像是在動搖，就像幾時要向那人濤中倒潰下來的光景。

要突破那人濤，端直地向工部局颺去，那是不可能的。在那兒只好是一半自動地，一半被動地，在停窒着的一些車輛中，被那潮頭蕩到了大馬路的彼岸。

好容易被蕩到了先施公司的大門口了，前面又更加猛烈地退下一股人潮來，我和C君終被蕩進了先施公司的門內，而那鐵製的鎖子門在我們的背後好容易也就把閘口堵着了。

公司的底層已經化成了一片人湖，店員們也都是惶惶然不知所措的。

我便走上三樓去，那兒，人卻是很稀疏，除掉店員之外，外來的人沒有幾個。大約在樓上來買貨的顧客，因為生了事，便都竄下樓，找尋出路去了。

走向那西南角上，從一堵向上半開的玻璃窗口俯瞰下去，慘劇發生處的情景便一目了然地展開了出來。

那素來是陰沉沉的工部局，把鐵門緊閉着了，愈見表示得陰沉。門前和街心的電軌上有些水漬，街上是一個行人也沒有的。工部局對面和其附近的商店都早已把舖門關閉了。

樓下是一個十字路口，有幾個紅頭巡捕和山東大漢在那兒堵塞着行人，有的端起步槍來威駭，有的舉起木棍來亂打。其中最活躍的是有幾位沒穿制服的外國巡捕，兩手都握着手槍，鷹瞵鵂視地東奔西突。手槍柄是有絲繩套在頸上的，那大約是怕第一防線的手被人突破了時，還有頸子作爲第二防線以維護武器吧？然而那樣的推臆，卻不免是一種杞憂。猛烈的人潮儘可以蕩掉腳上的鞋子，儘可以冲破公司的鐵門，然而對於那些木棍，步槍，手槍的尖子，卻如像演奏會上的各種演員和樂器之受着指揮棒的指揮。尖頭的一舉一收便是潮頭的一漲一落。

幹得真神速，門口的血沒多一刻工夫便沖洗乾淨了。屍首是不用說的……

一位談着廣東官話的執事，同站在窗邊對我們這樣說明着。

我們沒有說話，只顧看樓下的光景。大約看得可有十分鐘的光景吧，街心的一位西捕，忽然抬起頭來看見了我們。那人，我佩服他真是精敏，他不僅在防地，而且還在防空。他舉起手槍來向我們揮動，意思是要

我們把頭縮進窗去，不准往外看。他那一雙眼睛就像要爆出彈丸來的一樣，比他手中的一對手槍還要可怕。接着便有幾位紅頭大漢和山東大漢舉起步槍手棍來楞着我們，我們也只得把頭縮轉來。談着廣東官話的執事自行把玻璃窗拉攏了，接着更命令店員們把臨街的窗幕通同拉攏了。

看這情形是只好弄到罷市的了，終竟見了血，終竟被逼到了這步田地……

廣東官話在慨嘆，但我們卻還想再看看外邊的情景，又向更上的幾層樓走去。然而，那幾層樓的臨街的窗幕，都早已被拉攏了的。

就這樣，和五卅慘劇絕緣後，在先施裏面被關閉了幾個鐘頭。等到街上的人潮平靜了，又才被解放了出來。街上已經上了電燈，大馬路上的電車和黃包車是絕了跡的，時而有大汽車載着武裝着的外國兵飛速地往來奔馳。

繞道仍從浙江路走回法租界的環龍路去，走到浙江路的路口時，已經有外國兵如臨大敵地在那兒站崗了。

受傷者裏面，記得有一位頂年青的聖約翰大學的學生，似乎姓黃，是南洋的華僑子弟，年紀只有十七歲。入了醫院後，報上載着他的同在上海讀書的一位姐姐便住在院裏看護他。還有他的聖約翰的同學多人都誠懇地關戚着，替他們姐弟奔走。其中一位朝鮮人姓申，我看過他打腳球，是魁梧奇偉的一位大漢子。

這些姐弟間的，同學間的，乃至被壓迫民族間的，令人可以落淚的愛情，和小沙渡路與南京路上的流血，形成出一個極顯明的對照。我是深切地，深切地，受了感動。當時曾起過一個想念，想把這個對照用戲劇的形式表現出來。

第一幕 慰問顧正洪的家族

第二幕 南京路上的慘劇

第三幕 病院中的死別

想寫成這樣的三幕。前兩幕不用說要讓那小兄弟去活躍，第三幕却要讓姐姐做主人公。那小兄弟實際上是否死亡，我現在已經不記憶了，但在我的擬想中，是要讓他死亡的。由於他的死亡，向他悲痛中的姐姐，啓示出一條艱劇的而應該走的路。那姐姐要沉痛地生出一個決心，越過她兄弟的死屍，努力變成爲我們民族未來的央大克。(註)

但這劇卻沒有做成功。

這，要怪我太無毅力，由於畫鬼容易畫人難，我在構想的途中便把方向轉換了。

(註) Jeanne d'Arc (1412—1431) 法國我爾倫的少女，英法戰爭之際，我爾倫城被圍，挺身而起，解救國難。後爲

英軍所補，被焚死。

前好些年辰我便想把聶政兄弟的故事寫成劇本。名之曰棠棣之花，並且曾經發表過兩幕，一幕是收在女神裏的聶母墓前兄弟的訣別，一幕是創造季刊創刊號上的濮陽河畔聶政與嚴仲子的邂逅。落尾是還有兩三幕的，起過好幾次稿，但都不能滿意，寫了又毀了。那計畫，於是便遭了停頓，甚且是決心把它拋棄的。但不料五卅慘劇一發生，前面所說的那對現實的「棠棣之花」卻使我這虛擬的古事劇復活了起來。我便費了兩禮拜光景的工夫把那兩幕劇的聶婆寫出了。

聶婆和未來的央大克，自然不同，但和起初所計畫的棠棣之花也完全兩樣。聶母墓前的兄弟訣別讓它獨立了，濮陽河畔的一幕是完全改造了的。這劇寫成後會由上海美專的學生表演過一次，演了三天，賣了幾百塊錢，寄獻給當時的上海總工會去了。詳細的情形，我在三個叛逆的女性的後序上是提到過的。

聶婆的寫出在當時的自己很是得意，而尤其得意的是那第一幕裏面的盲叟。那盲目的流浪藝人所吐露出的情緒可以說是我的心理之最深奧處的告白；但那種心理之得以具象化了出來，卻也是我所應當告白的事實，是受了我當時所嗜讀着的愛爾蘭作家約翰沁孤的戲曲的影響。

愛爾蘭文學裏面，尤其約翰沁孤的戲曲裏面，有一種普遍的情調，很平淡而又很深湛的，頗像秋天的黃昏時在潔淨的山崖下靜靜地流瀉着的清泉。日本的舊文藝裏面所有的一種「物之哀」(Mono no aware)頗為相近。這是有點近於虛無的哀愁，然而在那哀愁的底層却又含蓄有那麼深湛的慈愛。釋迦

牟尼捨身飼虎的精神，大約便是由那兒發揮出來的。日本的『物之哀』大約也就是受了佛教的影響，佛教文學雖充分地被腐雜化而被定型化了，但那裏面確有些清湛而深邃的東西。在佛教經典以外的印度文學，我所接觸的也有限，但我讀過伽里達惹的霞空特羅，那種翡翠般的有深度的澄明，讀起來令人心身上所有的一切窒鬱，都要消融了的一樣。

我自己就這樣感覺着，只有真正地了解得深切的慈悲的人，纔能有真切的救世的情緒。僅在救世底方法和悲苦底認識上却有不同。像佛教的以有生爲苦蒂，導人歸於寂滅的那種消極的辦法，兩千年來已經證明了那是不合實用的。愛爾蘭人有哀愁的文學，然而也富於民族解放的英勇精神，誰能說這兩者之間是沒有關係的呢？日本人在還懂得『物之哀』的時候，他們的國勢是蒸蒸日上。日俄戰爭時的名將乃木希典，他有一首金川城外的七絕，我覺得頗足以表示明治維新當時的一些文臣武將的心境：

『山川草木轉荒涼，

十里風醒新戰場。

征馬不嘶人不語，

金川城外立斜陽。』

這詩，在日本人所做的漢詩裏面，要算是字和音雅的一種。更想到他是指揮作戰的武人，而在戰勝之

餘，却做出了這樣一首表示着十分深切的哀愁的詩，怎麼也要令人起出一種肅然生敬的感觸。他之所以能够有叱咤三軍的力量，不也就是出於這兒的嗎？然而日本人的這種心境，在目前似乎也也要費點考古學的工夫纔能尋找得到了。

聶榮寫成後，我把來同以前發表過的卓文君和王昭君兩篇一道集合起來，成爲三個叛逆的女性交給了還在氤氳中的光華書局。這書局是沈松泉和張靜廬兩人合夥攪的，但據我所知道，他們所合的夥可以說是乾夥。

張沈兩人和我的關係，說來也頗有一段淵源。在一九二一年我最初由日本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們兩人都在泰東書局的編輯部，張在管印刷而兼做『小說家』，沈在管校對而兼做『詩人』，因而我們在馬霍路上也就有過半年同吃大鍋飯之誼。他們由泰東所得到的報酬，自然也是很有限的。張和他的夫人，還有一位三歲大的男孩，一同住在堆棧後邊的一間小房裏。因爲生活的支絀，他和沈兩人便想做小伙計生意，在夏天會託我挪點時間出來，替他們譯部小書。我答應了他們，便把安徒生的有名的童話沒有畫的畫譜，由德文重譯了起來。但到譯得只剩下兩夜的光景，泰東的趙南公却把他們同時開消了。那原因，我至今都還不大明白，大約也怕是趙探聽到他們有做小夥計買賣的消息吧。

沒有畫的畫譜，因爲那樣，也就沒有譯完，那譯稿直到現在都還留存在我的篋底。

沈張離開秦東後，一同到過一次新嘉坡，沈因為是「詩人」，偶爾在和我通信。但他們到了新嘉坡之後，也沒有得到成功。在一九二四年我回到上海的時候，他們也回到上海。張在商報館裏編本埠新聞，沈是賦着閑的。

沈的家——記不清晰了——似乎是住在高昌廟附近，他有一次把我引到他家裏去過，因為要去看他父親的病。他的家實在是很寒賚的，既逼隘而又骯髒。他的老人患着癱症，睡在樓上，樓的空間似乎是一張床所獨佔着的。當時我才從醫科大學畢業不久，聽診器、橡膠槌之類，西醫所必具的法寶是還隨身帶着的。我替他的老人驗了瞳孔，敲了膝反射，聽了聽心音，我斷定了那病症是 *Tuberculous* (脊髓癆) 那是無法醫治的。後來的結果是怎樣，我可不記得了。

我生平替人診病，除掉在學校時的實習之外，就只有這一次，但也沒有主方，沒有受甚麼脈禮，只是為相熟的人盡盡心而已。

沈的生活是那樣的_{情況}，張也相差無幾。故爾在五卅慘案發生以後，他們兩人又起心想做點書生意。這次，自然又來找我，我便把那三個叛逆的女性，交給了他們。

上海的商家慣例是以端午，中秋，年底的三關結賬的，他們在端午過後把書拿去付印，因而印刷紙張等費便可以推到中秋，等到中秋來時，賣書所得的錢已可以周轉了。故爾他們的成本，我知道，就是出了些

錢來租了一間辦事室，在福州路上正對着棋盤街口的一家門面極窄小的藥店的樓上。書出後，他們起初是找那藥店代售的。但不久，他們竟把那藥店頂過來，便成爲了自己的門面。

這，便是光華書局的誕生史。它在出了我的三個叛逆的女性之後，接着便是我的文藝論集，接着又是達夫的文藝論集。此外在中秋節的前後又發行了創造社所編的洪水半月刊。那書店，可以說是作爲創造社的託兒所的形式而存在的。這關係在後來創造社被封以後是尤其顯著。但這託兒所在現在是已經化爲烏有了。可憐創造社所託的兒，或者僅是我自己的兒，竟遭了那不良的裸母，輾轉的賣身，到了現在有些竟連下落都不知道了。

漆樹芬住在霞飛路上和環龍路四十四號弄背抵背的一個弄巷裏。他是那年春季，由日本的京都帝大經濟科畢業回到上海的。是河上肇博士的弟子。

漆的號叫南薰，本來是四川成都府中學的同學，要低我一級。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我留學日本的第二年，他也到了日本。同在東京，算又相處了半年的光景，雖然不同居，但於禮拜或節日是時相過從的。但不久便分開了。學籍雖然相同，同是經過日本的高等學校而大學而畢業。但因學校不同，學科也不同，八九年間不僅沒有見過面，竟連信也沒有通過。

南薰是一位老同盟黨員，他在辛亥革命時似乎就已加入了，或者更在其前。人不甚高，恐怕連五尺也

不足，但並不瘦削。眼睛有點爆，嘴角有點斜，一個龍膽鼻倒懸在悶銅色的顏面的中央，頗帶着矜持的意味。有點不修邊幅。體臭頗強，尤其脇臭，大約也是由於不大肯洗澡的原故。在中學校時代，成績是相當優秀的，同時對於政治的趣味似乎也濃。在東京聚首時，一談到國事上來，總要談得慷慨激昂，而且有點口角流沫。

這種典型的人，我在當年是不大喜歡的，——就是近年也未見得便怎樣喜歡。

但在八九年後，在上海重聚時，南薰實在把我征服了。

因為居處相近，他時常肯到我寓裏來，照例是那副志士風貌。穿西服時一條領帶總打不整飭，穿中服時幾個鈕扣總有一兩個要忘記扣攏。體臭依然佈着相當有力的第一線。但他一談吐起來，雖同樣談着國事，同樣慷慨激昂，卻再不像往年那樣使我生厭，而是使我「如聽仙樂」了。

他在上海法政大學擔任了幾點鐘的功課，來時多是在吃過晚飯後，一談總要談到夜半。

有一次晚上，記得是在三一三慘案前不久，他到了我寓裏來，抱着了一大包原稿。原稿紙是通常日本用的四百字一張的，訂成了兩大厚冊，每冊有三四百張的光景，用字數說時自當在三十萬字以上。那便是他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了。

從歷次的談話上，我早就知道，他在從事着寫述關於中國近代經濟的論著，但沒想出他的著作早告

完成，而且分量是那樣的大。大約也是由於同是受了河上肇的影響吧，關於社會經濟方面的見解，我們大抵是一致的。我是半途出家，論事僅憑直覺，要我舉出實證，尤其像統計圖表之類，我既不拿手，而且身邊沒有材料，也有手難拿。南薰卻不同，他是專修這一部門的，所有一切的資料，自然是取諸左右而逢其源了。古時的劉玄德說他遇着諸葛孔明如魚得水，我之得到南薰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在當時的感情，正好借着這個譬語來表示。

南薰說，一切材料是在大學在學的三年間注意蒐集的，寫是在第三年上開始寫，寫了有一年半的光景才寫完成。這努力，這堅忍，單只這層早就是在我們的儕輩中所少見的。聰明的人更會取巧，有的在宣言，說長篇大作的東西連看都不高興看，那有閑工夫來幹這種傻事！

我接到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之後，讀了一晝夜，便一口氣替他讀完了。南薰要我做篇序，表明我和他的關係和我對於他的著作的批評，我答應了，而且也做了。我往年是不肯替人做序的，達夫的沉淪，資平的沖積期化石，都曾叫我做序，但我都沒著糞佛頭。我明確地知道，他們的作品是用不着我的序的，序了反會要玷辱他們。但是南薰的書，我卻替他序了。

南薰雖是慷慨激昂家，但其實性質相當小心，甚且是有點逡巡的。他愁他的書沒地方出版，又愁出版後沒人要，因此也就煞費躊躇。我所以答應他做序，便是想給他一些鞭策。但他在叫我做了序之後仍然不能放心，接着又去找徐謙和唐紹儀。徐是法政大學的校長，唐在當時也是住在上海的，他們也答應了他。但是唐的那篇序是南薰自己的手筆，僅是經過署名者的檢閱而已。最後他更找到了吳稚暉，吳稚暉給他寫了篇很懇切的長序，更把他恭維到了絕頂。序裏有一節，記得曾把他的書和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相提並論，說是近年來使他感服了的最有價值的著作。吳稚暉的眼識的確精明，他於風塵中發見俊士，以他那『耆宿』的資格肯爲素不相識的一位無名的青年做那樣誠懇的介紹文章，在當時就連我這個第三者都是暗暗地生着感謝和欽佩的意思的。

南薰得到了這些序，歡喜自不用說，但在序的位置安排上又費了相當的苦心。我的是不成問題的，但其餘的三位都要算是不折不扣的『鼎輔元勳』，到底誰個當前，誰個當後呢？在這兒，說也『幽默』，卻要感謝起我們的『方塊字』來。南薰拿着這個問題來和我商量的時候，我教他，何不把姓氏筆畫來數一數？

真湊巧！一數，便成了『吳唐徐郭』，唐徐雖同是十畫，但唐究竟是做過內閣總理的人，無論尙齒尙爵，安在徐的前頭是沒有多麼大的問題的。字假如拉丁化了，——變成K·S·T·W——位置便剛剛倒過來，那可就麻煩了。

這個問題得到解決，然而南薰也並沒有因而安心。他那書名，在初並不叫經濟侵略下的中國。他自己本是用了一個很冗長而不很響亮的名稱的，詳細的字面我忘卻了。當我接到他的原稿時，我嫌他的名稱不好，便替他改成了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這兒自然是含有集納者的派頭，他在初也高興了這個書名，曾去找了一位姓蕭的女書家，名字不記得了，當時和他同住在霞飛路上的，替他題簽。但等到他自己破費自己印行，印到那全書都快要告成，只差封面還未印就的時候，適逢着有名的經濟學家馬寅初在五卅慘案中由北京到了上海，南薰又抱着那書去找他。意思是仍想請他做篇序。經濟學家說公務太忙，序沒有工夫做，只是書名太刺目了一點，卻替他改題了一個封面，便是經濟侵略下的中國。

這書印行後曾鬧動一時，銷路是十分暢達的，現在究竟銷到了幾版而且曾經改排過沒有，均不得而知。如字版是照原樣，讀者可以見到那書的表裏的書名是兩樣的。外封面用着馬寅初的題字，裏封面卻用着蕭女士的署名，頗有一名一字的風味。

相隔雖然僅僅十一年，當時的世風和現在的卻相差得很遠。『帝國主義』這種字樣，在現今已是

司空見慣了，但在當年卻幾乎是一種諱名。要使用這種名詞的人差不多就等於是共產黨。馬寅初要把『帝國主義』云云改成『經濟侵略』是良有以也的。

這兒又要插一段故事。

五卅慘案發生後，上海的各界各團體都是動了公憤的。留滬的四川同鄉，竟也會因此而活動了起來。中國人據說是一盤散砂，但是四川人卻更像一盤鵝卵石。四川人的鄉誼素來是很淡薄的。這原因怕是由於多是客籍的原故。在明末清初，四川遭過一次那位殺人狂張獻忠的屠殺，據鄉間的口碑，說是『張獻忠剿四川，殺得鷄犬不留』。四川成了空地，因此在清初也就有過一次大規模的移民運動。現在的四川人大概都是外省人，就如我自己的祖籍便是福建。我們這些客籍人在四川是各省有各省的會館的。因此我們四川人的鄉土觀念似乎沒有廣東浙江那些省份的來得濃厚。這或許也就是四川人的好處。四川話可以通行天下，四川人可以四處打鑼。然而在五卅慘案發生後，就連那些鵝卵石也都團結起來了。

鵝卵石中之尤近於駝鳥蛋者，記得有謝持，有熊曉岩；其次有王兆榮，有數學家何魯，有敵同宗郭步陶，有國家主義的領袖當今聖人曾琦，南薰和我也湊了兩腳。否，南薰倒是很熱心的一位，似乎事情的發動者便是他與何魯與步陶。他們三個人的確很熱心，何魯不惜金錢，南薰不惜奔走，步陶不惜筆舌。磋商了多少次，同鄉會公然成立了。

第一次開成立大會，記得是在一個講堂裏，不記得是什麼學堂。開會的結果自然是舉出了一批職員，而且很多。幹部是王兆榮，何魯，郭步陶，漆南薰幾個人，我也算是一位，是擔任文字上的工作，名目不記得是『宣傳』還是『文牘』。在我的下邊有一位李民治，別號德謨，他當時是東吳大學的學生，後來在北伐時共事很久，但我和他的相識是在這兒起頭的。

第二次是聚餐會，會場記得清清楚楚的，是在西藏路的寧波會館。爲什麼要聚餐，聚餐後幹了些什麼事體，都不記得了。只記得在場有楊杏佛的演說，我是第一次看見他，第一次聽他說話的。人頗瘦削而高長，有滿臉的天花，是一種才子型。他那口齒的清白，措辭的簡潔，思路的有條有理的，確是名不虛傳。他和何魯最好，他之出席是由何魯請來的。——我的記性真壞。這聚餐說不定本是第一次，就爲的是開成立會的商量，而上述的成立會倒是第二次了。

成立會上通過了一件事情，是要發表一通宣言，由我執筆。這，不用說，我也做了。後來由創造社出版的初版水平線下裏面，有一篇叫一個宣言的，就是這個東西。宣言做好後是要在第三次的職員大會上通過的。

第三次的職員大會也是借的一處私立學校的講堂，是在樓上。講堂是空了出來，在一邊安着一張條棹作爲主席台，前面圍放着幾排板凳。另一邊放了一張大餐棹，準備有一些茶水。

職員到得不少，將近有四五十人。有各科各股的負責人，也有各學校各商幫的代表。開會如儀，通過了好些議程，議到要審查我所做的宣言來的時候，吾鄉聖人會琦出席了。他是第一次出席同鄉會的。

宣言的草稿由我自己朗讀了一遍。說句開誠佈公的話，那篇文章我自己很是得意。雖然總不免是所謂「洋八股」的那一套，但就僅那一套在當時並沒有好幾個人能做。前面已經說過，連「帝國主義」那種字眼都要犯諱，也就可想見了。結果依然是犯了諱。

「洋八股」也有「洋八股」的路數，既在做五卅慘案的宣言，無論是怎樣會做搭題，總不會搭到「學而時習」上去的。「帝國主義」這個字眼免不得便出現了兩下。

當我的宣言唸完，主席徵求大家的意見時，聖人會琦便悠然而起，步至主席台前，要求簡單發言。會琦也是一位雄辯家，高度近視，中等身材，蒼白而略帶肥意。上唇微翹，聲音雖然有點盤舌而帶痰，說話卻是很得要領。他說，我們的同鄉會應該提倡愛國的精神，不好爲赤黨張目，像郭某所做的宣言，所說的大抵是赤黨的經濟理論，尤其有幾處「帝國主義」的字眼，那是太露骨的，宣言應該慎重地修改。

就這樣簡單地說了幾句，接着又說，他的事情很忙，便匆匆地又中途退席而去。

會琦擔任的是什麼職務，我不記得了。宣言本是公衆的事，要經修改原是理所當然。只是我們的聖人，儘管是怎樣的「一日二日萬機」，而同鄉會又儘管是怎樣的沒啥意思的團體，別人都在提起全副精神

攪幹，而他素不關心，在這第三次會上也僅僅中途出席，忽忽而來又忽忽而去，這是使我十二分不高興的。宣言經過主席王兆榮的裁奪，當場指定了謝持熊曉岩諸人做審查委員，修改後留待下一次開會再行通過。這樣，本是可以相安無事的，但我因為過分的不愉快，在預定的議程開完後，我自己臨時動議，請求辭職，於是便也生出了一個小小的波瀾。

謝熊諸人大約也是感覺着『左右做人難』吧，審查的事情停頓下來了。但宣言又不可不早日發出。結局又是由何魯去找楊杏佛，請他執筆修改，奇妙的是沒有更動什麼，只把『帝國主義』改成了『經濟侵略』。

究竟還是聖人能識時務。宣言發出去後，上海的各大報都不肯轉載。步陶是時報館的老記者，就以他的大力，在那兒也只登出了半截。

同鄉會成立了之後也還出過一種刊物，叫着長虹，是由我去找梁溪圖書公司出版的，沒有要印刷費。但僅僅出了一期，那條『長虹』也就雨霽天青了。其後不久，就連同鄉會也是隨着『長虹』而無形消滅了的。

誰個能够說我們四川人不是鵝卵石呢？

南薰住在霞飛路上，我爲『公務』也到他寓裏去過一兩次。寓所是一樓一底的房子，樓上租給一位

朋友住着，他的一家人就住在樓下的一間屋子裏面，除他而外有他的夫人和兩個孩子。看那情形，南薰夫人是很能吃苦的，雖然隨着南薰到過日本，且住在繁華的上海，而鄉間的樸素之風依然是保存着的。用舊式的觀念來表示時，南薰在著作上的得到成功，怕有多半也是由於她的「內助」吧。

我第一次碰着吳稚暉的便是在他那兒，是那老頭子把他的經濟侵略下的中國原稿和序文送去的時候。時候是在晚上，我和王兆榮先在，老頭子後來，在樓下坐不了一會，並沒談什麼，他又上樓去了。聽說樓上的朋友和老頭子相熟。老頭子的這點不拿身分，我是佩服的。他自己賣了氣力，做了文章，還要親自送來，真真是難能可貴。像我自己儘管住得和南薰比鄰，但他來十次，我總怕去不得一次。我自己並無身分可拿，不過總懶得一點，只要人肯來，我也就難得去，如此而已。然而不拿身分總是值得稱述的。

南薰的書雖然銷路很好，但僅靠一本書，收入自然是有限。他爲什麼不找書店出版，而要自費印行，我記得不甚了了，似乎也是找了幾家書店，沒有打響。我要再說一遍，當時和現在，究竟是兩樣。儘管有「鼎輔元勳」做序，老闊們也怕你太紅得燙人。原因不用說也還是上海的太上支配者不好惹，弄得不好是要吃官司罰錢的。但南薰終於自費出了版，而且也出了名。但名與利卻是不容易兼收，他一家人的生活費以後便不免發生了問題。

要說南薰是死於經濟侵略下的中國，恐怕也是說得過去的吧？在上海的生活既弄得不能維持，結果

是只好跑回四川。他在重慶當新蜀報的主筆，似乎當了很久的。一九二六年的六月我在廣東大學充文科院長的時候，曾打電去聘他，並把聘書都寄去了，要他到廣大去任教授，他照例又發揮着他那小心而逡巡的癖氣，沒有出來。不久我也就隨着北伐軍出發了。在北伐的高潮期中，他在重慶聽說還做過什麼軍的師政治部主任。一九二七年的退潮期中，重慶發生了三三慘案，他和着好些同志，被當地的軍人慘殺了。

真是冤枉！據我所知道，他始終是一位「忠實的國民黨員」；雖然有對於政治的熱情，而實無做政治家的鐵腕。他如肯降心相從，做一位大學堂的經濟學教授，我看是最相宜的。我時常在這樣想，假使一九二六年他是慷慨地出了四川，他總不會遭到那樣的慘死。關於經濟方面的問題，總有許多是由他的手裏替我們解答了的吧？

南薰的死聽說是從主席台上拉下來，被刺刀當場鑿死的。鑿死他的兵，是我的胞同鄉，樂山縣人王芳舟的部下。王家和我家本是世交，民國二年我最初出川的時候，芳舟在當重慶鎮守使，我還在他的衙門裏做過幾天食客。十幾年後卻由他的手下殺死了我的一位友人，真真是令人不勝感慨的。

學藝大學的創辦也是在五卅潮中實現的，但這實現與其是迎着潮流的應運而興，寧是抗流而起的一種預定計畫。參預這計畫的主幹自然是中華學藝社的人，連殷汝耕也是最努力的一脚。

起初是募款，仿照青年會的拉會員的辦法，分成了十大隊，各隊有隊長，有隊員，取着競爭的形式各各

分頭招募。成績似乎也還好，相當招募了一筆款子，詳細的數目我是記不得的，不過爲數也很有限而已。然而醉翁之意也不在酒。

中國人的脂肪，自所謂海禁大開以來，一百年間，已被國際資本家榨取成了油渣的，在這油渣上面再加鍋剗，實在也榨不出好幾珠油來。假使中華學藝社的人是以美國留學生爲主體，或者儘有法門去向洛克費勒（Rochefeller）摩爾剛（Morgan）輩的大財主們分些餘潤，然而這個學社的主體們卻都是留東學生，而且專門是以學術爲職志的，和現在的似乎也有點兩樣。因此，目光便不免要近得一些。

六

在五卅前兩年，日本的東京發生大地震的時候，中國人雖然捉襟見肘，也會慷慨輸將，在那時學藝社是盡了很大的力量的。日本的文化中心雖然是在東京，但產業中心是在大阪一帶，故爾東京雖然遭了震災，日本的國本並沒有因之而受多大的打擊，倒反而給了他一個除舊佈新的機會，使那三百年來的老江戸成爲名實相符的新興都市。故爾日本人也儘有力量和歐美諸國在世界舞台上角逐。這座世界舞台和我們中國差不多是同義語，大約也是值得我們誇耀的了。歐美人在這座舞台上所演的文化劇，名優日本又豈能少得一脚？於是乎退還庚子賠款作爲文化基金的消息，在一九二四年年末也就逐次有見諸事實的傾向。當時有醫學博士入澤，子爵岡部等來華，便是帶着這種使命來的。學藝社曾經大大地歡嚙過他們，請了章士釗做陪客，我自己也曾叨陪末座。

還有一位住在上海的日本人，後以研究紹興酒而得到博士學位的山崎百治，他便是在學藝社與日本的文化事業部之間的最賣力氣의周旋者。記得也像是一九二四年末或者一九二五年的年初，爲學藝大學募款事相當熱心的殷汝耕，曾作過一次東，邀請那位紹酒博士，和另一位在滬的日本大實業家，在他

相好的一位長三家裏。在座的不用說都是學藝社的要人們。

那是位廣東姑娘，據說是當時的「花國狀元」。門面倒很講究，面貌也還豐腴，但名號雖叫「狀元」，胸裏卻沒有幾珠墨水。

「狀元」既是紅姑娘，自然外局很多，在開席時會侑過一巡酒，接着便出去應局去了。直到我們席罷之後，她又才回到了自己的狀元府來。

有人和我開玩笑，向她介紹。

——「這是有名的文學家，郭先生啦。」

——「嘻嘻，夷家知道。」她說着便從茶几上取了枝筆來在局票上寫了一個「郎」字。

——「照嘻嘻格個 Kuo 字，嘻嘻嘻嘻。」

這假使是有意賣俏，倒也別有風韻，但其實是寫了別字的。字畫既歪斜，結構也有點詭異，身當其境的人立地便可以看出。

我自己對於募款是絲毫也不能盡力的，只是兩肩荷口地吃了不少次的中餐西餐乃至日本餐。此中自然也有的是日本人的回席。

但是日本人究竟是白手興家的苦勞人，他們的錢沒有「洋記」那樣的鬆汎。雖然交際是相當頻繁，

空氣也很可樂觀，要由日本民間捐助十幾二十萬的消息始終在醞釀着。然而「其雨其雨」地鬧了半年以上，日頭畢竟是呆呆的。

那也是理所當然，一個人要真正有了餘力，然後纔能顧到鄰人，國際間的關係又何得兩樣？我們在日本受過教育的人，日本的情形，多少是應該了解得一點的。別人自家都還有許多問題須待解決。例如上級學校之供不敷求，連中學的入學試驗，其競爭的激烈，上而於教育行政的主腦，下而於應試子弟的父兄，都是一樣地痛頭的資料。就拿小學的義務教育來說吧，因家貧連中食的「便當」（飯匣）都不能攜帶的「缺食兒童」，因沒有戶籍竟無資格入學的失學兒童，正不知凡幾。

荏苒之間也就到了五卅。雖然滬上各學界一時罷了課，然而在暑假期中要在上海各報上大熱鬧一下的各學校的招生廣告，照例也熱鬧了起來。在這廣告的競賽中也就有了學藝大學的一份，校長是王兆榮，預科主任兼教務長的是范允臧，文科主任便是我。招生廣告上是列出了這三個名字的。

王兆榮號叫宏實，也是留東同學，他在「五四」前一年以反對中日密約而回國的。在上海曾辦過救國日報，後來便在北京教育界裏做事情。他是專為辦學藝大學由北京南下的，當時的北政府已經任命他為四川教育廳長，他都辭掉了。

允臧一向是在商務編譯所裏任事，也為辦學藝大學事辭掉了那邊的職務。

這兩位同學的破釜沉舟，公爾忘私的勇氣，是使我私心佩服的。雖然他們的教育方針和我所懷抱的並不一致，但我是把我自己的意見滅沒了，一意地當了個蒼蠅，附隨在他們的尾巴上。

方針是怎樣的呢？前面已經說過，是『抗流而起』，而且是抗到了有點驚人的程度。在招生廣告上已經就寫明白了，不收女生，入學後不准參加政治運動，資格的限制毫不苟且。

這樣的辦法在我自己是感覺着危懼的，我怕的是不會有人來。但同學們很堅決，他們並不是想做生意，是想教育真正的『英才』，應募的就只一兩個人也都要辦下去的。確的，我覺得這也是一種辦法，在求學時代便有那種特立獨行的精神的人，大約將來也會是非凡的人物，更何況『鶴立鷄羣』那樣鮮明的對照或者還可以收些逆效果呢！

然而究竟是危懼佔了優勢。能够超越乎時代的『英才』看來，實在是少。招募的結果，應考者雖然不只一兩個人，但把預科和本科合計起來，所得到的學生還不上三十位。校址是租定在靜安寺路西頭的一座公館裏，位在民厚北里背後西手的街角上，在那兒與靜安寺路交成十字的那條小街名，我可忘記了。公館相當寬大。進門後，沿街一帶是一列三層樓的房子，樓下作爲辦事室，二樓作爲講堂，三樓是圖書室。隔着一個寬闊的草場，又有第二棟，是一列二層建築，樓下禮堂兼食堂，樓上學生的自修室兼寢室。在這前後兩棟之間，右手是一帶平房，沿着那忘記了名字的街。左手是一條有屋頂的通道。

學生既少，因為都是一年級，教員也就沒有幾個人。記得由我所找的，有教言語學的方光燾。由校長所找的有教德文的常雲涓，教社會學的李劍華，何魯來兼了幾點鐘的數學，曾琦兼了幾點鐘的國文。外加上我們三位。如此而已。

說也奇怪，教職員中除掉范允臧，方光燾是浙江人外，其餘的都是四川人，一個學藝大學就有點像是四川同鄉會的延長。這在當時並有人說過閑話，連我自己直到現在寫到這兒為止，都不曾感覺到有什麼異樣。這些地方倒很足表現，當時學藝社幹部諸人間，友情是怎樣地純厚。

開學了。學校的董事，教職員，學生，綜合起來，不上五十人，也還濟濟跄跄地聚集在一堂。行了開學禮。校長致了訓辭之後，又由他挨次請董事演說，請教職員演說。這又把我苦着了。我本來是害怕演說的人，而又全無準備。宏實校長大約也就是要想給我以相當的準備時間吧，他一直把我留到最後去說。簡單的腹稿打了好幾次，以為要指到我名下來了，但一指卻又指到了別人。人是同此心，心是同此理的，一個開學式那經得起十幾個人演說呢？

但我也不再像在杭州省教育會演說時的那樣着急了。我是經過五卅怒潮滌蕩過來的人，在那高潮期中講演過好些次，不知不覺之間也就把那妙竅懂到了。的確的，你總要目中無人才行。儘管有多少羣衆在你面前，他們都是準備着讓你吞的，你只是把他們吞下去就行了。怎樣吞法呢？我告訴你，你的聲音總要

宏大，語句總要簡單，道理總要武斷。愈武斷，愈有效果。最好要辦到一句便是一個口號。喊口號的方法你總是知道的吧？那照例是要有宏大的聲音的。但一味的宏大也不行，你總得要有抑揚，而且要先抑而後揚。一句話的表達要這樣，一場演說的表達也要這樣。——再說一次，總要先抑而後揚。而落尾處你把聲音放大，在愈武斷的地方你愈把聲音放大，包管你是要受着熱烈的喝彩的。千切不要貪長，千切不要說理，千切不要先揚後抑，這些都是催人睡眠的東西。懂得這些妙竅，儘管有多少羣衆都不够吞。人少，少得僅僅四五十人，等於一口稀飯了。

率性便把我那次的演說引來做個實例吧。——爲什麼隔了十幾年依然還能記憶呢？這卻不能說出個所以然，大約因爲是毫無道理的詭辯吧。

我說：我們辦學校，人要求其多，心要求其少。古人說「紂有億萬臣爲億萬心，周有臣三千爲一心。」我希望我們眼前的三十人的同學，從今天開學以後，便把大家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要成爲一個心臟。（這兒把聲音放大了一點，於是乎一次鼓掌。）

——但我們的同學僅僅三十人，或者大家會嫌其少吧？或者大家都覺得有點難乎爲情吧？一點也不。英國的卡萊爾說過：英國寧肯犧牲印度，不肯犧牲一位莎士比亞。莎士比亞是有名的大文學家，諸位想來都是曉得的。我們單拿印度的人口來說吧。那兒據說有兩萬萬人。英國寧肯犧牲印度，而不肯犧牲沙

士比亞，豈不是一個莎士比亞的價值，抵得過兩萬萬人以上。」（聲音放大，鼓掌。）

——「因此，我希望我們的同學，從今天起便放下決心，要人人都成爲莎士比亞。」（鼓掌）

——「那嗎，我們這三十個人，不是就有六十萬人以上！」（鼓掌）

——「六十萬萬人是我們中國的人口的約略十四倍，我們如造出了三十位莎士比亞，不是就等於造出了十四個中國嗎？」（熱烈的鼓掌）

——「所以，我們一點也不要覺得難堪。我要再說一遍，我們的心總要求其少，而我們每一個人的身上總望要生出孫悟空的毫毛。」（聲音特大，點頭下台，鼓掌聲不絕。）

我原說過是講不得道理的，這段小小的演說，你如要拿道理來給我講，那可以說每一句話都是不通。然而，不管那些，大家都是替我喝了彩的。在行禮畢後，有一位董事拉着我的手說：你今天的話，講得最好！

然而，事實卻也真是勝於雄辯。我儘管在說，心要求其少，要把三十個人打成一片，其實這是比一個人抵得上兩萬萬人的話還要誇張的。一個人要求其只有一個心，已經是不可能的事體，更何況人數還有三十！據我所知道的事實說來，那三十個人的同學，也就和其他的三百人或三千人的學校情形一樣，至少是分成了三派的。

一派是國家主義者，崇拜聖人會琦。此派的領袖是一位寧波學生，他的成績最好。我有一次上學生自

修室去，在他的書桌上，看見曾琦的像是裝在玻璃匣裏被供奉着的。

一派是非國家主義者，自然也就不崇拜聖人曾琦。曾琦那時在辦醒獅週報，雖然僅僅小報一張，所用的洋紙卻十分講究，而且每期都有他的雄文登載着。學校的規定雖是不談政治，但聖人所教的國文教材卻就是他的醒獅。他每禮拜向各位學生各人奉送一份報，就把自己的文章來當場宣講。崇拜他的人，自然是如聽綸音，但不崇拜他的在背後也就有些煩言。也是在修室裏見到的現象，我有一次在四川學生的書桌上看見展放着一張醒獅，但在曾琦所做的文章上用紅水筆批了六個字：「獅子狗兒放屁。」

另外還有一派便是無所謂派了。這一派論理倒應該是本學校的最理想的學生，因為他們對於政治的趣味可以說是等於零。然而他們的頭腦也差不多就是等於零的，不忙說一個人要抵兩萬萬，就希望其能和一位紅頭阿三比比，恐怕都有點困難。

看來，我們人，倒的確是一種「政治的動物」(Zoo-politician)。何以呢？因為除掉了「政治的」，便只是「動物」而已。

學生雖然有分派，但也還相安無事。尤其教職員們，大家是客客氣氣的。

在食堂後壁正中處，有凹進去的一段地方，開學時是設過禮壇的，平時卻設了一架乒乓台。吃過中飯後，大家都走到那兒去打乒乓消遣，沒有先生和學生的分別。

李劍華的乒乓本領，最是助人消化的一種藥料了。

劍華是日本早稻田大學出身，在教職員中人最年輕，身子也矮小輕便，不知怎的，打起乒乓來卻那樣地要人死活。他運用球板時，不是運腕，不是運肘，而是運用全身。他把右手上的膊緊緊地挾着，肘也不動，腕也不動，球來了，便跳動身子去將就。發球是這樣，接球也是這樣。一個球總要打脫三兩次，十個球也接不上一個。打得最好的是由柏林回來的常雲湄，和崇拜聖人的那位寧波學生，李先生一遇着了他們，更是弄得疲於奔命的。他們故意要擺布他，打得來半個桌面只見球也在跳，人也在跳。這喜劇倒弄得來頗有悲劇的味道了。

兼課的外來講師，何魯、曾琦、方光燾，他們是不參加這種遊藝的。宏實要保持他的校長的尊嚴也不便參加。但是校長倒也並不是怎樣不通方圓的道學，別種的逢場作戲他也還是喜歡來，而且是來得很熱心的。

那時候在上海灘上風行着詩謎，單只大世界一個遊戲場裏，所設的詩謎攤子就有着好幾處。這詩謎想來凡是稍微認得幾個字的人大概都是懂得的。不過我在這兒也不妨學一點『小說家』的技倆，專把萬人所曉得的東西來描寫一下。

先把一首舊詩來，掩掉其中的一個字，而把這個字和其它假擬的幾個字混在一道揭出，讓你去猜謎。

面的詩句如是五言，謎底的字彙便要四個，七言便要六個。在謎面上有時也有掩去兩個字的，謎底自然便是雙套。

這不用說是一種賭輸贏的遊戲。在大世界那些小攤上，賭者用銅元和銀角子，莊家是以香煙賠償的。賭法有孤注與搭注之分，在謎底中單賭一字者爲孤注，如猜中了，莊家見一賠三。兼賭二字者爲搭注，如猜中其中之任一，莊家只見一賠一。

我自己偶爾也有到大世界去消遣的時候，從那詩謎攤上，每每要贏他一兩筒的『白金龍』回來。那些地方的謎子實在太籠腳了，有些死不通的字彙也用來做謎底。然而詩謎攤總那樣多，足見設攤的依然要賸錢。那是理所當然的。因為到那兒去壓詩謎的人多是么二女士和癩三男士，他們並不問你字句的通不通，其實有多少連字都不認識，只是和賭單雙有無一樣，猜着好玩而已。賭單雙有無，莊家和閑家是一與一之比，機會相同。可說完全是靠運氣。詩謎卻不同，閑家和莊家卻是一與三或一與五之比，雖然閑家贏了孤注，莊家要見一賠三，在那兒的機會依然要多你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所以詩謎攤總是日見加多，而且擴展成爲大規模的賭博，和瘟疫一樣，在上海灘上風行了起來。

有一天，像是十月尾上了，在已經罷課之後，校長約我和允臧兩人往大世界鄰近的一家四川菜館去吃晚飯。在飯後走出店門時，無心之間卻遇着了蒲伯英。他也是吃了晚飯，剛好走出店門的。他是我們四川

最後一科的解元，反正時曾做過幾天四川省的都督，後來在段執政時代（？）又做過一次北政府的教育部次長，那時從北京到了上海，不曉是有怎樣的公幹。

他和我們遇着，便約着一同去打詩謎。我還以為就是大世界裏面的那些賭香煙的詩謎了。然而被他一引，卻引上了一處臨街的三樓，在大世界的斜對面。

樓上是前後兩大間。後間的一側隔出了兩三間小房，房前陳設着兩張大圓桌，一些斯文中人正圍坐在那兒開晚飯，又有伎女樣的女子雜在裏面。有濃厚的雅片煙的氣味。想來那些小房間一定是芙蓉城了。沿着另一側的樓壁通向前間去，那兒正中更圍集着一大堆人，滲進去一看，原來也就是打詩謎的，是在一張大餐桌上。但這兒所賭的輸贏，不是銅元角子和香煙，而是大洋和鈔票；注子竟有大到三四十元以上的。看了，不禁使我大吃一驚。

「這不完全是賭博嗎？」

「可不是。像這樣的，在上海灘上有二三十家，每家每晚都是有幾千塊錢的輸贏的。」

「是公開的？」

「那裏！不過上海的情形都是這樣，只要你懂得門徑，沒有什麼公開不公開的。」

在當場遇着一位朋友S，他是報界中人，對於我的疑問替我解釋了一番。

再看同來的人時，蒲伯英已經在上陣了。他很勇猛，回回都是壓孤注，注勢都來得很大。但接連四五回他都失敗了。

所出的詩謎自然高明得多。有時也有一兩個謎底實在不通，不通到誰也不肯去壓。然而揭曉的時候，卻偏偏是那頂不通的一個字。衆客便都不免譁然起來，要求看底本。底本拿出了，的確是「有詩爲證。」書不用說是相當有點年辰的古本子，好像是什麼時代的檻詩人，專爲預備後人出詩謎賺錢而印的一樣。宏實和允臧站在蒲伯英背後，替他做顧問。但宏實的右手不知幾時已經是捏着錢包的了。他左手理着他那很有愛嬌的鬍子，豁朗着一雙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齒向着我笑。

允臧把左手向我拐了一下，他悄悄地對我說：我借給你。

我看，還是到對街去打白金龍吧。我也一樣地悄悄地對他說。

豁朗着眼睛的宏實，關心到我們所說的話，連忙向着允臧問。允臧又悄悄地告訴了他。

「好的，我們去。」宏實就像解決了很大的難題一樣，立地踴躍起來，便領導着我們開始出發。

隔了兩個鐘頭的光景，三個人由大世界走出，要坐黃包車分手的時候，宏實的右手捏着了兩聽白金龍，左手又在理着他那很有愛嬌的鬍子。他向着我說：

「好不，我們明晚上再來，咳！」

依然豁朗着一雙眼睛，露着雪白的牙齒，在笑。

洪水半月刊的刊行要算是第二期創造社的事實上的開始。（注意：以後還有第三期。）這個開始可以說是創造社的第二代，因為參加這一期活動的人，都是由國內新加入的一羣年青的朋友。在那時，第一期的一些成員有多數還在日本留學，而回了國的幾位又是分散了的，只有我一個人住在上海，但我卻是最不努力的一個。

真的，我並沒有直接主持其事，就連那創刊日期，我都只能約略記得是在五卅以後。不過這個五卅以後的創刊，其實已是洪水的復活。洪水的第一次創刊還在一年以前，是創造週報停刊了，我跑向日本去了的時候。主持者是周全平、敬隱漁、倪貽德諸人。我那時做了一篇資本主義與盲腸炎寄給他們，是在那創刊號上發表了的。但那次的創刊卻僅僅出了一期便中止了。一年以後，幾位年青的朋友又捲土重來，而我所取的仍只是旁觀的態度。這理由，在洪水這個名詞的解釋上，也就是表現着的。雜誌之所以命名為洪水者，本是出於周全平的心裁。他這心裁，我知道得最明確，是醞釀於他在當年替某教會校對過一次聖經。上帝要用洪水來洗滌人間的罪惡，聖經上有這種意思的話，這便是那心裁的母胎了，所以「洪水」者洪水也。

並非時人所斥爲「洪水猛獸」者之「洪水」也。

故爾在第二次的創刊號上他們要我做篇文章，我也沒有做，結果是那資本主義與盲腸炎又重被揭載了一次。這樣的發軔，在上海方面自然沒有得到好評，刊物傳到了當時的北京，也同樣使人失望，連吳稚暉都在報上洩露過不滿意的話。因此我才覺得自己的消極冷淡之有點近於罪惡，辜負了大家的期待而且使朋友們也難乎爲情，於是我又才從旁把柁輪捉着，把那偏向着「上帝」的「洪水」向着「猛獸」的一方面逆轉了來。

我大約是從第三號或第四號起，才開始做文章的。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馬克斯進文廟，文藝家的覺悟，新國家的創造……那一聯的文字便絡續地出現了。

除我自己而外，我又把漆南薰和蔣光慈也拉來參加了。他們的參加，不用說，是使洪水，否，不僅洪水是創造社整個更改塗了一番面貌。

我和南薰的關係，在前面已經說得很詳細了，我現在要說到光慈。

光慈，初名本叫光赤，這大約誰也是知道的。他是安徽人，當時才從蘇聯回國不久，在上海大學擔任教課。他和我的交際是怎樣開始的，我現在怎麼也想不出來，只是我有一次和達夫兩人去訪問過他，他也有一次和秋白兩人來訪問過我，我是記得較爲明晰的。

我同達夫去訪問他時是洪水創辦才不久的時候，達夫不記得是因為什麼事體到了上海，我們在那時曾短聚過幾天。有一天上午，我拉着他，一道往法大馬路的明德里去。

天氣很晴朗。我們走向那弄堂一隅的絕底，在一家大門上正在扣着門環的時候，光慈先從側面的樓窗上望出，看見了我們。他是賃居在那兒的。樓房是在上海成爲了公式的二樓二底的側樓，有點像伸着懶腰的懶貓一樣，腰身過分的長。但因那家屋子是在弄巷的邊際，遂得三面開窗，光線是洋溢着的。

房中沒有什麼裝飾，只在近門的一頭安了一張床，另一頭靠壁的窗下，和床的軸線成正交地放着一張書桌，周圍有幾張坐椅。書桌後面靠壁是半壁書架，不十分整飭地擺着些西書和新刊的雜誌之類。

桌上最惹人注意的是擺着有汪精衛和蔣介石的像，像是印在明信片上的，同嵌在玻璃匣裏。蔣的像我是第一次看見，是經了主人的說明才知道的。他說：「這兩位真了不得，簡直是中國的列寧和托洛次基。」我們自然也跟着讚嘆了一陣。真的，在那時，無論是贊成或反對，誰不是把廣州當成了莫斯科的呢？

他那時正在校讀我所譯的屠格涅夫的新時代，俄文原書和我的譯本一同攤放在桌上。校讀得還不多，有些地方略略有點修改，他特別指出一處向我說明過，是那開首處奧斯突羅杜摩夫走進涅暑大諾夫的寓室的時候，我的譯文寫着「坐到一個椅子上，在抽屜裏抽出一隻快要壓扁了的香煙出來。」（譯書二頁九行）

光慈對我說：「抽屜在原文是作荷包，這一定是譯錯了的，來客初進人的房間也不會從「抽屜」中去找香煙喫。」

他說的十分在理，那不用說是我譯錯了。我便請求他詳細地把全書校改一遍，做篇文章在洪水上發表，同時我也可以做個勘誤表請求出版處挖改字版。光慈是欣然承應了的。但他日後卻沒有踐約。這自然是因為他過於忙碌了，沒有多的閑工夫來做這種義務校對的事情；但在我，就單只這一事也已是增加着悵惘的迴憶了。

古人每愛說「文如其人」，然如像光慈的爲人與其文章之相似，在我的經驗上，卻是很少見的。凡是沒有見過光慈的人，只要讀過他的文章，你可以安心地把你從他的文章中所得的印象，來作爲他的人格肖像。他爲人直率，平坦，不假虛飾，有北方式的體魄與南方式的神經。這種人，我覺得，是很可親愛的。可惜太死早了一點。假如再多活得幾年，以他那開朗的素質，加以藝術的洗練，「中國爲甚麼沒有偉大作品」的呼聲怕是不會被人喊出的吧？

方塊字往往要在不必要的程度上誤人。Economics 被意譯成「經濟」，往年的經濟學教本在開宗明義章便要大講其「經國濟民」。Romanticism 被音譯成「浪漫」，這東西似乎也就變爲了一種「吊爾郎當」。阿拉是寫實派，儂是浪漫派，或則那傢伙是浪漫派，接着是嗤之以鼻，哼了。不過近幾年似乎

「浪漫」也走起了運來。原因呢？大約是由於我們的高爾基，他很在替「浪漫派」張目吧。貓兒眼照例是容易變的。

但我卻要佩服光慈，他在「浪漫」受着圍罵——並不想誇張地用「圍剿」那種字面——的時候，卻敢於對我們說：「我自己便是浪漫派，凡是革命家也都是浪漫派，不浪漫誰個來革命呢？」

他這所說的「浪漫」大約也就並不是所謂「吊爾郎當」，但他很懇切，他還怕我們不能理解，又會這樣爲我們解釋過幾句：

「有理想，有情熱，不滿足現狀而企圖創造出些更好的什麼的，這種精神便是浪漫主義。具有這種精神的便是浪漫派。」（大意如此，就作爲我自己的話也是無妨事的。）

光慈的確是這樣的一種人；可惜實在太死早了一點。而在把他對於結核菌的抗鬪力，減弱了的一點上，「圍罵」怕也是相當奏了一點功效的吧？

我眼睜睜地看着文字在殺人。「浪漫」、「才子」、「詩人」、「標語」、「口號」、「洋八股」……這些字眼如用羅馬字寫出來，都有 Guillotine（斷頭台）的發音。

光慈有一種奇癖。凡是見過他的原稿的人總會注意到它是被寫得異常整齊的，一個字的添改剜補也沒有。看那情形誰也會以爲是起了草稿又謄寫過的東西，但他卻說他是決不打草稿的人。他說，他寫東

西在中途錯落不得一個字，錯落了往往會使全篇文字流產。因此他的文章是不肯修改的。有幾次請求他修改，但他說與其修改，寧肯毀稿。這，我總覺得是一種奇怪的癖氣，但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矯情的說辭，和他的私生活更會接近過的朋友，我希望能夠寫些東西出來爲我證實。

嚴格地說時，光慈的筆調委實太散漫了一點，那種筆調做長篇小說倒還可以敷衍得過去，做短篇小說便不甚相宜。因此他做來希望洪水的文字便每每有被退回的時候。而編洪水的幾位年青朋友，尤其是有點忌避他的：自然是因爲他不僅「赤」其名，而且是「赤」其實了。

他和秋白兩人的來訪又是在我的窮漢的窮談，共產與共管，已經闖出了筆禍以後了。這筆禍倒也並不是因爲干犯了當時執政者，而是因爲干犯了一位學藝大學的董事先生。且讓我在這兒簡單地追溯一下吧。

學藝大學的董事共有十人，其中有一位姓林名駿，表字植夫，別號靈光者，乃福建人氏，由日本東大農科畢業，曾在哈爾濱辦報，與「十大學教授」之一人王新命有同寅之誼，由安那其轉入國家主義者也。一九二四年寄寓上海，在商務印書館當編輯。創造社辦創造報，他以靈光之名曾聯續發表過幾篇給青年的信，因爲後來論到了要求恢復約法，要求裁兵的濫調上來，我們實在沒法顧情面，把稿子退還了他；他便在孤軍雜誌上寫出文章來罵了我一頓。我有過一篇笑劇式的短品，名無抵抗主義者的，即以此君爲模特

兒者也。

隔了一年，因募款出力，榮膺學藝大學董事。照例是在孤軍雜誌上發揮着淋漓的大筆。不記得是一篇什麼論文了，那裏面在痛罵當時的科學的社會主義者爲「窮漢」又大聲疾呼地吼着，中國只要一共產便要受人共管。我在這些文章中感覺着了很濃厚的「幽默」味，因此也就不免多事，寫出了上述的那幾篇閑文字來。

自己的文字記得也還寫得相當「幽默」不過在打着「幽默」招牌的專門名家看來，或者又會說「只是那一套」但是，管不得那許多。我是說，唯其是「窮漢」所以才要來鬧點亂子，不窮誰個肯去幹那種傻事，弄得自己家喪人亡，還要把一個腦袋子準備給別人拿去建功立業。又說「共產」與「共管」的關係似乎只是雙聲與疊韻的關係，據我的看法，中國是不待「共產」已經老早遭了「共管」我們的作爲國家而存在的太上支配權已經是老早被操在了別的一些什麼人手裏。問題是與其去擔心着莫須有的什麼「共產」倒還是應該努力取出什麼方法和行動來消滅這種實際上的「共管」云云，云云。

就只是如此這般的一些戲作，倒有點近於「土八股」——此其所以「幽默」也——然而卻又觸犯了我們董事先生的逆鱗。董事先生又在孤軍上大做其長篇高調的檄文，連那題目都已經够長，公式是「論什麼的什麼，以質問共產黨，兼質問郭沫若。」這一長槍殺下來倒還容易招架，因爲他殺的只是風車。

公平地說起來，我這個人究竟要比靈光狡猾得多。前面已經說過，學藝大學的經費，全靠募款所得的，是很有限的，學生又少，收入自然說不上來。因此在僅僅開辦了三個月之後，經費便支持不來，十一和十二兩個月的教職員薪水便不能不拖欠了。我在這時是靠著賣稿過活的，正苦於礙着朋友的情面，沒有抽身，而身為董事的靈光先生卻在他那長篇高調的檄文裏面授了我一個話柄。

我在這兒需得先行聲明，我在學藝大學任上的薪水，每月是一百五十元。那十一和十二兩月份的欠薪在隔了兩年之後的一九二八年正月，我已經失掉了自由，在上海生了一場大病的時候，沒錢付醫藥費，是由宏實校長補發了的，雖然那時候學藝大學已經早已不存在了。這層我是應該在這兒特別聲明，而且表示着深厚的謝意的。

董事靈光說：『一個人每月坐拿一百五十元的薪水，怕也不配說是「窮漢」吧。』

這話如譯得通俗一點，便是：我董事老爺每月賞你百五十塊錢的大，你還不識抬舉的小，三還要吵『窮』嗎！

言外之意是：媽的，你給我混蛋！

是是，董事老爺，我就混蛋！

正在苦於脫不了身的我，真是得到了一個天來的救星，你怕我不够狡猾，我還不會把捉着這個機會

因此我便向校長辭了職，把第一學期教滿之後，還我初服，坦坦白白地大做其「窮漢」焉。

關於學藝大學還有一兩件事情值得紀述，我順便在這兒寫出吧。第一是學校的招牌出於海藏樓大名士鄭孝胥的手筆，其次是把自己的藏書寄贈於學校圖書館的第一名社員是殷汝耕閣下。真真是「無巧不成雙」。這兩位先生，曾幾何時，竟先先後後成爲了「萬年」式的人物，長垂青史了。

光慈陪着秋白的來訪，是在我已經辭掉了學藝大學以後，但是，是在一九二五年的年底，還是翌年的年初，我不記得了。只記得是在午後一點鐘的光景，是頗陰晦的一天。我正坐在樓下的小堂屋裏看書，他們突然進來了。光慈在先，秋白在後，秋白戴着一付藥片眼鏡，一進門便取了下來。

秋白的相片早是看見過的，光慈雖也簡單地介紹了一下。

小堂裏只有正面有一堵窗，正對着外邊的鐵柵門，在那窗下擺了一張長條的西式書桌，是達夫住在馬霍路的泰東編輯所用過的，我把它要了過來。（現在這張書桌我相信是在周全平家裏。）我就在那書案前正對着窗口坐着，秋白從右側的門口進來，便在門次傍桌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了。光慈也從正中的小圓棹旁拉了一張椅子來，一同湊緊地坐着。

秋白的面孔已經是很慘白的，眼框的周圍有點浮腫。他有肺病，我早是曉得的，看到他的臉色卻不免

使我吃驚。他說，他才吐了一陣血，出院才不久。

我那時的意趣是集中在政治問題上的，因為在和孤軍派醒獅派的那些國家主義者論爭，目的總是想怎樣地去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的迷信和其催眠力。

同樣是主張國家主義，在社會的聲名上醒獅派雖然賽過孤軍派，更幾幾乎有獨佔的形勢，但在實質上孤軍派的人實比醒獅派的人高明得多。醒獅派的人只會做幾句文章，慣於用些慷慨激昂的筆調以挑撥青年的愛國情緒，說到實際的主張上來是空空如也的。

他們也有兩個口號，叫「內除國賊，外抗強權」在表面上，似乎也就是「打倒封建軍閥，打倒帝國主義」的閻墨式的翻譯。然而，他們一方面可以和當時的軍閥巨頭孫傳芳攜手，而對於吳秀才也在送秋波，則他們所「內除」的「國賊」乃反抗軍閥的那些「國賊」也。在另一方面，他們又反赤最力，把蘇俄甚至廣東都視爲「洪水猛獸」，則他們所「外抗」的「強權」乃企圖打倒帝國主義的那種「強權」也。假如開門見山地這樣說出來，中國的青年並不那麼易騙，但他們的錦囊裏有的是美辭麗句，嗚呼噫嘻，儘能道其所道，德其所德，故爾也儘足以麻醉得一部分青年。

他們，尤其首領曾琦，也唱導過飛潛政策，便是天上用飛機，海裏用潛艇，用以應付外來的進攻。這在作爲舊日的秋闈中應時的策論一道看，或者倒可以微幸備薦，然而說到實行上來，可羨我們的聖人似乎把

飛機當成了鷓子，潛艇當成了魚秧，那些東西似乎都是從自然界孵化出來的一樣。

在五卅前我自己沉默着的時候，因友人的招待，和曾琦在消閑別墅同過一次席，他那時不知道是誠心還是客氣，曾向我徵求過文章，希求在他的醒獅報上發表。（記得錢玄同也曾說過「郭沫若會琦那一批國家主義者」的話。）

——「我和你們的見解不大同，」我這樣對他說，接着又把當時蘇聯所施行的「新經濟政策」敷衍成了我所憧憬的理想：「我是想用國家的權力來推行一切的基本產業，而這國家是要從新創造的。」

——「那不正和我們一樣？」聖人的痰音高興地說：「請你盡量寫出來，在我們的報上發表。」

我在心裏只好暗笑。

但在孤軍派便迥然不同，像這種烟幕是不能蒙蔽他們的。他們大抵是從日本大研究過經濟學回來的人，其中還有好些是河上肇的弟子，他們對於河上肇的初年的學說是實地信奉着的，以為資本主義的揚棄非經過一道個人資本主義的階段，絕對不能實現；所以要振興中國，根本是須得勵行個人資本主義。他們就為中國的經濟路線曾經舉行過長期的討論，連我都是參加過的。討論的結果，主張採仿蘇聯的辦法勵行國家資本主義的就只有我和林伯修（當年的杜國庠）兩人，其餘都是反對派。因而孤軍派的經濟政策便由周佛海所想出的巧妙的名詞來模稜了，那綱領便是什麼「社會的產業化和產業的社會

化，「這個半頭紅蘿菔，如把一層皮剝掉，不外是個人資本主義的獎勵與保護而已。所以孤軍派的國家主義，如說得更切實一點，是國家社會主義。」

有好些皮相的人，直到現在對於國家資本主義與國家社會主義每每要起着感情上的絞線，有的人看着「資本」兩個字便要蹙額，又有的見到「社會」兩個字便要白眼，此醒獅派的聖人之所以要叫我做文章的原故了。然而孤軍派的人，像這點皮毛，他們是懂得的。

孤軍派的人有一個共同的信仰，便是學習日本和土耳其。

日本採用個人資本主義，僅僅幾十年工夫便成了功，這是人目所共見的事情。日本不好是我們的指路碑嗎？我們應該學習日本，這也並不是孤軍派諸人的特見。自甲午中東之戰以來，這種傾向早是成爲了我們中國的國是的。可以說像我們自己這一代便是在這種國是中被陶冶出來的人。三十年來，年年都有幾千人到日本去留學，畢業回國的自也不在少數。然而仿效的結果呢？依然是枉然。

有的人歸之於人，以爲日本明治維新期的一批人物都是好人，因此我們中國也應該在人材的精神方面着想，便主張着組織好人政府。

孤軍社的人則歸之於法，以爲日本的法律嚴明，憲法早就頒佈，人人都有法以爲皈依，故國事容易上軌道。滿清末年漫無法紀，民國成立以來雖有約法，但屢經毀棄，等是弁髦。這便是中國之所以不長進，故爾

他們極力主張恢復約法。只要約法一恢復了，在他們看來，中國的布爾喬治德謨克拉西便可以建立起來，中國便可以順暢地走上日本所走過的路。

這些，自然都不失爲一種愛國的見解，前者是所謂『有治人無治法』，後者是所謂『有治法無治人』。在某種共通的條件之下，這兩者委實都是可以實驗成功的。然而這個共通的必要的條件，他們兩派的人都把它看脫了。條件是什麼呢？那是說要有完全地或近於完全地和外界的影響絕緣了的一個實驗場所。只要沒有外來的影響來擾亂，無論好人政府也好，約法政府也好，都可以或早或遲地把中國興盛起來。然而中國這個實驗場所和外界的影響是絕緣了的嗎？百年以來的世界趨勢和中國局面用不着再縷述了，必要的條件分明是缺乏着的。把這種缺乏都不放在眼裏或甚至盲昧無所睹，只在治人治法的畸輕畸重上兜圈子，真可以說是等於痴人說夢。

日本的明治維新之所以得到成功，治人治法之兩得其宜，誠然是不可否認的因數，然而他們的實驗場所卻和我們的不同，而是近於完全的絕緣體，也同樣是不可否認的。在六七十年前發生着『黑船事件』，劃口通商，允許過外國人以治外法權等等的日本，其以半殖民地的風貌出現於世界也，和我們實在是難兄難弟，但不幸中之幸，卻有所虧得。我們中國人所並不缺乏的悲歌慷慨之士，對於日本人要洩洩氣的時候，直到現在不是都還能提起筆來，蔑視之爲『彈丸蕞爾之邦』嗎？就是這同一的心理了！那已經

人滿爲患的幾個島子，在殖民的價值上那裏趕得上我們？因此在日本民族覺醒了自行振作起來了的時，歐美|人倒也滿不在乎，他們樂得有我們這個太牢在手，無暇去爭吃小鮮。有了這種近於完全絕緣的條件而又益之以治人治法之兩得其宜，此明治維新之所以成爲「近代的奇績」也。

我就像坐在書齋裏的浮士德一樣，把秋白和光慈作爲自己的聽衆，在那兒唱獨白。

秋白是很寡默的，他只說我的意見是正確的，可以趁早把它寫出來。

但關於土耳其方面的情形，我便有點隔膜。我的直感是土耳其的改革之所以成功，也是由於近東問題已被解消於遠東問題的原故。反正是我們中國當了撐天的長漢子。

我希望秋白給我些關於土耳其方面的資料，他答應了，並說隨後檢出，由光慈交來。

秋白那時是把新青年雜誌恢復着的，注重在文化一方面的問題。做文章的似乎就只有他和光慈兩人，他希望我們也做些文章去。但那復活的新青年似乎只出了兩期的光景，以後又停頓下去了。

零碎地又談了些俄國文學，秋白勸我翻譯托爾斯泰的戰爭與和平，他說那部小說的反波拿伯主義，在我們中國有絕對的必要。我那時還沒有讀過戰爭與和平，並有點小兒病的地不高興托爾斯泰，因爲他是貴族還又倡導無抵抗主義也。秋白的勸說，我在三年後是遵從了的，但可惜那書只譯了三分之一便中斷了。目前精通俄文的朋友已經不少，七分生意三分文化的那種出版家之出現，都是我們所渴望着的。

談了有一個鐘頭的光景，秋白說他另外還有事情，便又和着光慈一道告辭走了。

不久便在報上看見秋白到了廣州的消息。又不久便有廣東大學聘我的消息傳來，後來陳豹隱對我說過，這事是出於秋白的推輓。但秋白自己卻不會對我說過。

文學和革命的關係，在當時的人多是認為不能兩立的，就在現在，有好些風雅之士依然在維持着這種見解，所謂「反差不多」運動便是這種見解的具體的表現了。這種人的根本見解是以「藝術」或「美」那種東西為先天存在的什麼，這種東西是超絕時空的，因而以這種東西為對象的人也就應該「度越流俗」，於是乎他就不差差不多了。這種着想法，正是典型的觀念論，因為他們把那種由歷史的發展所生產出的東西，不作為歷史的成果，而認為歷史的起源，這和宗教家之信仰上帝是一個模型鑄成的商品。不必遠說到星雲以前，地球以前，人種以前，住在北京的人，為什麼不拿前幾年所發掘出的「北京人」(Cinanthropus Pekinensis)來想一下呢？那時候，有風雅人所說的「藝術」或「美」存在嗎？一切都是「時代」產生出來的，有新舊代謝的機運，不舍晝夜地流行，新的你不敢和它覲面，舊的你把它投射在水甕裏，「時代」自然也就空虛起來了。

八

但在前些年辰，主張文學和革命不能兩立的，倒並不盡是風雅之士。譬如吳稚暉，他便是主張得最激烈的。不過他是站在「革命」的立場說話，雖然他所說的和革命不能兩立的「文學」，其實就是現今的風雅之士所「上帝」化了的那種東西。然而吳稚暉本人的思想，在後來也是稍稍有點變遷的。前兩年他又曾大叫過「文學不死大亂不止。」「大亂」呢？大約也就是有點像革命。能够鬧「大亂」的這種「文學」當然又不是和革命不能兩立的那種「文學」了。一隅可以三反之。

「文學不死，大亂不止。」

「文學死，大亂止。」

「死文學，止大亂。」

「活文學，出大亂。」

所以我們可以說吳稚暉是反差不多運動的元祖，或者也可以說吳老近年來是風雅化了。

真的，當吳老還未風雅化，唱着文學與革命不能兩立的時候，我受了他的反面的暗示，卻想到了文學

與革命的一體，因為人類自發明了言語文字以來即有文藝的表現，人類除非滅跡，文藝是不會滅跡的。在人類社會的革命期，凡是舊有的東西和革命都有點不能同立，倒不限於文學。然而革命並不是把人類的一切傳統革光而恢復到猿人時代以前，它只是把舊有的遺產加以損益，而得着新的成果。新的成果逐次又變舊，又生出更新的，更更新的。因此我於革命文學之外便提到了革命文學，革革命文學。這些異樣的表現，雖然遭受過譏刺，然而我到現在仍然不感覺着它們是怎樣的滑稽。這根本不外是一種由文學的角度所窺察得的辯證的史觀而已，要說它稀奇，我倒反覺得有點稀奇。

我的革命與文學那篇小論文，便是在那種情趣之下醞釀出來的。寫成爲文字雖然是「十五年四月十三日」寫的時候雖然已在廣東，但那起初本來是一篇演說，是在去廣東以前在日本人所設的上海同文書院的中國學生班所講演的，時期記不甚清楚了，總得在那年的正二月裏面吧。那兒所下的「革命文學」的定義是「表同情於無產階級的，社會主義的，寫實主義的文字」，這正是後來所說的「普羅文學」或「無產文學」了。有些朋友竟把我所說的革命文學和普羅文學，分成兩個不同的名物，這是不會看過我的文章，大約也就是出於有意的抹殺吧。

「表同情」三字在朋友間也發生過一下問題。有人把它解成憐憫去了。其實我們中國人所說的「表同情」是說表示意慾上的一致，並非哀憐。這用英文譯出時，應該是 to coincide 而不是 to have

sympathy (憐憫) 幸好在那年的「三月二日夜」我還寫過一篇文藝家的覺悟，末尾的幾句話正好是我自己的註腳。

「我們現在所需要的文藝是站在第四階級說話的文藝，這種文藝在形式上是寫實主義的，在內容上是社會主義的。」

這和近年蘇聯的文藝主流所提出的「社會主義的現實主義」的標幟，似乎也並不是兩樣吧。

那一九二六年的初頭，就因為脫離了學藝大學的羈絆，生活雖然苦得一點，但在精神上卻是自由的時期。在那時代的自己的思想之變遷是有點近於突變的，其前，其實也差不多是風雅之士。就因為有舊日的風雅作為保護色，故我說話作文都兩得其自由。說話的機會是相當多的，記得在婦女節上曾說過三不從，在交通大學的孫總理週年紀念上曾說過三民主義與共產主義。如在日後是頗難出於口頭和筆下的東西都平安無恙地通過了。這是有事實可以證明的。水平線下的初版在一九二八年是遭了禁止的書，被禁止的理由就因其中有論社會經濟的文字，其實那些文字都是在洪水上發表過的。

創造社出版部之醞釀和其得以成立，也就在這風雅還未掃地的時候了。

在這兒且寫一段我到過用直的回憶。

用直在江蘇吳縣的東南境，與崑山接界。那兒的周圍都有水環繞着，但也並不是島子。（這地形，請查

看地圖自明。唐開元時的楊惠之所塑的羅漢還有幾尊留存在那兒，稍稍留心近代文化動向的人，前幾年會發生過的保存運動，大約是還留在記憶裏的。

我早就被朋友們約過，想去鑑賞一下那些唐代的塑像，到了一九二六年的初頭，纔把機會得到了。那是因爲嚴良才的結婚，要往那兒去吃他的喜酒。嚮導是周全平，另外還有常雲涓同路。

大約是從真義下的火車吧，下了火車後還坐了一趟小火輪，然後才到用直。坐船的地方和船的本身都不乾淨，水也照例是江南地方所常見的不甚清潔的水，然而用直於我卻有點像物外的桃源。

去只一次，住僅半天，已有十年以上的光陰流過去了，回憶自然只是些難於把捉的縹渺，然而卻又是這麼的親切。那境地有點像是在夢裏的一樣。空氣是那樣的澄淨，林木是那樣的青翠，田疇的平坦，居民的樸素，使人於不知不覺之間便撤盡了內外的藩籬，而感到了橄欖回味的恬適。

到了用直，自然便落在了良才家裏，宏大的房子相當舊式，婚儀也是舊式的。我們看到新人正在周堂。讚禮者頗是一位新語製造者，他讚呼着——
鞠躬天地——鞠躬祖宗——夫妻交鞠，滿堂的男女賓都未免大笑。不一會又是新人拜客——
鞠躬三躬——鞠躬二躬——鞠躬一躬。

照老規矩，應該是三跪九叩，一跪三叩，不跪徒拜的地方，換成了腦袋子的幾屈屈，太不藝術的地方，這也就是時代的空虛了。在風雅皮還未十分脫盡的當時的我，也曾依稀髮髻地那樣作想，似乎不妨獨創一

下——其實也就是貢紙照抄——來他一個「三抱九接」或「一鞠躬三握」三抱九接者，每擁抱一次，接吻三次；一鞠躬三握者，便是鞠躬一次，握手三下也。自然，也可以因次數之多寡而定禮節之崇夷……一個人正在獨自思索，想入非非的時候，突然之間受了讚禮者的點呼。周圍的人把我一擁，於是也在嚴氏堂上，把腦袋子屈了幾屈起來。跪拜禮也，今也鞠躬，吾從衆耳。再要說到「抱接」在心裏想想，在口頭說說，乃至在紙上寫寫，都還半沙要緊，真要實行起來，那恐怕只好跑進瘋人院了。

在傍晚時分，全平把我們引去看了一次楊惠之的塑像。那是被鎖在一間新修的矮小的平房裏的，門外掛有一道小牌，似乎是楊惠之塑像保存所那樣的字樣。

所內靠着後壁，泥塑的幾尊羅漢，冷洩洩地坐在土面上，覺得和所謂「保存運動」是有點名實不相符的。那塑像如真的要保存，對於原物的護惜自應再加珍重，此外似乎還應該委託現代的名手把它們模塑下來鑄成銅像（原物乃泥質未便直接鑄銅）或則鑄成石膏像以事廣佈，方是道理。不然，儘管怎樣宣傳爲國寶，再不幾年，會化爲烏有的。

嚮導的全平頗有以那塑像之再被認識，歸功於自己的意思。據他說，前幾年顧頡剛在小說月報上所發表的文章——一般是作爲再認識的開始——那兒所插的幾張照片，本是他和良才兩人照的，因良才和顧頡剛相熟轉贈了顧頡剛，顧頡剛便把它發表了。我看這倒是很美的一種行爲了。

惠之據說，在開元時與吳道子同學畫於張僧繇，學成，不屑與吳道子齊名，便轉而爲塑，皆爲天下第一。這話是否可靠，實不敢說。不過，惠之與道子，似乎倒有點像羅馬文藝復興期的米克朗傑洛與拉斐羅，而尤其惠之與米克朗傑洛更有點像一形一影。兩人的作品都有力的呂律之橫溢，儘管受着宗教的題材束縛，而現實感卻以無限的迫力向人逼來，使人不能不感覺着一種崇高的美。惠之，我想他對於人體的筋絡骨格之觀察乃至解剖，一定是相當周到地做過來的。他的藝術的基調，是以極正確的客觀現實爲粉本而加以典型化的誇張，故爾雖誇張而終不失掉它的實感，反是因誇張而增加了它的實感。

遺像大抵是被人補修過的，有一兩尊的頭部尤其一眼可辨。那是通常隨處都可以見到的平滑無表情之塑像相，也是在我們中國隨處都可以見到的活人相，但是看來卻總是死的。不誇張者死，誇張者反活。這一對照，似乎把那藝術活動的機微，被某些人說得神乎其神的東西，是形象化了的。

到了晚間了，我們也被邀進了洞房。

再照老規矩，洞房花燭夜的新嫁娘，理應是『低頭向暗壁，千喚不一回』的。因此，別的地方是怎樣，我不十分知道，其在我們四川，在當夜便大有所謂『鬧房』之舉，那是約略同年輩的男女賓對於新嫁娘的戲謔。他或她們，總要想方設計把新娘惹笑或逗她發聲，謔而失諸虐，甚至——據鄉間的口傳——連鬧出人命案來的事體，都往往有之。

到了晚間了，我們也被邀進了洞房。

在柏林住了七八年回來的雲湄，卻依然舊習未除。他和良才本來是不相識的，被我把他強拉了來，而所以把他強拉了來的原因，也不外結婚那天是禮拜而已。而他卻在打着鬧的主意。

——「你看，」他在走進洞房的途中悄悄地對我說：「我今晚無論陪個說，總要把新人逗笑。我第一步要請她抽紙煙，第二步要請她和我打四圈麻將。」

——「不要椿壳子，你沒把新人當成你的表妹了。」

我們四川人說誇大嘴叫作「椿壳子」，上海話之「吹牛皮」也。走進洞房了。

真正是銀燭高燒，綾羅耀眼，滿屋都是嶄新的陪奩。

新娘雖也是坐在花格床前，但她一看見我們進房便預先立起了身，泛着一臉的微笑。

新郎替我們一一介紹了。

新娘從一張靠壁的條桌上，排有鏡匣磁罍等等的，取了一筒「白金龍」來，先向我們晉菸。我用眼睛向雲湄示意，雲湄反有點忸怩了。

——「郭先生，我是喜歡讀創造週報的。」這是新娘的第一聲：「我喜歡尼采的查拉圖斯屈拉如是

說，爲什麼不把它譯完呢？是思想變了？」

一鳴驚人，實在出乎意外。

全平到這時才替我解說了一番。

原來良才的夫人和良才是舊相識，在某地的小學校同時擔任過教務。他們的戀愛，本是自由了來，而婚禮暫且通俗下去而已。

真沒想到新娘要問到尼采，那時的尼采已經老早離開了我的意識的中心了。

我在週報上譯如是說，起初每禮拜譯一篇，譯的相當有趣，而反響卻是寂寥。偶爾在朋友間扣問，都說難懂。因此，便把譯的勇氣漸漸失掉了。早曉得還有良才夫人那樣表着同情的人，我真是不應該把那項工作中止了的。

——「你們不會宣傳，有些人利用新聞政策，利用得上好。」

這是良才的一位「小娘子」說的，又使我吃了一驚。

「小娘子」是良才的從姑母，矮矮的身裁，團團的面孔，看來只有十一二歲的光景。她是先在洞房裏的，坐在新娘的旁邊。

——「喔！我叫着，『沒想出你這樣小的孃孃！』」

——「你說她小？」全平插說着：「她人小心不小。」

——「全平，我倒要問你，」小娘子轉問着他：「你們的洪水說要獨立出版，獨立了沒有？」

——「想是在那樣想，但自己沒有出版部，怎麼獨立？」

——「創造社不好辦出版部嗎？」

——「那末資本呢？」

——「募股不好嗎？你們假如肯募股，我自己有一百塊錢，我最先就交出來。」

——「小娘子」這一鳴，又更使我出乎意外。

——「喔！沒想到你這樣小的嬢嬢！我又叫了出來。」

——「看不出來，「小娘子」今年已經十六歲了。」良才夫人解說着：「她也是喜歡讀創造社的作品的。我們有好些人都希望創造社的獨立。聽說洪水的編輯費，每月只有五十元，那是太不值了。」

不期然地從兩位亞馬荳的口中談出了這些問題，「鬧房」居然成了「房鬧」，時代倒也並不空虛。然而還有更進於此者。在談了一會之後，又由良才夫人自己提議起打麻將來！

全平私下對我說，她這是一種策略，是想借你們來作防禦戰，省掉好些男女親戚進來應酬的麻煩的。我又把雲湄看了一眼，雲湄愈覺得有點忸怩了。

更不一會，在花格床前陳設了一張方桌，果然打起了麻將。良才夫婦合打一脚，雲涓，全平，我，各打一脚。我自己是僅能打而不能數和數的，幸虧有『小孃子』做我的軍師。此外進房來看熱鬧的男女賓卻不很少。

牌可打了四圈。雲涓算最規矩，他除卻一些打牌用的術語之外，當晚幾乎什麼話也沒有說。

在夜深人散之後，我們被送到隣接着的另一座大屋子的樓房去就寢，雲涓上了樓連連的讚嘆着：

——『真沒想出，真沒想出！像這樣開通的新姑娘，就在我們成都，無論嗒個找是找不出的。』

第二天動身要回上海的時候，『小孃子』們又談到出版部的事情，她居然把她的一百塊錢拿出來交給了全平。

是的，這一百塊錢！這在事實上就是創造社出版部的最初的基金了。

用直有這位『小孃子』在我看來倒並不輸於有楊惠之的羅漢。

九

出版部的組織，在洪水創刊後不久，已曾醞釀過一次。

那時是達夫來上海，他主張得最積極。他說，自己沒有獨立的機關，處處都要受人的繼燕式的虐待。言之不勝其悲憤。

那是有點難怪的。

在被定性為半封建的中國社會裏，大抵的人都跳不出個人崇拜或行幫意識的那個圈子。所謂文化人——其實是尤其厲害的：因為文化便是意識的表現也。

達夫本是發起創造社者的一人，儘管你自己沒有那種意識，儘管你自己甚至在鄙棄那種意識，然而幫外尚有幫，那些幫外幫，好意的地或歹意的地，是在你頭上打了一個商記的。商記若曰「創造社的才子。」不要說當時的達夫要受「繼燕式的虐待，」就在現在，不是都還有人在廣播無線電，說創造社的某人會怎樣怎樣，某某人又要怎樣怎樣嗎？好在創造社雖然沒有建立過什麼了不起的功勞，但也似乎還沒有犯過萬惡不赦的大罪，鞭屍的健兒們，尤其和我們百不相干的一些日本的文筆勇士如 M · S ·

之輩，似乎可以息一下身手了吧。

那一次的醞釀也曾由周全平計畫過。募股的辦法記得是五十元一小股，五百元一大股。我自己還破過一點費，印了四冊比較講究的三聯式的股票簿，一冊寄與廣州的仿吾，二冊寄與武昌的達夫，與資平，剩下一冊留在我自己的手裏。但那股份定得未免太高，事實上連自己要來記上一兩小股，都感覺困難，結局是大家都不曾發動，成了一場泡影。

但第二次又從新醞釀起來了。

由角直回滬不久，全平趁着洪水滿了半年，便把它收了回來自印。同時又另外規定了一個募股的計畫，把單位降低，規模縮小，手續簡單化了。記得是五元一小股，五十元一大股，股東除應享的權利外，還規定有種種的便宜。這計畫又因手頭有洪水作為宣傳機關，一發表了出去，便儼如刺中了時代的神經，遠近的青年便都翕然響應了。

就這樣在開北的三德里裏面，於當年的四月一日，便看到了創造社出版部的開張。然而，這開張，我自己是沒有看到的，達夫也沒有看到，仿吾、資平不用說。那原因呢，是在三月十八號，達夫和我，更和一位新從巴黎回來的王獨清，一同往廣東去了。

達夫那時是已經離開了武昌師大的，住在富陽家裏養病，時而出到上海來一次。

他的失職，據說是因為遭了學校內的國家主義派和一部分舊教職員的攻擊。不久連石瑛校長也遭

了同樣的運命。一年前他們找我去，深幸我自己沒有去成，去了不還是在背上被人畫了一個烏龜？

王獨清的和我們發生關係是出於鄭伯奇的介紹，因為他們同是長安人，而且似乎還是同學。（？）

王還住在巴黎的時候，曾和我通過信，也曾寄過一些詩的譯作來，在創造社的刊物上發表過，但我們是不曾見面的。

不記得是那一天了，總得在二月尾上吧。那一天的早晨我接到廣東大學的來信，要聘我去做文科學長。達夫那時住在四馬路的鎮華旅館，我便跑去找他。我們商量好了，決定一道南下。接着我又去找過常雲澗和蔣光慈，但他們有職守，一時不能離開。那時候田漢也住在上海，廣大早就聘了他，要他去擔任文科教授，我也去找過他，勸他同去，但他因為受着醒獅派的遏阻，他是決定不去的。下午回到環龍路，才曉得王獨清回來了，在中飯時分來訪問過，不一會還要再來。

一個人坐在小堂屋裏，正打算給廣大寫回信，表示接受，並求其添聘達夫。王獨清出現在大門外了。他隔着窗口看見了我，眼睛睜得壁圓，直好像多年不見的知己一樣，急急忙忙地放着小跑，跑進堂屋來和我握手。

——「沫沫沫沫……沫若我我我我……我是王王王……王獨清」

吃得滿臉通紅。

王的身裁不高而略矮，不瘦而略肥，到底不媿是從巴黎回來的人，看裝束就有點像雨果的兒子廣沿黑呢帽，黑色波赫民央領帶，寬裕的玄青囉嘰西裝，馬褲上套了一副黑色的皮裹腿（這副皮裹腿在北伐出發時承他解贈了我，後來被我的一位勤務兵拿去了，）只是披在帽下的頭髮也取着一致的黑色，那卻似乎是不應該的。

但是全體的印象還不壞，因為裝束都很舊了，並不顯得矜持，而「心貧者福矣」的那句話也可以解釋得他那於荒率之中流露着真摯的當時的態度，那時候獨清先生還沒有出大名，而且腰纏也羞澀，所以似乎也還很曉得謙虛，很曉得珍重友誼。他在初見面的當天，便向我說過這樣的話——爲避免口吃起見，且用間接敘述法。

他說，他是最重友誼的人，凡是自己的朋友，他總是要生死與共，水火不辭的。

這聽來的確是像本心話，因爲他說話的態度十分真誠。大約也是因爲說得格外費力的原故吧。

在他未回國的幾月前，伯奇轉寄過他的信來，說他在巴黎的生活不能維持，叫我在上海替他謀賣稿的方法。只要他有稿來，賣是容易設法的，但他的稿子沒有來，而人卻跑回來了。

不過，他也回來得真是恰到好處。

當時的廣東雖然是我們的希望所寄繫着的唯一的地方，而又有仿吾先在那兒，有達夫答應同去，我不知怎的，總覺得有點畏途，覺得這一去好像要受着欺負。

好了，現在又有援兵來了。這位雨果第二是西洋留學生，而且又聽說他和×××相識，這不是一個相當的助力嗎？

我最初見到獨清先生，便在這樣與兔謀皮——我故意把「與虎謀皮」這個熟語修改了一下，因為當時的獨清並不像「虎」而他的「皮」也是容易「謀」的。

——「好不，我們同到廣東去！」

——「好好好好，去去去去去！」

這次的回話，似乎並不純是因爲口吃。

我當下把回信寫了，並請學校替我們送旅費來，信寫好後便和獨清一道出去付郵，又和他同往鎮華旅館去，原來他也是在那兒下榻的。在那兒，不用說，又把達夫替他介紹了。

在三月十號左右，廣大有了回信來，對於我所提出的條件，一概照辦，把聘書和旅費托林祖涵的兄弟林祖同，帶來了上海。

旅費是六百元，我自己留了兩百下來，對於達夫和獨清，各付了兩百。窮得連館債都不能付的獨清，自

然是歡其天而喜其地的。

三個人老早就講好了，只等聘書和旅費一到，便立即擇期啓程。這決定，連上海的相熟的朋友們，大家都是曉得了的。

記得就在旅費領到了手的那天晚上，樓建南和湖畔詩社的幾位朋友們約我們在一家小小的寧波館裏餞行。當席還討論過要組織一個小刊物的計畫，刊物的名稱都定了，叫着野火。——但這個刊物，後來卻沒有出版。

館子不很清潔，所在的街名不記得了，只是那周圍是寧波館子集中的地方。寧波菜並不怎麼出色，僅生吃蠓蟻頗留有深刻的記憶，以其和日本風俗相同也。

酒是我們的好朋友，但獨清卻是不能嗑酒的。他嗑了酒還有一種癖氣，便是嗑到將醉時要傷心地哭。這哭倒也並不稀奇，和嗑了酒要笑，要嘮叨，要生氣，要動武等等，其實是同一現象。那是因為腦裏的制止中樞先受了麻醉，那些感情的衝動失掉統攝，於是便胡鬧起來了。——寫到這兒，突然想到了那位遇路窮使痛哭而返的詩人阮嗣宗，那位晉代詩人是嗜酒的，其無端痛哭，大約不外是一種醉態吧。

我們的詩人王獨清當晚過於高興，多嗑了幾杯，不免也就痛哭了起來。

——「沫若，達夫，」獨清流着淚喊着我們，奇異而又不足奇異的是，平常很吃的口舌，嗑醉了卻一點

也不吃了。

——「我這人是重友誼的，凡是我的朋友，我是生死與共，水火不辭的。」

俗語說，酒醉吐真言，更何況說這話時還流着眼淚，這樣的誠懇是怎麼也要令人感動的。

然而，這「生死與共，水火不辭」畢竟只是兩句詩。

第二天清早，獨清一個人跑到環龍路來，照例是匆匆忙忙地劈頭便叫着「沫若」，口是吃得異常厲害的，聽得令人着急。但意思是聽懂了。他是說，路上不清靜，海賊很兇，前幾天才搶了一隻船。又說，廣東的政局不大安定，怕有什麼變動。結論是叫我先去看看形勢，他和達夫後來。

——「達夫也是這樣的意思嗎？」我微微感覺着失望地，這樣問。

——「是他他他……他叫我來對對對……對你說的。」

——「那我要去問他個豈有此理，學校早已開了課要我們趕快去。你們既要觀望，為什麼早不說？」

——「好好好……好的！我我我……我去同達達達……達夫講，你你你……你不要動動動……感情……」

這個小小的波瀾就這樣沒有壯闊得下去。關於這事我以後不會問過達夫，達夫也不會向我說過什麼，我們是三月十八號一同離開了上海的。

那天在下着微雨，有樓建南，應修人，周全平諸人，到碼頭上替我們送行。我自己的家眷留在了上海，是託全平替我照料的，創造社的事情也是付託了他，他就在我們走後，把那出版部成立了。

日期碰得那樣湊巧，真是偶然的事情。剛剛碰着了『三一八』這是一個世界的紀念日，已經就足夠名貴。誰料到就在同一天，北京的段祺瑞還在天安門用青年學生的血來更把它染紅過一次，成爲了我們民族的紀念日呢？

在船上住了五天，是二十三的早晨到的廣東。沿途的記憶雖然多少還有一點，但在此不願意縷述了。憧憬了多久的廣東，到了之後所感到的，卻也並不是什麼樂土。碼頭上照例是有很多苦力的，話既不通，人手又雜，實實在在弄得人有點頭昏。但是有一種景象覺得比任何名畫家的聖母瑪麗亞還要動人的，是那些穿着黑而發亮的香雲紗，駕着船運着貨物的很多的女人。那些大抵是中年婦人，身上的浮脂爲生活的重壓和南方的炎熱所榨迫乾淨了，都是很瘦削的，但也並不羸弱，倒顯示着有不折不扣的銅筋鐵骨的风味。而她們之中的大多數還在背上斜揹着一個嬰兒。那緊張着的全身神經，像鷹隼一樣，在生活戰線上飛來躍去的身手，真真是無上的畫材。但這樣的畫我是還沒有看見過的。

在苦力羣中看見了仿吾，他笑着老遠便向船上的我們叫出：我守候了你們三天了。

靠着由仿吾所帶來的人手幫助，算把各人的行李和書籍，安全地運上了岸。先是落到了一家旅館，接

着便去訪問林祖涵，因為聘書和旅費由他的兄弟所手交時是叫我們到了廣東後最先和他接洽的。

到了祖涵家時，他卻不在。在他的書房裏卻遇着了毛澤東。

太史公對於留侯張良的讚語說：「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

吾於毛澤東亦云然，人字形的短髮分排在兩鬢，目光謙抑而潛沉。臉皮嫩黃而細緻，說話的聲音低而
娓娓，不過在當時的我，倒還沒有預計過他一定非「魁梧奇偉」不可的。

在中國人中，尤其在革命黨人中，而有低聲說話的人，倒是一種奇蹟。他的聲音實在低，加以我的耳朵
素來又有點背，所說的話我實在連三成都沒有聽到。不過大意是懂到的，所談的不外是廣東的現狀，仿吾
在旅館裏早就告訴我們了。

當時的廣州因爲「三二〇」之變還在戒嚴期中，在市面上雖然看不出有什麼動搖，但在政治圈中
是還呈着發酵狀態的。

不一會林祖涵回來了，那位高長的老大哥，背有點穹，頭髮已經有點斑白，態度是異常的明朗，聲音雖
然像在嘴裏含有一個湯團，但很宏大。他似乎是一位澈底的樂天家，什麼憂慮都是不掛在眉頭上的。

林一回來，毛澤東和他商量了一會，便先告辭走了。

當天在林家裏吃了中飯。午後，他和仿吾把我們引到學校裏去接了頭，是到二十八的一天才一同搬

進學堂裏去了的。

在未到廣東以前，我自己雖然也在幹着別的事情，但自己的生活和意識是以創造社為中心的。到了廣東以後，這種情形便逐漸改變了。雖然創造社的朋友如穆木天鄭伯奇，在幾個月後也都先後到了廣東，雖然在廣州和汕頭也成立過創造社的分社，創造社的書籍儘管在廣州暢銷，劇本在廣州上演，但自己的意識是和它漸漸疎遠了。因此我在廣州的一段生活和蟬聯着的北伐期中的一段生活，我不想把它們寫在這兒。

不過那兩段生活的時期倒也並不長。我是三月底到廣東，七月底參加北伐軍出發，在廣州算整整住了四個月。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開紅花，看見了別號英雄樹的木棉散白絮。吃了荔，吃了龍眼，吃了田雞飯，吃了燒鴿，吃了蠔油板麵，吃了一次文科教授們的「杯葛」。

我留在上海的家眷是五月中旬到的廣州，但在北伐期中我又把他們留在那兒了。

北伐的那一段，在我只是由廣東到廣東，即是由一九二六年七月由廣東出發，一九二七年九月回到廣東的那一段。在這一段的期中我和創造社幾乎是絕了緣的。這一年中和以後的創造社的情形我不明瞭，只好讓別的朋友們來補寫，假如他們是有寫的興趣。

時代是在飛躍的，文章也只好飛躍了。

此
页
空
白

北伐述次

(一九二六——一九二七年)

此
页
空
白

小引

在這兒所要敘述的是一九二六年北伐軍進攻武昌時的事情。回顧起來已經六七年了，所有的材料大抵歸了消滅，即使還有被保存着的，在我目前的環境之下也蒐集不起來；所以我現在只能夠根據我所參加過的一部分寫出，而且是根據着我的日漸稀薄下去的記憶。因此我這篇文章只能夠採取回想錄的形式，記憶比較明確的地方寫得自然會詳，記憶比較淡薄的地方寫得自然會簡略。這樣，文章便會流爲是斷片的，但也只好聽其斷片。我本也可以加些想像進去，把全部的事件客觀化起來，寫成一部小說，但那樣反會減少事實的真實性，同時是會發生出許多錯誤的。我將來假如有更適當的環境，能夠蒐集得豐富的材料——我希望凡是參加過一九二六和一九二七年的那次的革命的人能夠提供出些材料來，就像我現在一樣寫出回想錄，便是最好的方法——我到那時候一定可以寫出那樣的一部小說或者歷史，要寫出這部著作我覺得我自己是最適當的人，因爲從廣東到廣東的那個巨大的波動，我是整個地參加過的。

這兒要從那年的八月二十四日離開長沙時寫起。要從這兒寫起的是因為從長沙到武昌在北伐期中是自然成一段落的。在這一段落中我特別要紀念我的一位陣亡了的朋友。這位朋友雖然陣亡了，就和其他在武昌城下陣亡了的將士一樣，除少數接近的個人之外，連他的名字都是沒人知道的。他的名字我現在要大書特書地寫在我這篇回想錄裏，我相信總不會是像寫在水上的一樣罷。但這不是說我的文章可以不朽，是說他那不朽的英勇由我這易朽的記憶中離析了出來，讓讀者替我分擔了去，就好像一簇地丁花的種子隨着風飛散到人間。

政治部到了長沙，駐劄在舊時的省議會。主任鄧擇生要經常住在司令部裏面參預軍事工作，因此政治工作大體上是由我在代理。

八月二十四日的那一天是在準備着第二天辦祝捷會的，慶祝岳州的克服，在那天晚上要舉行提燈行列。下午四點鐘的光景，大家正忙得來有了一個段落的時候，鄧主任突然下了命令來，叫把政治部的工作人員分爲先遣部隊和留守部隊，先遣部隊於當晚八時由長沙車站出發前進，留守部隊暫時留守在長沙。

從那連工作人員和夫役大抵在一千人上下的政治部，分出了三分之一來組織成了先遣部隊，把所當需要的物品通同指配停當了；在六點鐘的時候便指定了統率的人把全部的人員領向車站。

我和祕書的李德謨也是屬於先遣部隊的。但因為離開開車還有兩個鐘頭的餘暇，便偷了這個餘暇來到附近的澡堂裏去洗澡。在那樣三伏的天氣，到了長沙將近一個禮拜了，我們沒有洗過一次澡，自己身上的臭氣怎麼也不能忍耐了。洗了一個澡真是異常的舒服，走出街頭來正要打算坐人力車趕到火車站

上去時，但是人力車夫已經罷了工了；因為已經七點鐘，提燈行列開始了，車夫工會的工友都是要參加的。街面上的人也逐漸擁擠了起來，即使有人力車，也是到了礙難通行的地步了。到這時只好在街上找了一位嚮導，拼命的向火車站上跑去。

跑到了火車站門口的時候，俄顧問的翻譯紀德甫和幾位部員向着我們簇湧上來，異口同聲地叫着：

——「啊，你們到那裏去了來？鄧主任在大發雷霆——說要槍斃你們呢！……」

看錶也只到七點半鐘的光景，離開車的時間還有半個鐘頭，這發怒的原因使我一時沒有把捉得着。紀德甫是要時常跟着俄顧問的，他也是常住在總司令部裏面的人。他們——鄧主任，俄顧問和他——是七點鐘到的車站，看見先遣部隊的人員都已經上了車，以為我和德謨一定是立刻會到的，便把開車的時間提前了半點鐘。這個情形我們自然是無從知道的，而我們在洗澡，他們也是無從知道。就這樣在時間上便不免稍稍生出了一點齟齬。

匆忙地趕上月台，在昏濛的電燈光中看見在最後一架車廂的門口立着那位昂藏的鄧主任，他的頸子是硬擎着的，頭是照常微微偏在右邊。

——「到了嗎，咳？」他含着怒氣的聲音遠遠地在向着我們這一羣人發問。

——「到了，到了，」別的人替我們答應着。

接着也就走到了他的面前，把去洗澡和沒有人力車的話向他說了一遍。他只是哼了幾聲，把硬着的頸子微微地點了幾下。最後是說出：『好啦，我們開車啦。』

車是普通的三等客車，因為車上的電燈設備被北軍破壞了還沒有復元，車廂中只是點着幾盞馬燈，光度自然是很暗淡的。俄顧問的鐵羅尼坐在後面的一個車角上，他看見我們上了車，便跑來拉着了我的手，很親藹地用德國話向我叫着：

“Genossen K! Wie sind sie?”(K同志，你是怎麼了的?)

我也免不得用我的『不落肯』的德國話來和他說了一些。他們都退到一個車角上去坐下了，我自己覺得很有點沒趣，就像做錯了什麼事的小孩子一樣，只好遠遠地退在另一邊的車角上去默坐起來。不一會火車也就開動了，在昏暗中把駐劄得還不上一個禮拜的長沙留在了我們的後面。

二

車廂中的光景很暗淡，我自己的心境也同樣的暗淡。夜以繼日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求有功只想無過地勞苦了好幾天，不想要偷閑去洗個澡，竟鬧出了這樣大的笨事。洗了澡後的舒服已經被趕向車站時所跑出的汗水沖洗乾淨了，而在精神上還受了一次的『槍斃』。一些沒趣的只想向自己發怒的簡單的念頭在腦中洄漩着，洄漩着，自己不想向別人說話，別人也沒有人來向自己說話。

火車跑了大約兩個鐘頭的光景停止着了，已經到了目的地的汨羅。

在昏暗中又下了車來，車站的情形是怎樣，並且是在那一個方向，都摩不準確。天上沒有月光，連星影也都沒有一個，主腦的幾個人借着馬燈的光，聚集在一座路旁的墳台上，墳台是面着石板的。在那兒規定了第二天走路的方向，把命令傳出去了。當晚就地露營，明天清早六時向目的地出發。

鐵道路線的旁邊不一會便生起了幾堆火來，是準備夜飯的，部隊忙着出發，連夜飯都還沒用。

鄧主任的怒氣似乎還沒有解息，他依然沒有向我說話。平時他對我比較是沒有祕密的人，這回却好像成了木雕的哼將一樣。這次突然的出發究竟爲的什麼？岳州已經克服了，火車不日便可以開到岳州，爲

什麼我們要趕着走路？路向又不是沿着鐵路而是向着東北，並且也不當大道，連普通的地圖上都沒有路線。我們最後的目的地究竟是在那兒？我們的使命究竟是什麼……這些他對我全沒有說明，也沒有對我說明的意思。我覺得他對我沒有這樣嚴守祕密的必要。就是在車站上略略誤了一下鐘點（其實離開車前還有幾分鐘，）也不應有那樣長久不解息的怒氣。我自己私自怨艾的念頭也掉過來在對着他表示不滿意了。

胡亂地在露天中把夜飯用了，因為天黑，又因為明朝一早便要動身，各人用的行軍床都來不及取出；鐵羅尼顧問和鄧主任和着衣裳便在那石板面的墳臺上倒睡了下去。我很驚異，同時也很佩服他們，怎麼在那樣硬的地方便可以睡？紀德甫，李德謨，和我，在這時候從他們的面前退開了，自然是要去找睡覺的地方。我們有不約而同的心事，是想找一個柔軟的地方來睡。

一處有深草的地方，上面有幾株樹子罩着，在馬燈光中照明出來是異常地幽雅。我們便把這兒選定了。德甫把自己揹着的雨衣解了下來鋪在草上，德謨也從鄧主任的護兵手裏找了一床廣大的龍鬚草席來鋪陳着。我首先向那草席上坐下去，就像是坐上了鋼絲床的一樣，坐起了一個深窩。不一會大家把圖囊來做了枕頭，睡下去了。

德甫對於這次出發的動機和目的是很明白的，他睡着把情形告訴了我們。

原來就在那天的午後在總司令部開了一次祕密的軍事會議。我們的突然的出發，便是在會議上決定的。因為平江通城方面的第四軍接連地在軍事上佔了決定的勝利，敵人全線總退却，岳州是等於不攻而下的。敵人最後的殊死戰大約是在汀泗橋賀勝橋的一帶。這最後的抵抗如被衝破了，武昌城便指日可下。但就在這樣的情勢之下，我們在軍事上要和吳佩孚爭取武昌，而在政治上是要和新附的×××爭取武昌的。湖北的政權不好落在×××的手裏。我們現在所取的路線便是要去抄截×××，從弦線上趕着去追蹤第四軍。因而我們的目的地總是在通城以北，武昌以南。

這樣一得到了說明，才好像見了天日的一樣，在這次的出發中便頓然感覺了無限的趣味：因為這兒包含着一個賽跑的競爭心，而我們自己是這賽跑的選手。

說了一陣，因為疲倦，又因為草地的軟和，不知不覺也就睡熟了。第二天清早由喇叭的聲音喚醒起來的時候，睡在地面上的半身衣裳都是濕透了的。草席不用說也和水裏浸過的一樣。這個啞謎的解釋自然是不用費力的，因為草多的地方，地面太鬆，由那兒所發的濃重的蒸氣，在下半夜退了涼後通同結成了露水。到這時才明白了那本是騎兵將校出身，在革命戰役中受過好幾次名譽負傷的俄顧問和保定軍官學校出身在第四軍做過團長的鄧主任，為什麼要選着在堅硬的石板面上去睡覺的原故。沒有軍陣上的經驗的人，就是睡覺都要迂闊得鬧出笑話來的。不過還好，從廣東出發以來也算經過了一月以上的煨煉，

雖然在那夜露裏濕睡了一夜，身上却也沒有發出什麼毛病來。

三

過汨羅江的時候是二十五日的清早，江面並不寬，水也很淺，疑心到屈原何以會在那兒淹死。清早的太陽燦爛地照在江面上，在江岸的淺山中騎在馬上走的時候，做出了這樣的一首舊詩：

屈子行吟處，

今余跨馬過；

晨曠映江渚，

朝氣滌胸科。

攬轡憂天下，

投鞭問汨羅。

楚猶有三戶，

懷石理則那？

政治部從廣東出發的時候僅僅備了兩匹馬，是鄧主任和俄顧問的代步。到了長沙又添購了兩匹，於是乎我和紀德甫便也有騎馬的份子了。我騎的是一匹老白馬，怕是從長沙的那一座麵坊裏買來的。那馬老先生異常的馴善，循規蹈矩地總不肯走前頭，只接在別的馬屁股上『夫子步亦步，趨亦趨。』但我那時還沒把馬騎會，就坐在那樣的馬上，憂的與其是天下，倒甯是馬下。我最怕的是那騎兵顧問和團長主任，他們騎的馬既比較優秀，而他們一高興起來總愛放點小跑。這樣的情形便逼着我不能不採取人道主義的

方向，我的馬多是讓給別人騎，或者用去駝行李。但是做起詩來的時候，却把自己誇張成爲了英雄。

渡過汨羅以後的情形便不大記憶了，每天都是在山裏面走，走的都是一些很狹隘的小路。特別是入了湖北境界之後，山多是一些童山，路過的村莊都異常的凋敗，天氣熱，人多，又沒有軍隊式的組織，行動異常的緩慢。就那樣在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的三天中每天都在從新編製先遣隊，把趕不上的人和沉重的行李都留在後面，儘能跑路的和比較重要的人挑選着往前走。說也奇怪，我的體力，尤其是腳力，在那時候不知是怎的，真是特別的旺盛。我多是跑路，但我每天都在打前站，每到一個站口，總是我先到，便去替大家找宿營和中休的地點，有時還要爲大家燒菜煮飯；因爲從廣東帶來的火夫們，扛着幾口大鐵鍋和食具的，在汨羅車站出發後的頭一天，便已經落在後邊去了。

到了二十八日的下午四點鐘的時候，趕到了離崇陽不遠的石城磯，跟上了的只有二三十個人了。一方面在加緊的趕路，但一方面却又躊躇了起來。在山裏跑了幾天，和左右兩翼的軍隊都沒有聯絡；不知道軍事上的情形是怎樣了。逐漸和前線接近了起來，幾時和敵人偶然相遇都不可測度。天色還早，本來還可以趕路，但就因爲這樣的形勢，我們的領導者鄧主任他便叫我們暫時在石城磯宿營，他和俄顧問兩人騎着馬趕向崇陽去，待有他的命令來的時候我們再定行止。

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着馬去了，在我的幻想裏面，他們兩位就像是兩名勇敢的斥候。

在他們走後，我們便在石城礮宿營。那是小小的一個村落，只有二十來住戶的人家。村子是東西橫互着的，南面流着一條清淺的溪水，人家是面着溪水立在北岸的。我們幾個人，德甫，德謨，宣傳科的副科長朱代杰，和我，住在東頭的一家鐵匠舖裏。舖裏有鐵砧和廢了的爐灶，看那情形是已經好久沒有打鐵的。但那村子並沒有經過兵火，鐵業的廢止當然是另有原因。問那舖店的一位主人，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但我想，到在日本勢力支配之下的大冶鐵廠是相去不遠的，這明白是手工業被機械工業破壞了的一個小小的角度裏的現象。

鐵舖的第二進有一個小小的橫的長方形的天井，上面是一座敞廳，放着些極舊的棹椅，靠壁有一架頹敗的神龕。

我的一位很忠實的勤務兵把我的行軍床陳在天井的南沿，和舖面緊接着。——說起我那位勤務兵，我現在費了好一陣的追憶把他的名字記起來了，他名叫薛紹三，是福建人，在韶關的時候便開始跟着我，後來還跟着我到過南昌，足足跟過我一年。從長沙出發趕到這石城礮來的途中，大部分的工作人員和夫役都落了後，連鄧主任的幾位護兵也一個都沒有跟上，他却是始終跟着我的。我的一架行軍床和一口小小的鑲鐵衣箱，找不着夫役的時候，他便自己替我挑着。我趕到了石城礮，還得有行軍床睡覺，那是應該感謝他的勞力。

行軍床面好了，並且是面在屋頂下面的，這是從長沙出發以後的最舒服的一次。吃了夜飯，把應該辦的事情了結了之後，便把疲倦得就和乾油魚一樣的身子拉直了起來，很深熟地便睡下去了。

四

——「祕書長！祕書長！」

聽着有人在叫，朦朧地從深睡裏醒了來。

——「祕書長，鄧主任有信來了！」是薛紹三的聲音。那聲音好像是從遠處來的。

周圍通是黑暗，薛紹三卻提着一盞昏花的寡黃的馬燈立在我的床頭。

我一翻身起來，接過了他遞給我的一封信。信封面上自然是鄧主任的筆跡，寫着投交給我，還帶了一筆是信到後交來人腳資二元。

我把信連忙拆開來，借着昏黃的馬燈來看時，大意是鄧主任和俄顧問在九點鐘的時候到了崇陽，在崇陽得到了前線上的消息：我軍已過羊樓司，正在跟着敵人窮追。又說他們兩人第二清早一早由崇陽出發，叫我帶着紀翻譯和李祕書連夜趕上前去。

信看完了，把手錶來看時是一點半鐘。我問送信來的人，薛紹三又向外面去引了一個人進來，穿的是長衫，手裏打着一個圓紗燈，上面有「崇陽縣」的幾個扁紅字。看那情形大約是崇陽縣的差人。我看他的

衣裳是濕的，同時在天井中也聽見有微微的雨聲，才知道是在下夜雨。我叫薛紹三把錢給了差人，打發他走了。一面又把同宿的幾個人叫醒了起來。

把部事交託給代杰，把自己的行李委任給薛紹三和德甫，德謨兩個人動身的時候已經是兩點過鐘了。德甫帶着兩百塊錢的現洋，讓他坐着轎子——是晚上雇定在那兒的——在前面走着做嚮導。德謨和我都騎着馬。我騎的仍然是那匹極馴善的老白馬，走在最後。

夜雨微微地下着，夜景是一團墨黑。唯一的光只是前面走着的轎上所掛着的兩盞馬燈。馬是老馬，又是半夜裏趕出來走路的，睡眠沒有睡足，走得很是不耐煩的光景。它只是把頭埋着，一面走，一面在地面上哼着鼻孔。你要把馬頸提起來却很要費一番力氣，好在慢慢地走着也可以跟得上轎子，也就聽它去埋頭吐氣去了。

起初動身的時候有點興奮，並由屋內的空氣轉換到露天的雨中的空氣來，睡意是被驅除了的。走不一會雨也住了，老馬的老漢步却是一服大有效用的催眠劑，本來是還沒睡足的暫時被驅除了的睡眠，不知幾時又飛了轉來，襲着坐在馬上的騎士。有時腳擦着岩邊或樹幹，發出些悉率的聲音，有時頭上掛着樹枝，冷的水滴洒在臉上，突然地驚醒過來；但昏蒙蒙地沒幾分鐘又睡熟了。由人推想到馬，想那坐下的馬怕有時也是睡熟着的。古人說「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池」我那時的情形可以說是「睡人騎夢馬，夜半赴

戎機；但在事實上也並沒有什麼的危險，馬是仍然走着路，人是仍然騎在馬上的，那時候的情形大約是潛意識在活動，就和夢遊患者在夢中可以行動的一樣。所以事實上就真的讓盲人騎着瞎馬。在月黑的夜半騎到很深的池子邊上去，我敢保險，是斷不會落下池子裏的。以為危險，會落下池子的，只是睜着眼睛的人未曾行過實驗的幻想。

在夜裏走着的情形自然是很模糊的，但就在天明以後的情形我現在也不記憶了。只記得到了崇陽城內時是早晨八點鐘。先是到了鄧主任信上所寫明着的他們所住宿的旅館。到了那兒時，他們在清早六點鐘的時候已經走了。鄧主任還留下了一封信，叫我們向着蒲圻跟蹤前進。

用了早飯之後，德甫坐來的轎夫大約是念到了前途的危險，無論怎樣都不願意再走了，只好在崇陽城裏另外雇了轎夫，在這兒又很費了些時候。我在那時寫了一封信寄給廣東的成仿吾，把出發長沙以後的情形告訴了他，信後附帶了幾行日本文是寫給我留在廣州的夫人的，這幾行信卻虧她替我保存着了，我現在把它譯錄在下邊。

『廿四日離開長沙：今晨八時頃到達此地。我軍以破竹之勢進逼武昌，今聞已進展到離武昌城僅中國里百五十里之地：大約在三日內便可以攻進武昌。攻進武昌之後便萬事都順利了。

祝你的健康，並祝孩子們的健康。

我是異常的強健。連自己都出乎意外。

×
×，廿九日。
—

五

崇陽城內的市面並沒有什麼騷擾，城裏沒有北軍的痕跡，也還沒有什麼革命軍的痕跡：因為由通城進攻的第四軍直趨羊樓司，沒有經過崇陽，我們從長沙來的路向不用說是走了好些枉路。我們假如先朝羊樓司來，那定然是早把第四軍趕上了的。

由崇陽向蒲圻的道路是平坦的大路，此後的進行可以無須乎用嚮導了。路因夜來的雨很滑，德甫的轎子走得很慢，我們各自騎着馬向前頭走去了。在途中的一個大站口上，大約就是地圖上的『洪上』，把馬休息着等待着德甫聚齊了，吃了一頓中飯又走。

天氣異常的炎熱，坐在馬上總是想睡。路過着有樹陰的青草平地時，特別有一種很難克服的誘惑，總要使你跨下馬去，倒在草茵上，睡他一個酣足。有時竟直在馬上便晝寢了起來——在馬上晝寢，這個情形，在沒有經驗的人或許會以為是誇張，但其實這是極尋常的事。有些人鬧着神經性的失眠症，以晚上不能睡覺為苦，甚且有因此而自殺的。那種人我勸他去從軍或者做苦工，把閑着的肌肉充分地勞瘁一下，他會弄到要想不睡都不能夠不睡的那種地步。

沿途的風物都是太平無事的景象，在路上走着農人和行商，都像不知道在鄰近的縣分上有過並且有着劇烈的戰事的光景。因此走了半天倒也沒有什麼特別留在記憶裏的東西。

走到了天色漸漸向晚的時候，路上的行人漸漸的稀少了；直到後來在昏黃中只剩下德謨和我，我們所騎着的兩匹馬。馬走了一天半夜自然也是疲倦了，它們卻又知道我們是不會騎的，走到一段田隴上的時候竟至立着不動。沒有辦法只得都下馬來牽着馬走。在那田疇中走着，周圍的淺山由深藍的顏色逐漸轉化成黑影，灰色的暮氣連把自己的情趣都灰色化了。突然起着一種由廣東出發以後從不曾起過的恐怖的念頭——在那些淺山裏面萬一有從戰線上潰逃了下來北兵藏着，乘着這昏黑的時候向着我們一衝下來；再不然會有什麼大股的強盜來趁火打劫……這種無謂的憂慮執拗地來糾纏起來。

德謨也是有點神經質的人，大約也是我的憂慮無形地傳染到了他：素來是少說話的他，愈見沉默着，黑着一個面孔，就和那薄暗中的山影一樣。

好容易走到了一個村莊，問起路來，據說離蒲圻還有五里路遠。我打算走一段黑路，一直趕到蒲圻，在蒲圻或許可以和鄧主任們相會。徵求德謨的同意，他黑着一個面孔不置可否。但是要走走還須得等待着德甫一道，我們穿過了村莊，在北頭上的一個土地廟前休息着。等了將近半個鐘頭，兩個人交代着跑到村的南頭上去望，總不見德甫的轎子來。天色已經完全入了夜景，又微微地下起雨來了。路是完全看不見的。

到了這時候只好決心到村上去找個宿處。

拉着馬又折進村去，扣了好幾家的門都沒有回應。有些人家裏面有湖南兵的聲音，在那兒喝酒，那些自然是第八軍的兵士，不知道是幾時進了村的，我們在外面打門，他們也一樣的不理。最後在村的南盡頭處的一家門上扣着。裏面是漆黑的，起初仍然是沒有人回應。我們在外邊叫着說。

——「我們是南軍的官長，只求借宿一夜，決不擾害你們，你們放心把門打開。」

幾次放大聲音在門外懇求，裏面最後公然點起了亮來，有人的聲息，並且有出來開門的神氣。想那裏面的主人大約是聽明了我們，說是官長，又聽見我們的聲音也還不甚粗暴，證明了我們的確是官長一類的人；或者也怕是我們那兩匹馬不耐煩地哼着鼻子，蹴着腳的聲音替我們作了證明的，大門結局是開了一，一位五十來往的男子點着一盞菜油燈來接着我們。我們又把來意說了一遍，他很慇懃地把我們招待進去。我們問他繫馬的地方，他尤其高興，他說他家裏有馬房；接着又把兩匹馬引進他的馬房去了。

房主人看見了我們並不粗暴，他愈見安心起來了。他把我們歡迎着，好像有些得意的神氣。屋裏很熱，蚊子又異常的多，我們勸他把大門開着；他在做廳正中的土面上燒起了火柴來燻蚊子。

我們是還沒吃夜飯的，他出門去替我們買了幾升米來，他自己有些仔雞，便替我們殺了兩隻，很慇懃地在廚下準備着；又替我們燒了些水來洗腳。

我們坐在大門口等待着德甫，又等了半個鐘頭的光景，仍然不見到來。我剛才替自己懷着的憂慮又爲他喚醒起來了。他的身上是帶着有我們的盤費的，那兩名轎夫不會圖財害命嗎？天色是已經黑了的，轎夫是兩名，他是一個人，兩個人要結果他，那不是很容易的嗎？這比潰兵和強盜的想法更近情理，我對德謨說着，他也是在作同樣的想法。

——『假如是那樣，我們真是害了他呢，我們不應該把錢讓他一個人帶着。』我這樣說。

——『不過他是有槍的，』德謨說。『那兩名轎夫或者不敢動手。』

——『近在身旁的敵人，有槍也是不行的。』

兩人正在談說着的時候，遠處有光亮現出，向着村上走來。唯一的希望發生了出來，希望那就是德甫轎上的馬燈。

我們走向村外去迎接，燈光漸漸近了。

——『是紀德甫嗎？』我們叫着。

——『是的。』

那含蓄着歡喜的回應所喚起來的自然是同樣的歡喜。

六

轎子到了店門口，德甫拿着一枝開了盒的駁壳槍走下了轎子來。

看着他拿着槍的情形，我和德謨相向着笑了一下。

——「我們以為你在路上遇了什麼事情呢，等了你一點半鐘了。」我對着德甫說。

——「兩位轎夫走得太慢。他們說蒲圻在開火，死不肯走快。今晚如在這兒趕不上你們，我還要逼着他們趕到蒲圻的。」德甫說。

——「我也本來是想趕到蒲圻的，因為沒有馬燈。」

——「那麼好了，現在有馬燈來了，我們趕到蒲圻去。」

——「好的，好的。」好一會沉默着不肯說話的德謨贊成着。「我們吃了飯動身。」

德甫也是沒有用夜飯的，我們便走進店去。兩位轎夫吐着很多的怨言，把轎裏的行李搬了出來，又走出去了。我叫店主人也替他們預備飯食。

不一會我們開起飯來，店主人另外開了一桌飯出去招呼兩位轎夫的時候，那兩位膽怯的夫子已經

逃得來沒有蹤影了。

——『糟糕！』紀德甫叫着：『那兩位傢伙早就就是想跑的，他們在路上已經把轎錢通同要去了。』
這樣一來，我們要在當夜動身的計畫便很難實現了。店主人也慫慂地留着我們，說路爛很難走，叫我們第二天清早一早動身。我們便決定了他的家中過宿。

那房子是一例三間的建築，前後有兩棟。第一棟接着街面，中間是一個做廳，前面接着店門，後面接着
一個橫的長方形的天井，左右是舖面。那主人有三個小兒女睡在右首的一間的地陣板上，藏在烏黑的被
條下面，自從我們進了他們的家屋之後，都駭得不敢出來。左首的舖面是空着的，店主人叫我們在那兒下
榻，說那裏面有床，也還有捍麵台。

天井的兩側有過道連接着前後兩棟，第二棟的正中是堂屋，靠壁陳列着神龕，但奇妙的是在那堂屋
的天井邊上塑着一個一連有三口鍋的長灶頭。左右有耳房，右邊的耳房便是馬房，左邊是關着的，想來怕
是麵房了。

由那房子的結構上看來，那家主人在前怕也是一座大家，後來零落了才開始了開麵坊而兼帶麵館
的生意的，堂屋上的灶頭一定是後來塑上去的。馬房我進去看過，那從前應該是有地板的房間已經成了
土面。馬是只有我們自己的兩匹。據那店主人說，他家中在年內接連出了兩次喪事，死了他的母親和他的

妻室，他的馬就爲經營喪葬賣去了，麵坊的生意是已經停了業的。這位主人又算是經受了第二次的零落，他的前途是只有把剩下的房廊賣掉，成爲流氓無產者了。

湖北的天氣夜裏就到九點鐘過後都不能退涼，又加以在敝廳中燒着火燻蚊子，熱得來很令人難耐。德謨跑到門外去，在石面的階段上睡着了。我和德甫走進左側的舖面去。那兒是有兩間房間的，前面是純粹的舖面，在櫃台背後靠壁陳着一張很寬大的捍麵台，德甫和着衣裳便倒在上面睡着了。我自己又走到那後面的一間小房間裏去，那兒放着一架大花格床，照那色彩和褪了金箔的一些赭色的雕刻看來，是那店主人的母親或者祖母結婚時的嫁奩。後手一隻角上放着一張方桌，桌上放着一座紙紮的靈堂，那當然是店主人的母親和妻室死時用過的。那在喪事過後是應該燒毀的東西，而店主人還珍重地保存着，足見他真是窮得有點程度，他似乎是想留來在自己的喪事時使用的一樣。桌下放着一架鐵火盆。房間怕有兩三個月沒有人住宿過，也沒有人打掃過，灰塵真是『山積』着的。

床上只是平坦的木板，上面沒有草也沒有草蓆。我自己決定就在這兒睡下。我去把紀德甫的雨衣取了來鋪在床上，把馬燈吹熄了也就睡下去了。

突然之間醒了轉來，我以為是天亮了，但周圍是一片墨黑。把火柴擦燃照看手錶時，才十一點過鐘，睡了還不上兩個鐘頭。自己還在詫異這突然的覺醒時，頸子上異常的作癢，同時全身都像在發燒的一樣。房

裏的空氣悶熱得難耐，便索性起床把馬燈點燃，想到房外去另外找一個地方來睡。

我把面在床上的雨衣揭起來了，奇異的是床板的木面就像在移動的一樣。我起初懷疑着是我自己的眼睛發花，待我再過細看時，這第二次受的一驚比我疑床板的移動還要厲害。真是見所未見的一個奇景——一床板上都是浮動着的臭蟲！那臭蟲的大衆好像是戰場上的千軍萬馬，我是睡在那兒就闖入了小人國的葛理維一樣，足足被它們攻擊了兩個鐘頭，把我從深熟的睡眠中攻醒了。這場仇恨不能不報。我穿着膠皮鞋憤恨地踏上床去，便把那千軍萬馬的臭蟲陣踐踏了起來。我算是打倒了一個臭蟲帝國。同時又感覺着自己的身上是還有敵人馳騁着的，便提着馬燈，抱着雨衣，跑出了敝廳來。

敝廳上燒着熏蚊子的柴火還沒有滅盡，把火撥活起來，把自己身上穿的軍服和襯衫脫下在火上拌抖。抖下的臭蟲絲毫也不誇張地是『勢如雨下。』它們受着了炮烙之刑，發出了濃烈的異樣的奇臭。

身上的臭蟲大約也掃蕩乾淨了，時間還早，便在敝廳上的一個楊妃椅上胡亂地睡下去了。

七

店主人起得很早，他替我們把早飯弄好，讓我們起來吃了之後也才六點鐘的光景。

要準備動身了，到馬房去轡馬，我那匹老白馬睡在地面上很不容易拉起來，兩隻眼睛角上也流着眼淚，看那情形它實在是疲倦得不能再走路了。沒有馬夫跟着的馬是很大的麻煩，在自己的飲食起居都顧不周到的時候，對於馬的飲食起居却不能不加意的顧着。鞍轡要自己轡，馬到疲倦了的時候得自己牽，那馬老先生的用處在我已是消滅了的。我便索性又講了點子馬道主義，把馬寄放在了麵房老闆那兒。我留了一封信給政治部後來的人，讓他們過身時把馬收下。在我的想法是，那經營麵坊的主人是把自己的馬賣掉了的，那匹老白馬他或者會藏匿起來不肯交出，但就那樣也樂得做了一番順水人情，老闆或者可以把麵坊恢復起來。本來是在麵坊裏住慣了的老馬又落到麵坊裏也算得是適材適所。不過那匹馬，後來仍然是拉到了武昌，也見得那麵坊主人真是忠厚；可惜他的姓名我忘記了，他住的那村落的名稱我也不記得。

夜間住了的兩，清早又微微地下過一會。在赴蒲圻的途中，臭蟲的悲喜劇還鬧了一幕小小的餘波。駝

着硬洋的紀德甫騎着唯一的一匹青馬，我和李德謨在路上跟着走。德甫把他的雨衣披着，走不一會他叫起來了，他在自己的頸子上抓下了好幾個臭蟲來。那自然是昨晚的臭蟲潛藏在衣縫深處，在火上沒有抖落乾淨的。惹得德甫在路上又把全身的衣裳脫了下來清掃了一遍。我自己的頸子上也有點囉哩，原來是昨晚在床上放過一下的軍帽裏面，在那皮沿的內部也藏蓄了好些餘孽。

走到八點鐘的時候快到蒲圻車站了，愈和前線接近空氣便愈覺得緊張起來。沿途遇着的都是士兵，從他們的口中探聽得不少的前線上的消息。據他們說來，汀泗橋的戰事是昨晚結束了的，現刻怕在咸甯一帶開火。總司令部的火車昨夜已經開到了蒲圻。

在離蒲圻車站不遠的地方有一道小河，渡過河便是往咸甯的捷道，有好多往前線去的兵士都是從那兒渡河的。德謨和德甫主張渡河走去，我是主張到蒲圻車站去把擇生的消息探聽明白了再定走法。他們不肯聽我的話，我同他們也就分了手，約定在咸甯聚會。

我一個人走到車站上去，總司令部的車的確是停在那兒的。我走到那主腦部的車箱去，剛好走到車口，遇着白崇禧從車裏走出，他那時是代行着參謀總長的職務的。他看見了我却是先開了口：

——『哦，K先生（他對我照例是這樣的稱呼，）你也趕到了這兒！』

我問他：『擇生是不是在車上？』

他說：『擇生是昨晚到的，我們的車子是夜裏到的，他到車上來開過會。今早一早他又趕到前線上去。現在怕在咸甯和賀勝橋一帶開火，陸續的有傷兵送轉來。我們的兵站部準備得太不周到，傷兵拿着沒辦法，我們這火車是又要立刻載着傷兵開回岳州的。』他又問我：『是不是要去見×××？』

我答應他：『我是要趕到前線上去的，要去追趕擇生。』

——『那嗎你最好是乘火車，停不一會有火車要開到咸甯。』

剛好說了幾句話，月台有哨子的聲音，火車開動起來。我去找着了站長，問明了開往咸甯的車子是第八軍的軍用車，還要等一兩個鐘頭才能開車，因為軍火還沒有載好。

乘着還有一些時間我便在車站上巡視了一下，還有好些沒有搭上火車的傷兵被留在車站上，有的把手掌打穿了，有的把脚打斷了，有的是頭上受了傷已經失掉了意識，呻吟的聲音是異常的淒楚。有很濃的硝烟氣和石炭酸水氣。但是却沒見有人吐出怨言，大約也是因為打了勝仗的原故。一切的情形都很雜亂，而在雜亂上是帶着了一層欣喜的彩色。

巡視了一會我又走去找着站長，叫他替我在車上找一個座位。他說他自己不能夠作主，把我引去找着了一位第八軍的營長。那營長很矮小，立在月台上在督促着裝載軍裝包子，是新製的革命軍的軍服和軍帽；因為新附的湖南兵大多數是還穿着從前的軍裝的。

我對那營長說：我是總政治部裏的人，要趕到前線上去，要搭他們的車子。

那營長帶着一個很冷淡的態度，把我的身子上下地估量了一下，他沒有說可，也沒有說不可，只是對着站長說：『車子怕不够啦，只空着兩個車廂了，連我自己怕都是找不着座位的。』

我看他把我是看得很下賤，以為頂高怕不過是一名准尉的司書，但那也是難怪的。因為我身上穿的是一套藍布的軍裝，自從由長沙出發以後在山裏跑了幾天，已經骯髒得很有點程度；腳上是一雙襪草鞋，套在一雙綠色帆布膠皮鞋上，兩來都已經被泥濘緊了。

我聽着他那樣的口氣，也沒有管他，各自跑到最末尾的一個空着的鐵皮車裏去了。等到軍裝包子裝到這架空車來的時候，我在車上也很賣了一些氣力，替他們搬運。包子高齊車頂地裝滿了半車，算也裝完了，那營長和他的屬員們最後也上了車來，他對我倒也沒有干涉，我自己也就厚起鐵臉皮來在鐵皮上坐下了。

八

其實我是太客氣了的。在快要開車的時候從月台上湧進了好些人來，大抵是由第四軍落了伍的夫役。營長的手下人不要他們上車，但也沒法禁止。那些夫役多是廣東人，高聲地反問着。

——『吊那媽，耐車害（你不是）革命軍耐害反革命的北洋軍……』

空着的半個車廂已經擠滿了，車子開動了起來，月台上還有好些人沒有擠上。

擠上來的人裏面有一位是第四軍的政治工作人員，本是廣東大學的學生，他把我認出了，他仍然把我叫着『K學長。』他說他是在平江得了病，送回了長沙，現在病好了，要趕到前線上去。他雖然穿的是同樣的藍布軍服，但比較整齊潔淨，沒有像我身上的那樣狼藉。看那情形，他自然是搭着昨晚的總司令部的火車趕上來的。他揹着一條毛氈和一頂第四軍的特徵的銅鼓帽。他看我坐在鐵皮的車底上，便把自己的毛氈解開來疊着，請我坐，我卻不過他的厚意，便拉長讓我和我並坐起來。

我們的坐處是向着鐵皮車的東側的門道的，和那位營長閣下相隔不遠。那位閣下大約是看明白了我比司書生的地位要高得一點，他在打開菸匣要吸菸的時候，公然進了我一枝香菸。後來，在九月間，劉佐

龍在漢口舉行軍長就職禮的時候，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出席。在行禮畢後的茶點席上我也還看見過這位營長。他的席次和我離開得很遠，他公然走到我面前來特別和我打招呼，就好像我們是十年前的舊交一樣。可是那營長的尊姓大名我一直沒有攀問過，我揣想他現在怕已經升成了軍長了罷？

車內和車外的情形都是很雜亂的，但是，是有光輝的雜亂，一切都好像是浮在了戰勝的榮光裏。鐵道的兩旁和離鐵道稍遠的路上都像潮水一樣湧着本軍的隊伍。

因為夜間和早晨的微雨，空氣是很濕潤的，一受着向午的太陽的薰蒸，倍感着燥熱。戰死了的北洋軍隊是沒有收屍的，狼藉在鐵道沿線的兩側；死後僅僅十幾個鐘頭，已經腐化着，發出異樣的奇臭。汀泗橋是最有名的激戰地，在那兒附近的兩側的湖沼裏面浮着無數的死屍，有的仰着，有的伏着，有的側着。（在戰事告了結束之後，聽說從那兒水底撈出了不少的槍械。）那兒的屍臭尤其是厲害。

過汀泗橋不遠，在東側的一段疎林裏面，有三個裸體的綁在樹上的死屍，通是跪着的，一個特別肥，身體異常的暫白而豐滿，頭是垂着的，嘴上有長長的八字鬚鬚。在當着心窩的地方有一個拇指大的槍眼，從那兒流出的血液在白暫的肚子上畫着一條含着潤意的黑線。頸背後插得有一道紙紮的箭標，寫着『正法旅長一名×××。』人的名字沒有看得清楚，餘外的兩名死屍也沒有看得清楚，火車已經跑過去了。那三名軍官自然是由吳佩孚正法了的，吳佩孚親自到了汀泗橋來督戰，無如戰線仍然是潰敗了。但可佩服

的畢竟是大帥，連他自己都是要忙着逃命的時候，他卻有那樣的閑情來明正典刑。

過了那帶疎林子的時候在東側的湖沼的彼岸看見紀德甫和李德謨兩個人牽着那匹青馬，夾在隊伍中間走着。他們比我先走得兩點多鐘，但是瞬息之間火車便已經把他們趕過了。這個比賽恰是我們從汨羅跑路趕到蒲圻來的一個縮影，在山路上跑了五天多，別人的火車只跑了五個鐘頭。

快到咸甯車站時，在一處空地上看見了鄧主任和俄顧問騎的馬，又看見了鄧主任的一位馬弁，那是留在長沙總司令部行營裏的人，乘着昨晚的火車趕來了。我高興得很，以為這一次終竟把擇生趕上了。在咸甯下了車，我便向那馬弁和馬的所在處跑去。

那馬弁遠遠地看見了我，就像迷了路的小兒看見了娘的一樣，歡喜得快要流出眼淚的樣子。他告訴我他是在蒲圻車站上碰着鄧主任的，早晨跟着趕到了咸甯來，主任便到城內第四軍軍部裏去了，叫他帶着馬在車站上等着，一直等了兩三個鐘頭都不見來；他自己還沒吃早飯，肚子又餓，又沒有一個錢。

我把了錢給他，車站上已經有些賣小食的，便叫他去吃。車站外面的壁上四處都是用白墨寫的留白，是某某團部，某某營部，或某某政治部叫所屬的人員在某處集合或者前進。我在進口處的壁上找着了一段空隙，便也用白墨給紀德甫李德謨兩個人題着壁報。叫他們在車站上等着；我自己便去找第四軍軍部去了。

咸甯車站和縣城是有池水隔着的。池子中間有一條路，擁擠得不堪。另外又有些渡船在補濟着交通，那些船怕是臨時拉來使用的。我跳上了一隻渡船渡進城去，問到了第四軍軍部。但到了那兒時，那兒的留守部隊正待要出發；據說軍部的主要人們都已經前進了，鄧主任也跟着前進了，出發後已經有兩點鐘的光景。

就這樣，這一次的追趕又撲了空，我本想跟着第四軍軍部的留守部隊前進，但有德謨和德甫沒有跟上，又怕他們在車站上死等，不得已又一個人折回車站去。

九

在車站上遇着了德甫和德謨，兩個人都走得很疲乏，德謨尤其帶着十分怨望的面孔，就像是我叫他們去吃了苦的一樣。他們說路是怎樣的泥濘，人是怎樣的擁擠，空氣是怎樣的奇臭。特別是還要服伺着一匹馬。但這是不能由我負責的；要走那一截路原是出於他們的本意。不過我到了後來，就是在我寫着這篇回想錄的現在，都覺得有點失悔，失悔我自己沒有去涉歷過那一段路；在火車中坐着雖是舒服，但是那有名的汀泗橋的戰場的情景在我是很模糊的。

咸甯以上還沒有通車，因為前線在賀勝橋作戰，戰事還沒有結束；鐵路上敵人所埋下的地雷也還沒有掃清。時而有從路線上抬轉來的工人，是因為誤踏了地雷受了傷的。趕上前線的隊伍大抵都避開了鐵路軌道，檢着小路在走。但是沿着鐵路軌道走的人也還是不少；因為路平坦好走，而且比小路接近。德甫和德謨是上了走小路的當的人，我們便決定冒險沿着鐵路軌道走去。馬是不能騎的，一匹青馬也只好交給鄧主任的馬弁看管着，叫他在咸甯等候着後來的部隊。

三個人互相隔着五尺遠的光景，在鐵路沿線上走着，起初是很小心的，路軌中間有石子面着的部面

自然是不敢走，就在所走着的土面上，只要稍爲有些隆起或新異的地方，便要停着脚。但是走過咸甯車站，過了一兩道小橋之後，覺得路軌上並沒有什麼變異，也就漸漸的膽大了起來，放着脚步不斷地追趕過在我們前頭走着的人。

沿路的兩旁都有北軍遺棄了的物品，刺刀，馬刀，軍服，軍帽，子彈帶，手榴彈，下了機關的步槍，人的屍首，馬的屍首。那些屍首都還沒有腐化，像汀泗橋一帶那樣的奇臭是還沒有有的。

在路上趕過了不少的人，在一處山凹處看見了一處地雷爆發過的地方，地上濺的血還是鮮紅的，沒有凝集。血跡在地面上滴了一截路，又折向小路上去了。又在一處看見鐵路上在微微地冒着烟子，當心地走上前去看時，看見了一根枕木在燃着，不知道是怎樣地燃起來了的。我便洒了一番尿在那上面，把火澆熄了。

被我們趕過了的人中有兩位是我們認識的人，便是李漢俊和詹大悲。他們和我是在長沙相識的。大悲穿着一件白色汗衣，打着一把洋傘，脚上是一雙泥漿了的嗶嘰鞋，走路的神情很有點狼狽。漢俊比他要好得一些，但頗有點滑稽的風味；他穿的是在長沙買的一件不甚合身的軍服，帶着一頂軍帽，手裏也撐着一把洋傘。兩個人的優養慣了的白嫩的臉和手都已經烘成了桃紅色了。

我們和他們擦身過的時候，問他們遇着過擇生沒有，他們說在蒲圻遇着過，以後便一直分了手。看那

光景他們也是昨晚由長沙乘着總司令部的火車到的蒲圻，再由蒲圻一直走路趕上來的。

就這樣一直趕到向晚的時候，快要到賀勝橋了。在澄清的空氣中，隔着山還聽見前面有機關槍的聲音。我們踴躍了起來，以為這一次總可以趕到最前線了。但到我們趕到了賀勝橋的時候，戰事已經結束了。天色黑了下來，有很多的部隊在離市街不遠的一個村落裏宿營，四處都起着營火。我們去問了好幾處，問第四軍的司令部，有的說是前進了，有的說是紮在賀勝橋的街上，完全得不到要領。

在咸甯的時候，因為城內的飲食店都把食料賣盡了，我是只在街頭買過一些豆腐乾來當了午飯吃的。德甫和德謨也只在咸甯車站上吃了一些粉條。三個人沒吃中飯地跑了一天，肚子都餓得來不能忍耐；又是星月都沒有的黑夜，要趕路也沒有辦法，只得在一家農家裏去歇腳，託那兒的主人替我們準備一些夜飯。

正在吃着夜飯的時候，詹大悲和李漢俊兩人也趕上來了。不約而同地也落到了我們停息着的農家裏。他們是帶着有一位下人的，一來便闖進了那農家的內室去，把那家人的寢室佔領着了。那下人回頭又拿了一個空菜匣來，把我們弄好了的飯打了一匣去。我到飯用完後走進那寢室裏面去看過他們，他們也正在吃飯，菜匣裏面帶着不少的乾糧。我心裏感覺着不大愉快：他們既有那樣多的好菜，為甚麼看見我們在吃白飯的時候不分出一點給我們，要把飯拿到這兒來藏着吃？為着那樣小小的事情懷着大大的不

平，自己現在想起來都覺得好笑，覺得真是孩子氣，但當時的實感是那樣的，那是無須乎掩飾的。

睡的時候，德謨從農場上拉了兩把稻草來，鋪在門道外邊的一隻角落裏，蜷曲着便睡下去了。門道內的小小的堂屋裏面，有一架炕床靠着正中的土壁，德謨便在那上面打橫了起來。我自己取下了一扇門來，和炕床平行着，放在兩個短竹凳上，那便成了我自己的臥榻。疲倦得不堪的人，一睡下去便睡熟了。大約是因為在熟睡中略略翻了一下身，我和門扇使一同倒在地上，發出了蠻大的響聲。我自己自然是驚醒了，連睡在炕床上的德謨也被驚醒了，他模糊地問了我一聲：「炸彈？」

我倒下地時，右脚的小趾碰在了方桌的腳稜上，起初麻木着沒有感覺着什麼，待把兩個短竹凳移開，就儘那門扇陳在地面再把身子睡下去的時候，小趾疼痛了起來；把火柴擦燃來看時，已經起了一個很大的血泡。

第二天是八月三十一日，又是一清早起來趕路，連早飯也都沒有吃。這一天關於沿途的記憶絲毫也沒有，大約是因爲始終都在鐵路沿線上跑，所接觸的情景和前一天的沒有變化的原故。現在所記得的只是自己擔心着怕不能走路，在路，上跑着卻也沒有怎樣吃苦。

在傍晚的時候跑到了離武昌城僅僅有十五里路遠的紙坊。聽說第四軍的軍部是紮在紙坊車站上的，跑到車站上問時，又已經前進了。據留守的人說，『怕現刻已經進了武昌。』

聽着這樣的消息應該是要喜歡，但在我自己卻把趕路的興會失掉了。每天在路上跑的目的是希望早一刻跑上最前線去參加實際的作戰，但是從汨羅跑到紙坊來，足足跑了一個禮拜，才不外乎是和從前上京求名的『風餐露宿星夜登程』的舉子一樣。德謨和德甫兩人也和我抱着同樣的感覺，我們決定當晚就在紙坊過夜，等明天清早起來再走。

留守處的人叫我們到車站對面的站長住宅裏去，說那兒有空着的房間。我們找了兩升米，便拿過站長住宅去。那兒有一個花園，臨着花園的一帶房廊的東頭的確有一間空着的房間，陳着三尊大床也都是

空着的。房間的東南兩面有臨着花園的迴廊，迴廊邊上圍繞着欄杆。我們到櫥裏去找着了一個小火爐和沙鍋，拿到迴廊上來準備熬點稀飯。同時德甫在園子外又找了些蔬菜來，準備一同煮在那稀飯裏面，沙鍋的容量頗大，我們儘量地煮着，打算把第二天清早的早粥都一同煮好。跑了一天沒有吃飯，肚子餓得異常，聞着稀飯的香氣真是一種說不出的誘惑。

稀飯讓德甫和德謨兩人熬着，我一個又到車站上去打聽前方的消息。剛走過車站去便下起了傾盆的大雨來，露天中的雜色隊伍都湧進車站來躲避，擠得來真是和新開封的火柴匣一樣。就這樣暫時把我阻止着了。前方的消息是很模糊的，軍用電話似乎受了雨的影響，也打不通。我等雨住了又折回住宅去，看見那兒的迴廊上已經縱橫地睡着了無數的人。走進房裏去，看見德甫和德謨兩人睡在近門的一尊床上，裏面靠壁的一尊上睡着李漢俊和詹大悲，另一尊上陳着他們的雨濕的行李。地板上也睡着好幾個人。原來詹李兩人也同落在這兒，他們在中途雇了轎子坐來，在路上是淋了雨的。

我問到稀飯上來。

德謨睡在床上說：『我們弄好了，等你不來，正在吃的時候他們來了。他們也來吃，連轎夫也來吃。他們說他們有米帶着，吃了再煮，一鍋飯立地便吃乾淨了，連我們也都只吃得一碗。』

我問：『再煮的稀飯在那兒呢？』

沒有人回話。

漢俊在床上叫着他們的下人：「你煮的稀飯呢？」

——「我們馬馬虎虎的可以過去，沒有煮啦。」睡在地板上的他們的用人回答着。

——「糟糕！」我一肚子的飢火化成了一腔的怒火，很難遏抑地想痛罵出來。但只客氣着又連說了
一聲「糟糕！」

——「不要緊的，」詹大悲在床上安慰着我：「明天進武昌城去，我請你們吃大餐。」

——「哼，」我冷笑着，「你擔心吃鉛彈。」

我對於詹大悲，特別的感着一種先天的不滿意。我在肚子裏面罵了他好幾聲的「臭官僚，」「投機派。」我知道湖北省政府委員會裏面，是有他的名字的，他這一兩天來的趕路的熱心不外是去搶官做而已。「哼，哼，」我自己冷笑着，「國民革命！不外是讓幾位投機的爛紳士做做新官僚罷了！」——心裏儘管懷着怒氣，但也沒有說出口來。

床上已經沒有地方可睡了，地板上也被泥濘的腳踐踏得沒有睡下去的勇氣。我率性負着氣從房裏跑出來，檢着東面的迴廊上空着的地方，和着衣裳睡了下去。睡着和自己肚子裏的飢餓交戰，起初很不容易煎熬，但隔不一會也什麼都不在意識裏了。

九月一號的清早又由紙坊向着武昌城出發。早飯是不用說的，連可以充口腹的零碎的什麼什物都買不到手。

在路上走不好一會，看見田疇間的一段高地上有一座廟宇。我們便避開大路向那廟宇走去，想在那兒找點食物。漢俊也跟着了我們來，詹大悲坐着轎子各自往前頭去了。廟宇的名字我不記得了，走到那兒時才是荒廢了的一座，連乞丐的影子都是沒有一個的。

漢俊說：『還是熬着一下，我們趕進武昌城去開早飯啦。』

他說着又各自從田塍上走回大路去了。

我們仍然在山地上走，看見前面不遠處有一些人家，我們便向那兒走去。

那兒是小小的一個村落，有好些農家的兒童們站在村外看着鐵路沿線上過兵，他們是非常高興的。他們看見了我們走近身去也毫不畏懼，有的反是向着我們走來，問我們要空彈壳。

進村裏去，向一家起着炊烟的門首去，說明了我們要買點食物吃的來意，那家的主人非常的歡迎，請

我們進門去，通過小小的廳堂，在廳堂後面的廚房裏一張靠壁的方桌上坐下。方桌正對着一道後門。門外是一片敞壩。廚房的另一邊是一個長灶頭，正在煮着豆漿。原來那家人家是做豆腐生意的。據說平常是送進武昌城裏去賣，自戰事發生以來已經有好幾天沒做生意，今天因為『南軍』勝利了，他們又才開起火來，準備午飯時挑進武昌城去。

村上的人，看見我們到了，便有好些人圍集了來，探聽軍事上的消息。我們根據着數日來的長驅直入，滿相信着先頭部隊是已經進了武昌；村上的人的相信比我們還要堅決。他們說昨天下午三點鐘的時候吳佩孚陳嘉謨坐着的火車跑過。接着便是崩潰下來的北兵，接着便是追趕上來的南軍，和吳佩孚的火車相隔得只有兩三個鐘頭。以後便一直連夜連晚都在過兵，過到了現在還沒有過完。村裏人就像自己打了勝仗的一樣，非常高興，他們都稱我們是『南軍』，有的還在『南軍』上加上『我們』兩個字，他們說：『我們南軍怕有好幾百萬馬啦。』

主人把煮熟了的豆漿和現成的飯，現成的豆腐乾來犒享我們。我們一面吃着，一面和他們談笑。說也奇怪，我們也並沒有向他們宣傳，事前也不曾有人向他們宣傳過，他們總口口聲聲的說：『南軍是打救我們老百姓的，南軍勝利了，我們老百姓就有出路了。』受着老百姓這樣期待的『南軍』自然是會打勝仗；但是打了勝仗後的老百姓的出路呢？

突然在後門的做場上有喧嘩的聲音起來：『把他捉着……把他狗娘的打死……把他吊起來……』大家湧到後門外去看時，一羣村上的人在做壩邊上一排樹列下圍集着，又在嚷，又在打。我們也走上前去看時，原來他們是捉着了一位改了裝的北兵。

那北兵被衆人糾打着。口口聲聲的說：『咱不是北兵，咱是南邊人，』但他一口的北方音怎麼也不能改變。

——「你這北方拐子！你還在扯謊！你這狗娘養的！——你昨天清早偷了我的雞。——你這身上的衣裳是偷來的。——打！打！打！打！打死……」

有用拳頭的，有用腳蹴的，把那北兵的鼻血打出來了，哀號了起來。

我們把下手的人制止着了，叫大家把那北兵解開。我們對大家說，那位北兵也是我們兄弟，是我們中國的老百姓，他也是被逼得沒有出路才來當兵的。他從前就做了些不好的事情，也不是他一個人不好，是他們的官長不好。又對他們說，南軍裏面也有北邊人，北軍裏面也有南邊人，並不是南邊人就好，北邊人就不好。德甫是山東人，在這兒他自然是提出了一個現身說法的實證。

大家都了解了我們的意思，把敵愾和緩了下來。那位北兵歡喜得流着眼淚，一翻身便向我們磕了幾個響頭。他回答着我們的詰問，說他是河南人，他是參加過南口的戰事的，從河南調到南口，又從南口調到

湖北，他們的軍隊是有兩個月沒發餉的。

——「你現在是要往那兒去呢？」我問他。

——「咱要回家鄉去啦，副爺。」

——「你可有路費嗎？」

——「連一個銅板也沒啦，副爺。」

我們把了幾塊錢現洋給他，他接到手裏便撲東一聲又在地下磕起響頭來，向着我們三個人每人磕了一個頭。

——「三位青天大老爺，三位救命的活菩薩！咱要賭咒。咱一輩子兒是不再當兵了。」

那人起來向着大家打拱；很狼狽地走去了。有的人在他的背後叫着：「老鄉，你回去傳傳名啦，看我們南軍的官長是怎樣地有良心。」

那人把頭點着，沒有掉過身來。

把剩下的飯吃着，豆腐店的主人對我們說：

——「南軍的官長，你老不要着急，隊伍是一定進了城的，你老吃完了飯可以不要再走路了，你老打從鐵軌路線上去，走不好遠便有一道橋，橋下是有船的，你老可以趕船到武昌，可以趕到文昌門進城，比走

路來得快，也來得舒服。』

我們聽着他的話，着實是很愉快，並且也決定了照着他的指示，趕船下去。心裏還暗暗地在航心，怕所說的船通被北軍拉走了。

把飯吃完了，充分地付了一些飯錢，辭別了店主人出門。他們還把我們送出了村口，遠遠地向我們指示着那趕船的地方。

精神百倍地走回到鐵道路線，雜在一些隊伍裏面走了不遠，果然有一道橋，但是橋下是連船的影子也沒有的。我們還以為船是一定被北軍拉走了，說不定也怕是被自己的軍隊拉走了，不得已只好還是走路。

愈朝前走，路線上的本軍隊伍愈見稠密，走到後來隊伍是停止着進行的，我們便一直向前超蓋過去。在八點過鐘的時候，走到了停止着的隊伍的最前頭，在鐵路的正中看見了鄧主任和鐵羅尼顧問，和另一個背立着的人在那兒在討論着什麼。他們也看見了我們。擇生把左手的拳頭高舉起來，滿高興地向我叫着：

——「呵，你們到了！」

背立着的一個人掉過了頭來。是一位中等身材的古銅色的面孔的人，面孔的印象是平面的。口裏含着一隻大雪茄。

鐵羅尼照例把兩手來握着我的兩手，連連地叫着“Genossen K. Cenossen K.”他那黑色的高加索人的一雙眼睛充滿着光輝和喜悅。

擇生把另一個人爲我介紹了，那便是第四軍的第一師師長陳銘樞。我是第一次和他見面的。

——「還沒進城嗎？」我問着。

「敵人跑得太快，」陳銘樞說，「我們趕遲了一刻。」

到這時候我才知道我們是走到了最前線，一方面高興着我們還可以參加最後的一戰，一方面笑着向德甫和德謨說：「我們幸好沒有趕船，真的是由文昌門進了城，現在是成了俘虜啦。」

周圍的風物漸漸映到了稍有餘暇的心境裏來。空氣是異常地清澄的，近處的樹木帶着青翠而新鮮的葉冠，有的還在點滴着夜來的宿雨。

稍後幾步，有一位肥胖而白皙的人，嘴上有八字鬚，頭上戴着尖頂的京帽，穿着長衫和坎肩，坐在路軌上面。擇生把他頤指了一下，對我說，「那是咸寧縣的偽知事。」在那人的旁邊還有幾位穿長衫的人，想來也是由咸寧帶來的了。

我注意着看那知事，看他的樣子很是鎮靜，但他操在膝前的一雙手卻掩不着他內心的恐怖，不住地在發抖。旁邊穿長衫的人有一位像是他的跟隨人，問他冷不冷，他只把頭搖着。

我問擇生，「把他帶到前線上來是什麼意思？」

擇生帶着一種惡作劇的微笑說，「我們是要駭他一下的。他昨天清早還在替吳大帥辦差，那曉得今天清早便落得了這樣的下落。」

擇生們是還沒有吃早飯的，不一會有人擔了一桶飯來，他們便踞在鐵軌路線上吃。附近的農民圍集

了好些人到我們的周圍來了，他們也異常的高興。有些人特別送着了飯菜來。

——「把一枝槍給我們罷，」其中有一位很勇敢的向着我說，「我們也要跟着你們去打仗啦。」

——「打仗不是好玩的，要經過訓練才行，」我對他說着。「我們的戰火還很長，將來要打到北京去。把武昌打下了的時候會招兵，你來應募好啦。」

正在這樣說着的時候，在那澄清的空氣中突然轟的響出了一聲大礮。圍集在我們周圍的農民就像一羣鳥雀一樣驚散了。

——「哦，開火了！」在後邊的隊伍中不期然地有好些人叫着。

我特別把那位咸寧縣的知事看了一下，看他的臉色嚇得碧青，嘴唇變成了紫色，牙關連連地在發戰。作戰的計畫早已是定了的，第三師長的張發奎已經先到洪山去了，由洪山的高處礮擊寶陽門一帶。留在鐵路沿線上的隊伍進攻中和門和保安門。陳銘樞的隊伍陣在南湖一帶作兩方的策應。目的是希望敵人出城來應戰。

敵人的大礮接着又響了幾礮，是正對着鐵路沿線上打來的。礮彈來得很高，在我們的頭上拉着風遠遠飛到後邊去了。洪山方面也有礮聲，似乎我們的礮隊也在應戰的光景。在鐵路沿線上的左翼軍取出了散兵的陣勢要開始進攻了。陳銘樞帶着了一部分隊伍從田塍上向南湖走去。咸寧縣知事是一同帶了去

的，那人不知是遭了釋放，還是遭了槍斃。

敵人的大礮的間隔愈見來得密促，中間夾着了步槍的射擊聲。擇生聽着那槍聲，他很高興的說着：「嚇，敵人開城應戰來了！」

俄顧問尤其高興，他的含着笑意的眼睛望着我，照例又用着德國話說：“Genossen K, wir wollen in Wuhan Mitagessen geben!”（K同志，我們要進武昌城開午餐會啦！）

前進的軍號吹起來了，隊伍逐次前進。我們是沿着大路走的，鐵羅尼走在最前頭，其次是擇生，其次是我，其次是德甫和德謨。敵人的礮接二連三地從我們頭上的空中響過，我每聽見一次礮聲，心裏總要冷一下，頭是不知不覺地總要低一下的。但我看到前頭的鐵羅尼和鄧擇生時，卻不免要慚愧起來。那矮小的鐵羅尼，他是騎兵將校，革命戰役時右邊的膝頭上受過名譽的負傷，因此在固有的騎兵式的步法上更添着一層顛簸的意思，愈見像一隻水鴨，但他的頭部卻絲毫也沒有動顫。舊時曾做過團長的鄧主任也照常是把頸子昂在右邊，把胸脯挺着直黨的在走。我自己便也盡力地鎮靜着，想不讓我的頸子動，但到了礮聲一響，頸部的肌肉們就像是成了不隨意筋的一樣，又一齊都收縮了起來。自己太不好意思，回頭去看看德甫和德謨兩人，他們也是和我一樣在把頸子縮動，我自己暗地嘆息着：「沒有實戰的經驗究竟是不行的。」

起初是每人相隔得五尺遠的光景成着縱隊地進行着，敵彈來得愈見密接了，鐵羅尼和鄧主任教我們走下路邊去向田塍上散開來。他們說路線來得高，五個穿着官長服的人進行着是容易成爲敵人的目標的。我們服從了他們的指揮向左側的路旁走下去。一離開了路線，斜坡上被昨夜的暴雨打濕了的土是很疎鬆而泥濘的，異常的難走。

走下了坡時看見了詹大悲，他是逼緊着坡脚走的，身上的白色的汗衣和小衣已經有好幾處被泥塗污了，他似乎是跌了好幾次的跤。看見了他那樣狼狽的情形不免又起出了一番奚落他的心事，我向他嘲笑說：

——「詹大老，你很有軍事上的經驗啦。」

——「怎見得？」他問我。

——「你懂得借路塍來抵擋大礮。」

沒有等待他有回答的餘裕，又是轟的一聲飛過，詹大老把杖着的洋傘舉起來在頭上擋了一下。

下邊的田地上是取着散兵線進行着的我們的軍隊。人人都帶着一個嚴肅的面孔，進行是很遲鈍的，一些下級的軍官叫破嗓子地在督促着。看那情形的確是可憐的一幅圖畫，要說是和驅着羔羊上屠場一樣，是一點也不過分的。在我們的前面並沒看見敵人，但聽見有槍聲，有些槍聲來得也很近。驀地有衝鋒的軍號吹奏了起來，下級的連排長高撐起指揮刀吶喊着衝鋒，向前面突貫，軍隊跟着突貫，我們也跟着突貫。一面喊着，跑着，跑到前面沒有遮攔的地方，看見了武昌的城郭了。那連接着的通湘門和中和門上的城樓在慘淡的白光中縹渺着，卻沒看見一個敵人的影子。在前頭領導着的軍官不期然地把步武停止着了，士兵們也把步武停止着了。敵人從城牆頭上不斷地把大礮轟來，但那些礮手們似乎是很少經驗，也怕是因爲連次的大敗已經是驚惶失措，一礮二礮地都打從頭上飛過，落得很遠的去了。礮到不能打準，漸漸失掉了它的威嚴；我自己的頭公然也不再爲它低下去了，而且感覺着一種對於敵人的嘲笑的趣味，覺得他們是在放花礮一樣。一些尖銳的步槍聲，拍拍拍拍地連響着的機關槍聲，就好像是一些編織。

現在想起來覺得那次的衝鋒真是有點奇異。不知道是什麼原故，那些軍事上的指揮官在開始衝鋒之前竟沒有派遣斥候去探伺敵情，只聽着槍礮聲便往前衝，結果是向着空氣衝了一陣。這兒自然有一個心理上的遺算。大家以爲敵人一定會要背城借一地出城來迎敵，但那知敵人是駭怕了的，衝鋒的結果，只是明白了城裏的敵人是想探堅壁清野的計畫。

不知道是從那兒傳來的消息，又說敵人是由保安門出了城，有一部分隊伍又衝向保安門去，我們也跟着衝去。

保安門外是有市街掩護的，街坊上很熱鬧，賣飲食的店子早已經在開門做生意了。兩側佈滿着的我們的軍隊都是停止着沒有作戰的。看那情形知道保安門的敵人也還是沒有開門。我們三個人便一直沿着街側往前進，有些下級的軍官注意我們，叫我們留心着流彈。城上的敵人時時在對着街路上射擊，街上的居民和本軍不斷地有受着流彈的人。愈朝城邊走，街面便愈見慘淡，舖口都是掩閉着的。我們一直走到看見了城門口的地方，看見了那嚴閉着的城門。這一閉關真是有點令人失望，同時也有點令人憤恨。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兩扇木製而蒙着鐵皮的城門，就和中國的封建餘孽一樣，到了二十世紀的今天還在發揮它們的威力。我想到那樣的古城，就拿大礮來轟也一定是可以轟破的，但可憐的是在本軍的隊伍中竟連那樣的大礮也沒有，有幾尊新捕獲的野礮已經運到洪山去了。後來才知道那架在洪山上的大礮想要打進武昌城都沒有打到。

從城門邊上又退轉去，在街面的右側找着了左翼軍的司令部，我們走了進去。在裏面的一間客廳裏看見了鐵羅尼和鄧擇生。他們在一座炕床上對坐着，詹大悲也坐在擇生旁邊的一把椅子上，在和他商量着什麼事情。有好些穿長衫的街坊上的紳士們很匆忙地進出着。

“Genossen K. nehmarsho”（K同志，不好啦）“Wir koennen nicht in Wuhan Mittagessen geben.”（我們不能在武昌城內開午餐會啦。）很有點幽默味的鐵羅尼假裝着一個失望的樣子對我說。

“Vielleicht koennen wir eine Abendgesellschaft geben.”（或者我們可以開一次夜會的，）我也用我的『不落肯』的德語來和他應答。

客廳正中的方桌上堆着無數的肉心饅頭，我和德甫德謨三人不期然地都同時伸手去拿了來吃，自從離開長沙以後整整一個禮拜沒有遇見過這樣的吃食過。

敵人既持着堅壁的戰法，白天的戰事是沒有進展的可能的，大家所期待着的是敵人或者會於夜間出來襲擊。擇生和俄顧問都要參預軍事計畫，政治部的事情照例又全盤託付了給我。計算起來比我稍緩一步的由石城磯來的部員們在日內或者會到，政治部不能不找一個臨時辦公處來集中這一部分人。萬一在日內或者夜間攻進了武昌，各種的標語和布告絲毫也沒有攜帶，是應該臨時寫作的。還有附屬於各軍的各級的政治工作人員也應城召集起來討論一下在城外四鄉及入城以後的工作的步驟和範圍。政治部的臨時辦公處決定設在了南湖的文科大學（後來的中央軍事政治學校，）我和德謨兩人便和他們分了手。紀德甫是要跟隨着俄顧問作翻譯的，自然也就不能和我們再在一道了。

敵人從城牆上時常有槍礮射出，我們退到着彈距離以外迂迴着向南湖走去，途中經過一些農家，他們於驚惶之中都帶着親睦的氣象，對於我們表示出滿腔的歡迎和信賴。他們並沒有逃避的情形，有些農家在自己的屋子的土面上挖了些坑陷來躲避子彈，讓孩子們踞坐在那兒。

在文科大學遇見了李漢俊和幾位湖北黨部的人，還有在暑假中留在學校裏的幾位學生，其中有兩位是我們四川人，我已經把他們的姓名忘記了。多蒙他們的幫助在學校後部的一段樓房裏找了幾間房間來做辦公處；因為學校的中樞部和樓下的全部是已經被軍部駐劄着了。

那天又忙了一下午，不外是寫標語，做傳單，同時利用着大學的學生們向四鄉去宣傳。

一直到了晚上我們所期待的朱代杰所帶領的一批人還沒見到來，反是在長沙留守着的一大部隊人和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由廣東附隨着政治部出發的）趕着火車先到了。正在為安置他們忙亂着的時候，擇生派了人來把我和德謨找去。

我們被引到了一處小巧的洋館裏，那不知道是鐵道局的附屬物，還是外國宣教師的住家，是暫時做着軍司令部的。在一間精巧的客廳中很雜亂地呈示出一些軍事上的主要人和俄國顧問，鄧擇生和鐵羅尼都在那兒。興高彩烈地有好幾種聲音，好幾種言語，在那兒作着軍事上的雜談，淡巴菰的烟子和氣味是很濃烈的。

擇生看見了我們，他第一聲問我們的便是吃了飯沒有。由他這一問才想到午前在保安門外吃了幾個肉心饅頭之外還沒曾和飯見面。他吩咐了那兒的護兵替我們送了兩份來，我們坐在一隻角上和大家的談話不相干地吃着。說也奇怪，在有些重要的事情都已經忘記了的我，卻把那晚吃的菜記得很清楚；我記得是吃的清炖雞，火候很適宜，味道也很合口。

擇生在衆人的談話中是很熱心的一個，因為他在前本是軍事上的人物，第四軍的主腦部都是他的舊友，他能講德國話，能够直接用德國話來和俄顧問的一部分談話，或者替他們翻譯。在談笑之中也時而有軍事上的報告送來。有一次是第X軍的Y師長派人送來的報告，說他的隊伍開到了沙湖，他本人是駐劄在鐵路工程處，但那報告沒有遵守軍事上的格式，也沒有證明時刻。會集在那兒的軍官們便拿來做了譏評的中心，擇生譏評的特別露骨。

——『連軍事上的ABC都不懂，也在做師長。』

第X軍從廣東出發時是派了兩師人參加的，在未到長沙以前部下的隊伍已經逃走了不少，一直沒有上過火線。在長沙時其中有一團人成立黨部，我代表着總政治部去列過席，那一團人中有三分之一是在長沙新補充的隊伍，有好些還穿着長衫。但到北伐軍已經兵臨武昌城下了，那Y師長卻也神速，用火車載着自己的兵趕到了武昌城下。

——「名將的用兵是「始如處女，後如脫兔」的。」說這話的是那頗以儒將自命的陳銘樞。

擇生又來問了我們一些工作上的情形，我們把下半年所做了的一些事情告訴了他。向他說留在長沙的大部分隊伍趕着火車到了，反是代杰所帶領着的一部分先遣隊和胡公冕所帶領着的一部分的宣傳大隊還沒有到來。

——「他們大約是在路上沒有趕上火車的。還是我們幾位的脚跑得快些啦，」擇生又很得意的說着，但他卻沒注意到他的話是有點誇張；因為他忘記了他自己的脚是踏在馬鐙上的。

他又簡單地告訴了我們一些軍事上的情形，在那一下半天是沒有什麼進展的，只是漢口的劉佐龍派了代表來輸誠，交涉還沒辦妥。吳佩孚在昨晚崩潰了下來時候便渡過了江去，大約是連夜逃向河南去了。我們的一方面有第八軍派了一部分隊伍由白沙洲繞道渡了江，已經取得了漢陽，早遲要向武勝關進出以截阻北洋軍隊的來援。城裏的敵人沒有什麼動靜，大約是要死守着以等待吳佩孚的來援；沒有援兵到來之前他們是不敢出城的。但當晚自然要提防着他們的夜襲，那倒是絕對地可歡迎的事情。

——「他們要出城來夜襲，那是他們自己掘自己的墓坑，」擇生用着他愛用的表現法來這樣說。

待我們把飯吃完了之後，聚集着的軍事上的要人們大都分頭去就自己的部署去了。擇生和鐵羅尼是要留在司令部裏的，我便和德謨又回到文科大學去。

那一天晚上敵人沒有動靜，第二天的上半天也沒有動靜，軍事上的人們有些焦燥起來了。攻城的大砲沒有，飛機也沒有（有由俄國駕駛的飛機還沒有到，但也不是戰鬪機）對着一座封建時代的古城簡直沒有辦法。

軍事上的人們在中午的時候開了一次會議，決定組織敢死隊，在當晚乘着夜陰運着梯子去爬城。本來是沒有工兵隊的革命軍，政治部在這時候又成了臨時的工兵隊。好在這時候代杰所領率的一批先遣隊和胡公冕所領率的宣傳大隊都已經到齊了。政治部派了許多人到四鄉去徵發梯子和麻繩。梯子是兩塊錢一架，由政治部發出徵發券。被徵發了的人家可以憑券到政治部來領錢。

徵發隊一派遣了出去，絡繹便有好些梯子徵發了來，有些是嶄新的，有些舊得來怕已經有百年以上的高壽。凡是舊的梯子大概都很短，大約是用久斷折了被鋸短了的原故。爬城的地點是決定在賓陽門的東北角上一段小丘上的城壁，那兒的城壁比較低，只有一丈五六尺高的光景。長的梯子連着兩架，短的連着三架，大約是可以搭上的。梯子被堆積在南操場上，部裏留下的工作人員和勤務兵，便一同在那兒找紮

起來。由我自己的手也找紮了三四架。找紮好了，又抬到學校的門外去。

爬城的時間是決定在午前二小時，在夜半的時候由各軍所挑選出來的敢死隊到南操場來齊集。分成了十人一小隊，每小隊一乘梯子。梯子有四十駕，就由四百名的敢死隊扛荷起去。

擇生是要跟着去督隊的，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也要同去。我自告奮勇也要求去，擇生不允許。他說我也走了，部裏沒有人主持，主要的工作還是在明天進了城之後。竟連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在東江之役本是有陣地經驗的人，他都不肯讓他去，只挑選了十名的宣傳員帶着一道去了。

由南操場送着敢死隊出校門，已經是兩點過鐘了，看着他們荷着長梯，向黑暗中消逝去。天上仍然沒有星月，一切的燈火不用說是不能點起的。看着這樣的光景，不由得把易水歌在腦裏的字幕上浮現出來，不斷地起着寒慄。

在敢死隊出發後，一方面作着第二天清早進城的準備，一方面靜候着前線上的消息，但是消息是很沉寂的，只在天色向明的時候，稀疏地聽見了一些槍礮的響聲。爬城的計畫顯然是失敗了。在五點鐘的時候我叫胡公冕到總司令部去探聽消息，結果是不出所料，因為敢死隊走到城近處時天已經發白，敵人已經有了準備了。

在前線上雖然並沒有直接的交綏，但時而有受了敵人的流彈的士兵送轉來，總司令部的衛生處是

組織得最不完善的，有多少傷兵便一直送到了政治部來。政治部的衛生股只有一位股長和兩位股員，仍然是不濟事的，好在黨紅會的一些女同志是附屬在政治部裏的，她們也很踴躍的幫着做着些救護的工作。

但是到了九點鐘的時候，鄧主任和俄顧問都不見回來，同他們一道去的十位宣傳員也都沒有一個影子。我便決心着和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同到前線上去視察，同時也帶了一位宣傳員同路，便是周恩來的弟弟周恩壽，是一位很敏活的短小精幹的少年，在那時是在做着小隊長的。

從文科大學向北走去，不遠更折向東首時，途中有一段路在小春地裏和通湘門以東的城牆平行着，是全無掩護的。城樓和城壁很鮮明地現在左側，城上的敵兵都隱約地可以看出。路旁有些短梯子拋撒着，自然是昨晚的找紮沒牢，在途中解脫了的。賓陽門一帶的附郭的居民爲避免前線上的炮火負荷着家財更向鄉下逃去的人，男男女女地在田塍上絡繹不絕。

走到洪山的寶通寺近處，路上有鮮紅的還未凝結的血，過路的士兵對我們說：剛才有一位兄弟在這兒中了流彈。

寶通寺是衛生處駐劄着的，成了臨時的野外病院，門前很呈着雜亂的情形，但我們沒有工夫進去，又往前走。

走到了關帝廟，那兒是前敵司令部的駐劄處。從那廟門走過時，陳銘樞含着一隻雪茄剛好從左側的大門中走出。我那時候很佩服他，覺得他很沉勇，就像是關聖帝君顯了神的一樣。連那在他的後面跟着的兩名護兵，也就像是周倉和關平。

我問我們的關聖帝君：「擇生是不是也在裏面？」

關聖帝君曰：「不在，怕還在前面的長春觀裏面。」

他也是要往前線去的，我們便和着他一同走出了關帝廟的東轅門。

從那兒走出了之後，左側是一兩家人家的背後，右側是一段空地。空地盡處，左側的人家也盡了，接着是在道路的右側又有一排和城牆正對着的人家。那些人家的門戶都是掩閉着的，同時怕已經都是逃空了的。前面的道路上有晌午的陽光照着，城牆上明顯地可以看出來的敵人，不斷地向那陽光中放射出啾啾的槍聲，把那兒的光景渲染得異常慘白。但無論你怎麼用力的凝視，那些神祕的子彈你是看不出他們的路線來的。我們的關聖帝君長嘆起來了。

——「頓兵於堅城之下，如何是好呵？」他站在路口上，用着唱京戲的口白這樣說，同時又回向着他的兩員站將，提着駁壳槍的周倉與關平。

——「你們到這屋後去看看，看看有沒有背道好走。」

兩員護將去探尋了一會，轉來報告的是：『沒路好走，』於是我們的關聖帝君把頭搖了幾下又各自走回關帝廟去了。

我們和關聖帝君分了手，各自向那慘白沒有掩護的道路上走去。我們三個人，我走在最前面，周恩壽走在中間，胡公冕走在最後，每人相隔五六尺遠，開始走出四五十步的時候是很心驚膽戰的，保不定究竟是在那一步上便要 and 那些啾啾地叫着的神祕的東西相遇。但是走過了那四五十步，覺得退轉去也還是一樣了，愈朝前走便愈見冷靜了起來，是由死心蹋地中生出來的冷靜。奇妙的是想起了老子的兩句話，所謂『忽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忽兮其中有物』，頗感覺着一種輕淡的滑稽的趣味。

就那樣恍兮忽兮的走着，眼前用紅牆圍着的長春觀，真好像就是長春的天堂。

在那天堂的門首遇着了獨立團的團長葉挺。他也帶着了兩名護兵由那兒出來。

——『喂，趙子龍，怎樣？』我這樣簡單地向他打招呼。我在當時對外的宣傳是稱揚他爲趙子龍的，他自己也很得意，但他卻不會知道奉上這個徽號的便是我。

他只是把頭搖着。

——『擇生是在裏面嗎？』

「我也在找他啦，裏面連一個鬼影子也沒有。」

「他該不是戰死了嗎？」

「不會的，我們今天清早一同踞在這兒，隔着牆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他叫我去找陳師長，我找了半天才找到，轉來便沒看見了他。他是和鐵羅尼一道的。」

「陳師長我們在關帝廟的門口碰着，一同走了一段路，他又退轉去了。」

「糟糕？」神經質的趙子龍憤慨着，失了睡眠的充着血的眼睛放着異樣的光，嘴唇在戰顫。

我們又各人離開來，先先後後地退轉去，葉挺折進關帝廟去了。

由關帝廟的西轅門退出了的我們，走不好遠，在路的左側一座花園的柴門口遇着了鄧擇生和鐵羅尼。他們兩人是坐在那門限上的，紀德甫和擇生的兩名護兵立在他的面前。大家都帶着一個很疲倦的面孔，鐵羅尼的眼膛分外的黑，眼仁充着血，向着我微笑。擇生卻很不高興地問着我們：

「你們來幹麼？」

「來看看前線上的情形，同時來找你們的，怕你們陣亡了啦。」我回答他。

擇生苦笑着。

公冕問那十名的宣傳員的去向，擇生說：「那幾位小傢伙駭倒了，在關帝廟前面的一家人家裏藏着。」

不敢出來。死是不會死的，你不要擔心他們。他們到了晚上會爬出來的。」他又回過來問着我：「你們走到了前面的那兒？」

——「到了長春觀，遇着了葉挺。他進關帝廟去了。」

他硬着頸子偏着頭點了幾下，扁着的嘴邊微微泛着矜持的微笑。

——「今天是不會再有戰事的，我們回去睡覺去罷。」擇生這樣說着站立了起來，又用德文來向着鐵羅尼說了一遍，鐵羅尼也站了起來。

大家默默地走着歸路，走過了洪山，在一個小小的莊落上遇着了上前線來的總司令部的一羣人。其中有總司令的蔣介石，軍事顧問的加倫將軍，勇名嘖嘖的張發奎——那時候我們是稱他爲張飛。但這位近代張飛的身子很矮小，臉也很尖削，頭上一頂軟的軍帽，俄國式地朝天戴着，身上穿着一套洗白了的淡青色的布軍服，褲腳是廠着的，腳上穿着一雙綠色的膠皮鞋。這樣一個貌不驚人的樣子，在不認識他的人看來，一定會把他當成一位勤務兵。

兩來的人一接頭，兩種國語的會話各自分開來了，各各報告着前線上的情形。立着談了一刻，擇生和鐵羅尼又隨着總司令部的一團人折向前線去。他們要到前敵司令部去開臨時軍事會議，我和公冕們便同他們分了手。

時候已經是過了正午，因為口渴，我們便到一處人家去求一點茶水。那家人家的前面是一排一列三間的新修的房子，左手的掛角上有一帶耳房，後面還有一排老房子，看那形勢大約是中等地主而兼帶着自行耕種的農家。我們向那左手的耳房邊走去，因為那兒的後面在起着炊烟，表示着是廚房的所在。

耳房裏坐着好些女眷，又縱橫地放着好些包袱，自然是城隍附近的居民到這兒來避難的。我們表示了來意。廚房裏出來了一位中年的農婦替我們捧了一壺茶來，並且請我們往外面最右側的一間廳堂中去休息。那家裏的男主人也出來了，是一位很樸素的中年人，很客氣地來陪我們坐了一下。他問明了我們還沒有吃中飯，又留着我們吃飯，叫他的女人替我們殺一隻雞。

在飯沒有送出之前先送了一壺酒來，有兩盤花生和豆腐乾做下酒菜。公冕是不喝酒的，恩壽也推說不喝（大約也是因為大隊長在面前有點忌憚），我一個人便自斟自飲起來。酒是黃色而帶甜味的，和我們四川鄉下釀的蔭酒相同。那種酒的酒母是糯米製的甜酒，有時滲些燒酒在裏面，又泡些香橡皮和佛手柑片以取香味。那主人所拿出來的酒也有香椽一類的香味，大約泡製的方法是完全一樣。這種酒在成分

上是一種混成酒，喝時很可口，喝後卻很醉人。

我不客氣地把起初送來的一壺酒喝乾淨了，主人把飯送了來，雞子是紅燒的，另外還炒了一盤雞雜。他看我很能喝酒，便把壺拿了去，又替我換了一壺來。我已經有幾分醺醺的醉意，推諉着不再喝了。

——「你老不要客氣，」主人說，「你老是軍人，軍人是能够喝酒的。」

——「他不是軍人呢，」公冕對他說，「他本來是大學堂的先。」

——「哦，怪不得總有幾分斯文氣象啦，」他說，「這酒是不醉人的，你老，不要緊，你老再喝一壺罷。」說着便提起壺來替我斟酒。還說了一些菜不好的話，便退下去了。我索性又自斟自飲起來，把第二壺也喝得乾乾淨淨，足足怕喝了兩斤蔭酒，醉意可有七八分的光景。

把飯吃完了，公冕和我把錢包傾倒了出來，湊集了三塊錢，把來交給房主人。他推着不受，他說：「你老在替我們老百姓出死力，這點我們是應該孝敬的。」——在這些地方足見得當時的農民對於革命的信賴和歡迎。當時的革命軍比較上還有點紀律，而還沒有把握着政權的所謂革命黨人在標語上，傳單上，乃至宣傳員們的口頭的演說上，發行了無數不兌現的軍用票，如像「打倒貪官污吏，」「剷除苛捐雜稅」之類，這些自然也收了莫大的效果。

我們在那一次不用說也賣了一下膏藥：「我們革命軍是不虧空老百姓的，吃了老百姓的東西總要

付錢啦。」

把錢放在桌上，告辭着又走出去。仍然是我走在前頭，恩壽走在中間，公冕走在後邊。走不好遠，走到了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來了。從對面有一大隊夫役挑着擔子走來，是送稀飯到前線上去的。那些夫役沒有軍事上的人指揮，走得異常密接。走到那段地方的中央處和他們接了頭時，轟充的一聲一個大礮打來了。這第一礮沒有打到，離我們有八九尺遠的光景，落在了那乾燥着的小春地裏，起了一陣土烟，沒有爆發。

公冕在後面叫着：『大家趕快走，把隊伍隙開來，每人離過五尺遠的光景。』

大家都很忽忽忙忙地搶着往前走，對於他的命令好像馬耳東風，他又更加大聲地叫出第二次時，話還沒說完，又是轟充的一聲飛到了。這第二礮又打過了一些，超過我們有五六尺遠的光景，在地裏又起了一陣土烟，也沒有爆發。

夫役們更加忙亂起來了，我醉醺醺地向公冕叫着：『城牆上的礮手打得還不錯啦，只可惜那礮彈怕是劣貨 *Made in Japan* 的。』

——『這兩礮都不錯，也怕是地面鬆的關係，要是爆發了，今天的犧牲是很不小的。』公冕這樣說。

夫役的一隊人把正中處走過了，我自己的尿意來了，便站在那田地中對着武昌城洒尿。尿正洒到中途的時候，又是轟充的一聲。這一礮正落在我背後的路路上，爆發了；夫役的隊班子混亂了一下。

——「這一礮大有進步啦，嚇！」我一面洒着尿，一面感嘆着。

隊伍把那段路已經走過了，連公冕和恩壽也一同踉蹌地退了轉去，只剩我一個人立在地裏。公冕立在後面的一座農家外面的草墩上向着我叫：「有人受了傷，快轉來，快轉來！」

我退轉去走不幾步，看見路上倒了一擔稀飯，路旁的番薯地裏倒了一名夫役，在那兒呻喚。我問他：「你受了傷嗎？」

他指着他的左腳的腳頸：「噯喲，吊那媽，痛啦。」

公冕又在叫。我叫那受了傷的夫子等着，回頭便去替他叫扛架來。

待我走到公冕所立着的地方時，看見恩壽睡在那草墩下，也在呻喚，左腳的腳背在流着血。農家的人跑了好些出來圍着。

——「恩壽也受了傷嗎？那邊番薯地裏還睡着一個呢。」

——「我已經叫同來的夫役們去叫扛架去了。恩壽也是不能走路的，怎麼辦呢？讓我回部去叫人來抬罷。」公冕這樣說。

——「用不着回去叫人的，」我說，「我們就在這兒找一扇門來，不可以抬回去嗎？」

公冕贊成了我的說法，結果是在農家裏找了一張楊妃椅，四脚朝天的翻過來，在底子上敷了好些稻

草，便成就了一臺扛架。

恩壽被移進了那架臨時扛架裏，我和公冕便把他抬回了南湖。

九月三號和四號都沒有動作，只是敵人早是推察到了南湖文科大學是革命軍的司令部，時常有大砲對着這個方向打來。因此在夜間是不准點燈的，有點燈的必要時都須得在燈亮上罩着黑罩子，背着武昌城的一面。

我們所住宿着同時兼帶着辦公室的房間是在樓上最後的一排，背面的窗口是正對着武昌城的。在四號的晚上，在兩個窗口上罩着黑布，更把軍服來罩在馬燈上，我和胡公冕，朱代杰，李德謨幾個人在擬定派往到湘西新附的某軍去的政治工作人員名單。正在這時候，鐵羅尼顧問和紀德甫兩個人走進了來。他們和鄧主任是住在更前一排的一間空出了的講堂裏的。

鐵羅尼是很有趣味的一個人，他雖然是騎兵將校，但他在政治上和理論上的認識是很正確而豐富的，而且還很有文藝上的教養。他很喜歡詩，特別是喜歡往年自殺了的俄國的薄命詩人約先寧。在行軍的途中，他隨身帶着的一冊約先寧的詩集，有時我以紀德甫爲介，請他把那清新的歌詠農村的詩，替我們在口頭上翻譯過。

大約因爲我也是喜歡文藝，而且也特別喜歡詩的原故，鐵羅尼和我很能相得，自從從廣東出發以來，一有暇時，他每愛和我作個人的談話，在那樣的時候自然總是靠着紀德甫做中介的。

他等到我們把名單擬定，公冕和代杰拿着出去派人作準備的時候，我們又才談起話來。

鐵羅尼問我進了武昌城以後的工作步驟，我把所預畫着的大略告訴了他，他特別注重到了學生方面的宣傳。他說：『武昌的師範大學有不少的學生，那兒聽說是國家主義派的根據地，現在雖然是在暑假期中離開了學校，不久便要開學了，他們是又要轉來的，你用怎樣的理論來破除他們的國家主義？』

他這個問題是我在半年以前還沒有到廣東的時候便曾經思索過的，因爲當時在上海方面宣傳國家主義的人，如像醒獅派和孤軍派，大抵都是我的同學，有過半數是和我相識的人。我知道他們有好些的確是很有熱誠的人，他們是看見中國的積弱，總想用最良的方法來把中國強盛起來。他們所想到的最良的方法便是所謂國家主義。醒獅派的人很籠統，他們的國家主義只是一種熱情，一種聲浪，更具體的說，只是所謂『內除國賊外抗強權』的兩個口號。內的國賊是什麼，外的強權是什麼，怎樣去除，怎樣去抗，他們是沒有充分的素養來分析，來究極的。雖然在會琦口中也曾提出過飛機潛航艇的政策，但是可憐，他老先生卻沒有想到飛機和潛航艇不是會從天飛下來，從海裏浮出來的。他們對於經濟問題完全還沒有睜開眼睛，極簡單極接近極可痛心的一個實證，每日呈在我們的眼前的，他們都沒有見到。那便是他們的機關

報醒獅用的正是洋紙！

孤軍派的人比較起醒獅派是要『醒』得一點。他們比較上提出了一些具體的方案，他們在那時候主張恢復約法，主張裁兵，也特別把經濟問題提出來討論過。雖然討論得並不見有什麼具體的結果，但他們大體的傾向在擁護個人資本主義。這一批人大體上是日本留學生，所以他們更有一個具體的信念，便是要做效日本。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和中國一樣是經濟落後的國家，但自變法維新（便是由封建制度變成資本制度）以來不數十年，一躍而成爲了世界第一級的強國。日本正好是中國的指路牌，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這個提示正是他們和一切的常識家所共同具有的根本信條，他們是相信着中國一定能夠。但其實這兒正是一個問題，問題便是：日本人用那樣的方法強盛了，爲什麼中國不能夠？

中國人要效法日本——這是中東之戰以來的中國的國是。自甲午以來中國送到日本去的留學生，沒有詳細的統計，我想至少總在三四十萬以上，就是我們自己便是由這種國是中所生出來的一個世代，但我們效法的結果是怎樣呢？

效法日本其實是間接效法歐美，更具體的說，便是在暗默間想怎樣來把中國數千年沉滯着的封建社會轉化成近代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除派遣留日學生之外，派遣到歐美去直接效法的人，我想那個總數

和留日學生也會是不相上下的。但那做效的結果又是怎樣呢？

中國人效法歐美，事實上是在日本人效法歐美以前。舉出些個簡單的例子吧。日本耶教徒的聖經是從漢譯本重譯過去的。日本人在明治時代乃至大正時代的初期，研究英文的人是在用中國鄭氏著的英文熟語辭典。然而這個情形在四五十年後是恰恰顛倒了，中國人甚至要採用日本人編著的中國史了。

問題的面貌在這兒更加顯明了起來，便是日本人效法歐美成了功，爲什麼中國不能夠？

我的答案很簡單：日本的資本主義的社會革命所以成了功，是因爲有地大物博的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歐洲的資本主義侵入東方來的時候，日本是同樣受着患害的。但那個已經人滿爲患的日本的幾個島子，在歐美人看來，比較起中國自然是沒有多麼大殖民價值的。因而在資本主義的進軍向着中國萬箭齊射的時候，日本人便在這短時期內培植成了自己的資本主義。中國要做效日本，想在今後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最好是要有比中國更好的殖民地來緩和歐美的以及日本的資本主義的進攻，就如像日本有中國替他做了擋箭牌的一樣。然而這個條件已經是無法具備的了。中國今後要想成爲強盛的資本主義的國家，除非是近世的帝國主義者在火星或者別的星球上發現了廣大而有價值的殖民地。

我把我這樣的意見在那暗淡的一室中，在敵人的砲火轟擊之下，對着鐵羅尼談出，他很表示贊成。他

說：『土耳其近年的國權運動的成功也有同樣的意義，便是近東問題已經解化成遠東問題了。』

——『土耳其的外觀上的成功，英法帝國主義的援助不是最大的原因嗎？』我多少帶着反駁的意思這樣說，『意思不是在掣肘蘇聯嗎？』

——『那是自然，』鐵羅尼說，『就如日本的成功一部分也是由於英美帝國主義的援助那樣，那時又是在掣肘沙皇時代的俄國。日本假如沒有日英同盟的掩護，恐怕他的成功也沒有那樣的快。不過根本還是中國做了烏龜。』

烏龜這個表現我起初沒有懂到他的用意，覺得有點奇怪，我又叩問了一下，才知道他是說的神道碑下的最屬。那在行軍的途次他是看見過不少的。我不免笑了起來，不錯，我們的背上的確駝着有很大的神道碑，這神道碑上寫着有舊時代的殘骸『軍閥』和『官僚』，而在那上面更狼藉着無數的帝國主義者的商標。

話正談得高興的時候，突然有一聲大礮落得很近，而且爆發了。室外起了一番嘩噪的聲音。

代杰走了進來，說：『大礮落在圍牆的外邊，一隻牆角打破了一角。』

接着又有人來傳達嚴密熄燈的命令。鐵羅尼和紀德甫便告辭了出去，拿着手電一開一閉地從廊道中間向前面的講堂裏走去了。

五號的晚上又是決定要去大規模地爬城的。南湖附近的農家的梯子因前一次的爬城，徵發得已經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遭了失敗，這次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的下午便已經派人到咸寧附近去徵發了。主持其事的仍然是總政治部。五號的上午已經有梯子絡續送來，堆積在南操場上，大家又來從事綴紮。紮好了的便抬到學校門外去停積着。

這次的梯數比前次多上四五倍，又是斷斷續續地送來的，因此綴紮的工事便很見拖延。一直到了晚上由各軍所挑拔出來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齊集的時候，還剩下好些梯子沒會綁好。操場沒有可以工作的餘地了，大家把那還沒有綁好的梯子都抬到校門外去，又在那兒繼續着工作。

天已經黑下來了，全靠幾隻馬燈的光放在地面上照着。適逢其會有好幾隻馬燈的洋油都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洋油盡了便可以到那兒去取。在場的人們沒有人知道那施發所的所在的，替他們說出地址來時，但那大學的内部大家也不熟習，於是我自己便把馬燈收集起來，左右兩隻手各提了三四盞進施發所去討油。進去時燈光是很幽晦的，倒沒有感覺着什麼，

出來時因爲油份充足，燈光倍加明亮，左右兩手各提着三四盞，自己都覺得好像是成了一位火焰天使，要飛起來的一樣。走到校門口恰好碰着一羣軍事上的將官們迎頭走來，有幾位俄顧問參在裏面。陳銘樞和張發奎在最前頭走着，大家都匆匆忙忙地沒有打招呼。在那一羣人的後部有一位年青的軍官，臉色白晳而清秀，身裁長而細，他招呼着我：

——「哼，你這傢伙，點起那多亮真好玩啦！」

話中含蓄着責備的語氣。他沒等我的回話說出，又把從紫梯處跑來的鄧主任拉着了。

——「喂，擇生，這位尊駕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寶貝罷？」一面說，一面把我指着。

——「怎麼？」擇生驚訝着回問他。

——「毫沒有軍事的常識！在敵人的面前點着那麼多的燈，好做礮靶子啦！」

——「你真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那一座大學堂在背後擋着，敵人會有千里眼看見這些燈光。」

那軍官沒再說什麼匆匆跟着前面的人走進去了。擇生也跟着進去了。

在混成隊出來就道的時候，所有的梯子也剛好綁完，部署是和前次的辦法一樣，只是人更多，氣象更加悲壯。

剛才的那一羣軍官們又走出來了，擇生和鐵羅尼也在裏面。剛才責罵過我的那位年青的軍官呈着笑容走來向我拉手。

他說，「剛才得罪了，我是黃琪翔。」

黃在那時還是張發奎部下的團長，在軍中有美男子的稱譽，但我們還不會見面。我也笑着和他拉了手。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和我拉了手，其他相熟的人也和我拉了手，最後是紀德甫走來。

德甫自來是少說話的，從廣東出發以來，尤其是自長沙出發以來的這幾天，我們雖然時常在一道，他和我竟直可以說是沒有直接談過一次話。他的身裁高長而瘦削，面孔也瘦削而帶黃色，但也不是病態，年紀是只有二十五六歲，青春依然還留存在他的一切的態度裏。他穿的依然還是從汨羅以來的那件黃色的布軍服，到了武昌以來連換洗的時候都還沒有。他除揹着圖囊和皮帶之外還揹着一桿駁壳槍。

他和我拉手，拉得特別用力，他說：「今晚上我們無論怎樣是要打進城的，打不進城我不回來見你了！」

他是說得很爽快的，我回答得也很爽快。「那要你回來，我們明天趕上來相見。」

在那時候誰都相信着當晚一定是要打進城的，雖然免不了是有多大的犧牲。混成隊中的士兵們有

的自然也在吐着怨言，但大多數在沉默之中含蓄着必勝的勇氣，他們的路似乎只有兩條，不是死在武昌城下，便是活進武昌城內。他們每個人雖然都有金錢上的犒賞（數目我不記得的），但那不足以污損他們的英勇；因為獻身的精神，敢死的氣魄，終不是金錢可以買得來的。

我們彼此拉了手之後，指揮敢死隊的軍事上的人們向那深不可測的，和死境似乎並無區別的黑暗中消去了。

誰都是想到在五號的夜裏一定可以攻進城，當晚留守着的人，特別是政治部，要準備着第二天進城的工作，大家都沒有睡覺。

敢死隊出發後有兩個鐘頭的光景，礮火的聲音特別地猛烈起來，想見着戰鬪是異常的激烈。礮火的聲音一直到天快見亮的時候才漸漸衰竭了，在那時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我軍已經攻進了武昌，正在城裏巷戰。進城的門道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又說是武勝門。先進城的軍隊有的說是第四軍，有的說是第八軍，又有的說是第一軍。消息雖然有各種的歧異，但是在已經攻進了城的一點上是一致着的。

每來一次消息大家都要狂喜一次，但一根究起那消息的來源時又多是渺茫無着的。我們希望着擇生從前線上會有什麼確實的消息送來，但是始終沒有。消息傳來得很頻繁，蓋然性也逐次地增加，我叫胡公冕到前面的總司令部去問過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會着了白參謀長，講那攻進了城的消息是有的，但還沒有得到前方來的確報。第二次他是見着了總司令，說他正在和前線打電話，說是的確是攻進

了城，是第一軍的第六團先入，由武勝門攻進的，大約賓陽門在現在也已經攻破了。

得到了這第二次的報告，自然是再無可懷疑的，政治部的全部是已經把開發的事體準備好了的，便頓時在南操場內整起隊來，時候是七點過鐘。但在要開發的時候，我自己又親自跑向總司令部去，正要上樓，碰着了已經任命爲湖北財政廳長的陳公博由樓上下來。他先對我說，武昌的確是攻破了，他也要立刻進城去。

我聽了他的話便也沒有再上樓去，折回南操場，讓部隊開發。

胡公冕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我和代杰德謨諸人領率着政治部的全體人員。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是由兩位宣傳員在前頭打着的。

走出了文科大學的校門大家都很有點威風，特別是那騎在馬上的胡公冕儼然像是一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不斷的有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跑來，看見我們威風凜凜地在向着城走，都遠遠地便把擔子放下了。我們告訴他們說：『你們不要逃難，城已經攻破了。』他們聽見我們這樣說，有的便立刻又挑起擔子向着城一邊走去。

走到了那要分路的叉口上了。那兒有三條路，向直走是通通湘門，左手是朝保安門，走，右手是朝洪山

走的。在那兒又遇着了陳公博，他騎在一匹皂驢馬上正在躊躇，向直走自然是很捷近，但那兒異常的慘淡，連一個人影都沒有。他決定朝左手走去了，我們是朝右手，覺得由賓陽門攻進是更要可靠一點。

向右手走去時走不好遠，便要走到那段全無掩護的地面上來的，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沒有經過訓練也沒有見過仗火的凡馬，但那傢伙的神經似乎比人還要敏感，一要走上那段地面時它便囉哩起來，無論怎樣鞭策它，它都不肯走，甚且人立了起來，終竟使我們的胡大元帥不能不趕快從馬背上跳下。走在最前頭的馬，讓馬夫拉在最後頭去了。

大家走上了那段土面。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在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下過一次暴雨之後，接連着好幾天都是晴天。地面乾燥得就和沙漠一樣。武昌城遠遠地在陽炎中橫陳着，脚根是看不見的，白濛濛地好像是一座蜃氣樓。

剛剛走到那段地面的正中處，我正向旁邊的德謨指點着說，「我們前天推大礮的地點便是在這兒了。」話還沒有十分落脚，忽然地，兵的一聲大礮剛好落在隊伍的中間不及三尺遠的光景。地裏起了一陣土烟，部隊裏也起了一陣人烟。礮彈沒有爆裂，隊伍卻是爆裂了。沒有經過訓練沒有見過仗火的人，無論平常是怎樣的熱心，怎樣的誇口，一到臨場便是要露馬腳的。政治部的有好多些勇士們聽見了一聲大礮，便駭得雞飛狗跳起來，有的把手裏拿着的標語和傳單通同拋棄了，有的駭得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有一位四川

的姓曾的人駭得當場便吐了一口血，把腰勁駭軟了，幾乎連路都不能再走了。

接着又來了兩聲大礮，都打得很準確，但都要感謝那騙錢的帝國主義者，他們把些不中用的廢彈賣給了中國的軍閥，一個二個都沒有打開花。而我們總政治部的有好些不打便開花的大礮們要收拾起來走過那段危險的地面，真是很費了一些力氣。

走到有掩護的地方了，公冕很讚嘆地對我說：『敵人還不錯，城裏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有點靠不住罷，』我懷疑了起來，我是不相信敵人會有那樣的鎮靜的。『進城的消息真是老總親自對你講的嗎？』

——『是的啦，是他親自對我講的，』公冕很堅決地肯定着。

——『我怕他也是受了騙，』我這樣說，一種誑報軍情和冒功圖賞的那類卑劣的事跡在我的腦中浮泛了起來。

搬家逃難的人是絡繹不絕的，從前線上也時而有散兵下來，抓着他們詰問時都不知道有攻進了城的那麼一回事。由種種情形的歸納，覺得那個消息是很可疑的，我便把部隊的進行中止了，由我和公冕和幾位願意同行的同志往前線去探聽，待把消息探聽的確了再定行止。

我們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扛架抬來，後面有一位背着駁壳槍的護兵跟隨着。

扛架愈見抬攏來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雨衣把面孔遮蓋着的，在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皮腿套，兩腳長伸着沒動。我的注意力完全是集中在扛架上的，我想到那負傷的一定是一位官長。

當那扛架從我們的身旁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隨着的一名護兵突然叫着我：

——「祕書長！主任……」

那人原來就是鄧主任的護兵楊昇，我大大地吃了一驚，連忙問着：「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係係……」

我沒等他把話說完，由那服裝已經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了那扛架上的人是誰了。連忙跑到扛架旁邊去，揭開那蓋着面孔的雨衣來看，紀德甫的面孔現了出來。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臉色轉化成了蒼白色，嘴是隙着的。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眼淚頓時在我眼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楊昇從自己的懷中取出了一封信給我，是擇生寫給我的。信是寫在抄本的一葉上扯下來的，那誠懇而簡單的幾行文字至今還一字不易地留在我的腦裏。

『××同志：

攻城計畫仍歸水泡，敵人尙在頑強抵抗。德甫同志於今晨正七時陣亡於賓陽門外長春觀內，哀痛至極；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nda Den 七時四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是慣愛把自己的名姓用德文字母寫成『演達·鄧』的，他這幾行手書就像一股電氣一樣，一霎時使當場的同志們都嚴肅了起來，有好一陣大家都沒有聲息。

攻進了武昌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假造的。因為誰都相信着當晚的夜襲一定可以攻進城，而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自會掌握着武昌乃至湖北全省的統制權，這便構成了那假造情報底動機和目的。但是爲這種小小的陰謀所欺騙了的不愉快卻爲紀德甫底戰死所喚起的嚴肅而悲壯的感情所鎮壓着了。大家在默默地佇立了一會之後，又只得回到全體的部員們所等待着的地方，叫把旗幟捲了起來，把隊伍分散開，三三五五地折回南湖。敵人的礮手，大約也是因爲有城牆的保護完全恢復了他們的鎮靜，在人少的時候他們是不肯開礮的，一些成了驚弓之鳥的部員們算也誠惶誠恐地先後把那段危險的地

面通過了。

走回南湖的途中，楊昇用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把晚上夜襲的情形告訴了我；話雖難懂，但也得到了一個大概。

敢死隊有一部份人是到達了城下，而且有少數的人是爬上了城牆的，但是敵人也早有防備，遠處的用機關鎗掃擊，近處的用手榴彈投擲，爬上了城的人因為衆寡不敵，都被打下了城來。其中有一位曹連長，爬上了城，也被敵人打下了。他的部下爲去搶回他的屍首，死傷的很不少。

鄧主任的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隊，一個彈子打來端正地打中了馬的腦壳，那彈子從鄧主任的左脇下穿過，軍服的袖子打穿了一個洞，人卻沒有受傷。馬是頓時倒了。

在清早的時候他們退到了長春觀。那兒的地方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同一的一個水準上，和城牆相隔得也只有二三十丈遠的光景。他們就躲在那土牆背後，用駁壳鎗和城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牆頭去，打一槍立刻又縮下牆來。敵人也曉得這邊是有人埋伏着的，用着機關鎗對準掃射，但都沒有把牆打穿，打進了園子裏的鎗彈，真是就和雨點一樣。這邊不應戰的時候，敵人也把鎗準掉過了方向，不再對準着這邊。但你一伸頭去打幾鎗，他們又來向你下一陣子彈雨。就這樣來復了好幾次。最後一次是紀德甫把頭伸出去探看外面的形勢，正回過頭來報告坐在牆腳下的鄧主任和鐵羅尼的時候，突然地有鎗彈打中了

什麼的聲音：他立地便要朝地下倒。鄧主任趕快把他扶着，曉得他是受了傷，順着勢子把他放橫在地下。

鄧主任和鐵羅尼都來關照他，他用很低微的聲音說：「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他就只這樣說了這一句話，以後便沒有聲息了。

毫無虛飾的楊昇斷斷續續地把這些情形告訴了我，我聽着他那木訥而低抑的聲音，看着他那勞瘁了一夜而氣色很沈悶的相貌，曉得他的內心是誠虔地在替德甫哀悼着的。特別是德甫臨終的那句話，很是打動了他，他向着我返復了兩三遍。一個人臨到了死的關頭，完全沒卻了自我底存在，而顧慮着同在患難中的友人——在這種精神的面前是誰個也會低頭的。更何況楊昇是和他同處在一個死地的人，在他那素樸的心中，和山裏的溪泉一樣沒有什麼渣滓和塵埃夾雜着的心中，自然是會有更清澄更透徹的印象。

——「我不要緊，請你們留心着敵人。」

紀德甫的屍首抬回了南湖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的樓上的一間講堂裏。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製辦棺木和衣衾，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和勤務兵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來了，檢驗他的傷痕。

鎗彈是從後頭骨的左側打進去的，從後頸窩下穿出；又從右肩打進胸部，由肩胛骨底右側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子彈的餘勢才盡了，籠在軍褲裏面已經融斷成了三個顆粒，連布製的軍褲都沒有打穿。

就這樣一鎗貫穿了三處。頭部和胸部的都是致命傷。血流得不多，但那內部的出血不用說是很厲害的。

接着又檢查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着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架手錶，衣袋裏有一個錢包。那個錢包是皮製的，已經很舊了，當着衆人的面前我替他打開了來。從那裏面所取出的內容是：——兩個銅板和兩張當票！當票是廣東的當舖所開的，寫的是很奇怪的字，不知道那所當的是什麼物品；但照我的推想說來，怕只是被條和書籍之類，因為出發時不能隨身帶走，所以才取了那樣的便法交給了當舖。

『兩個銅板』——這層或者有人要懷疑，以為我是在有意地誇張。其實這倒是不足怪的，自廣東出發以後直到武昌城下，沒有正式的發過薪水（自然，假如是有需要時，是隨時可以向財政股支用的），每天吃着公家的火食，在行軍中誰也不感覺有怎樣的用費，所以德甫的錢包裏也就只有那樣的一點財產。不過這也可以表示他的淡泊。我是在努力寫着實話，毫無思想做小說，假如我要做小說，在這兒也正好誇張，可以替他編出一部日記或者編些信扎出來，為投滿臉騷瘡的年青的男士或女士的嗜好，或者還可以編出幾封戀愛的書信。但那是無聊到萬分的，那樣只會污辱了我們的德甫。

德甫的錢包我是交給了德謨們替他保管着，那下落是怎樣我不知道。只有那斷成了三個顆粒的鎗彈，我是把來當成紀念品保存着的，但在第二年的八月我在江西的德安遇着危難的時候，我的一口皮箱遭了搶劫，那個貴重的紀念品和着好些重要的資料一齊遺失了。

在那天的午後，棺木和衣衾都採辦了回來，德甫便立即收殮了，我因為工作忙沒有臨場。收殮後的棺木是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小屋子裏面的。

在那天午後還做了些什麼工作，我現在全沒記憶了，只記得我睡在床上的時候做過幾首哀悼德甫的詩，我現在把它們記錄在這兒：

一棺蓋定壯圖空，身後蕭條兩板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人間何處弔英雄？

回思夜襲臨歧語：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難禁清淚滴君衣。

患難相隨自汨羅，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到如君總不磨。

一彈穿頭復貫胸，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第二天清早七點鐘的時候，在要把德甫的靈柩送到鄰近的寺院裏去停寄之前，政治部全體的人員連同勤務兵，都聚集在後庭的那座小屋前面爲他展弔。小屋是磚砌的，就和汽車的格納庫一樣，前面的門敞開着。因爲天氣熱的原故，棺材下已經有血水流出，同時也有臭味了。這樣的情景尤其是觸動哀感。

由胡公冕的贊禮，大家在棺前沉默了五分鐘之後，組織股長的李鶴齡報告德甫的履歷。大意是說他

是山東人，在中學畢業後便到蘇俄留學，留學的期間很短，因為爲中國的革命所迫便提早的回了國來。但是他是很努力的，他的俄語的程度和學理上的認識已經可以自在地作政治上的談話和翻譯了。他不用說是共產黨，是在莫斯科加入的。但他的家世是怎樣，他是怎樣到的俄國，他是山東的那一縣的人，我現在都不記得。

接着是鄧主任代表政治部全體的人致哀詞，報告了他戰死時的情況。接着是俄顧問鐵羅尼用法國話致哀詞，由鶴齡替他翻譯。

鐵羅尼的確是很悲哀的，他一面演說着，一面流着眼淚。他說：革命陣營裏失掉了一位很忠勇的同志，同時他也失掉了一位很好的伴侶；他平時對於他太生疎了，沒有得到他的充分的認識，他自己是很失悔的。

他的失悔的意思很明顯地有一部分是表現在他的眼淚裏的，鐵羅尼根本是一位富有浪漫性的詩人，他是由於他的浪漫的情熱而成爲了革命家。他喜歡幽默，喜歡詩歌，喜歡在規律的生活之外作些餘興。但是紀德甫的性格卻恰恰和他相反。德甫是很寡默的，平常除必要的談話之外，連開口的機會都很少。從廣東出發以來和他共同了兩個月的生活，我是很少看見過他有發笑的機會的。因此他們兩人在平時便不很投合，鐵羅尼早有換掉他的意思，德甫也很想掉換工作。但是德甫的莊嚴的一死把鐵羅尼對於他的

感情完全改變了。

自從紀德甫死後，武昌城下的軍事行動沒有怎樣的進展。爬城的計畫失敗了兩次，犧牲了好些同志。以後便沒有再行採用了。在兩三天後大家所繫望着的飛機由俄國同志的操縱從廣東飛了來，但那飛機並不是戰鬪機，也沒有爆擊彈，只在武昌城上的上空把通常的炸彈投了兩次，散了幾次傳單，結果只是把敵人恐駭了一下。

這兒卻有一個小小的插話。

那在武昌城上所投下的炸彈，有一顆是把武昌美術師範學校打中了的，並且還打中了我們的一位知名的藝術論評家華林。華林當時在那兒教書，也就在那兒寄宿，那炸彈的破片打傷了他的足趾。他爲此很受了不少的痛苦，後來在他回到了上海之後對於革命軍曾經加以詛咒，而那詛咒的餘沫是曾經飛濺到我的身上來過的。

我現在把這段插話寫在這兒，但也並不是存心報復地要來奚落我們華林先生，其實我是想請他做一個活的證人，證明飛機投過炸彈的事情是實。而且更還希望他爲我們提供出些資料來，他在武昌城裏

是過四十天的籠城生活的，像他那樣有文筆的人，最好把那段生活記錄出來，寫一部『武昌城內。』

飛機的威駭沒有用處，繼起的便是炸城，由洪山附近有掩護的地方打地道到武昌城下去。這樣的工作不免是要曠日持久的，武昌城外的革命軍便只有取着待命的形勢把武昌包圍着。

到了八號，因為漢口方面的政治工作吃緊，又因打地道的材料都要向漢口採辦，非得有機關在漢口主持不可，政治部便決定了在漢口設立辦事處。起初本是擬定由朱代杰去主持的，但到了一切準備都已經停當了的晚上，擇生又來找着我說：漢口的事情還是要我去主持才行。於是預備好了的規模又不能不改變一下，代杰依然做我的助手，在部中挑選了二三十名的精幹的同志，帶了十名警衛兵，在九號的清早向白沙洲出發。這一行人中，代杰，鶴齡，德謨和我，便是核心的人物。

到了白沙洲時，暫時駐劄在那兒的武聖廟裏面，因為所要搭乘的小火輪要載第八軍的軍火，一時很不容易載齊。中飯是在那兒用的。由白沙洲渡過鸚鵡洲時天色已經黃昏，再從漢陽城外走過的時候更已經黑下來了，便點起了馬燈照着走路。這個情景在武昌城上的敵人自然是看見了，隔着江便不斷地有槍礮射來，那槍聲和礮聲在夜氣中響得更加透澈，但是卻沒有一個子彈打中。

漢水上面是搭着浮橋的，由那浮橋渡過寶慶碼頭時，馬燈的光映在水中，水是異常的清淺。渡過漢口後當晚在旅店裏過了一夜，和前兩天派來的人接了頭，在第二天，十號的清早，才搬進了設在後城馬路的

南洋兄弟煙草公司裏的辦事處裏去。

公司是有四層樓的西式建築，樓下正中是大門，左側是公司的門市，右側是銀行式的一個大廳，那兒在前做過銀行。在軍事期中是做着逆軍的軍需處的。還有那幾層的樓上是舊勢力的俱樂部，因此便認爲了準逆產，由我們所派來的人把它查封了。在對於公司的營業沒有加以妨害的範圍內，我們把那樓上樓下的非公司的部分都佔據了起來。樓下銀行式的大廳便成爲了總政治部的辦公廳，左側前面當門的一隅有一間小室，便作爲了主任室，主要的幾個人便聚集在這兒。我自己是時常在這間小室中的一尊梭發上過夜的。

當時的漢口還是舊勢力潛伏着的巢穴，吳佩孚逃走後還不上十天，一般的人多相信着他會捲土重來；因而市街上的大商家都還沒有開市，各種報紙也都還沒是改換舊時的論調。劉佐龍所領帥着的鄂軍集中在那兒，劉的本人打着保境安民的旗號，隱隱地以湖北的政治中心自命，對於南北兩方都取着不即不離的態度。此外，還有好些新附的軍隊，那在名義上雖然是自己的人，而在實質上是形同敵國。我們跳進這樣的環境裏去，所負的使命便是擴充革命底認識和革命底氣勢來鎮壓周圍的敵人。

我們開始把報界拉在手裏，封了兩家很反動的報館，同時組織了一個新聞檢查委員會，所有的報紙都要經過我們的檢閱才能够發行。民衆團體底組織加緊地進行，各種工會有組織的公開強化了起來，無

組織的便從新加以組織，甚至如像省市黨部底公開都是在我們的掩護之下成全了的。

就這樣聚精會神地幹了一個禮拜，各種宣傳機關都拉在了手裏，有一種美國人辦的新聞也被我們把它拉了來。民衆團體逐漸地產生，民氣高漲了起來，漢口的市面便頓然改了舊觀。我們自己在這幾天中所過的生活要算是最緊張，最有趣味的的生活，晚上睡覺的時間很少，多不過三四個鐘頭，甚至連熬幾個穿夜的事都有。

然而在這樣自以爲痛快的時候，卻於不識不知之間惹出了很不痛快的局面。

在移到了漢口的第五天上，碼頭工會底工友們把一位著名的工賊郭聘伯逮捕了來，這人在一年後的武漢政府時代是槍斃了的。最初送到部裏來的時候，部裏的同志們便主張就地正法。但在正式的規定上政治部並沒有殺人的權柄，我便決定暫時把他扣留起來；一面派人到武昌去向鄧主任請示，提出了他以往的罪狀和我們主張槍決以鎮壓反革命勢力的意思。

犯人送來時是在清早，待到了下午傍晚的時候，突然有一營人的隊伍開到了政治部的門前，對着政治部陣列着；照那服裝看來，知道是劉佐龍部下的隊伍。這自然是犯人的黨羽去慫恿了劉佐龍，要用威駭的手段來把犯人奪回去的。部裏的人不免有些驚惶，因為我們自己的武裝力量是只有十名的警衛兵，每次派兩名在大門外輪流守衛，這十人的力量無論怎樣是不能和那一營人抵擋的。我自己也隱隱地懷着不安，但我想到那來的人不會便有膽量動作。他們不過是來向我們示威，我們卻也不好向他示弱。我壯着膽子叫人去傳那營長，那營長卻很恭順，便一個人走了進來。我在主任室傳見了他，那是一位將近五十的人，瘦削的臉上滿臉都帶着煙屎，嘴上有點稀疏的八字鬚鬚，身材也不高，穿的是臃腫的北洋軍服。

我先開口問他：「你們來是什麼意思？」

他有點狐疑不定的神氣，吃格着說，「我們不知道貴台是怎麼的機關。」

——「怎麼的機關？」我反應一聲，「是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政治部。」

——「是，是，」他愈見地恭順起來。

——「你們來到底是什麼意思？」我又逼着問他。

——「聽說貴部……唉……逮捕了人，」他囁囁着說。

——「逮捕了人怎麼樣？」我沒等他說完又搶着詰問他：「你是來要人的嗎？」

——「不，不，不是那樣，」他連連地把兩手舉起來擺着：「因為外邊有不好的風聲，我們是奉了上

台的命令來……來……保護貴部的。」

我聽他說出了這樣的話，幾乎忍不住要發出笑來。我也把我的態度漸漸的緩和了。

——「多謝你們的好意。但我們自己有警衛隊，就有什麼動靜，我們自己是能够對付的。你們的軍隊不好這樣輕易地調動，反轉要惹出不隱當的風聲。我請你從速把你的隊伍調回去。」

那營長誠惶誠恐地便告辭了出去，接着是「立正……向左轉——走」的號令聲，那開來的隊伍又從原路開回去了。

就好像是串演了一場空城計的一樣，在營長的司馬懿走了之後，大家都不免笑了一場。

但就在營長退去後不上二十分鐘的光景，我派到武昌去請示的人回來了，帶來的鄧主任的信件是很不以為然。他說我們政治部沒有捕人殺人之權，在目前革命勢力還沒有鞏固的時候，尤其是不可任性動作。叫我們把犯人嚴加看管着，再聽候發落。

我得到他的來示自然是不很滿意；但我也私自慶幸，因為我慎重地請了一番示，要算是很能夠先意承志地體貼了上司的意旨的。一有命令不准殺，自然是不敢妄爲了，一場高興不用說是已經冷去了一半。但是剩下的一半是還要冷到零度以下，生出負號來的。

在第二天的清早從武昌方面又派了人來傳達的鄧主任底命令，叫我把郭聘伯立即解過武昌。這個命令是表示着對於我們的絕端的不信任。他在昨晚叫我們嚴加看管，只隔了一夜又叫我們解過武昌，他是怕我們不遵守他的命令會要任性槍斃的。我自己很不了然，我不知道爲什麼捕殺一名罪惡昭著的工賊會有這樣的嚴重。在我的意思是，初到漢口來，在革命勢力還未鞏固的時候，正好雷厲風行地做些行動出來示威，藉此也可以收攬民心；然而上司底見解和我們的卻是正相反對。

命令自然是只有遵照，但在那時候要把一名要犯由漢口送往武昌卻不是輕易的事情，萬一路上有了差池，那又是不好擔戴的；於是又只得把十名的警衛兵除下兩名在門外站哨之外，通同派遣了去好護

送着郭聘伯老爺過江。門衛的換班暫時也只好用勤務兵來假充了。

事實是這樣。在我們的請示到達武昌之前，郭聘伯底神通已經先到了彼岸。他的黨羽在總司令部告了狀，說碼頭工會的人任意捕人。這個消息把武昌方面的軍事中樞激動了一下，就在第二天便由總司令部出過一張佈告，對於民衆團體任意捕人的事情嚴加禁止。一有我的請示去，才知道那所捕的人已經移到了政治部，而且我又主張槍決。這是很把鄧主任作難了一下的。他是還有更嚴重的他的上司，因此他也比我的請示更要慎重地索性把那犯人要過江去了。

事情只是這樣的結束，在我雖是覺得不甚痛快一點，但也沒有什麼，因為逮捕的下手人並不是我們。我們雖主張槍斃，但僅僅是一個主張，而且是恭而且敬地請了示的。但不料隔了一條江水，鄧主任對於我們的誤解卻是出乎我們的意料之外。在十八號的晚上那時在總司令部祕書處擔任着工作的蔣先雲給朱代杰寫了一封信來，就爲處理郭聘伯的事責備他們不懂策略，辦事太幼稚，同時敘及鄧擇生向他訴苦，說我是一位感情家。又說是我們幾個四川人有點跡近把持，不應該在部中激成了廣東派和四川派的對立。

這個非難真是有點像晴空霹靂，而且對於我們幾個人也可以說是頂門的一針。我們幾個——代杰、鶴齡、德謨和我——太不湊巧地都是四川人，又都佔着重要的位置，但我們並不是有意識地團結攏來的。代杰是政治部的元老，他起初擔任着庶務科長，後來在要出發的時候因為我加入了宣傳科，又兼帶了行營秘書長的職務，他便以輔助我的意義，改爲了宣傳科的副科長——這個名目都是臨時定出的。組織股長的鶴齡本是黃埔軍校的教官，在出發的前一天才轉過政治部來的。德謨的入政治部比代杰稍後得一些，他一直是擔任着秘書的事體。我們幾個人都是個別地進的部，在上海時雖和德謨相識，但並沒有怎樣的深交；代杰和鶴齡更是到了廣東後才認識的了。就這樣完全是偶然集合的我們，在拚命做着工作，連自己的性命都是置諸度外的時候，不料才激起了同人中的黨派的觀念。在代杰、鶴齡諸人都很灰心，而在我自己尤其是憤慨。我自信自廣東出發以來是很能遵守紀律而遏制着自己的感情的，不辭勞苦地幹了兩個月，卻樂得了一個感情家的評語，我心裏真是不能悅服。而這個評語不是擇生直接向我說出，而是間接的訴苦，尤其是使我難耐。像這樣羊頭狗肉的革命工作，我決心着不再幹了。當晚便寫就了一封辭職的信，請另簡適當的人來負責。在第二天清早的一早便派人送過了江去。

十九號的下午擇生過江來了，到了政治部時已經晚上，我迴避着他沒有直接和他談話，他在主任室裏和代杰諸人談論了足足有兩個鐘頭，談話的內容我是沒有過問的。

二十號清早還在六點鐘以前，擇生派了人來把我請到他留宿着的旅館裏，那是同在後城馬路，離煙草公司不遠。

我穿着便衣走進他的房間裏去，他是已經把軍服穿好了在等待着我的。我們在一張方桌上坐下了。擇生帶着一個愁蹙而又含着怒氣的面孔問我：「你是在鬪氣，還是認真要不幹的？」

——「兩來都是，」我索性不客氣地回答着，「氣也要鬪，職也要辭。」

在平常我們對他是很客氣的，因為他是上司，凡是他所說的話都是絕對的命令，我們是只有唯唯聽從的；這一次他看見我的態度反常，他就好像吞了一口熱湯，悶了一下，有好一會沒有說話。

——「在現在革命的工作異常緊張的時候你要辭職，你這不是反革命嗎？」

——「革命不一定要做官，抱着革命的志趣的人無論到什麼地方，無論做什麼事體，都是可以革命的。」

——「你打算要到什麼地方呢？」

——「打算到上海啦。」

——「目前在孫傳芳的統制之下你能够去嗎？去了你有什麼事情好做呢？我看你走不到上海，你的腦袋子已經不會在頸子上的。」

「那倒痛快些，像目前這樣的半死不活，羊頭狗肉的革命，真是耐不過。」

擇生又沉悶着了，他接着又更加緩和地說，「你對於革命的現狀究竟有什麼不滿意的地方呢？」

「我最大的不滿意便是萬事都講策略。目前的革命的勝利只有軍事上的勝利，政治上是絲毫也沒有表現的。像我們政治部對於民衆發出了許多的口號，但是一點也不能兌現。軍事上的勝利一半是得到民衆的幫助，但是對於民衆所切實地要求着的事情，我們萬事都講策略。我們對於舊時代的支配勢力太顧忌，太妥協了。結果民衆是受了欺騙，我們自己會轉化成舊勢力底繼承者，所謂革命只是一場騙局。」

我這樣抽象地說了一遍之後，又舉出了些事實來證明，同時是提到了郭聘伯底逮捕這件事情來。我說：「爲愛全一位著名的工賊，而失掉幾萬工人羣衆底信賴，這樣的「策略」我真是不了解。」

擇生說：「你的見解是很正確的，但是實際上是舊社會底力量太大，我們的力量太弱。我們革命軍的內部便有偉大的舊勢力磅礴着，我自己是有好多說不出來的苦處的。總之我們和衷共濟地緩緩地做去罷。凡是關於政治部內部的事情一切都照着你的意思做去，老總不久要向江西出發，他希望你去，但我們都媿婉地謝卻了。武漢的工作無論怎樣是不能離開你的，我已經派了黨務科長的季剛去江西，你無論如何是應該把你的感情抑制一下，努力着幹下去。我說你是感情家，並不是罵你的意思，革命家沒有強

烈的感情是不能够革命的。不過在目前，對內對外的策略都是應該講的，這是無可如何的事情。還有部內分出了黨派的話，是有少數不良分子的流言，我自己是毫無那樣的成見的，我也相信你們決不是那樣腐敗的封建餘孽。」

他誠懇地這樣說着，說得快眼淚的樣子，我爲他的誠懇卻不免打動了，我的感情自然也就緩和了下來。

他最後又嚴重地下出一個結論：「總之，你在目前是不能够離開這兒的。就是代杰，鶴齡，德謨，都不許有一個人離開！你們離開了，政治部只好垮台。」

他說的話委實也是實際的情形。在當時一切工作計畫是由代杰經手，一切來往文電是由德謨經手，鶴齡是長於演說的人，並且又通英法兩國的語言，所以對外的宣傳和交涉大抵是由他擔任的。他們三個人的確是一尊寶鼎底三根柱脚，我不過是代替着擇生總成其事而已。他們三個人要走了一個，政治部底事情一定會辦不動。又假使我走了，他們的興趣也是會減少的。我本來有一多半是鬧着感情，聽了擇生的一席話把氣平了下來，只好答應他又維持着做下去。

那一天擇生都是留在漢口的，我陪着他跑了好些地方，直到晚上他又才過江去了。

但在夜間在主任室的辦公桌上我找出了一張寫了幾行沒有寫完的信箋，是擇生寫給廣東的留守

主任孫炳文的。信裏有這樣的話：「革命的苦楚易吃，同志們的氣難受，我恨不會在武昌城下戰死……」

九月下旬，總司令部終竟移到江西方面去了，戰事的中心自然是移到了江西。總政治部有一部分人也跟着去了。各地方來歸附的軍隊很多，凡是有來歸附的軍隊，他們最先所請求的便是派遣政治工作人員。所謂政治工作在當時的舊軍閥們看來，就好像和打出青天白日旗一樣，是成爲了革命軍的必要的徽章。他們並不知道政治工作的真意，但很知道南軍和北軍在組織上的重要的不同處便是在這種工作的有無。有了這種組織的南軍打了勝仗，就覺得這種東西是使軍隊強盛的良法，因而政治工作便成了一個時代的寵兒。各方面來歸附的軍隊既多，所派遣到各處去的工作人員也就不少，胡公冕所帶領的一個宣傳大隊，所有的宣傳員，不久便被派遣一空。連公冕本人也就不被派遣到江西去了。

總司令部移到江西去後，有行營設在漢口，行營主任便是擇生；同時湖北省政府也相繼在漢口成立了，省政府的主任也是擇生。他以一人而兼領三個主任，自然很忙，因爲工作的關係便留在漢口的時候多，頓在武昌城下的時候少了。在南湖剩下的少數的政治部的人員在九月尾上索性通通移到了漢口來。附屬着的黨紅會也分遣到武漢各軍的軍醫處去服務去了。最有趣味的，是那由擇生所要過江去的工賊郭

聘伯又鄭鄭重重地護送過了江來，仍然關閉在煙草公司的三樓上的一間小樓間裏。

政治部一搬過了江來，工作人員添多了，同時內部的負責人員也由擇生調動了一下。他把編纂委員的郭冠杰改任爲總務科長，把屬於總務科的財政股長也改換了。

冠杰是擇生的同鄉，也是在陸軍小學的同學，後來是改習了法政的，曾經在法國留過學。他因爲和我是同姓，時常稱我「宗兄」。他是擇生最親信的人，時常肯把擇生底私話來傳遞給我。他初到漢口來的時候對我說，「擇生時常說，宗兄很刻苦，革命性很強，擇生是十分敬重的。在長沙時宗兄的工作做得很好，到漢口來的工作便雜亂得一點，自然也是局面大了的原故。」

他一接了事之後，照政治部的規定，總務科長本是有批核一切來往公文的權限的，他便把德謨素來擔任着的工作一手接過去了。但他對於這層卻沒有經驗，每天幾千百件的公文堆積在他的案頭上不知道怎樣處理。過了三天又由鄧主任的命令叫所有的來往公文仍由德謨繼續辦理。

湖北的省政府在當時真正是一種魚龍混雜的模範政府，那個委員會五花八門地是什麼人品都有的。昨天還是罪該萬死的舊軍閥，而今天便一躍而成爲了功高千古的革命元勳；在咸甯以後和我們一同馳驅過兩天的詹大悲和李漢俊在其中要算是錚錚佼佼的第一流人物了。省政府的內部組織是分成四科，科長秉承委員會的旨意受各委員的指揮以執行行政務；其中的教育科，擇生要叫我去擔任，連委任狀

都下了，是總司令部第七號的委任狀。但這項委任我堅決地辭退了。

有一天擇生到政治部來，他問我，『爲什麼要辭退教育科長的事？文化工作正應該大幹一下，除你而外是沒有再適當的人物。』

我的答語很直率，我說，『我是來革命的，不是來做官的，受你的指揮我可以，要秉承大委員們的意旨我卻辦不到。』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

——『漢俊正是很適當的人物，你找他，他一定可以承認。他以委員而兼科長，就和詹大悲一樣，辦事也會順手。』

在我明確地把意思表示了之後，大悲和漢俊也到政治部來找過我。他們起初以政府委員的資格，說要委曲我，我一定要把教育科的事情擔任起來。

我仍然說：『我不願意做官。』

大悲說，『革命政府也不能不要官，革命的官和反革命的官是不同的。』

——『不同的只是名目罷了。』我說，我在這兒索性把大悲先生俏皮了一下，『譬如你老先生擔任着委員而兼任着實業科長，還有湖北礦務局的局長，你老先生不和滿清時代的道臺一樣嗎？』

大悲先生不動聲色地笑着說：「這是策略問題啦，你知道我們是兼差不兼薪的。」

這位先生我不知道怎的，對於他總有一種先天的厭惡。我自從認識了他以來便不高興他，他的一切的派頭不外是一個官僚底模範。他老先生是慣愛講策略的，說不上十句話便會有五個「策略」的字眼。他是湖北人，又是當時的中央委員，自從軍事一進展到武漢以後，他儼然就像是鄧演達的執掌鵝毛扇的軍師。鄧對於他也就和劉玄德之於諸葛孔明，幾幾乎是言聽計從的。

——「你不幹誰個好幹呢？」漢俊說。

——「你正好幹啦，我已經向擇生推薦了你。」

結果是漢俊說，他暫時爲我代替着。又說他打算組織一個教育編制委員會，由省市黨部的宣傳科長，省政府的教育科長，以及其他適當的人物來構成，要我去做主席，但是我也謝絕了。

江西的戰事沒有初到武昌城下時那麼順利。舊歷的中秋第六軍曾經攻進過南昌一次，但遭了敵人的反攻。以衆寡不敵反遭了一次慘敗。戰線綿互着南潯鐵路一帶，敵人據着南潯鐵路，以徐家埠爲中心，上下策應，和他應戰的有第七軍第一軍第二軍第三軍一共好幾師人，支持了許久，終不容易把敵人打破。在九月尾上孫傳芳的軍艦公然有兩隻開到了黃石港來，竟連武昌圍城的兵士都不能不開了大部分去抵禦。這個消息是嚴祕着的，但城內的敵人和漢口租界的帝國主義者有連絡卻早探知了，乘着圍城的兵力稀薄時，一夜公然敢於派遣了一部分人縋城而出。適當其衝的是葉挺的獨立團，混戰了兩個鐘頭，算把出城的敵人通同殲滅了。獨立團也遭了很大的損失，那一團人經過幾次的激戰，所有的下級官長幾乎是陣亡乾淨了的。

炸城的工事也遭了好幾次的頓挫，有時是挖得太深，出了水；有時又挖得太淺，地面凹陷了下去；更有兩次是挖到了城濠，自己把地道穿破了。每遭一次頓挫，總要使前功盡棄，又來重起爐竈。因此工作便十分牽延，武昌城的陷落便遑遑無期。京滬等地及國外的報紙竟把守城的敵將劉玉春英雄化了，把他稱讚得

就和田單張睢陽一樣。

但是糧食的封鎖是收了很大的效果的。武昌城有二十萬的人口，圍到了三四禮拜上來，城內的糧食估量起來早已是盡了的。城內的人和漢陽漢口的人大抵非親即友，因此漢陽漢口二地的水面上的人物們便發起了營救的運動，想把城裏的人救出。這在本軍方面自然是沒有什麼問題的。和城內費了種種的交涉在十月初頭上便有開城放出飢民的事。約定了每天上午在一定的時間內由漢口派船去迎接，船上插着白旗爲號。

頭一次開城似乎是十月三號，飢民爲要擁擠出城的原故，在文昌門的城門口竟擠死了兩個人。那些出城的人的確是很狼狽的，據說一般沒有積蓄的人在頭一個禮拜便已經絕了糧。吃草根，吃樹皮，吃貓，吃狗，吃老鼠，只是還沒有鬧到吃人的地步。有人把那飢民吃的土饅頭給我看過，外皮是一種黃垢色的粘土和着一些穀糠，內面包着些狗肉和貓肉的心子，然而都恐怕要算是上食了。有儲蓄的人自然又不同，但籠城的期間過久，他們又有他們的焦愁和恐怖，這在事實上是促進了開城的原動力。

在那開城的前後，敵人已經失掉了鬪志。城內的敵兵鬧到一天只能吃得一二碗稀飯，城上的人每有向城下的人打話的時候，他們向城下的兵士要飲食和煙草吃。城下的兵士問他們爲什麼不開城，他們把手稜在頸子上，表示他們的官長要砍他們的腦袋子。

但他們的官長，劉玉春和陳嘉謨，也派過私人到第八軍去通過款曲。他們要求保全他們的實力回河南去，要南軍讓他們出城，開出一條路來讓他們退走，南軍不加以攻擊。但這個要求不用說是遭了拒絕的。就在這陳劉二人想投降而尚存着觀望的期中，他們的部下有一位旅長卻着了他們的先鞭，首先派了人來投誠，約定了在十月九號的晚上裏應外合，把寶陽門開開來迎接我們。這位旅長似乎姓劉，名字我忘記了。他的一旅人是編配在唐生智底部下的。後來在武昌下游的鐵路工程處成軍的時候，唐鄧和我去監督，各人作過一般訓話。

雙十節到了，在武漢要算是空前絕後的一次盛大的國慶紀念。

會場設在漢口北郊的華商跑馬場，開會的時期是上午九時。參加的羣衆當得在十萬以上。團體旗黨旗國旗的飛颺，國際歌先鋒歌革命歌的合唱，口號的絕叫，萬歲的絕叫，演臺上如火如荼的演說，各種音樂隊的演奏，把那廣大的跑馬場化成一片澎湃的大海。

正在開會的當中，武昌城攻破的消息傳到了。這在我們本來是早已預知了的消息，但在一般的民衆是出自不意的，在那消息當場傳佈了出來的時候，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絕頂。十萬以上的羣衆一時動搖了起來！脫帽，搖旗，揮拳，鼓掌，破命的高呼。那宏大的怒濤，就像要捲成海嘯，把那十幾萬的羣衆都捲到天空裏去。

怒濤一激動了起來沒有可以使它立地靜止的力量。慶祝會的預定本來是還有好些人的演說，但都切止了——演說已經是沒有用處的——便開始照着預定的路線遊行起來。這對於漢口租界的帝國主義和在帝國主義的掩護之下的反動勢力真是絕大的示威。

湖北總工會也是在這一天成立的，在漢口公會堂開成立大會。我參加了跑馬場的慶祝會後又到這兒來。這兒聚會着的是各種工會的代表以及來慶賀的各機關各民衆團體的代表。這兒是革命的鹽，革命的火車頭，雖然沒有那羣衆大會那麼熱鬧，但所給與人的是堅實的鐵槌般的感覺。

武昌方面在我們的軍隊進城之後，到了下午，又由第四軍把劉玉春活捉着了。這個消息傳到漢口來時是快要黃昏的時候，我們頓時印出了傳單來散佈，利用種種的方法來公佈這個消息。有一個方法大約是代杰想到的，他叫人買了白布來用紅水寫着『劉玉春活捉了』的幾個大字，把來圍在一駕汽車的周圍。讓那汽車在漢口全市中馳騁着，同時又從汽車上散佈傳單。這一個消息，和公開這個消息的奇妙的手段，把在熱狂中還未靜鎮的民衆和市民愈見煽颺了起來，把漢口全市都哄動了。汽車走一路，民衆便簇擁在它的後面跟隨着，到汽車把漢口巡遊了一遍折回到後城馬路來的時候，羣衆擁集在政治部門前不肯分散，愈集愈多，把後城馬路那條很寬闊的街道塞得水息不通。政治部前面的出入竟開出了一條火巷子來。

這仍然是那駕汽車所生出來的效果。

汽車本是從前吳佩孚用的一乘朱紅色的轎車，用白布在三面圍着，車窗恰被遮掩了，車箱的內面是不能看出的。大家以爲劉玉春便是囚在那駕汽車裏面的，因此都要等那車門打開，看着劉玉春出來。這完全是出乎意外的一種收穫。在晚上鄧主任和鐵羅尼過江來的時候，他們是費了很大的工夫才到達了政治部。鐵羅尼很是驚嘆，他對我說，「這樣的羣衆在莫斯科以外是不能夠看見的。」

第二天清早八點鐘的時候，鄧主任由歆生路的總司令部行營到了後城馬路來，因為在八點半鐘是決定了要開一次部務會議的。

部務會議列席的人是各科的科長，股長，以及祕書，主席便是主任。鄧主任所主持的會議，名目雖叫會議，照例是一種軍事的獨裁，他是先在自己的鈔本上寫出幾條大綱，接着使用命令式宣佈。

他這回所宣佈出的命令，是要政治部全部遷過武昌，駐劄在舊省議會裏面，以後的工作是偏重在農民運動方面。

這個步驟本來是應該有的，但要全部遷徙卻是出於意料之外。我的意思是想仍然以漢口為本部，而於武昌設立支部，因為漢口無形中已經成為了政治的中心，而且也是武漢三鎮的社會的中心，對內對外的的工作都以這兒為便利；而且政治部的工作在這兒已經有了一個月的基礎，不應該完全拋棄，搬到那偏僻的在各種工作技術的運用上都不靈便的武昌。注重農民運動的工作在漢口也是可以做的，武昌設立一個小規模的辦事處也就可以呼應了。

我把這層意思表示了出來，擇生反對着說，『目前的漢口雖然是政治的中心，但這是一時的現象。武昌已經攻破了，政治中心是要移到武昌。不久省政府，省黨部，都要次第地移過去。還有是政治工作人員應該過艱苦的生活，久住在漢口是會墮落下去的。』

決議自然是照着了他的意思，等待那做着第四軍軍部的省議會空出之後便搬過江去，同時漢口的辦事處留下幾個庶務員看管，只當成一個購置物品的機關。

在會開完後擇生過江去了，我在那天下午得到空閑也渡過了江去。城裏的情形自然是還沒有恢復的，商家都閉着店門，居民都瘦削憔悴得像木乃伊。我的去向是往省議會，議會前面的廣場中停集着好些北軍的棺材，有些是南軍進城後才收殮了的。天氣還熱，棺材都是些菲薄的木板匣子，屍臭異常的熏人。

走進省議會時已經是快黑的時候了，四軍軍部正在搬家，我叩問了幾位負責的人，知道第二天上午便可以空出。政治部也就決定了在第二天搬來。

那時被活捉着的劉玉春是關在省議會的樓上的。一位副官把我引到那間房間裏去。那是在樓上第一排右側的第一間小房間，裏面是黑洞洞的，只在一張桌上放着一盞馬燈。進門在右側的角上放着一張木板床，劉玉春面着壁捲臥在上面，有一個跟隨的人在服侍着他。引我進去的副官打了招呼。劉玉春起了床來，很客氣的請我坐。

劉很白皙而肥胖，足見他在四十天的圍城生活中是絲毫也沒有受苦的。他是一位中等身材的人。雖然在縲絏之中，大約也是狃於素來的威勢吧，態度很能鎮靜。

我在那時和他談過一席話，在第二天的革命軍日報上發表過。我開手恭維他，說他能忠於職守，能把一座孤城死守了四十天，是難得的事情。

他也謙遜着，說他只是「一介的武弁」，只曉得服從上官的命令，上官要叫他守城，他便守城罷了。

——「但是，」我說，「你所服從的上官，吳大帥，一從賀勝橋敗潰了下來，便渡過江跑回河南去了，而你一個人偏偏要來頂着擔子堅持，使武昌城內二十萬的居民，爲了你一個人受了四十天的水深火熱的痛苦。你們又在武勝門外放火，燒毀了無數的人家，使多數負郭的居民無家可歸，這無論怎樣怕是該你負責的。」

——「在軍事上是出於不得已，軍人是只曉得服從命令，只曉得打勝仗的。」他回答着。

——「你這樣的話，」我又說，「怕不見得是出於本心。軍人的天職是在保衛人民的，所該服從的命令是保衛人民的命令，要打勝仗也是爲的人民；不是專爲某一個人效奔走犬馬之勞，不是爲要保全一二人的身家性命而屠民以逞的。我敢於替你把本心的話說出來罷，你是相信着吳大帥會捲土重來，吳大帥一時是決不會崩潰。所以你能多支持得一天，你的功勞便很大，你是多有一重犒賞的。」

——「我是決沒有那樣的心事，我可以對天地神明發誓！」他搶着話頭來辯駁。

——「你不用掩飾罷，」我說，「這種想頭是誰也應該有的，你我也並不是聖人。不過就是爲了你這一念，武昌城內外的居民，你想，是怎樣地受了災難？」

他沉默了下來，隔了一會又再說時，聲音愈見和軟了。

——「我們軍人的腦筋很簡單，」他說，「我們沒有深刻的心思。」

照那語氣上看來，似乎有悔恨的意思在他的腦中盤旋。我最後又問到他的家族。他說，他最罣念的是有一位八十多歲的老母親。萬一「國民軍」的長官肯鑒諒他，使他能够保全生命，回家奉養，他以後決不再做軍人，他要做一名馴良的老百姓。

和他談了一席話，覺得他很真率，似乎並沒有什麼矯詐的地方，在舊軍人中的確要算是很難得的一個人物。他在我的談話中似乎也感受了好些慰藉，當我把話說完了，和他拉手告別的時候，他很和藹的對我說，他希望能够和我再見。他說他自從失掉了自由以來，來和他談話的人都好像法官拷問囚犯一樣，沒有人像我這樣的和氣。

和劉玉春一別之後，在第二年的夏天他終竟恢復了自由。那時張發奎在做第四集團軍的總指揮，我在做黨代表，我們在舊督軍署的總指揮部中還見過一次面；他還記得我，同時也還記得我們那一次的談

話。但他後來的情形是怎樣，是不是做了「一名馴良的老百姓，」我是不知道的。

政治部移到了武昌，便駐劄在省議會的右半部，左側的半部是要讓給省黨部的。幽囚過劉玉春的那間小房間開放了出來成爲了會客室，在那東側的一間大房間便是主任辦公廳，其餘的各科各股都分設在各個小房間裏去了。

第二天清早，便是開城後的第三天，因爲閑着，我自己便帶着了一名對於戰地的情形比較熟悉的副官和一名勤務兵，向賓陽門走去。那道城門離省議會最近，在那崎嶇不平的一條街道上走不上四五分鐘便可以看見城樓了。城牆內面的脚部，挖出有很多地坑，是北軍避免飛機的工事。

出了城後，先走到左手的一段高丘上去，那高丘上的一段城牆比較低，那兒便是九月初旬的兩次夜襲，所選擇來爬城的地方。陣亡了的人很不少，屍首在城下爆露了足足四十天纔得以收殮。我去時，屍首已經是被收殮了的，但在那兒壓了一個月以上，被壓着的草，腐化了，因此在那青草地上狼藉着的手榴彈的殘骸中，還縱一個橫一個地呈出一些人體的烙印。

在那高坡上立着愷望的時候，有一羣日本的新聞記者也走了來，其中有幾個是我在漢口認識的。他

們見了我，便來和我客氣了一下，拍了好些照片。日本人對於中國事件的關心，對於中國情形的偵察，真正是無微不至。南軍佔領了武漢的時候，日本的各個報館，各個通訊社，都派有專門的訪員，勤勉地訪查四面的消息；但是上海方面的本國的報館和通訊社的訪員，我卻不曾看見過。中國的訪員和記者，似乎只消用一瓶漿糊，一把剪刀，幾份外國文的報。

城濠對面也聳立着一個丘陵，丘陵頂上有一座廟宇，四圍有紅色的牆圍着的，那便是長春觀，紀德甫的陣亡處了。我悵望了一會，徐徐地走下了高地，想踱過長春觀去憑弔。從那城濠的石橋上踱過的時候，在對面的右側現出了一個窟窿，副官指着對我說，『那便是最初打穿進了城濠來的一個地道。』

地道工作的根據地是在長春觀下附郭市街最前頭的一家茶店裏，那家人家幾乎爲被挖出的泥土所堆滿了。屋頂，屋壁，和堆積的泥土上的彈痕是不計其數的。

立在地道工作的洞口上看了好一會，我想上長春觀的心事又改變了。我想緩幾天等到擇生或鐵羅尼有了閑暇的時候，再約他們同去，好詢明紀德甫陣亡時的地點和情況。因此我便離開了那兒，沿着城濠邊，向通湘門方面走去。

走不好遠，在城牆頂上呈出了一個缺口，副官指示着對我說，『九月下旬敵人出來夜襲的時候，便是從那兒縋城而出的。在那城濠裏死了的敵人很不少，從昨天起一樣地在被收殮，但因爲火材匣子不夠，屍

首還沒收完。』

收了屍的火材匣子有好多是還堆積在城濠邊上的，沒有收殮的屍也還東一個西一個地腐化得不成形狀。空氣中瀰漫着濃烈的奇臭。

走到通湘門的時候，城門是閉着的，城門外也還橫着好些屍首，有些是我們自己的人。我冒着那濃烈的屍臭，在一些死屍間向那城門走去，在那城門洞下也橫陳着好幾個屍首，都是穿着革命軍的軍服的。屍首大都偃伏着，其中最把我打動了的，是靠着城門洞的左壁坐在地上的一個，兩手叉着，頭部是折疊在胸上的。這些陣亡了的勇士不用說都是受了重傷，爬到了這城門洞口來暫時躲避敵人的彈雨的；但他們的傷害很重，就要乘着夜陰爬回自己的本營都不能夠辦到，便睡的睡着，坐的坐着，整整地在那兒餓死了。想到他們的澈骨的疼痛，想到他們的焦灼的飢渴，想到他們的絞心的憂慮，憂慮到自己的生死和留在故鄉的家族，禁不住有灼熱的眼淚在眼睛裏湧。但我那時候的感觸卻是沒有流於感傷；因為我覺得他們的死是光榮的。他們的血是有代價的，他們是死得其所，是死而無憾。……但在七八年後的現在我寫到了這兒，我對於當年的誇張的感想，是只能夠自己對着自己冷笑了。

離開通湘門又朝前走了一節，走到了鐵路的路線上，有幾架敞車陳列着，車上近城的一側立着有五六尺高的鋼板，那鋼板上大框小洞地所受的彈眼，很像是暴雨落過後的沙面。很想再朝前走，由中和門

或者保安門折進城去，但覺得路太走遠了，費了已經不少的時間，怕的是部裏有什麼事情要我，又只得從原路折回。

自從移到武昌以後，很像是已經失掉了彈性的橡皮帶子一樣，比在漢口時清閑得不可比擬。

在這時候又是我煩悶開始的時候，我很想辭掉那時的位置，率性回到上海或廣東去做點更稱意的工作；要是不能夠，便率性再退回書齋。

在武昌究竟做過了些什麼事情，我現在已經很模糊了。但奇妙的是卻有一件小小的事情記得異常鮮明。

政治部駐劄舊省議會，本是在圍武昌城以前便豫定了的步驟。武昌開城以後，不料湖北省黨部也是預計着要佔據這兒的，他們在擇生處辦了交涉，又只得由我們讓了一半出來彼此分住。

我們先進去，因為是政府機關，自然便把國旗掛在屋頂正中的旗竿上了。省黨部隔了有一個禮拜的光景又才由漢口搬了過來，部裏的人也很替他們幫了一下忙。

省黨部一來，自然是又要昇掛黨旗的。在要昇旗的一天，他們要政治部把國旗放下來，讓他們把黨旗換上去。開首是在下級人員間有了一番爭執，部裏的同志走來告訴我，叫我無論怎樣不要退讓。

接着很興奮地來了兩位省黨部的人，他們來會我，說着那換旗的事。一個說，「一切權力屬於黨」啦，黨部是在一切政治機關之上。」一個又說，「黨部是革命力量的中心，我們應該「擁護革命的中心力量」啦。」他們都在把我所編擬的口號來作爲大前提，對着我大發議論。

我對他們說，「國旗已經掛上了，又要放下來，未免不成體統。省黨部的黨旗，能够在前庭正中另外立一根旗竿來掛上，是再好也沒有的。」

兩人看見我沒有退讓的意思便退出去了，又搬了一員大將來。

來的是T，T是湖北省黨部的委員，同時又是省政府委員，又是共系的國民黨中央委員。我對於他，平常是比較地懷着敬意的。

他很幽默，沒有初來的那兩位年青的人那樣地劍拔弩張。他說，「黨部辦事的人總是很迂緩的，沒有政治部的人辦得敏捷。」他希望我們敏捷地另外樹一根旗竿，把那屋頂中央的旗竿讓給他們。

這本來是無可無不可的事情，但因為要顧全部內同志的意氣，我也不好由他的一幽默便軟化下來。我也帶着幽默的意味說着，「國旗已經昇上了，不好無故的扯下。要說省黨部是黨部，是在一切政治機關之上，但是總政治部在出發時受了中央黨部的委託，是有指導並解散地方黨部的權限的……」

我的話還沒有說完，T把他的態度改嚴重了。他說，「你要那樣說時，那我還是中央委員啦！」

我忍不住笑了一下，說：「你是路易十四的新翻譯家，路易說「朕即國家」，你現在把它改成「我便是黨。」」

T辭去了，結果仍然是在前庭中樹了一根旗竿來，把黨旗掛了上去。

這件事情想起來真是無聊，但那時的革命同志大多數也每每愛鬧着這樣無聊的意氣。三分來是革命，七分來是做官。

和這同樣的悶氣，初到漢口時也和市黨部鬧過一次。德謨辦了一通公文給市黨部，他因為政治部受過中央黨部的委託，便把市黨部當成了下級機關，公文送去了，由市黨部的人附箋退了回來，說「本黨部不便接受這樣的公文。」結果是把中央的委託文件發表了出來，市黨部雖然沒有再說話，但是彼此間的感情便弄得很有隔膜。他們對於德謨的批評特別嚴格，說他的「官僚氣太重，不甘淡泊。」

到武昌來又由換旗這件事情鬧得和省黨部不和睦了，他們在外邊對於我的批評，又是說「書生氣太重，不甘寂寞。」

荏苒之間也就到了十一月初旬了，天氣逐漸地寒冷了下來，江西的戰事還牽延着沒有解決。幸好武昌攻破後，把第四軍的勁旅抽調了大部分人去應援，在馬迴嶺的一戰澈底地給與了敵人以致命的打擊之後，九江在六號的清晨終被南軍佔領了。這個勝利的消息到達武漢的時候，是七號的晚上，那天正舉辦

了紀念蘇俄革命的慶祝大會，在那大會的興奮還未平復的時候得到九江克復的消息，和在雙十節的慶祝會上得到了武昌攻下的消息一樣，把武漢三鎮都歡動了。

就在那天晚上，擇生由漢口打了電話來，叫我準備着到九江去。他說，「九江攻下了，南昌是不日便會攻下的，江西方面的政治工作異常吃緊，非我去主持不可。」

接到了他的命令，自然便風急火速地準備了起來，挑選了六個我認爲是能幹而必要的同志和我同去。李德謨便是其中的一個。

但那時在九江和武漢之間像黃石港一帶是還在敵人手裏的，我們要往九江便非改裝不可。恰好在八號的晚上便有一隻英國船要開往上海，我們便決定了搭乘那隻船。在八號的清早過江去，在漢口置了衣履，把裝束改了，成了名實相符的便衣隊。

因爲要避人的眼目，在晚上上船的時候只有兩位便衣同志來送行，都是漢口的負責的同志。話頭自然是每易回顧到我們初到漢口的當時，那時也是在反動勢力還在蠢動的局面上跳進去的，他們都承認我們多少是做了一些墾荒的工作。有一位是市黨部的組織部長P，爲德謨用上行下的公文和我在一次公開的會議上略略爭持過的，到這時把所有的嫌怨都化除了，他特別懇切地同我和德謨握手，祝我們的健康，祝我們的前途無恙。

把送我們上船的人送上了岸，立在甲板上看着燈光中的武漢，在我們的眼前移動了起來。素來是很沉默的德謨，在這時候立在我的旁邊自言自語地說：

——「這回可惜的是沒有德甫和我們同路。」

他這一句話正道破了我那同一瞬間的悵觸。

——「德甫停喪的地方你曉得嗎？」我問他。

——「S同志是曉得的，我幾次想約他去看看，還沒有得到機會，S便派到江西去了。」

——「我連要到長春觀去看看，都沒有去成。」

我們當時對於武昌城的留戀似乎就只有這一點。在半年以後我們雖然也回過一次武昌，但那長春觀我至今沒有去看過，德甫停喪的地方我至今也不曉得。只有那汨羅江畔的露營，崇陽山中的跋涉，咸甯道上的奔波，賓陽門外的流血，就像已經舊了的影戲片子一樣時而在我的腦中浮動着。

後記

這篇回憶錄在宇宙風上分期登載了十五次，算登完了。我現在把全部來重讀了一遍，稍微添改了一些字句。在雜誌上發表的本是三十一節，因原先的二十七、二十八兩節太短，爲保持全體的均衡上，我把它們並成了一節，故今成三十節。就儘它們以這樣的形式作爲我的定稿吧。這兒有一件事情應該附帶着提及的，是本篇在發表的『中途』上海有一家幽靈出版社，把前二十五節盜取了去，作爲北伐途次——第一集而『出賣』了。那兒公然還標揭有『版權所有翻印必究』的字樣，所謂『侯門仁義存』，真是有趣的一件事。有好些朋友說，中國人不懂幽默，但據這件事情看來，我卻感覺着我們中國人是第一等的幽默民族。——

敬錄該第一集的代序之頭一節，以爲本後記的尾聲吧：

『一九二五——二七年的大革命，中途雖然被人出賣了，但不論怎樣，它在中國民族解放革命的歷史上的烙印，是永遠不能磨滅了的。』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五日記。)

賓陽門外

這篇東西本來是北伐途次的縮寫，在爲日本改造雜誌用日文縮寫的武昌城下之前。原是應上海某雜誌的徵文寫的。因該誌停刊，原稿留在上海友人處已歷年餘。內容是怎樣我自己已不大記憶，但那寫法和北伐途次與日文的武昌城下都小有不同。這在自己的作品的製作過程上，是一項頗有趣的資料。讀者或許會嫌與北伐途次重複，但內容雖是一事，而結構並不全同，我是認爲有獨立的性質的。

（一九三六年七月十九日。）

五號的晚上又決定了要去大規模地爬城。南湖附近的農家的梯子，因第一次的爬城已被徵發乾淨了，這次所需要的更多，而且鑒於前一次去遲了招了失敗更不能不早些動手，在四號的上午便已經派人到咸寧附近去徵發去了。主持這件事情的依然是總政治部的先遣部隊。四號的晚上已經有梯子絡續地送回來，堆積在南湖文科大學的南操場上，到五號的清早一早便從事結紮，依然是梯長的兩架紮成一架，梯短的二架紮成一架，紮好了便抬到學校門外去放着。

梯數比前次的多，梯子的送來又是斷斷續續的，因此結紮的工事也就拖延着，直到黃昏時由各軍挑

撥出的混成敢死隊在南操場上取齊的時候，又新送了一批來也非結紮不可，結紮的人們只得移到學校門外去繼續着工作。

回頭天色便黑下來了，天上沒有絲毫的星月的光，全靠着十幾隻馬燈在地面上照着。有好幾隻馬燈的洋油恰在那時同時點盡了，燈光幽幽地快要熄的神氣。總司令部裏面是有燈油施發所的，設在文科大學正館的樓下。在中堂背後，正對着上樓梯的那個地方。但是政治部的人大多是新到，知道那個地方的人很少，又怕不重要的人走去要不出油來，我便把那些收集起來了的快熄的馬燈一個人提了進去要油。進去時燈光很幽暗的，倒沒感覺什麼，出來時因為燈油充足了，燈光分外地明亮了起來，兩隻手各提着四五盞燈，連自己都覺得全身都要亮透了的一樣。

提着燈走到了校門口，在那兒恰巧遇着一羣軍事上的重要的人走來，都是要上陣去督隊的。在最前頭走着是陳銘樞和張發奎，還挾着幾位俄顧問，彼此都匆匆忙忙地擦身過了沒打招呼。在那一羣人的最後有一位年青的軍官，臉色很白，身裁長而細，驟看好像是政治工作人員，但我不認識他。他突然把我指着。——『呢！你這個傢伙！』是廣東人的聲音，『你點起那多燈，真好玩啦！』

正在那時候在督着結紮梯子的鄧擇生走了來，要跟着那羣軍官們進裏面去。那位罵我的年青軍官沒待我回答，又急忙和擇生打話。

「呢？鄧大主任，這位一定是你政治部的尊駕啦！」

「怎麼樣？」擇生說。

「毫無軍事上的常識！在敵人面前點這多燈，好做礮靶子嗎？你看，他還不肯吹熄啦。」

「你莫那樣神經過敏，」擇生回答他，「一座大學堂在後背擋着，敵人怕會有千里眼。現在不點燈，沒綁好的梯子怎麼辦？」

「好了，和你講是講不清的，我現在很忙。」軍官說着便匆忙地向走上前頭去的人趕去了。

「那是誰？」我問擇生。

「是黃琪翔，你不知道他嗎？」擇生也匆忙地趕進去了。

我把燈分佈開來，督着把梯子綁完好了的時候，隊伍已經開了出來，仍然和前次一樣，八個人扛一架梯子，八個人做護衛，兩組人在途中是要交代的。把梯子扛好的便一隊二隊地向那漆黑的和死境相隔不遠的夜空中消隱下去。

督隊的軍事上的長官們最後又湧了出來，其中有擇生和政治部的顧問鐵羅尼，通譯紀德甫。本是軍人出身的擇生，凡遇戰鬥總是要上前線的。鐵羅尼也是騎兵將校出身，和擇生是形影不相離的人。通譯的紀德甫本來沒有去的必要，因為他們兩人可以用德語會話，但他和前次一樣沒有迴避了自己的任務。德

甫是很沉默的一個人，故鄉是在山東，自從由廣東出發，尤其是由長沙出發以來的幾天中，我們雖然時常在一道，很少有談話的機會。他的身裁高長，瘦削，背略略有點弓；面孔也瘦削，帶着黃色。年紀只有二十五六的光景，但和年紀不相稱地大有蕭索老成的氣象。不過你假如肯留意看他，在他那雙黑矍矍的眼睛裏，是有青春和熱情留寓着的。

擇生和我拉了手，鐵羅尼也和我拉了手，他們不期然地都用德國話來說：

“Wiederssehen, Morgen in Wuchan wiederssehen!”（再見，明天在武昌城內再見！）

紀德甫最後也來和我拉手，素來寡默而蕭索的他卻異常的高興，他說，「這一次再不成功，我是不回來見你們的。」

——「好的，不用你回來，我們會跟上來的。」他說得很爽快，我也很爽快地回答了他。

他們和幾位揹着駁壳槍的護兵也走了，走不上十幾步遠，除掉有些步伐聲之外，通和黑夜融成了一片。

*

*

*

敢死隊出發後沒上兩個鐘頭的光景，礮火的聲音猛烈地起來了。就那樣終夜不斷地繼續着，直到快要天亮的時候，槍礮聲才漸漸地竭了下來。不知道是從什麼地方傳來的消息，說是武昌城已經攻破了，正

在城裏巷戰。但攻進去的城門，其說卻紛紛不一，有的說是賓陽門，有的說是通湘門，有的說是武勝門；先攻去的軍隊也有的說是第八軍，有的說是第一軍，有的說是第四軍。政治部的電話和前方失掉了連絡，幾次打電話上前線去都打不通，從前線上也沒有電話回來。我叫宣傳大隊長的胡公冕到總司令部去探問了兩次。第一次他回來的報告是見着了參謀長白崇禧，說是有攻進了城的消息，據說是第八軍，但還沒有得到前方的確報。第二次是見着了總司令，也說有攻進了城的消息，攻進城的是第一軍。總司令正在向前方打電話探問實情。

得到了第二次的報告時已經是清早了，槍礮的聲音早是停止了，我便決心把政治部的先遣隊全部開發向前線，好趕進武昌城去作必要的政治工作。部員們在南操場整隊的時候，我自己又向繫在正館樓上的總司令部跑去，想探問最後的虛實。剛才跑到樓梯脚下，遇着已經任命為湖北財政廳長的陳公博，由樓上下來，我問他情形是怎樣，他說，消息是的確的，他也要立刻進城去了。

我便立地又折回南操場，把已經整列好了的部員們督率着開發。

胡公冕騎着他的一匹矮小的青馬走在最前頭，領率着宣傳大隊。其次是政治部的工作人員，我和幾位重要的負責人在最後走着。走出文科大學的校門時大家都很有點風光，特別是騎在馬上的胡大隊長就儼然像一位凱旋將軍一樣。

路上有不斷的逃難的人挑着家什行李的，由城坊跑來，我們便開始了我們的宣傳工作。『城已經攻破了，不要逃難了，我們現在正是要進城的。』有些聽了我們的話，很高興地挑着擔子便回頭走，但也有些有點狐疑，或把擔子放下，或駐一下腳又各自挑往前去了。

我們走到了那快要分路的三叉口上來，那兒有三條路好走，端直走去是通通湘門，左走是通保安門，右走是向洪山，通賓陽門。在那兒又遇着了陳公博，他騎在一匹棗驪馬上正在躊躇：因為端直的那條路上是很慘淡的，不見一個人影。他是朝左手走去了，我們卻和他反對向通賓陽門的洪山方面走去。因為早就決定下了的，進城後總政治部的駐劄處是和賓陽門相近的舊省議會。

朝右走去，走不好遠便要通過一段全無掩護的地面。公冕的那匹青馬本來是毫沒經過訓練的驚馬，但它的神經卻是比人還要銳敏，從有掩護的小徑上一要走進那段空曠的地面時，它立刻便囉哼了起來。無論怎樣鞭打它，它都不肯前進，結局是人立了起來。弄得沒法，公冕也只得跳下馬來，那走在最前頭的馬拉在最後頭來了。

天氣是很晴朗的，自從初到武昌城下的八月三十一號的晚上過一次暴雨，以後接連都是晴天，土面乾燥得和沙漠相彷彿。地裏種的蕃薯，因為經過這幾天來的隊伍的踐踏，已經殘敗得不堪，在正中處形成了一條小道，踏上那地面便可以看見武昌城，在白茫茫的朝陽中橫亘着。地上有幾乘單獨的梯子，自然

是因爲沒綁好，由昨夜的敢死隊們所遺棄了的。這段路，我同公冕在前兩天往前線上去視察的時候是走過的，去時因爲只有三個人，不會遇着什麼，回來的時候適逢有一隊伙子送中飯到前線，走到那正中處，敵人從城牆上放了三次大礮來，最後的一次打開了花，打傷了一名伙子，把我們帶去的一位宣傳員也打傷了。這回我們又走到這段路上來了。我們是堂堂地整着隊伍走的，宣傳大隊的旗子打在最前頭，政治部的兩面大旗打在正中，這在武昌城上當然是很明晰地可以看出的。

剛好走到正中處，突然轟隆的一聲飛來了一聲大礮，從隊伍頭上打過，在離四五尺遠的地面上起了一陣土煙。礮彈幸好沒有爆開，但是隊伍卻是爆開來了。胆怯的把手裏攜帶着傳單和標語通通拋棄了，駭得四散。這四散卻又正散到好處，轟隆的又是一聲，這回的土煙正起在人四散開了的路上。這回也沒開花。但就應着這第二次的一聲，在地裏卻有一個人倒了。那是機要股的S，大約他平常是有肺病的，因爲連吃兩驚，在地上打了一突坐，接着又吐了兩口血。在他還沒時間立起身來的時候，又是轟隆的一聲，這回打得更近，在不及小路的地裏起了土煙。但這一次也應該感謝那騙錢的帝國主義者，不知道那一國把不中用的廢彈賣了給我們的軍閥的，依然是沒有開花。

在受了那三聲敬禮以後，好容易把那星散了的隊伍督率着通過了那段危險的地帶，城上也再沒有動靜了。

——「這回也是三礮，」在走到了對邊有掩護處的時候我對公冕說：「我想怕是那段城牆上剛好安置了三尊大礮，一齊打了之後，要裝彈，要描準，所以便再沒有下文。你看是怎樣？」

——「大約是，」公冕答應着，他接着又讚嘆着說：「敵人還不錯，城內在巷戰，公然還有這樣的鎮靜。」

——「怕靠不住罷？你相信城一定是攻破了嗎？」

——「是老總親自對我講的啦。」

從前線上也有些零星的隊伍回來，我們問他們，他們也說不準確。從洪山方面逃難下來的人是絡繹不絕的。

我對於破城的消息終不免懷疑了起來，決定把部員們暫時停寄着不動，由我和公冕及其它自告奮勇的三五個人往前線上去探視。

*

*

*

走到離洪山不遠的地方，從對面有一架扛架抬來，後面有一位提着駁壳槍的護兵跟着。看那情形自然是受了傷的官長。

我們和扛架愈見接近了，架上的人是用一件黃色的雨衣把面孔和上身罩着的，兩隻腳露在外邊，在

黃色的馬褲上裹着黑色的皮裹腿。我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了那打架上，心裏在想着那受傷的人不知道是死是活，也不知道是那一軍的軍官。

當那打架和我們擦身過的時候那後面跟着的護兵突然向我屹立着，舉手敬禮。

——「報告！」他叫着。

我注意看去，才知道他就是擇生的護兵楊生，整夜在前線上的勞瘁使他的面孔黑得來幾乎不能認識了。

——「主任……」

——「主任怎樣受了傷嗎？」

——「無係，係是……」

沒有等他的話說完，由那打架上的服裝立地喚起了我的記憶和判斷，我已經知道那打架上的人是誰了。我連忙跑到打架旁邊，把那蓋着面孔的雨衣揭開了來，現出了紀德甫的面孔。兩隻眼睛睜着，定着，失掉了光彩。黃色的面皮失掉了彈性，就像青銅鑄就的一樣，口是隙着的。這在我們學過醫，看慣了死屍的人，一眼便可以知道他是已經死了。灼熱的眼淚頓時在我眼眶裏鼓盪了起來。

——「主任有信，」楊生從他的懷中搜出了一張紙片來給我，是從抄本上撕下來的一頁。

「××同志！」

攻城計畫又遭失敗，敵人仍頑強抵抗，我軍死傷甚衆。德甫同志於今晨正六時陣亡於賓陽門外長春觀內，至可傷悼。後事望兄從厚料理。

Yenda Den 七時十分於長春觀」

擇生的署名慣愛把自己的名姓用羅馬字寫成「演達·鄧」的，他這幾行誠懇的手書使在場的人像着了電的人，不期然地對着德甫的屍首把頭低下去沉默了一會。

攻進了城的消息不用說完全是謠傳了。發生這種謠傳的動機或許是有意識的，因為先攻進城的部隊在論功行賞上是要掌握武昌以及湖北全省的統治權的。這兒充分地有容納一種小小的陰謀的餘地。大家沉默了一會之後，又擁護着德甫的屍首回到部員們停寄着的村落上去。這回把旗幟收捲了起來，在通過那段危險地帶時，用了散兵線零零碎碎地過去，城上的大礮是沉默着了。

在走回文科大學的途中，我始終跟着德甫的屍首，楊生也始終跟着我。我從他那很難懂的廣東話中，不完不全地算把那夜襲的情形得到了一個大概。

敢死隊在快要走到城下的時候，敵人卻早有了準備。賓陽門附近的城牆上敵人點起了一帶的火把，把城牆上下照得通明。槍礮不息地亂射起來，所有夜裏的槍礮聲大部分都是敵人的。但是我們的隊伍也

有一部分衝到了城邊，更有少數的人爬上了城，但都被敵人劊下了城來。敵人的手榴彈機關槍打到天快亮都沒有停止過。

鄧主任騎的一匹馬也被打死了。他們在前線上督戰馬突然倒了，是一個子彈打中了馬的腦殼，那子彈從鄧主任的左脇下穿過，把軍服的左袖打穿了一個洞，但恰好沒有受傷。

在天快亮的時候，他們上了長春觀，那兒的地面高，和城牆的一角幾乎在一個水準上，相隔也只有二三十丈遠。他們躲在土牆背後，時而用駁殼槍和城牆上的敵人對打。把頭伸出去，向城牆上打一槍又趕快縮下牆來，敵人也曉得這邊有人埋伏着，便時時用機關槍來掃射，子彈打在長春觀的瓦上真個就和下雨一樣。就在六點鐘的時候，紀德甫又把頭伸出牆去探望，正回過頭來向坐在牆腳下的鄧主任和俄顧問報告的時候，隨着一聲槍聲，他便向牆下倒去，鄧主任和俄顧問趕快把他扶着。他們把他移在草地上睡下，問他怎樣，他說：『我無係要緊，你們當心。』聲音很微弱的，但就說了那句話，便沒有聲息了。

楊生說着，在他的聲音中含着哭的意思，特別是臨終的那兩句話，他是返復說了幾遍的。

——『我無係要緊，你們當心。』

德甫的屍首抬回了文科大學，停放在臨着南操場上的一間樓上的講堂裏。我一方面叫人去替他採

辦衣衾棺木，一方面得着幾位部員的幫助把他身上的軍服解開了來檢驗了他的傷痕。

槍彈是打中了後頭部，但一個子彈卻打穿了三處。從後頭骨左側打進，從後頸窩下穿出，又從右肩頭打進胸部，由肩胛骨右下隅穿出；最後又打穿了右側大腿的右側的皮部，子彈的餘勢才盡了，融成了三個顆粒，籠在了馬褲裏面。

接着又檢驗了他隨身所有的物品，除掉所穿的衣類之外，手上有一架錶，衣袋裏有一個錢包。錢包是皮製的，是俄國製品，很舊。錢包裏面所有的是——兩張當票和兩個銅板。這便是他所有的一切。當票是廣東的當舖所開的，字很奇怪，不知道所當的是什麼。但就情理推察，總不外是被服和書籍之類，因為要向前方出發，那些東西是不能夠隨身帶走的。

* * *

德甫就在那天下午裝進了棺材，暫時停寄在學校後庭的一個小小的格納庫裏。第二天清早全體部員在格納庫前爲他致祭，隨着由幾個同志把他送到鄰近去殯葬的時候，他的棺材中已經有腐臭瀰散出了。我因爲工作忙，沒有去送他，不知道他的殯地是在那兒。但在殯殮了他的那天夜裏，睡在那文科大學頂後一排的樓上的一間寢室中，做了幾首哀悼他的詩，卻是幾首舊詩：

一棺蓋定壯圖空，身後蕭條兩板銅。
沉毅如君偏不祿，人間何處弔英雄？

回思夜襲臨歧語：不破堅城矢不歸！
今日成屍橫馬革，難禁熱淚滴君衣。

患難相隨自汨羅，陣中風露飽經過。
人生自古誰無死？死到如君總不磨。

一彈穿頭復貫胸，成仁心事底從容。
賓陽門外長春觀，留待千秋史管彤。

此
页
空
白

雙簧

這是一九二六年的雙十節，北伐軍攻破了武昌城時的一段插話——

北伐軍在圍城四十天之後攻破了武昌，生擒了劉玉春陳嘉謨，又恰逢着國慶紀念日，漢口民衆的熱狂真是到了一百度以上。

漢口的青年會在幾天前早就決定下了在雙十節的晚上要敦請政治部的主任鄧演達去作講演，該會的執事們在遍街貼着紅紙金字的佈告招誘聽衆。但到了雙十節的那天晚上來，鄧演達因軍事上的勞頓，又因還有別的事務不能分身，他便叫我去代理。

青年會的人最後來催的時候已經九點過鐘了，我便把當時宣傳科的組織股長李鶴齡拉着，一道去代理講演。

到了青年會，因爲預定的時期早已過了，立地被引上了一個大講堂，在那兒已經塞滿了無數的聽衆。剛好在講壇靠壁的一排靠椅上坐定，由迎接我們來的一位人（大約是幹事）向着另一位在壇上

司會的高長大漢，驟看頗像西洋人的，打了一番耳語之後，司會者略略向我們目禮了一下，便宣佈開會。這司會者不僅風格像西洋人，連說話的聲調也是西洋式。

——「兄弟，現在，宣佈開會。讓我們大家起立，讓我們唱讚美歌。」

大家都起立了。讚美歌的號數當得是先決定好了的，壇下右側的前兩排都是坐的女生，其中有一位年長者步到右隅斜橫着的一架大風琴前坐下，奏起了樂譜來，歌聲接着唱出。

讚美歌唱畢後，司會者又開始祈禱。祈禱過後又作開會辭。那開會辭是很嚴重的，而且是很雄辯的。大抵青年會的幹事都是雄辯家，他們那犀利的口舌真是他們的犀利的武器。

開會辭頗長，怕支持了有三十分鐘。全辭自然是不能夠記憶。但那主眼是在孫中山乃基督教信徒。

司會者說：「北伐軍打敗了北洋軍。但北伐軍的將領們是誰的信徒呢？是孫先生的信徒。孫先生又是誰的信徒呢？是我主耶穌的信徒。所以凡是信仰我主耶穌的便得到最後的勝利，北伐軍的勝利是我主耶穌的勝利。」

接着用最上級的讚美詞稱揚着鄧演達，說「他這位革命偉人像美國華盛頓法國拿破崙，是中國空前絕後的人物。」但一轉語仍不外是鄧演達是孫中山的信徒，孫中山是基督的信徒的三段論法。

司會者又說到鄧演達的因為勞瘁不能到場，他說他是抱着很大的遺憾，他「將要在另一個機會上

去請這位革命偉人來抒他的革命偉論。今晚上就只好聽聽我們這位革命偉人所派來的代表向我們演說。」

於是他便指揮我去講演，演臺下一遍狂濤般的鼓掌聲。

目前的儀式本來是基督教所固有的，論理並不稀奇。鄧演達在當時以一人而身兼三主任，總政治部主任，湖北省主任，總司令部行營主任，名實相符地有「三頭六臂」的神氣。青年會的那位大幹事要稱他爲「空前絕後」的「革命偉人」，要請他來講演以廣基督教的宣傳，要因他之不能親來而抱着無限大的失望，要看不起像我這樣的無名小卒，自然也是萬分在理的。但是當時是在「國民革命」高潮期中，而當時的指導精神之一是「反對文化侵略」，即是反對基督教的。我自己未到場之前心裏滿以爲青年會是爲革命的勢力所懾所以才請老鄧來講演，縱使有意在利用，但總會通融一些，把所有一切形式上的儀式免掉，免得講演者作難。殊不知一到講演場來，才是這樣的一個嚴陣。司會者以十足的基督教意識逕直把我當成了一匹贖罪的羔羊拉到這樣嚴重的基督教的軍門來做燔祭。他說你是耶穌基督的徒孫，或者徒會孫，你的革命的勝利是耶穌基督的勝利；你一個打着「反對文化侵略」的旗幟的人，不怕僅僅是一名小卒，看你怎麼樣？司會者對於他的宗教自然負有宣傳的責任，但你對於當時的「革命」不是也負有宣傳的責任的嗎？別人對於自己的責任，遵守得那樣的忠實，宣傳得那樣巧妙，而你就只能夠成爲一條贖

罪的羔羊，白白地就讓那法利賽人加上柴火？

一自入場以後，聽着唱讚美歌，聽着司會者作祈禱，致開會辭，我自己惶惑得啼笑皆非，苦於無法對付。鶴齡似乎也和我一樣地惶惑，時時以含着怒氣的眼睛望着我，是問我『究竟怎麼辦？』我的眼睛一直沒找着答話來的時候，司會者已把開會辭講完，揮我去講演。

狂濤似的鼓掌聲終竟把我這匹羔羊逼促着走到了壇前。

就在和寫文章的途中突然有妙意飛來的一樣，在我向着司會者和聽衆致了敬禮，燔柴正要着火的時候，我卻得了一番天來的惠雨。

我先對聽衆說，『我自己的正式的講演要留在後面，在講演之前還得行一次儀式。剛才司會者某先生所行的儀式是基督教的儀式。某先生是基督教徒，自然要行基督教的儀式。但我們是革命軍人，我們革命軍人在講演之前也是有革命的儀式的。這儀式是要先推一個主席，由主席宣佈開會，讀總理遺囑，默哀三分鐘，然後才落到我的講演。我們現在就先推李鶴齡同志爲主席。』

這樣一提出，聽衆逕直熱狂化了，鼓掌聲比前兩次的更高更長，就像始終不肯止息。滿場充滿着和惠的眼光，我知道聽衆已經完全是我的。一直到鶴齡起來，對大衆宣佈開會，大家才肅靜了起了。

鶴齡本是極機敏的人，他做着臨時主席把開會的程序執行如儀，於是才又揮我去講演。

又是一陣狂烈的鼓掌聲。

我的講演怕有五十分鐘的光景，詳細的語句自然是不能記憶的，但大概的意思卻還留在腦裏：因爲關於這一方面的我自己的思想和客觀的事實至今還沒有改變。

我說，我自己是深能了解耶穌基督和他的教義的人。新舊約全書我都是讀過的，而且有一個時期很喜歡讀，自己更幾乎到了要決心去受洗禮的程度。但我後來爲甚沒有受洗禮呢？是因爲我恍悟到了我們中國人沒有再受洗禮的必要。自鴉片戰爭以來的我們中國人，自生下地來，已經便是基督教徒，而且一輩子都是實行着基督教義的。譬如，基督說，你要愛你的鄰人，甚至愛你的敵人。有人如要剝你的外衣，你索性便奉送你的內衣。有人要打你的右臉，你索性更讓他打你左臉。這些愛的教義，我們中國人一直不假言說是實行着的。怎見得呢？有人割去了香港，我們索性便讓他租借九龍。有人奪去了安南，我們索性送他一條滇越鐵路。有人佔領了朝鮮，我們索性奉送以滿蒙。我們中國人，真真是比任何基督教徒還要基督教徒。基督說：你要積天上的財，施舍你地上的財。有錢的人想進天國，比駱駝想穿過針眼還要難。我們中國人呢？那是把地上的財老早拋得一乾二淨了。銀行，礦山，鐵路，郵政，內河航業，內海航業，工廠，商場……凡是可以生財的產業，沒有一樣不已經拋得精光。我們中國人大家都瘦得來像一條線了，天國的門不怕就只有針眼那般大，我們是已經有充分的資格穿過去的。」

我盡力說了一番隔的理論，大大地受了聽者的歡迎，笑聲，掌聲，轟隆地不絕。

我最後是如那位魁梧的司會者之稱鄧演達爲「革命偉人」一樣，我稱之爲「基督教偉人」。我說他以中國人而又信奉基督教，那是雙料的基督教徒，怕比基督還要基督。不過，我可惜他是局在了漢口，猶如基督是釘在十字架上，不能發展他的天才。他應該是往倫敦巴黎紐約東京那些地方，讓那些地方的「駱駝」充分地縮小起來，可以「穿過針眼。」

說得大家又哄堂大笑，我在熱烈的鼓掌聲中把講演作結。

「基督教偉人」委實是一位魁梧的「基督教偉人」。他乘着我把話講完了便又向着聽衆廣續致詞。

他這次特別恭維起我來，說我是一位「空前絕後的」——又是一個「空前絕後的」——雄辯家。然而我之所以善於雄辯，是因爲我是「中山信徒」而中山又是基督信徒，所以要「請大家信仰基督，才能有這樣的雄辯。」

這次倒把李鶴齡惱殺了。我的演說是客氣的隔，鶴齡於是便也開始演說起來，他是率性不客氣的不隔。

他說，中山的信教是他早年的事體，他一生教人革命，卻不曾教人信教。宗教是怎樣的東西，是怎樣害

了中國，是怎樣和革命不能兩立，而一些吃基督教飯的騙子是怎樣胡說白道，東拉西扯，當場便是證據。他以他那從巴黎練習回來的廣長舌，滔滔地捲了一個鐘頭，說得那位司會的「偉人」實在有點難乎爲情。接着鶴齡又叫聽衆起立，唱國民革命歌。

那簡單的國民革命歌自從北伐軍入了武漢以後，早就是傳遍了的。鶴齡一提頭，幾乎滿場的人都合唱了起來，連那位彈風琴的教會出身的女音樂家也把那簡單的樂譜伴奏了起來。

接着是高呼口號，鶴齡喊一聲，聽衆也跟着喊一聲。他喊出「反對文化侵略的基督教政策！」的時候，右手最前兩排的教會女生們似乎響應得特別高，她們就好像一向受人欺負，今晚才得到機會要圖報復的一樣。

口號一喊完，在無數的萬歲聲中熱狂了的羣衆像潰了隄的海潮一樣向會場外湧去。

「偉人」這才張皇起來了，帶着哀怨的聲音高叫着：「請大家沒忙走，我們還要做祈禱，還要唱讚美歌啦！」

羣衆中只聽有人在叫着：「要什麼祈禱！要什麼讚美歌！不唱了！不唱了！」真的想挽回那既倒的狂瀾，只有人民的力量才能够。

革命書社

著者 郭沫若

發行人 俞鴻模

印刷者 大華印刷所

上海山西北路五八三號

刊行日期 一九四九年七月

• 有 所 權 版 •

刊行者：

海 燕 書 店
上海四川北路一四六六弄六號

總(27)全(A-1-2) · 2(2001-5000)

蘇聯研究叢書 蘇聯文學史



季莫菲葉夫·水夫譯

蘇聯的每一勝利都是世界性的勝利，都是符合全體進步人類的福祉的。蘇聯文學的每一勝利也都是世界性的勝利，也都是符合全體進步人類的福祉的。

蘇聯文學作品的被紹介進我國，少說也有二十年的歷史。但直到現在還不曾出現過一本總的、全面的、有系統的論述。本書爲蘇聯僅有的這方面的著作，文字深入淺出，內容從十九世紀起，直到十月革命、內戰時期、恢復時期、重建時期、衛國戰爭前一時期、衛國戰爭時期、戰後時期等。對於未來主義、批判現實主義、象徵主義、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等文藝派別和最近一次文藝界的肅清運動，都從社會的階級的基礎上給予精確的分析，對於大匠的作品均有具體詳盡的批評。最後一章紹介蘇聯各兄弟民族的文學，材料新穎。在蘇聯這本書被用作中學十年級學生及大學學生的文學參考書，已增補再版了好幾次。全書四十萬言，附精印作家肖像三十幅及作家人名索引表，尤爲生色不少。

本書內容

- (1) 九十年代——俄羅斯文學發展的新時期
- (2) 文學的新任務
- (3) 高爾基創作道路的開始
- (4) 第一次俄國革命時代的高爾基
- (5) 兩次革命中間那一時期的高爾基
- (6) 十月革命後的高爾基的創作
- (2) 接近高爾基的現實主義作家
- (8) 詩歌中的現實主義
- (9) 批判現實主義
- (10) 象徵主義
- (11) 華列里·勃柳索夫
- (12) 亞力山大·勃洛克
- (13) 十月革命後社會主義現實主義的發展
- (14) 蘇維埃文學的主要發展時期
- (15) 符拉其米爾·符拉其米洛維奇·馬雅柯夫斯基
- (16) 馬雅柯夫斯基革命前的創作
- (17) 十月革命後的馬雅柯夫斯基
- (18) A·托爾斯泰
- (19) 蕭洛霍夫
- (20) 法捷耶夫
- (21) 蘇聯各民族的文學



郭沫若先生四大巨著

(本集全開五十二正訂)



少年時代

·自傳第一卷·

本卷包括作者二十一年之生活，自一八九二至一九一三年，共分四
大章：童年時代，反正前後（中學時代），黑貓（結婚生活），初
出遊門（離川去日本留學前之生活）。共二十四萬字。定價十八元。

今昔蒲劍

·學術論文合集·

「今昔集」及「蒲劍集」之合集。作者近年來之重要論文，如「論
古代社會」、「論儒家的發生」、「論古代文學」、「莊子與魯迅」、
「民族形式商兌」等，及關於屈原的研究論文多篇，均編入本集。
定價十六元五角。

歷史人物

·歷史人物研究·

本書包括人物研究論文九篇：論曹植，隋代大音樂家萬寶常，王安
石，王陽明，甲申三百年祭，夏完淳，王國維與魯迅，論郁達夫，
論開一多做學問的態度。定價九元。

地下與地上

·小說集第一卷·

這是郭先生小說的第一卷，分七輯，計中短篇小說廿五篇。如「落
葉」、「塔」、「漂流三部曲」、「歷史小品」等，均為百讀不厭
，受過讀者熱烈歡迎的作品。全書三十萬字。定價二十二元。



海燕書店 簡明目錄



郭沫若著作

—新排之廿五開全集本—

少年時代(沫若自傳第一卷)	18.0
革命春秋(沫若自傳第二卷)	19.0
歷史人物(人物研究)	9.0
今昔蒲劍(論文集)	16.0
地下的笑聲(小說·散文一集)	22.0
抱箭集(小說·散文二集)	15.0

文學

理論·史·批評

蘇聯文學史(蘇聯研究叢書)	水夫譯	300
論民族形式問題(文藝論文集)	胡風著	70
密雲期風習小紀(文藝論文集)	胡風著	60
文藝探索與人生探索(文藝論文集)	夜澄著	00

創作小說

任務(中篇)	侯千城著	排中
受苦人(七月文叢·短篇集)	孔厥著	40
第一擊(七月文叢·短篇集)	亦門著	80
求愛(七月文叢·短篇集)	路翎著	40
人生賦(七月文叢·短篇集)	楊力著	50
結合(七月文叢·短篇集)	晉駝著	50

在鐵鍊中(中、短篇集)

偉大的教養(短篇集)

地下(長篇)

沃野(長篇)

烽火天涯(長篇)

翻譯小說

荒漠中的城(長篇)綏拉非摩維支著金人譯 18.50

『遺失街』風習(長篇)耶斯賓斯基著水夫譯 13.50

初戀(長篇)弗拉易爾曼著穆俊譯 10.00

有錢的同志(短篇集)A.雷森等著什之譯 6.00

新時代的曙光(中篇)淑雲飛珂著斯曠譯 5.00

隨爾蒂可夫寓言(短篇)蔣天佐譯 4.80

三天(電影小說)戈爾巴打夫著斯曠譯 3.00

巴爾扎克小說集

杜爾的教士(獨身者三部曲之一)高名凱譯 3.40

畢愛麗黛(獨身者三部曲之二)高名凱譯 6.00

單身漢的家事(獨身者三部曲之三)高名凱譯 12.00

葛蘭德·歐琴妮 高名凱譯 8.80

幽谷百合 高名凱譯 12.00

兩詩人(幻滅之一) 高名凱譯 6.00

外省偉人在巴黎(幻滅之二) 高名凱譯 14.00

發明家的苦惱(幻滅之三) 高名凱譯 8.40

老小姐 高名凱譯 5.80

古物陳列室 高名凱譯 6.30

米露埃·雨兒骨 高名凱譯 11.50

路翎著 10.00

任何著 5.60

程造之著 12.50

程造之著

程造之著

地區的女詩人

高名凱譯

詩

列寧是我們的太陽 瑪耶可夫斯基著 之分譯 5.00

鐵鍊(七月文叢·詩集) 魯藜著 4.10

又是一個起點(七月文叢·詩集) 綠原著 5.40

她也要殺人(七月文叢·長詩) 田間著 2.80

突圍令(詩集) 莊湧著 3.00

劇本

列寧在十月(電影劇本) 卡普勒著 什之譯 4.50

海濱漁婦(獨幕劇集) 雅魯納爾等著 什之譯 7.80

賭棍(獨幕喜劇) 戈果里著 什之譯 2.50

兩代的愛(五幕劇) 巴人著 6.70

費娜小姐(三幕悲劇) 巴人著 5.50

雜文

掛劍集(七月文叢) 舒蕪著 7.80

史地

蘇聯的土地與人民(蘇聯研究叢書) 陳原譯 排印中

蘇聯外交史(蘇聯研究叢書) 華崗編 排印中

太平天國史 華崗編 排印中

傳記

傑克倫敦傳 I. 斯通著 董秋斯譯 16.00

尼古拉梭夫傳 裴柯夫斯基著 俞鴻模譯 1.60

音樂

民族音樂論 V. 威廉士著 沈敦行譯 4.80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17 5759B



上海

上海舊書店
基本定價
十元
售價 0.90